



新社会学文丛

新古典社会学的 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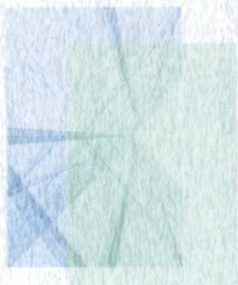
Imagination of
Neo-classical Sociology

〔美〕伊万·塞勒尼 (Iván Szelényi)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magination of Neo-classical Sociology

塞勒尼等人试图通过对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验以及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塞勒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和最具有原创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

——麦克·布洛维（美国社会学学会前会长，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5097-1706-6



9 787509 717066 >

ISBN 978-7-5097-1706-6

定价：49.00元

新社会学文丛



Imagination of
Neo-classical Sociology

新古典社会学的 想象力

〔美〕伊万·塞勒尼 (Iván Szelényi) 等/著
吕 鹏 刘建洲 王颖曜 闻 翔/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 / (美) 塞勒尼等著; 吕鹏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8

(新社会学文丛)

ISBN 978 - 7 - 5097 - 1706 - 6

I. ①新… II. ①塞…②吕… III. ①社会主义制度 - 研究
IV. ①D03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583 号

· 新社会学文丛 ·
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

著 者 / [美] 伊万·塞勒尼 等
译 者 / 吕 鹏 刘建洲 王颖曜 闻 翔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责任校对 / 姜夕芬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3.75
字 数 / 40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706 - 6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言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写就的文章，因而涵盖了我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智识进展。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题，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的，是我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切。

文集的第一编主要是经验性的，不仅勾勒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勾勒了这些不平等的来源。

第二编是对我在匈牙利所做经验调查的理论反思。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经验上可观察到的不平等的阶级结构，有什么样的意义？

第三编既包括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同时，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没落，我也对社会体制的性质进行了概念上的反思。这一编探索的，是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大多数经验数据都来自我的祖国匈牙利；作为一名“民族志研究者”，我觉得自己对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理解得最为透彻。但是，我并不将自己看作是一位地区问题专家。我将来自匈牙利的资料看作是“个案研究”。我的目的一直是试图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以及各种后共产主义政体之间的系统性差异。

在本序言的一开始，我将对自己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做几点评论。

《住房体系与社会结构》一文于1972年首次以英文发表，但是文章所使用的资料却来自20世纪60年代几个不同的问卷调查。

1966年，我开始了与捷尔吉·康纳德（Gregöry Konrád）几乎长达十年的合作。康纳德拥有法语和法国文学学位，却不能（或不想）在中学里谋取一份教职（中学教员是拥有这一学位的人的典型归宿）。他在布达佩斯郊区一个名叫“芝加哥”的贫民窟里做了一阵子社工〔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小说，叫《办案员》（*Case Worker*），正是对那段岁月的一个半自传体性质的描述〕。1966年，他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到匈牙利国家城市规划院工作，而我当时是布达佩斯城市规划所的一名兼职研究人员。1966年1月或2月的某一天，我们在这两个机构举办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首次见面，其间讨论了我們之间可能进行的合作。我们相见恨晚，会议结束之后，康纳德邀请我加入他的机构开始一起从事研究。我们的第一个项目针对的是布达佩斯和三座省会城市里的新住宅区。1969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以一本专著的形式出版，书的标题是《新住宅区的社会学问题》（*The Sociological Problems of New Housing Estates*）。这部著作作为我们将对住房社会学做出的贡献打下了基础。

在开始调查时，我们预计，这些住宅区的住户主要是工人阶级。虽然我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共产主义者，但很明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将把质量较高的新住宅分配给工人，毕竟，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应该是工人的国家。十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并非如此。总体上说，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这些新住宅区里的比例，要比他们在我们所调查的城市里的比例更高。为了确认我们完全控制了所有的人口统计变量，我们做了另一项调查。这一次，我们从佩奇（Pécs）和塞格德（Szeged）这两座城市随机抽取样本。这项调查的结果为我们早先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还搜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相关数据，结果都指向同样的方向。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我于1973年在匈牙利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又写了一本书。但是在当时，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可以将这本书以匈牙利文出版，于是，该书于1983年以《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城市社会不平等》为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

关于经典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住房问题，《住房体系与社会结构》一文是我当时所能做出的最清晰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陈述。^① 约翰·雷克斯

① 我是在亚诺什·科尔奈于《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所提出的“经典社会主义”一词的意义上使用“经典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

(John Rex) 将韦伯提出的理论应用到对住房建设的分析上，这一点启发了我。按照雷克斯的解读，韦伯提出了一种关于各阶层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被应用于各种市场情境。因此，为什么不将住房市场上各种强势和弱势的战略性位置界定为“住房阶级”呢？于是，我对住房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做了区分。那些位于公共部门顶端的人收到的补贴最多，因此最为强势；而那些位于私有部门底端的人则最为弱势。我还试图用这幅“住房阶级”的图景来反驳有关“职业阶级”的描述；我发现住房体系往往导致社会特权的累积，那些在工作上春风得意的人往往在住房体系中也处于有利位置。我还提供了一组“动态分析”，引入了“住房流动性”的概念：我不满足于讨论静态的图景，我想要拍摄动态的“影片”，去追踪住房体系中各种社会群体的运动。顺便提一下，后来我才知道这恰恰与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的想法一致，他当时正在发展他的“空屋链”(vacancy chains)概念。我只是没有他所掌握的数学知识，无法从数学上建构住房流动的模型。

1971~1972年，我知道我必须发展出一套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成熟的“政治经济学”，但当时我的头脑中仍是一片空白。我后来的两篇文章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于1971年用匈牙利语发表了《城市化不足下的社会冲突》一文。之前我的著作无人提出异议，这一次却第一次引起别人对我文章的不满。《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一文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再也无法以匈牙利文发表，于是在1981年以英文发表。这两篇文章显示，特权和弱势的累积不仅仅限于住房体系，在整个地域体系之中都可以观察得到。一个人在这一地域体系中处于何处，意味着这个人可以获得何种公共补助和稀缺资源；不仅仅存在住房阶级，而且存在“聚落区阶级”(classes of settlements)，也就是那些居住在边远小乡村的人，他们的穷困程度是城里人的2~3倍。^①

乍一看，《城市化不足下的社会冲突》像是在说社会主义的经典体系是反城市、亲农村的。但这并不是我要说的意思，从《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一文中应该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城市化不足下的社会冲突》一文的主要观点是说，国家社会主义是反基础建设（以及反私人消费）的。列宁主义将社会主义从一项致力于满足人类需要的规划，转变为致力于加速经济增长

^①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应该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你们对城乡不平等的社会含义非常熟悉。

尤其是工业增长的规划。伴随着“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苏联的领导人开始沉迷于“赶超”西方，因此尽可能多地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称的“第一部门”投资，也就是投资于生产资料的生产。正如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领袖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去吃能下金蛋的鹅。在基础项目上投资，比如建造住房，就如同吃了这样的鹅。因此，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和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住房方面的基础设施）压到最低限度，而将生产性投资放大到极致。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国的“大跃进”当然也是最为戏剧性的情节之一。

这一目标只有在经济管理体制之下才能实现：这种经济管理体制杜绝了无政府状态的市场和个体消费者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将可以从生产者那里抽取的产品尽可能多地集中到中央计划制定者的手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正在阅读卡尔·波兰尼的著作。我发现，他关于市场、互惠和再分配整合经济的区分很有意义，可以将其应用到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上。

波兰尼用再分配理论来描述有着大型水利工程的古代帝国，比如古代中国。在这些社会中，中央帝国权威从原本可以自治的村落中征收尽可能多的剩余，从而维系它的灌溉系统和防洪设施。如果征收来的剩余多于这类需求的正当需要，古代帝国就会将它们用于“挥霍性”的官僚消耗上。人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读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

苏联式经济体系可以被认为是再分配的一个现代化了的版本。虽然做过这样的暗示，但波兰尼从来没有将他的理论充分应用于对现代经济体的分析。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开始承担这一使命。我将这一体制的现代化了的版本称为“理性再分配”，从而用一种价值中立的方法将其与古代帝国的“传统再分配”区别开来。这种区分遵循的是韦伯主义的分析路线：关键性的问题是，那些行使再分配权力的人是以什么为基础来寻求他们行动的合法性的。

《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一文比《城市化不足下的社会冲突》在分析上更进了一步，它将国家社会主义“区域管理体系”概念化为一个以再分配的形式整合起来的体制。但是关于现代再分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成熟，要一直等到《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的出版（完成于1974年，1979年才出版）才完成。在这本文集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文对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运转的方式做出了最为全面的说明。

以再分配方式整合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理论，当时仍然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也从富人那里向穷人再分配收入，在社会科学家的头脑中，“再分配”一词天生地就带有特定的含义。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在这上面苦苦挣扎：我的许多西方读者不理解我所论述的要害是什么。事实上，在1973年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城市社会不平等》一书的书稿正在接受 Pergamon 出版社的审读。评审是一位英国新左派城市规划者，他误解了我的意思，讨厌我的书，以为我是在攻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于是，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这本书都没有被出版。

文集中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是我在离开匈牙利之后写的，目的是明确区分市场经济中的福利再分配和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性质。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1978年完成）一文中，我试图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澄清福利再分配和再分配整合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这篇文章中，我开始对实际存在的“混合”经济从概念上做出界定。这并没有太偏离我早期的著作。毕竟，在论述住房体系的论文中，我已经提到了两个部门：回想起来，其中一个我应该称之为再分配部门，另一个则是市场部门。但是我始终都没有对“两个部门”的思想（一个是支配性的，另一个是从属性的）做充分发展，直到1978年的这篇文章发表。到了1978年，我清楚地意识到，所有的经济体从本质来说都是混合型的，因此其主导性整合模式的“失灵”必然将被某种次级机制补充。这一洞见使得我能够在这两篇论文中尖锐地指出这样的问题：在市场整合的经济体中，不平等主要是在市场中产生的，而从属性的再分配机制将纠正这些不平等；在再分配经济体中，不平等是由再分配产生的，那些“弱势群体”必须借助市场来弥补他们的劣势。

这两种体制互为镜像（这是戴维·斯塔克后来创造的一个概念）。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再分配的功能与它在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相反。尽管我做出了努力，但是我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和《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策》（1987年完成）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亚诺什·科尔奈首先注意到了我的观点。当他试图详细说明《短缺经济学》一书在宏观经济上的后果时（该书完成于1980年，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引入了“多种协调形式”这一思想。他考虑了我提出的将社会主义经济描述为一种以再分配形式整合起来的体系的命题，但拒绝了它；相反，在他于1984年写就的开创性的《官僚和市场协调》一文中，

他将其称为“官僚”协调的体系。

科尔奈的顾虑是人们会将再分配这一概念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这一顾虑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他选择了一种不合适的解决方式。他所提出的“官僚协调”这一概念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关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是什么的信息，而只是含混地提到了国家如何做事，而这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什么特别之处。毕竟，韦伯将官僚制称为法理型权威最为纯粹的类型：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存在大量的官僚特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公司内部（威廉姆森将其称为“科层制”以与市场相区别）。尽管如此，我还是始终对科尔奈抱有感激之情，因为他（重新）发现了，经典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区别于其他体制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并不仅仅在于产权关系，更在于经济整合的性质，或者说，经济协调的性质（这是一个与经济整合一样棒的词）。顺便提一下，这为解读21世纪中国经济的性质打开了广阔的空间。科尔奈在他晚期的著作中倾向于相信，一种连锁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选择了市场，那么就会导致私有产权，而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合法性的共产党的政治主导权就会崩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释放出了大量的市场能量，而且也为私有产权创造了空间；但是共产党的作用仍然没有受到削弱。所以，虽然我在自己的许多论著中都将中国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体制，但中国的情况很明显地表明，经济整合的制度、产权关系和政治权威的性质之间的联系是很松散的，在政治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市场整合和私有产权能够于此共存共荣。

但是直到倪志伟于1988年发表那篇题为《市场转型理论》的精彩文章之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这一提法才开始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倪志伟拓展了我关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理论。我当时并没有也未能提出一套转型理论——我所研究的经济体当时并未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体制向资本主义体制转型。倪志伟把我的论点推向了它的逻辑性结论，甚或超越了它的真正含义。倪志伟采纳了我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以再分配方式整合起来的经济中，那些因支配性的整合形式而处于劣势的人可以从市场那里获得补偿。倪志伟的结论是，在转型期间，市场制造了更多的平等，而再分配者实际上是转型中的输家。伴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再分配经济的理念被广为接受，尽管倪志伟关于转型意义的结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且理应如此）。这篇于1988年发表的文章出色地捕捉到了市场转型在早期的一些矛盾之处。就像在中国一样，在中欧，在博弈的最初阶段，某些市场力量得以释放出

来（比如，小农被允许在价格受到管制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某些小商品生产者开始比官员挣得更多，而可以理解的是，这惹恼了一些干部。在《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一文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中，我报告了类似的发现。我相信倪志伟和我的方向是对的，我们辨识出了转型早期阶段的一种重要的张力。但是在那篇于1988年发表的文章里，倪志伟暗示得更多：它被解读为暗指干部们会成为转型的输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不平等程度将低于再分配经济时的水平。

不过，倪志伟的后一部分观点尤其与我的主张相抵触。在我早先的许多文章中，我都坚持认为，我并没有说市场经济比再分配经济更平等。我唯一的目的只是展示，再分配经济有它自己的不平等，而我们不能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那样，将这种不平等解释成市场力量的残余。恰恰相反，至少在工资和奖金方面，再分配经济产生的不平等往往更低，基尼系数更小。由于掌权者分配了附带性的福利，不平等程度自然会有所提高，但也几乎从未达到过市场经济下的不平等程度。

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不仅将市场力量看作是解放的力量，而且会带来平等化的效应。他们说得很道理：当古典（封建）等级的特权被非人身依附性的市场力量逐渐瓦解之后，早先的一些不平等消失了（至少暂时消失了）。不过，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普世的和平等的原则之上，它也从未像我们所知的封建主义那样僵化和不平等。“封建—社会主义”（feudal-socialism）这一术语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但却始终不怎么准确。

我试图从自己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中得出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性质的结论，而这构成了本文集第二编的内容。

《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一文（1982年）是对我与康纳德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的简短综述。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所试图发展的阶级理论是我著作中问题最多的部分。《社会主义社会史大纲或者对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一文捕捉到了这一议题的复杂性，是对我早期关于阶级理论的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以及本文集这一编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理论上的洞见，即使在今天，它们在经验上的意义也仍然没有改变。

让我从我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开始。我们确实很难将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一

种“无阶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上存在大量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是再生的，不仅贯穿一个人的一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代代相传。然而，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极不平衡，而这些不平衡又与经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到底是政治权力不平衡导致经济不平等还是相反，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们试图用阶级分析来回答这类问题是很困难的）。然而，无可争辩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直接生产者”对他们劳动产品的处置权并不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多。因此，如果人们可以根据从生产者那里征收“剩余”的体制出发来界定阶级关系的话，人们也应该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界定阶级支配和剥削。这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一文的理论出发点。

在这一问题上，我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推理方式结合在一起，而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理论综合。我的第一个要点来自马克思，也就是说，谁对剩余拥有处置权；但我的第二个要点则来自韦伯，也就是说，这种权力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虽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产权赋予了剥削以合法性，但是在一种再分配体制下，做到这一点的，是再分配者的“目的性知识”（teleological knowledge）——或者更简单地说，中央计划制定者宣称，他们比一般人更知道什么更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果这种“目的性知识”得以落实的话，那么就意味着知识界的“阶级权力”；因此，从定义上说，知识分子指的就是这样一些社会行动者：他们宣称自己掌握了这样的“目的性知识”，并因此宣称他们拥有社会权力和特权。

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一文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对上述主张从历史角度出发做了明确的说明。这是一个关于“胚胎状态的阶级”，而不是关于实际存在的阶级的理论。这是一个借口吗？几乎不是。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都绝少宣称它们所辨识出的阶级是固化的。20世纪70年代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家汤普森就曾宣称“阶级是一个事件”。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一文中，我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胚胎状态”的知识阶层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于是，我没有选择“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的理论，而是直接与吉拉斯的官僚集团理论进行交锋。我特别明确地指出，在斯大林主义下，反智主义是非常强劲的，其统治也确实是官僚化的——尽管我质疑官僚们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从而更倾向于将他们称为统治集

团（我觉得这非常准确）。在卡里斯玛型领袖逝世之后，这些政权才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而它们找到的，在苏联和东欧是科学，在中国则是现代化。这就是我所声称的“对专家治国的开放”。这种开放针对的不仅仅是管理—技术专家精英，从广义上说，针对的是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我在好几篇文章里称之为“文化资产者”）。这些人尊重知识，对理性的秩序心怀向往。

在我的自我批评中，我承认，这一阶层仍然处于“胚胎状态”，从没有实际存在过。之所以会如此的原因是，官僚“集团”佯装对专家治国论以及知识分子做出阶级妥协，但最终却不愿意与他们分享权力，而是转而安抚农民工甚至工人阶级。正如我在《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一文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中更明确地承认的那样，最终出炉的新阶级并不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而是一个由“小资产者”组成的阶级。

我仍然坚持认为，建立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呼吁确实曾经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而不是仅仅吸引了那些信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1968年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民主德国都是很明显的例子。与此类似的是，我还假设，中国的改革运动在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那里拥有非常广泛的支持基础。

我关于阶级理论的论著也具有一些现实上的意义。当社会开始发出理性主义的呼声时，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往往会非常强烈地支持建立一个有着理性承诺的社会秩序。这不仅是因为实现这一承诺的手段是理性的，而且因为它的目的在于结束“市场的无序”。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一直对市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怀有不满。这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这一带有反讽性暗示的术语被创造出来的原因。

“Bildung”在德语中是“文化”的意思，而“Bürger”指的是资产阶级。那些创造这一术语的人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看上去很荒谬。一个有文化的人怎么能同时还是资产阶级呢？如果东欧的改革确实吸引了受教育阶层的注意的话（我觉得中国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这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这些文化人不要无政府状态，对新富起来的人甚至过去的有钱人都抱着不屑的态度，这些人虽然声称拥有权力和特权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但却无法用他们的文化优越性（以及教育文凭）来证明这些权力和特权的正当性。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东欧的知识阶层开始对执政的官僚集团感到失望，开始相信他们分享权力的承诺只是“水中花镜中月”，于是知识阶层

最终开始走上异议的道路。到 1989 ~ 1991 年共产主义体制没落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文化资产者和受教育阶层，而他们的规划已不再是将社会主义理性化，而是“打造资本主义”。事实上，1989 年在东欧所发生的就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领导这场革命的就是（由受教育阶层，亦即文化资产者组成的）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

这构成了我和康纳德合著的《知识分子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支配》（1991 年）一文的主要灵感（这是我和他一起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史大纲或者对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一文的主题。毕竟，在《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和《社会主义企业家》中，我对知识阶层的议题做了草率的批判；知识分子最终夺取了权力，但使用的方式却与我们早前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预测的方式不大相同。我于 1998 年写就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该书于 2008 年刚刚出版了中文版）中记录下了我这趟心灵之旅的最后心得（至少在目前为止我是这么想的）。在那本书里我总结到，知识分子始终是革命性的力量（真正的革命驱动力并不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而是文化资本），但是所有的新阶级理论（包括我自己的）都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假定：那些在推翻前政权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知识分子可以长期地保有他们的阶级权力。

《新阶级理论的三次浪潮》（1988 年）一文和我的《新阶级理论》（2004 年）一书，是对各种新阶级理论兴衰的一种多少带有反讽意味的评论。这篇文章和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虽然新阶级从未成功地长期保有他们的阶级权力，但是，知识分子的各个组成部分确实制定了自己的“规划”以取代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这些人包括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先锋”、20 世纪 20 ~ 50 年代的技术—管理精英，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技术型和人文型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只不过，他们都失败了。布莱尔的“新工党”、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或近期的奥巴马版本是否能够被解读为新的“阶级规划”，尚有待观察，但他们确实动员起了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可以认为，与布莱尔和克林顿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小心地寻找第三条道路相比，奥巴马对“希望”和“变化”的呼吁甚至更向前进了一步。

但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了，甚至那些坚持中国仍然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向市场力量和私有产权敞开了大门。在本文集的第三编，我试图解释共产主义体制没落的原因，并且试图发展出一套理论，讨论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

《社会主义为何失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一文（1994年）对流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一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存活的经济体制，而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管用。我们指出，在“粗放型增长”阶段，再分配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确实表现不错，甚至表现得十分出色（至少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工业方面是如此）。在美国的帮助下，但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的工业能力，苏联打败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军队——纳粹军队——而当时纳粹仍然在对英、法、美的战争中有所斩获。而也正是苏联，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在西方发达国家引发了一场人造卫星恐慌，他们害怕苏联也许会在技术上超越西方。我们承认，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再分配经济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危机，因为它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型，也就是从一种重工业和军工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战略，转为大众消费社会。但是，它们崩溃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这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在1929~1933年间，当面对同样的挑战时，市场资本主义几乎崩溃。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2009年3月），大众消费引导型的战略增长减速，资本主义正面临同样的严峻危机。如果我的中国批评者是正确的话（我听说在中国有人批判我的著作，指责我草率地将中国称为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确实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成为经验上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带来有活力的增长，可以逐渐转型到“集约型增长”阶段（据我所知，中国正在向高科技领域和世界经济的高效生产部门进军，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它仍然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但这却使中国拥有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几乎潜力无限的国内市场）。

但是《社会主义为何失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一文的底线在于，将苏联拖垮的，是各种（国内和国际）力量的联合。国内政治是一个重要的肇因。异议知识分子发起的“话语革命”剥夺了官僚统治集团的话语，加深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最终造成了合法性危机。^① 在《社会主义为何失

^① 当“幕僚”们开始怀疑那些占据领导岗位的人是否有能力统治时，合法性问题就出现了；当大众开始寻找可靠的对象来替代现存统治体制的时候，合法性问题就转变成了合法性危机。

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一文中，我重新回到在《知识分子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支配》一文中已经提上议程的主题上：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尤其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一群异议人士在瓦解一个体制中的作用。

但是，我并不想低估国际力量在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瓦解中的作用。虽然美国的自由派不会喜欢我下面的主张，但我还是要说，在我看来，罗纳德·里根之所以确实在共产主义体制垮台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并不是通过他在柏林墙前那声“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堵墙推倒吧”的呼喊，而是通过他的那场“星球大战”豪赌。虽然没有多少美国专家相信“星球大战”在技术上可行，但戈尔巴乔夫却不能承担忽视它所带来的风险。美国的新技术进步可能已经带来了重要的军事意义，而这迫使戈尔巴乔夫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但这时苏联的经济已经在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转型的危机中挣扎。

那些建基于——或者用戴维·斯塔克的术语来说，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废墟而出现的社会经济体的性质是什么？这正是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讨论的主题。

我希望最终能够出版一本以“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多样性”为主题的著作。这本书还没有写出来，但是在我的身边聚集了一帮同事，他们知道谁将先完成这本书，以及这本书是否会为这一复杂的议题盖棺定论。我相信，我是第一个讨论这一议题的人。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我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趋同（至少是局部的）持续了数十年之后，伴随着共产主义体制的没落，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趋同当然只是局部的，尤其是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苏联的短时间模仿之后，中国走上了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农业部门的社会主义转型）。尽管如此，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基本的相似之处。我甚至敢说，共产主义体制事实上生产出了一种“社会主义人”，这些人的人格特征惊人地相似。在这里，让我用亲身经历对这一观点做出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唐纳德·特雷曼（Donald Treiman）以及魏昂德（Andrew Walder）有过合作。我和特雷曼于1993年在东欧做过一次“1989年之后的社会分层”的调查，我们三人试图把这项调查应用到中国。我帮助特雷曼和魏昂德调整他们的调查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在此期间，我们多次访问中国，主要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合作。在我

们最后几次访问期间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位中国同事私下里告诉我：“你知道吗，你们三个是非常不同的人。特雷曼就像是一个美国商人，魏昂德就像是一个威严的德国领导，而你，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事实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虽然魏昂德是最为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也比我更了解中国，但是我觉得我能深深地理解中国同事们的大多数反应。我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匈牙利生活了27年，对社会主义生活游刃有余。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中国时，我感觉完全就像在家一样。我们都是“社会主义人”。

1989年之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我对作为“自下而上建设资本主义”的东亚社会与“自上而下建设资本主义”的欧洲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我当时相信，我在《社会主义企业家》中所做的分析事实上更适用于中国而不是东欧。在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于农业部门，资本积累始于基层，私营中小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而至少在我完成《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的初稿时（1996年左右），国有企业基本上仍未受到触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是“自上而下”建造的，转变的动力是集体部门的私有化。但这种转变有两种方式：在俄罗斯，一般是前党政精英和他们的庇护对象盗用公共资源，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但是市场制度的进化却非常缓慢（我称之为“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社会”）；而在中欧，市场制度确实有所发展，但是在将公有部门私有化方面，外国投资者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而本土资产阶级却寥若晨星（因此我称之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这是对社会和制度变迁的一种有趣的描述，但却不是特别准确。尤其对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我们的分析与人们的直觉相差甚大，而且来得很及时。在我们于1993年开展调查之前，主流观点是由匈牙利的艾勒梅·汗基斯（Elemér Hankiss）和波兰的雅德维佳·斯坦尼茨基斯（Jadwiga Staniszkis）所提出的“政治资本主义”理论。这两位出色的学者预测了1988年的趋势，预言通过所谓的“自发私有化”——这一过程在1988年时确实是在波兰和匈牙利都发生了——前共产党精英们努力将自己确立为新的“大资产阶级”。但在1989年，这些政权垮台了，自发私有化被一种更为常规的过程取代：比较公开的拍卖（到底有多公开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情）成为私有化过程中的常规部分。在《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的精英循环或再生产》（1995年）一文中，我们提出的证据显示，在中欧，前政治精英很难有机会成为新的“大资

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都在向下流动；如果前精英中有人获益，他们也往往是前经济精英（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通常并不是前高级管理人员）。但俄罗斯的情况则多少有所不同，在那里，“政治资本主义”的命题确实更有说服力。

我早期关于走出共产主义体制多重轨迹的理论确实很有意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需要做进一步的精心阐述，我仍然在考虑如何提出更好的术语。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新古典社会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古典社会学家们会假设说，经济体系的逻辑必须与政治权威的性质相吻合。韦伯和马克思都会同意，市场资本主义倾向于与自由、民主共存。韦伯对此持肯定态度；马克思则带着讽刺的态度，对他来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资本主义能够存在的最好外壳。我所称的新古典社会学，也就是对各种市场体制的研究，并不采用这样的假设。对我来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黏糊到了一起是一个经验问题。至少目前来说是如此，但我们中没有任何人拥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从而预言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

伊万·塞勒尼

2009年3月17日于纽黑文

（吕鹏译）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伊万·塞勒尼 / 1

社会主义社会史大纲或者对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
..... 伊万·塞勒尼 / 1

第一编 国家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伊万·塞勒尼、凯瑟琳·贝克斯特、劳伦斯·P. 金 / 31

住房体系与社会结构 伊万·塞勒尼 / 63

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 伊万·塞勒尼 / 87

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

——当代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政策的悖论 伊万·塞勒尼 / 123

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策

——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再分配与社会不平等

..... 伊万·塞勒尼、罗伯特·曼钦 / 152

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

——社会主义匈牙利家庭农业企业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史

..... 伊万·塞勒尼、罗伯特·曼钦 / 194

第二编 新阶级

新阶级理论的三次浪潮 伊万·塞勒尼、比尔·马丁 / 223

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 伊万·塞勒尼 / 245

知识分子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支配

..... 捷尔吉·康纳德、伊万·塞勒尼 / 287

第三编 国家社会主义之后

社会主义为何失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分析

..... 伊万·塞勒尼、巴拉日·塞勒尼 / 317

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的精英循环或再生产：导言

..... 伊万·塞勒尼、索尼娅·塞勒尼 / 337

译后记 / 359

社会主义社会史大纲或者 对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

伊万·塞勒尼

一 介绍性评述

在过去的 25 年中，我出版了 3 本主要著作。每一本都试图解释社会主义社会和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变迁，以及对这些社会中的各种可能性进行评估。

这三本书分别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完成于 1974 年，1979 年出版）、《社会主义企业家》（完成于 1986 年，1988 年出版），以及最后完成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1998 年出版）。在我看来，这三本书构成了某种与传统形式多少有点不一样的“三部曲”。我花了 25 年的时间，用三本书的内容来写作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但是我周围的世界却以眼花缭乱的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变迁。这本书的内容所反映的正是这些变迁。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我也发表了其他一些论著，但是与我试图阐述的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下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的庞大叙事相比，它们都只是细枝末节（side-stories）。

在这篇论文中，我希望以自我批评的方式仔细审查我的“三部曲”。我希望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能避免自恋。我的目的是给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解释，就像这些文本对我而言是陌生的一样。关键点当然不是宣布我一路成功地

预测了历史（一些社会科学家在共产主义没落之后确实如此宣称）；相反，我想说的是，每次我都错了。这篇论文的初稿是为在2001年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倪志伟（Victor Nee）组织的小组讨论而写的。那次小组讨论的目的，是探索社会主义和转型社会的分析家们预测错了的地方，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倪志伟和我就是以这种精神来撰写各自的论文的（其他的讨论者太年轻，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出错误的预测）。布洛维在一篇雄辩的论文中承认，在他关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著作中，他过高估计了工人阶级形塑社会主义社会未来的能力。他曾经相信，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的出现是有可能的。在他那篇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开创性文章中，倪志伟曾经预测，干部特权将衰落，直接生产者将会从市场中得到更多的利益。现在，他则承认过低地估计了干部权力的持久性。很多干部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权力，甚至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特权——即使在倪志伟的“研究个案”中，情况也是如此。

与我那些“显赫”的同事相比，我有更多的过失需要供认，这部分是因为就自我批评的艺术而言，我比他们实践了更长的时间。《社会主义企业家》已经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则是“否定之否定”，是对《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批判分析。因为这是否定之否定，所以它也不可避免地对《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修正”。

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我认为，一个“新统治阶级”也许正在从前官僚集团、技术专家和人文知识阶层的融合中崛起，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目的理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我将这一体系称为“理性再分配”。

《社会主义企业家》则承认说，如果这项阶级计划曾经获得一时的成功的话，它最终还是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为一个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社会主义企业家”）提供空间，官僚阶级保持了它的垄断权力。官僚阶级并没有将社会主义“理性化”；相反，通过向小资本主义让步，他们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和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找到了“第三条道路”。

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我承认说，至少在欧洲社会主义社会中，“第三条道路”失败了。结果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社会

主义企业家”，也就是社会主义晚期的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主要赢家（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输得很惨，随着前国有部门的大规模私有化，他们被证明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多少竞争力）。

据此看来，《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比《社会主义企业家》更是批评的靶子。理性分配计划被舍弃了，“持目的论的规划者”（teleological planner）式的人物周围并没有形成新阶级。然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没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一开始是“公民社会”的拥护者，后来成为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信仰者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从理性社会秩序的“知识先锋”（intellectual vanguard）转变成了“文化资产阶级”（cultural bourgeoisie），也就是“第二代文化资产者”（second Bildungsbürgertum）。他们的任务甚至他们的历史使命都与“第一代文化资产者”，也就是中东欧 18 和 19 世纪知识阶层的社会角色相近。后共产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不仅提倡现代性，还“建造”资本主义。这是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打造资本主义的事业，知识分子作为有产阶级的“替代”（substitute）行动起来。换句话说，正如《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所预测的那样，对文化资本的占有确实变得重要起来，但它不足以持久的阶级权力打下基础。文化资本（和它的占有者——文化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不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Charisma）。但是通过占有文化资本得到的权力和特权，正像韦伯社会学中的“卡里斯玛”一样，主要是一种转型的机制。所以，布洛维和倪志伟各自自我批评一次，而我重复的自我批评则两次走向反面。

不谦虚地说，这“三部曲”遵循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虽然不是出于事先设计，但也顺其自然。（我当然喜欢我总是对的！）第一本书提出了一个“命题”，第二本书用一个“反命题”反击了它，第三本书达到了一定形式的“综合命题”，“超越”了一开始的命题，在反对它的同时又保留了它。正统黑格尔主义者会把这一运动称为扬弃（Aufhebung）。为了“自上而下地或者通过设计来建设市场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把自己建构成文化资产阶级——这一命题是“知识分子先锋命题”“扬弃”了的版本。在“知识分子先锋命题”中，知识分子将建设一个理性、有秩序的社会看作是他们的历史使命。

因此，就这三本书的内容来说，有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如果将其放在从成熟的社会主义到晚期社会主义，然后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变迁里看，则更有意思。不过，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在方法论上的连续性更

强。虽然比较框架的性质随着时间在改变，但这三本书都是“比较性”的。我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中（以及在写作此书以前的其他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后来被戴维·斯塔克（Stark, 1986）称为“镜像比较的方法”（method of mirrored comparisons）。^① 我开始发展这种新方法论的时候，正在建立自己关于市场经济以及我原来称之为“行政分配”条件下的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后来受波兰尼著作的启发，我将“行政分配”重新命名为“再分配经济”。^② 20世纪60年代，在我和捷尔吉·康纳德一起合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住房（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物品）的分配方式是不平等的。然而，与我们之前的研究者的预期不同（Trotsky, 1972），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不是从过去的市场资本主义继承过来的，而是政府再分配干预的结果。^③ 而且，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发现，那些在再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简单地说就是工人和农民）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通过次级“协调机制”（the secondary “coordinating mechanism”），也就是正在出现但还处在萌芽期的市场来帮自己一把。

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新的比较理论。根据这个新理论，在所有体制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机制”创造了特权，服务于社会等级制度中的最高层，从而产生了不平等。我们当时并没有使用斯塔克后来创造的术语，但是我们意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彼此的“镜中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市场机制创造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

① 早在1968年，我开始在我的一些关于住房的论著中发展这种方法。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的英文出版物，是我于1972年在《社会学评论专刊》上发表的《住房体系与社会结构》一文。

② 我相信自己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是在1972年我的博士论文中。这篇论文最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题目是《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城市社会不平等》。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社会主义作为“再分配经济”这个观点。西方读者之所以有误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福利再分配”和“再分配经济体制”的区别。倪志伟在1989年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最终成功地把再分配经济理论介绍进已有的文献当中。

③ 对我们而言，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反直觉”的发现。至少自托洛茨基以来，以及在社会科学的左派当中，普遍的认识是，不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但它们是“残存的市场制度”的结果。无论是什么，市场制造了不平等。现在我们发现了很多实例，市场作用的结果竟然减轻了不平等！此外，社会主义社会被认为应该是“工人国家”（workers state）（即使是畸形的），所以人们认为，工人的特权不应该被否定，而且这种结果肯定不是政府的政策，也就是说，不是再分配造成的。现在我们发现，工人通过参加市场形式的活动补偿他们因再分配而承受的劣势。

被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所中和；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占支配地位的再分配机制创造了基本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被不享有特权的群体在非正式的市场活动中“软化”。用斯塔克的话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就像照镜子，你的右边在镜子里是左边，反之亦然。

与倪志伟于1989年写作的在其他方面出类拔萃的《市场转型理论》一文中表达的观点相比，我们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新理论当然与其有着很大的不同。倪志伟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版本：更多的市场意味着更多的平等。不是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必然会同意这个观点（参见Lal and Myint, 1996），因为他们也许会说，经济的动态发展需要不平等，但是他们倾向于相信，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中，至少会是“水涨船高”，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效果会渗流到下面，所以，那些在社会等级制度底层的人也会从市场力量的增强当中获利。这种“渗透理论”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并不一定期望从更多的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平等，但是它期待市场扩张会使所有人受益。我的理论与此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我于20世纪60~70年代写作的文章中，我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分配型经济会完成市场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性。如果我考虑了这种可能性的话，我就会有一个“转型”理论：它会遵从我的镜像比较，也就是说，当市场取代分配成为主导机制，市场也会成为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我们后来发展了这个观点，参见Kostello and Szelényi, 1996）。

我相信，这个新方法使我能提出一种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分析的新类型。我相信，我并不需要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就能够对社会主义的实际形式提出批判性的分析。这种跨系统的比较并不一定是为了说明一种体制比另一种体制更优越，而是为了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机制，这些机制在各自的体制内占据支配地位，分别制造着不平等。^①

当时我不是特别熟悉福柯的著作。即使在我写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

^① 在他1980年的杰作《短缺经济学》中，亚诺什·科尔奈用了相同的方法。以我对这本书的理解，他最根本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制造了慢性短缺，而市场资本主义倾向于制造“过度生产”的循环。这本书不是建议一种体制比另外一种体制更好或者更理想，它说明了这些系统是彼此的镜像。无论在哪个系统中，你都不能独占所有的优势。在他晚期的作品《自由经济之路》（Kornai, 1990）和《社会主义体制》（Kornai, 1992）中，科尔奈的分析改变了，现在他相信资本主义是最理想的系统，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从来没有走向这条道路。布洛维在他于2001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文章中，由于没有看到我们在分析中的讽刺，误解了我们的《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知识分子》这本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福柯式的书的时候，我也没有接触过福柯的著作。当我选择批判分析的时候，我近似于自己独立提出了福柯的观点。这个批判研究只是意在显示这个支配系统的“暂时性”，它并不需要一个阿基米德点。布洛维在他于2001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批判我的文章中，误解了我批判方法论的本质（布洛维的这篇文章在其他方面都写得很有才气），以为我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视角来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我试图发展的是一种“内在的批评”（immanent criticism），它将批评限制在展示暂时性上，而不是把它跟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进行对照。也就是说，我试图发展一种“反讽”（ironic）的视角。我会在本文的后半部分阐述这种视角。我的“三部曲”的三本书，都坚定地遵奉了这种批判研究的方法。

当国家社会主义崩溃的时候，我前期的作品所使用的跨系统比较失去了它的力量。所以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中，重新调整我的批判分析方法变得很有必要。遵从布洛维的建议，或者转向一个后社会主义理论的“乌托邦视角”，都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符合逻辑的步骤是保持“内在批评”的视角，保留“反讽”作为批判的工具。不同于使用跨系统比较去显示被调查现象的暂时性，我转向了资本主义的新古典比较社会学。这个规划在我和吉尔·伊亚尔（Gil Eyal）、艾莉诺·汤斯利（Eleanor Townsley）近期的出版物中有详细的阐述（Eyal et al., 1998; Eyal et al., 2001），我也会在本篇论文的总结部分对此进行概述。

在本篇论文的剩余部分，我将总结“三部曲”中的实质性观点，并且试图从社会条件（也就是阶级和精英斗争的不同形态）出发，去解释为什么这些书中的诊断，特别是预测，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

二 改良共产主义的“黄金岁月”：知识分子和“新阶级”

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开创性著作《新阶级》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的起始点。吉拉斯的有力分析可以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最有影响的作品，它有说服力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兑现它的承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或者正在生成中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正如吉拉斯早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所知道的那样，社会主义制造了一个

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由官僚组成，它视知识阶层和工人阶级为反对者（在吉拉斯眼中，知识阶层可能是官僚统治的主要反对者）。

我们的结论和吉拉斯的结论有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知道的一样，社会主义跟“无产阶级专政”扯不上什么关系。解释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谜团。官僚阶级在权力结构的中心，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它是新的“阶级”吗？知识阶层确实是“反对力量”吗？1965 年，我们开始和康拉德以及城市规划机构合作开展一系列经验研究项目，得到的数据和我们与规划者的接触让我们重新思考吉拉斯的命题。我能回忆起来的三个事件让我走上了写作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的道路。首先，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我在中央统计局的图书馆工作。当时毕博·伊斯特万（István Bibó）刚刚走出监狱，并成为我的同事和朋友。1956 年毕博在纳吉·伊姆莱（Imre Nagy）政府内任内阁部长，是一个左派民粹主义理论家，而且被认为是匈牙利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政治哲学家。在一次对话中，他对我说，“社会主义最大的谎言是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它是知识阶层的专政”，这个论断震惊了我，并且促使我思考。

下一个事件，我记得大约在 1966 年，康拉德和我一起分析关于匈牙利住房分配调查的计算机输出结果。我们预期工人会比知识分子得到更多，但是数据显示，在高质量住房的获得者中，工人的比例很低，不仅是党的干部，而且各种知识分子的比例也奇高。我们一开始的反应是我们可能把职业编码搞错了，于是让我们的统计顾问重新做了分析，最后发现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总是通过再分配体系获得特权，工人却必须在官僚阶级容忍的有限市场中，争取遮风避雨之处和食物。

第三个动力来自我和一位高中友人的父亲的对话。此人的父亲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布达佩斯的市长〔所以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政客，是海军上将霍尔蒂（Horthy）的亲密盟友〕，他自己的名字叫小卡罗伊·森地（Karoly Szendy Jr.），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电子工程师，所以，尽管他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他却仍然保留了这个敏感的工作。然而，他非但没有入党，作为天主教徒，反而每天早晨出席弥撒，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也是如此。鉴于他优秀的技能，他被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并因此被要求供职于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审议一项报告，报告中建议将匈牙利的对外贸易自由化，那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因为我有一个经济学学位，他邀请我到 he 家里并且询问我的意见。他被那

份建议解除价格管制、为市场力量创造更多空间的提议震惊了。他抱怨说：“我们不能允许这个！这个会导致混乱、无政府。”本来应该没有人会比他对共产主义更缺乏同情，然而，作为一个好的工程师，他知道市场的无政府是魔鬼，社会需要一个理性秩序。

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我从其他许多反共产主义体制的知识分子朋友那里听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美好的理念，唯一的问题是错误的人占据着对的位置（意思是：如果我在一个决策者的位置上，我会知道怎么做）。“逆向选择”（counter-selection）^①——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问题是官僚阶级在进行规划，而不是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在规划。这确实是康拉德和我一起紧密合作了好几年才研究出的那些城市规划者的固定思维。

这些个人兴趣使我重新审视吉拉斯。我总结出，吉拉斯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论断可能是对的。但是，对于描述斯大林主义官僚阶级所享有的那种权力来说，“阶级”这个术语可能并不合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说的官僚阶级是“种姓”（caste），可能更为精确。但是我采纳了韦伯的术语体系，我建议，最好的描述斯大林时期官僚阶级的方法，可能是称它为“统治集团”（ruling estate）。“种姓”有着很特定的含义，不太适合“现代官僚体系”。在另一方面，“等级”（rank）或者“集团”（estate），却很好地捕捉到了“古体”（archaic）（更精确地说，家长制的）和“现代”这两者之间的有趣混合〔这里的所谓“现代”，用赫勒、费赫尔、马库斯在1983年合著的著作中的术语来说，就是“超理性”，参见Heller, Fehér, and Márkus, 1983〕。正是这种有趣的混合，界定了社会主义官僚制的特征（也可参见Bauman, 1974）。然而，随着“卡里斯玛”型领导人的去世（从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卡里斯玛”领袖的意义上来说），斯大林主义官僚制进入了合法性危机阶段，这种危机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改革中达到了高潮。什么是合法性的新准则？是科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相比于市场资本主义更为优越，因为后者是无政府主义的，前者却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秩序。在共产主义尴尬地彻底垮台后，这种合法性依据听起来可能相当荒唐，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人们却不这样认为。苏联曾成功地制造出一场“科学恐慌”——人造卫星和宇

^① 简言之，“逆向选择”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才能的人无法做出贡献，而庸才则被选择担任重要职务。——译者注

航天员加加林把西方吓坏了。如果更多地是从技术、科学和教育上而不是经济上来说的话，苏联看起来似乎马上就要压倒经济发达的西方。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的扩展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这个恐慌的反应。

对理性秩序的追求确实广泛地打动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如果官僚意味着做正事，如果官僚集团已经准备好了要放弃逆向选择的做法，转而把专业能力强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社会主义体制将变成一个有着人道主义面孔的理性系统——拉德温·里什塔（Radovan Richta）在《十字路口的文明》（*Civilization at Crossroads*）一书中提出了与此一模一样的看法，它是东欧各国更广泛的知识阶层的宣言。所以，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复辟市场资本主义”，而是用真正的科学规划取代斯大林革命主义，从而创造一个我们称为“理性再分配”的体系。

在对住房分配进行研究之后，我们把“镜像比较”的方法应用到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当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合法化了资本家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在“理性再分配”（理性规划，如果你更喜欢这个说法）系统中，则是“目的论的知识”，也就是规划者和再分配者的科学知识合法化了，为什么直接生产者不能处理他或她的劳动产品而需要被再分配者重新按照长期的和集体的利益进行分配。因为从定义上来说，知识分子是知识的垄断者。^① 新支配阶级位置的最佳候选人不仅仅是官僚阶级，而是官僚阶级和更广泛层面的知识分子合铸的联盟，而知识分子的核心，当然是技术专家。

时隔25年以后，我还是相信，这项关于社会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如何演变的诊断并非不合理。那是一个黄金岁月，是高期望的时代。在那十年里，资本主义似乎正在走向末路；社会主义也有着一张人道主义面孔和民主的制度，且没有过多地向市场妥协，它主要被“理性”再分配控制着。这样的社会主义甚至在西方也呈现上升趋势。卢卡奇（Gyorgy Lukacs）由此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样的评论。伯克利、巴黎和比勒费尔德的学生（与教授）在读马克思、葛兰西和卢卡奇的著作。古尔德纳（Gouldner, 1979）和其他一些学者像贝尔（Bell, [1973] 1976）、赫尔斯基（Schelsky, 1975），有些带着热情，有些心怀恐惧，描述着遍布全世界的“新阶级的崛起”，谈论着知识阶

^① 我们将知识分子界定为那些能够说服社会他们占有对社会有利的知识从而应得到权力和特权的人，这是一个事后觉悟的福柯式的或者古尔德纳式的定义。

层的崛起和未来知识分子的阶级力量。

回过头来看，在西方，“新阶级规划”明显被夸大了。当然，在许多重要的位置上，肯尼迪政府的确比往届政府更多地任命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Townsend, 1996；2000）。但是，这至多减轻了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而不是在旧官僚、财产所有者和知识分子之间达成权力共享。我们肯定不能说，知识分子像古尔德纳（Gouldner, 1979）所想象的那样“罢免”了老的有产阶级。所以，我和康拉德的书的核心经验参照点要更加坚实。我不能确定官僚统治阶层到底是否真的有意向知识阶层——特别是向它的技术专家派系——敞开大门分享权力，但可以确定的是，很多知识分子把这种开放当真了。“布拉格之春”确实跟“打造资本主义”的呼声没有什么关系，它所涉及的，是一种在被启蒙的官僚（比如杜布切克^①）和有着改革思维的知识分子——比如里什塔（Richta, 1969）、锡克·奥塔（Ota Sik）等人——之间达成交易的愿望，从而创造一个有着人道主义面孔的理性社会主义。

这就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试图要捕捉的东西。1974年，在我们完成这本书时，我们没有看到官僚阶级和知识阶层之间的暧昧关系行将结束（但是事实上也从未破裂），这是不可原谅的。我们没有正确地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1968年8月事件和波兰1968年事件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后果。我们写到了官僚阶级的“反进攻”，所以我们明白知识阶层的计划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匈牙利政权还在吸收技术专家^②进入它的官僚队伍（出于同样的原因，民主德国也是如此）。即使在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官僚阶级和技术专家之间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团结工会运动对知识阶层充满怀疑（参见Szelényi, 1982：322 - 323），认为知识分子可能跟官僚集团是一路的。然而，对我们的失误来说，这不是一个足够好的理由。我们不可原谅地低估了知识分子对官僚集团的幻想的破灭，以及最终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幻想的破灭，不管它可能显得有多“人道”或者“理性”。

虽然做了上述的自我批评，我仍然坚持认为，作为对20世纪60年代社会

①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曾经于1968年1月至1969年4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译者注

② 厄吉贝特·萨莱伊称他们为“新精英”，并把20世纪80年代看成在新技术专家和守旧官员之间进行斗争的时期（Szalai, [1988] 1989）。

主义社会变迁的动力学的社会分析，我们对吉拉斯的纠正在“黄金时期”是精确的。吉拉斯说对的地方是斯大林主义下的官僚掌握着垄断权力。但是他又是错误的，因为官僚集团不能将自己确立为一个新的支配阶级，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一个支配等级来进行统治的。在斯大林主义之后的改革时期，官僚集团确实经历了一场合法性危机。它试图通过诉诸“科学”和“理性秩序”，至少假装它已经准备好了和技术专家或者更广泛的知识阶层建立联盟，从而解决这个危机。这个行动诱发了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积极回应，从而使得人们觉得讨论新阶级计划，也就是新阶级“地位上升”变得情有可原。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背后是一段动荡的历史，这段历史也影响了我。这本书第一次在西方出版的时候是走私出去的，我自己最后也被流放，被禁止回到我的祖国匈牙利长达七年。

三 通向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新阶级规划的没落和“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崛起

1982年，我拿回了我的匈牙利护照。当我回来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和我七年前离开时不一样的国家。对我来说，最惊人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是小私营领域的扩张和非正式经济的迅速增长。不过，这对我来说倒也不是彻底的惊奇。1971~1972年，我在匈牙利农村做研究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家庭小生意的活力。我甚至在1971年时就与康拉德合写了一篇题为《城市化不足中的社会冲突》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相对于城市工业人口）城市相对缓慢增长的原因之一，可以归咎于从集体农场得到的“自留地”（family plot）里的小型家庭农业生产。它不仅为“农民工”（peasant workers）提供食物来源，也为他们提供收入，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生产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拿到城里的市场上卖个好价钱（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1] 1974）。然而，我在1982年所看到的尺度，与7年前有着质的不同。现在，私人小买卖已经无处不在，而且它真的成为系统运作的方式。人们仍然被要求在国营企业工作，但是到1982年，每个人都知道，这类似于19世纪中叶的奴隶为庄园主提供劳务。工人们确实在工作地点（隔三岔五地）露一下脸，但是他们假装工作，政府给他们支付工资也是徒有其表。实际的挣钱的“活”是在工作时间之后，在“第二经济”中（参见 Stark, 1985）。

我也为与我同道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当我于1968年开始在布达佩斯的经济大学（University of Economics）教课的时候，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必须至少花费整个第一年的时间让他们走出马克思的影响，去阅读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甚至早期与我同道的“异议者”们，比如捷尔吉·康拉德、米克洛斯·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i）、雅诺什·吉斯（Janos Kis）、捷吉尔·本斯（Gyorgy Bence），也视他们自己为共产党政权的“左派”批评者，其中有一些还效忠于马克思主义。让我来引用我的朋友康拉德的话，他之前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成为“自由派”之前，他认同自己为左派。他在1977年匈牙利语版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在瑞士伯尔尼出版，当时在匈牙利出版是不可想象的）的后记中写道：“对我来说，很明显的是，我们应该自下而上地观察社会，在我们遇见之后，伊万很快采用了这种思维方法。”这是我们两个如何在友谊和同事情谊中共同成长的精确描述，但它同时也证明，即使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中，传统左派的姿态在当时是多么普遍。

我来自一个传统的右翼家庭，然后向左移动。在西方生活了七年，见识过“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之后，我变得更为赞同马克思主义。我变得更左，甚至比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时更加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当我回到匈牙利时，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自己的观点总是比老朋友们观点更左。我感觉，不仅是异议分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转而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越来越多地对社会主义表示怀疑。虽然当时还没有人主张“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确实支持“第三条道路”，也是“市民社会”的坚定信仰者。他们主张说，“资本主义”的概念就像“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意义。所以，我看到了一种双重变迁：一是私有部门出人预料地兴起，它为普通工人和农民提供了解决生计的机会；二是一个越来越不抱有幻想的知识阶层，这个阶层不再相信有可能与官僚统治阶层达成任何交易。知识分子肯定不是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官僚阶级不同知识阶层达成协议，转向通过向新的小资产阶级开放非正式经济来赎买政治和平（所以，匈牙利工人相信，波兰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是在犯傻；匈牙利工人知道，国有部门是不着边的，离开了国有企业的大门，生活才刚刚开始）。

在我流亡后第一次回国访问期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科学事务的部门领导通过亚历山大·萨莱伊（Alexander Szalai）（他当时是匈牙利社会学界的

一个重要人物) 带给我一个消息说, 他要见我。这位领导的名字叫安德拉斯·诺普 (Andras Knopp), 其实他要对驱逐我负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我没有把这件事视为个人恩怨。我十分好奇, 也想见他。他大人有大量, 我不必到他在中央的办公室去拜见他, 而是在一个咖啡馆见面。我们谈了一个小时, 或者更准确地说, 他说了大约一个小时, 我几乎不可能在他的长篇大论中插进一两个问题。最后, 他终于给了我一个问问题的机会, 所以我问了一个非常傻的西方左派的问题: “你难道不担心你是在这里复辟资本主义吗?”

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逗, “你看, 这些私人小买卖对我们是有利的。我自己也是从一个私营面包店买面包的, 因为他们的面包比国有工厂做得更好。好面包对我们是有利的, 人民得到了满足, 这对政治是有好处的”。好吧, 我想, 如果你们在 1949 年时就有这样的想法, 整个故事早就会有很大不同……

回到美国之后, 我很快从国家自然基金那里申请了一大笔资金, 用来研究匈牙利正在出现的私有部门。我拿到了 1982 年匈牙利人口统计局的收入调查 (一个非常不错的信息来源), 我开始从事后来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的工作。我现在知道, 严肃的自我批评的时机已经到来 (Szelényi, 1986 - 1987), 实际上, 我承认知识分子的新阶级计划已经失败了。官僚集团顽固地抵制知识阶层分享它的权力, 转而选择向小型私有部门 (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做出让步以赎取政治和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像我十年前预测的那样, 走向“理性再分配”。事实是, 它已经变成了混合经济。国有部门仍然占支配地位, 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底层, 官僚阶级的地位根深蒂固。但是, 另一个从属性的私有部门却在出现, 在它的顶端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 也就是“社会主义企业家”。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主义的终结。1986 年, 我开始使用“后共产主义”这个说法, 但是不幸的是, 直到 1989 年 5 月我才把它写进我的著作中 (所以我不能宣称拥有这个说法的“版权”, 我相信是布热津斯基在 1988 年创造了这个说法^①——由此我的著作也流失了很多本来可以有的“被引用率”)。但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说得很清楚, 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主义当时已经不存在了, 至少在匈牙利是这样。我把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新体系

^①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Brzezinski) 在其所著的《大失败》一书中使用了“后共产主义”一词, 但其含义与塞勒尼的有着很大的不同。——译者注

称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其中，我预计公共部门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私有部门将只是扮演一个补充性的角色。

我从1982年的收入调查中为我的研究提炼数据，试图理解这一“新阶级”的起源。这个新阶级不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而是由新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我估计了新的小资产阶级增长的规模和动力，以及他们的社会来源。我观察到，一些干部开始“将他们的官僚特权商品化”，并且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有部门中去。但是我也注意到，也有以前的企业家的孩子回到这个新的阶级中来。

这本书涉及的是过去的回归，也就是旧的轨迹如何重新浮出水面。我讨论了“被打断的资产阶级化”（interrupted embourgeoisement）：正走在资产阶级化道路上的家庭，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如何被迫离开这条道路的。只要他们能抵抗住“干部化”（cadrefication）和“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双重压力，他们就能回到原来的轨迹上去。

我所使用的术语是相当笨拙的，我没有聪明到把我所描述的问题概念化为路径依赖的地步。戴维·斯塔克（David Stark）有着不寻常的天赋，他能够找到针对某个现象的正确概念。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路径依赖和中东欧私有化战略》中，他做到了这一点。在一个脚注中，他认可了我的著作，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批评我使用的“轨迹”这一说法是“目的论的”。我对于他能找到（针对我试图描述的现象）一个更好的术语非常感激，但是我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轨迹”比“路径”的目的论意味更强，难道它们不都是“通向”某个地方吗？

《社会主义企业家》是一部谦逊的著作，对三部曲中的“卷一”（《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在这个自我批评中，我并没有忏悔说，我是一个傻瓜。我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的证据出发，看出知识分子的“阶级规划”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子宫”是有可能孕育这一规划的，只是“婴儿”流产了。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二元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等级秩序和附属性的正在形成中的阶级秩序共同存在，这一共存的局面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主要特征。

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还是“市场转型”？对于这个问题我思想斗争了良久。1982年，我已经问过安德拉斯·诺普（Andras Knopp）这个问题。1985年，我的老朋友——跟我一起合著《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帕

尔·朱哈慈 (Pal Juhasz), 以及他的年轻同事巴林特·马扎尔 (Balint Magyar) 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校区拜访了我。第一天晚上, 我邀请他们到我的家里吃晚餐。席间, 我又问道: “这是复辟了的资本主义吗?” 在共产党没落之后成为自由党议员的朱哈慈和后来甚至一度担任自由党主席的马扎尔, 都被这个问题弄得不愉快。“为什么这必须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 为什么这就不能是‘第三条道路’, 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他们的反应对我来说意味良多 [虽然在1989年之前, 对我在匈牙利的自由派朋友来说, “第三条道路”是魔鬼撒旦 (arch-enemy) ——“通向第三世界的第三条道路”是他们当时的口号]。在1985~1986年间, 我确实看不到这个系统已经行将崩溃。我看不到1989年发生的彻底垮台的迹象, 所以, “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整体性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和我们的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它有可能在长时间内再生产自己——这些在当时听起来都很合理。

“第三条道路”是一个承载了过多含义的术语, 与我在1986年使用它的时候相比, 它甚至变得更为含义多样和难以理解。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对它的采用, 实际上给这个概念制造了大量的混乱。在“新工党”之前, “第三条道路”指的是某种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现在布莱尔的理论家们, 特别是安东尼·吉登斯 (Giddens, 1998) 用它来描述一种介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立场。这个说法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哲学, 意为德语里的“特殊道路”, 或者“Sonderweg”。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它经常被民粹主义者使用, 通常是被左翼人士, 但是偶尔也被右翼使用。对政治左翼来说, “第三条道路”意味着一种农业发展形式, 它不接受苏联的集体农场 (kolkhoz) 体制, 而是意在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 分割大的半封建等级所拥有的土地, 创造出庞大的拥有土地的农民阶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个理念被反共产主义的左派利用, 他们坚持说, 当共产主义者宣称只有一种选择的时候——要么是共产主义, 要么是对西方的殖民依赖——他们是在误导公众。他们声称, 有一条追求国家独立发展的第三条道路。1989年以后, 这个概念被右翼民族主义者利用, 来谋求反西方的意识形态, 他们强调国家、宗教和传统来反对西方和全球化。对于所有使用这个说法的人来说, 从左派到右派, 第三条道路都暗示着“最好的道路”,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在《社会主义企业家》中, 我努力与这个用语所承载

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判断保持距离。我坚持说，我使用“第三条道路”或者“第三种方式”是中立的（Szelényi, 1988: 17），而且实际上是带着反讽意味的（Szelényi, 1988: 212）。它并不意味着“正确的道路”，它指的是，东欧在晚期社会主义条件下最有可能走的道路。所以，对于认为我赞同第三条道路的指责，我坚决地为自己做无罪辩护。《社会主义企业家》没有反西方的偏见。

然而，历史证明我是错误的。我的分析在1986~1988年间是正确的：共产主义已经走向末路，我们正在步入后共产主义时代。但是，说这种发展将会导致一种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并以某种“第三条道路”来实现自我生产，在中欧和东欧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1989~1991年，这一体系就这么完全“垮台”了。我的那些早在1985年就劝我说资本主义没有复辟的朋友，承担起了自上而下打造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且他们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社会主义企业家》如果早几年出版，可能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但是我的出版商速度很慢，这本书在1988年才出版（尽管实际上在1986年的晚春我就已经完成了写作）。当时，已经到了检验共产主义是否已经结束的时候，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被证明只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的一个短暂的过场。那个东欧的老笑话被证明是对的，我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个老笑话是这么讲的：“什么是共产主义？”回答：“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最长的、最痛苦的道路。”

四 社会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知识阶层的归来， 以及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打造”资本主义的方式

1989年以后，该是我重新组合并且面对《社会主义企业家》的错误的时候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进行第二轮自我批评。这就是我和我的合著者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里要做的事情。人们并不需要动多少脑筋就能认识到，东欧在1989年以后全面转向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之前，并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什么混合经济，我们当时见证的就是全面转向资本主义。对于称之为“转型”（transition）还是“转变”（transformation），我们有些许犹豫，但是当尘埃落定，这些都只是文字游戏

而已：这个正在出现的系统无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尽管并不一定是同质的，也并不一定遵从趋同甚至和解的轨迹。从这一点来讲，斯塔克（Stark, 1992）强调这种变化为“转变”而不是“转型”确实是对的，尽管他后来提出的“比较资本主义”（Stark and Bruszt, 1998；Stark and Bruszt, 2001）的构想，更好地捕捉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的独特特征。“转变”这个概念给我们猜测新的“终点”可能不是资本主义提供了某些空间，但这其实射偏了靶子。在中东欧所发生的已经是资本主义，只是不一定是我们从西欧和北美所认识到的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富有挑战性的智识上的任务是，搞清楚正在形成的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前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正在扩大，它们甚至没有走向同一种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模式）。这不是在给新现象贴上旧标签（比如，边缘性的或者依附性的发展，政治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等等），我们应该以全新的方式来将这些新形式概念化。就像之后我要详细阐述的那样，后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代表着资本主义广泛的多样性。它们会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时候以及是否会汇聚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仍然在我们的猜测当中，但是基本没有疑问的是，《社会主义企业家》预测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持久的、自我复制的混合体制是不切要点的。

随之而来的，是要对这一说法做出限定。东亚社会主义国家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或者越南是否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从某些角度来说，它们不是资本主义。它们仍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合法化的依据。它们都保留了庞大的公共部门，其他的经济领域实际上是混合的，从而很难被清晰地归类为私有或者公有。倪志伟正确地描述了中国的“混血”形式（Nee, 1992）。中国可能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它确实最接近我所描述的“第三条道路”。但是，所有迹象也都在表明，中国在走一条不同于中欧和东欧的道路。新空间被创造出来，管制被解除了，私营企业和半私营企业渐渐地填充了这些新空间，同时，经济中更为传统的领域（在中国是公共部门）却增长缓慢，并且慢慢地让步于形成中的私有经济。

所以，《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是对《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自我批评。中欧和东欧的混合经济并没有持续，小资产阶级没有成为转型的赢家，资本主义没有自下而上地生长，它是被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的。但是谁是

赢家呢？如果没有资本家存在，谁在打造资本主义？^① 对这个问题，常识的回答是党国精英（nomenklatura）。正在出现的是政治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党国精英变成了盗贼统治者（cleptocratura），并且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新的大资产阶级（Hankiss, 1990；Staniszkis, 1991）。这仅仅是“新瓶装旧酒”吗？“越改变，就越和原来一样”（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eme chose）。那么，我们的知识分子怎样了呢？

就是在这一点上，《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回到了《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的主题，但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扬弃”的方式。我们的分析紧随厄吉贝特·萨莱伊的研究（Szalai, [1988] 1989）。她在不同的著作（其中几乎没有英译本）中指出，技术专家（她称之为“新精英”）和老牌政治官员（political apparatchiks）之间的斗争，是匈牙利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她的研究也适用于分析苏联和波兰的变迁动力。共产党精英中的技术专家派系在和政治官员的斗争中，与异议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盟。在 1989 年夏秋之际，正是这个联盟打败了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共产党统治，并且为后共产主义转型铺平了道路。相同的过程也在苏联发生了，坦克并没有镇压这些运动；相反，面对自己的关键卫星国的急速变迁，苏联垮台了。萨莱伊在她后来的作品中也说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后共产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精英中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和不停变换的联盟。异议知识分子和前共产党技术专家之间的协定并没有持续多久。1989 年夏，这个协定已经瓦解。在 1990 年匈牙利和波兰的选举中，“新精英”抢夺了政治权力。这些“新精英”现在是反共产主义知识精英（常常由与前共产党很少有联系的人文知识分子组成），并且开始与技术专家为敌。技术专家—管理精英暂时退回到经济领域。在一些国家中，他们确实在“搞”政治资本主义，并将公共产品占为己有。在另一些国家中，他们耍手段把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转给外国人，以换取保住他们的经理职位（现在作为经理人的收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他们有时甚至在新近私有化的公司中持有财产股份。但是在第二届自由选举中，技术专家精英（或者那些继续在政治领域而不是在新经济中安身的技术专家）中的许多人重新掌权。他们剥夺了“新精英”的职位（这个现象在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都有发生），启动了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政党轮替。政府的“颜色”，从爱国基

① 实际上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资本主义从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有产阶级的社会形态中出现。

督教人文知识分子，转变为前共产党技术专家和他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盟友（其实只是“颜色”又变回来了）。所以，使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中广义的“知识分子”概念，谁在1989年得胜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很显然，1989年革命的赢家，不是20世纪80年代“第二经济”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失去了很多，很少有人变成大企业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与新来者在“真正”的市场中竞争）。知识阶层才是赢家：他们是前共产党技术专家与自由主义或者爱国基督教人文知识分子的某种结合。所以，资本主义由知识分子从没有资本家的社会主义中打造了出来。《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并没有说，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将不会出现持有私产的有产阶级——重心在于题目中的“打造”一词。资本主义一旦建立，当然会出现自己的有产阶级。至少在我们看来，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这次转型——与以前所有的“转型”不同——发生在一个与马克思所分析的社会不同的社会中，这个社会的“子宫”中不存在私有财产权制度或者正在出现的有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打造资本主义就不得不留给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者——知识分子。

因此，知识分子确实获得了权力，但是方式与《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里面所假设的不同。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变成“理性分配者”；相反，他们一股脑儿地放弃了社会主义规划，把创造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当成他们的“使命”或者“天职”。20世纪80年代晚期，他们已把这一任务看作是“打造资本主义”（即便在最为“进步”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产生这种态度的时间也是相当晚的，可能晚至1987年或1988年）。“打造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伦理任务，就像“打造社会主义”当初是一个伦理任务一样。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以前的左翼知识阶层“从扫罗变成了保罗”^①。他们不仅接受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一剂为了获得公民自由

^① 保罗是最著名的圣徒之一，原名扫罗（Saul）。扫罗是希伯来人惯用的名字，保罗是罗马人惯用的名字。为了便于在罗马人管辖地传道，扫罗改名为保罗。保罗的悔改有一段奇妙的经历。他本来是一个极力逮捕、关押、刑讯基督徒的人，在去大马士革搜捕信徒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并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立时双眼失明，只好被人领进大马士革，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虔诚信徒，顺服神的带领，前去医治这个本来要捉拿他的人，并亲切地称他为“兄弟扫罗”。这时的保罗痛心悔改，信了耶稣为自己的救主，并且尽力宣扬耶稣的救恩，为了传讲福音曾屡遭苦难，最后甚至殉道而死。全部新约《圣经》共有27卷，古代信徒都认为，其中有一半是保罗在神的感召下写的。——译者注

而必须吞下去的苦药，而且甚至开始“信仰”资本主义。

在这个时候，德国编年史学，特别是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的作品（Kocka, 1988）启发了我的研究。毕竟，在这个地区有知识分子领导现代化的历史先例。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我们可以认为，中欧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建构成“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或者“文化资产阶级分子”。鉴于这个地区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或者“经济资产者”（Wirtschaftsbürgertum）力量的薄弱，文化资产者们没有多少选择，只能自己践行在西欧和北美由资产阶级执行的任务。虽然“文化资产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创造出来，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编年史学中的重要术语，但“Bildung”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追溯到康德和歌德（Bildung是一个很难翻译成英语的概念，因为它比“文化”或者“教育”的含义更广，并且深深地扎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当中。在本文中只能近似地将其译为“文化与教育”）。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知识分子确实在现代化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了柯卡理论的武装，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重新理解《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的半边缘国家，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先锋”，而且实际上他们是亲资本主义的。他们的第一次规划，也就是“文化与教育”（Bildung）规划，把现代教育系统和其他机构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中欧知识阶层的第一次规划。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即便这个规划可行，那也至少是相当艰难的；他们开始怀疑，为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可能抵不上将从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得到的收益。难道我们不能设想出一个代价更少、让我们更快地实现现代性的方法吗？因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地区的知识分子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与左翼和右翼激进主义的联系加深，并由此变得越来越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资产者”这个术语在20世纪20年代被创造出来，带着反资产阶级的情绪（这个词是右翼理论家创造的，本来也可以由左翼分子创造出来）。将Bildungs和bürgertum这两个术语结合起来，指出了人们如何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资产者”（“Bürger”）或资产阶级分子（bourgeois）。^①只有在

^① 在德语中，Bürger或Bürgertum这一概念的含义要比bourgeoisie模糊得多，但是同时也更为丰富。Bürgertum是Bürger的复数形式，这个词的含义很广泛，指的是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上的市民，包括商人、自由民等。更详细的解释，可参见伊亚尔等著《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吕鹏、吕佳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54~105页。——译者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术语才获得积极的正面内涵，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要展示德国的知识阶层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纳粹，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看作是“Bürgertum”，认可的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到了19世纪末，中欧的知识阶层（俄国的知识阶层也不是简单地加入队伍，而是很快在这个转变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采取了第二次规划。现在它视自己为绕过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一个超理性社会秩序的先锋。《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聚焦在这个计划的左派版本及共产主义上。这本书主张，共产主义，特别是改良共产主义，可以被视为一个“新阶级规划”。有些知识分子则倒向了右翼〔他们并非微不足道的一小撮人，其中有一些非常有名，比如海德格尔、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这里只说最好的几个〕。在20世纪上半叶，文化资产者只能隐藏起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资产者或资产阶级分子是不时髦的。

因此，对中欧知识分子社会史的这份重新解读接受了《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自我批评，但并非全盘接受。是的，知识分子的阶级规划失败了，但是这个规划确实曾经真实地存在过（而且并非注定要失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世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结合）。不管怎么说，1989年革命的赢家是作为文化资产者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新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开始感觉到，第二次规划也不会成功，所以他们开始发展第三次规划。他们重新解读了18世纪和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论著，发现了“Bildung”这个概念的原意。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先辈们非常类似的是，他们首先重新发现了市民社会的概念，然后才意识到，为了实现只有市民社会才能带来的自由，财产私有制和市场资本主义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市民社会是市民性的，并不一定非得同时是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现在他们回到了中欧知识分子的第一次规划，把自己建构成“第二代文化资产者”（文化资产阶级分子），将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打造资本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回到了《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的主题。知识分子并没有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甚至没有走在变成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的道路上。他们确实赢得了1989年革命，但是只能跟前共产党技术专家结成联盟。在90年代的后共产主义转型中，他们属于支配精英，但从一开始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日益

成为支配精英中的一个“从属派别”；领导力被技术专家—经理阶层和新的政治精英夺取。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巩固，支配精英会让位于新的支配阶级。毕竟，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从社会主义等级秩序到资本主义阶级层化社会的转型，精英霸权只在新阶级关系还没有成形的時候得以持续。

这本书最普遍的结论是，“新阶级”理论很可能出错，因为“文化资本”也许从来没有以一种持续的方式变成资本的支配形式。文化资本就像韦伯社会学中的卡里斯玛。它是一种革命力量，协助一个体系运动到另一个体系，但是一旦改变完成了，官僚统治或者有产阶级的支配就会牢牢地建立起来，而文化资本的持有者只能坐在后排。

扳倒共产主义和正在打造新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社会力量的聚合，在不同国家有着很不同的表现。我们在最近一本著作中描述的文化资产阶级，以及前共产党技术专家和异议人文知识分子的联盟的独特角色，最好地描述了中欧的这种转型。然而共产主义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地。就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那样（King and Szelényi, 2005; Kitschelt et al., 1999），前共产主义国家正在走向不同的归宿。至少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方面来看，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国家之间的差别被缩小了；然而在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趋同”后出现的，是强劲的“分化”趋势。不同的社会将走上哪条道路，主要取决于阶级力量之间和精英内部斗争的组合方式。

只有在中欧，技术专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使共产党行政人员最后退位。在这场运动发生的地方（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资本主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新权力精英确实实施了相当成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总体上说，这些国家也避免了共产党行政人员顺手拿走公共财产，把它们变成流通的财富。虽然有一些腐败色彩，但总的来说私有化是依法执行的，在一些情况下，采取的是证券机制（voucher mechanism），在另一些案例中，则是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在经济产出急剧下降之后，新自由主义政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重新回转过来，它们向世界市场和外国投资者开放。外国资本在商业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刺激了经济增长，并且把本土资产阶级限制在中小型企业里。

在东欧和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除外），技术专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并不存在或者力量太弱，以至于不能打败共产党官僚（戈尔巴乔夫也曾试图

模仿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组建这一联盟)。老的党政干部在政权垮台后存活下来，他们在尚还弱小的市民社会中翻云覆雨，成功地将私有化的公共部门转化为私人财产，并且制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承袭制版本。最后，在中国，技术专家在毛泽东去世后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老牌集团至今仍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情况足以防止技术专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是技术专家也有足够的影响力。东亚的市场经济进展缓慢，不像欧洲是“从高层”发动，而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这一模式为倪志伟的判断提供了依据，倪志伟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直接生产者”（特别是当他们在变成私营企业家的路上）也许甚至能从市场转型中获利。

因此，我最后提出的限制条件是，知识分子确实赢了1989年革命，但是这种说法只是针对中欧及其上面所述的限制条件才有效（也就是说，即使在中欧，他们的胜利也只有在前共产党技术专家—管理精英参加联盟后才能取得）。知识分子并没有把自己转变成新阶级，只是把他们的作用限制在“革命力量”上，去完成“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打造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在其他后共产主义和晚期社会主义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的历史以不同的方式展开。

五 方法论的连续性：作为批判性研究方法的 讽刺在新古典社会学中的应用

如我在这里宣称的那样，上述的“三部曲”可以作为同一个研究的三本书来读，它们在内容上否定彼此，目的是根据快速变迁的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的现实逐渐进行调整。不过，这些著作中所应用的方法论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

这里，我想简单地回应一下布洛维（Burawoy，2001）对《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的有趣批评（其中，我的有些论点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阐述过，参见 Eyal et al.，2001）。在最后一本书中，我们指出，随着共产体制的没落，社会学面临着一个新任务。在一种可供替代的社会主义出现之前，社会学可以将（实际存在的或者“真实”的）社会主义作为支持或者反对现状的批判点。更重要的是，鉴于社会主义理念至少并不算是社会分析的主流思想，社会学家们很少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保持敏感。现在，随着社会主义已经从

议程上消失，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的归宿，所以“比较资本主义”可以变成宏观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我们甚至有点儿不谦虚地称之为“新古典社会学”。^① 要点是，共产主义的没落迫使宏观社会学家回到了这个学科的某些起点问题：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资本主义？它的起源是什么？但是，这不仅仅是回到经典。古典社会学，甚至比 20 世纪的社会学更专注于社会主义的承诺和威胁，所以，古典社会学家们倾向于把资本主义想象成一个同质的系统。^② 所以我们主张，新古典社会学将重访经典议题，但是将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相同的问题。如斯塔克所称的那样（Stark and Bruszt, 1998），新古典社会学的核心规划是“比较资本主义的社会学”。

应该已经很清楚的是，我们相信社会学的“古典转向”跟经济学的古典转向有着根本的不同。社会学中的古典转向确实使社会学（我们以前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能够处理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的大议题。但我不接受社会学只是经济学的女仆，以及社会学所能做的只是向经济分析引进了一些对于更宏观的机制的理解的说法，比如经济行动的“嵌入性”。社会学的新古典转向意味着，社会学将以辩论的方式跟新古典经济学交锋，就像古典社会学和古典经济学一样。

布洛维在他的批判性评论（Burawoy, 2001）中声称，新古典转向基本等于“市场凯旋论”（market triumphalism），是对批判社会科学规划的放弃，他认为我在早期作品，特别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中曾经致力于这个规划。

我相信我仍然效忠于“批判分析”。我认为布洛维误解了我在早期作品中使用的批判方法，这种方法，就像我所说的那样，跟我最近使用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我承认布洛维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晰。在没有批判性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以某种方式位于我所试图进行批判

① 我是在 1997 年秋或者 1998 年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倪志伟的某次谈话中创造了这个说法。我记不得是谁先用这个说法，是倪志伟还是我；尽管如此，我非常感激他的这个给人以启发的术语，如果不是他的启发，可能我不会想到这个说法。

② 这一说法并不适合韦伯。在某种程度上，韦伯是第一个“新古典”社会学家，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了资本主义有许多历史性的形式，他还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政治或者政治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复杂理论，他甚至研究了国家资本主义。不过，即使是韦伯也倾向于把“现代资本主义”想成接近于“纯粹模型”，而把政治资本主义看作是暂时性的，尽管这有时是致命的偏差性现象。

性理解的体系之外)的情况下,批判分析是否可能?布洛维的答案很清楚:不可能——也就是说,需要批判性的传统观点——因此,他推荐了后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新古典社会学,前者假设出一个“积极的乌托邦”作为批判性的制高点。这是一个完美的、符合逻辑的观点,值得尊重,而且已经被许多从事批判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运用。^①但是我坚持认为,这不是提供批判分析的唯一方式,而且我也试图在我早期的批判分析中跟这样的“乌托邦”制高点保持距离。

在这里,我愿意回到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的“镜像比较”的方法上。我采用了这种方法,因为我不想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或者可能更不平等,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合法性。关键是,为了理解和提供针对社会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批判性分析,我们需要从它自己的特征出发——你也许会说这是一种“内在批评”或者“反讽”的方式。这样的分析就像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热忱一样,是“反讽”的,因为它坚持认为,我们不需要展示一个更好的结局,来理解正在被研究的现象不是不可避免的,(用福柯的说法)它是“暂时性”的,可以是别的样子。

与此类似的是,在《社会主义企业家》里,我坚持说,我所做出的晚期社会主义正走在某种第三条道路上的诊断,是一种反讽性的判断。我再次使用这个说法,并不是为了推荐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为了说明这是在往好的方向变化。唯一的要点是为了说明正在被研究的现象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其他的行动或者生活的方式,判断什么是理想的、是对的不是社会科学的任务。跟韦伯一样,我相信社会科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我们顶多能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或者可能做,其他的必须留给社会实践。

假设一个乌托邦的存在的确是提供批判分析的一种方式,但是,既然批判分析的目的是提升行动者批判性的自我批判意识,那么,反讽也同样有效的方法。“反讽这个概念根植于希腊喜剧人物 Eiron (聪明的不得意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屡次赢了自夸的 Alazon。柏拉图式对话的苏格拉底反讽起源于这个喜剧。假装无知和谦卑,苏格拉底向不同的人提出各种无聊和明摆着

^① 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批判理论自身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视角。到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放弃了从“无产阶级视角”或者“社会主义视角”来提供批判分析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不再相信这些了。相反,他们坚持提供“内在批评”,一种我认为跟我描述的“反讽的历史观”相类似的方法。

的问题，只是为了暴露他们的无知和他自己的一样深刻。”（*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8: 390）

这篇论文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自我讽刺的训练。决定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的是读者。我只是希望谦卑不只是“假装”的；无知虽然是真实的，但对那些想要被视为社会科学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令人感到尴尬的事情。

王颖曜 译 郑雯 校

参考文献

- Bauman, Zygmunt. 1974. "Officialdom and Class-Bases of Inequality in Socialist Society." Pp. 129 - 148 in: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edited by Frank Parkin. London: Tavistock.
- Bell, Daniel. [1973] 1976.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urawoy, Michael. 2001. "Neoclassical Sociology: From the End of Communism to the End of Clas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4: 1099 - 1022.
-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8. Vol. 6.
- Eyal, Gil, Ivan Széleá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8.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 Verso.
- . 2001. "The Utopia of Postsocialist Theory and the Ironic View of History in Neoclass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4: 1121 - 1128.
- Giddens, Anthony.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uldner, Alvin.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Hankiss, Elemér. 1990.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eller, Agnes, Ferenc Fehér, and György Markus.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London: Blackwell.
- King, Lawrence P. and Ivan Széleányi. 2005. "Post-Communist Economic System." In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second edition.
- Kitschelt, Herbert, Zdenka Mansfeldova, Radoslaw Markowski, and Gabor Toka. 1999.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cka, Jürgen. 1988. *Bürgertum in 19 Jahrhundert: Deutschland in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München: Tachenbuch Verlag.
- Konrád, George and Ivan Szelényi. [1971] 1974. "Social Conflicts of Under-Urbanization." In: A. A. Brown, J. A. Licari, and E. Neuberger (eds.), *Urban and Social Economics in Market and Planned Economies* (Vol. 1, pp. 206 – 226). New York: Praeger.
- Konrad, George and Iva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Yovanovich.
- Kornai, Janos. 1980.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 .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stello, Eric and Ivan Szelényi.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1082 – 1096.
- Lal, Deepak and H. Myint.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5): 663 – 681.
- .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 – 27.
- . 1996.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Society—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908 – 949.
- Nee, Victor and P. Lian. 1994.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Theory and Society* 23 (2): 253 – 296.
- Richta, Radovan. 1969. *The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White Plains, N. Y.: Sharpe.
- Schelsky, Helmut. 1975. *Arbeit tun die Ander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Staniszki, Jadwiga. 1991. "Political Capitalism in Pol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5 (1): 127 – 141.
- Stark, David. 1985.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Firms and the Macropolitics of Reform—New Forms of Workplace Bargaining in Hungarian Enterprises." Pp. 257 – 273 in Evans, Peter,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eds.), *States versus Markets in the World-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 . 1986. "Rethinking Internal Labor Markets: New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92 – 504.
- . 1992.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1): 17 – 51.

Stark, David and Laszlo Bruszt. 1998.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One Way or Multiple Path: For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4: 1129 – 1137.

Szalai, Erzsebet. [1988] 1989. “The New Elite.” *Across Frontiers* 5 (Fall – Winter): 25 – 31.

Szelényi, Ivan. 1972. “Housing System and Social Structure.”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s* (February): 269 – 297.

———.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Supplement), pp. 287 – 326.

———. 1986 – 1987.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 Project—An Auto-Critique.” *Politics and Society*. 15 (2): 103 – 144.

———.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Madison, Wisc.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zelényi, Ivan and Balazs Szelényi. 1944. “Why Socialism Failed?” *Theory and Society* 23 (April): 211 – 231.

Townsley, Eleanor. 1996. *Academics and the U. S. Government in the 1960s*. UCLA,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 2000. “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Demise of the New Class: Academics and the U. S. Government in the 1960s.” *Theory and Society* 29 (6): 739 – 784.

Trotsky, Leon. 1972.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finder.

DYNAMAN

第一编

国家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伊万·塞勒尼、凯瑟琳·贝克斯特、劳伦斯·P. 金

一 哪一个社会主义？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套初步的理论，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社会学特征。在“冷战”时期，西方的研究者们既不能获得关于这一论题的信息，同时也离这些话题很远；而苏联的解体，则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去发展一种更加客观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理论。

这一理论的目的，是理解构成社会主义现实的制度体系。这一理论涉及的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而不是由社会主义理论家所发展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类型。与此相似，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讨论，针对的也是一系列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经济制度（institution）。不过，由于《经济社会学手册》中的许多文章都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做了社会学分析，因此，这里只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或许，我们可以采用三种主要的标准，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

* 本文原文发表于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1944.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34 - 251.

予以区分。基于其不同的产权形式、依照其各自的整合机制或者是根据支配这两种体制的独特理性形式，或许能够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区分开来。不同的论者所强调的是上述这些社会主义的不同方面：马克思所强调的是第一个维度（Marx, [1867] 1977）；波兰尼强调了第二个维度（Polányi, [1944] 1957）；韦伯则强调了第三个维度（Weber, [1922] 1978）。而实际的制度，可以被描绘成这三个维度的结合。用韦伯的话来说，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这三个维度，具有一种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的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最为明显的独特特征在于，它是这样一种现代经济体制，其目标是消灭个人私有财产并将某种形式的集体所有权（通常是国家所有权）制度化。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家而言，消灭私有财产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此外，所有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试图宣布私有财产是非法的，并去培养各种不同的集体所有权形式。

社会主义理论家也对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加以攻击，并致力于用某种长期的计划性手段来取代市场。由于大多数社会主义政权都对市场做出了一些让步，因此所有稳定下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都具备货币体系，对某些物品也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尽管如此，所有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对两种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实施了中央控制：这就是资本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劳动力也被纳入中央控制的范围。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就是：在所有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都处于边缘位置，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国家机器的再分配干预来加以整合的。

最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计划制定者们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批评资本主义的左翼人士指出，在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经济体制下，“工具理性”处于支配地位，而对目的的考虑要屈从于对手段的律令要求。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们试图挑战这种“手段对目的的专制”（despotism of means over ends），从而恢复目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purposes）的地位；换言之，就是贯彻“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政治为纲”，经济体制屈从于政治的考量。总之，资本主义是被“形式理性”所统治的体制，而社会主义体制则为“实质理性”所支配。

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大多数生产资料（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是集体所有的，市场的作用被限定在某些边缘性领域，中央计划或再分配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再生产的逻辑；而在这样一种逻辑中，实质理性占据着支配性地位。

受上述这些一般原则的指导，本文的任务有三：对关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争论进行简要的回顾；提供一种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实证理论”（positive theory），并将其描述为一种“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①；最后，对（实际发生的和最终失败的）各种对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进行改革的尝试予以讨论，并探讨社会主义经济最终崩溃的各种原因。

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所记录的是一种已经失败的经济体制（也许中国是一个例外）。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为了避免历史主义的错误——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注定会失败，我们也并不认为各种关于改革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二 失败的是社会主义吗？

自从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宣称自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一直有人（往往是政治左派）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俄国的试验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持怀疑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东欧发生的剧变感到高兴，声称这些国家是社会主义政治的羞耻。

我们最好不要沉迷于定义。这些社会经济体制在苏联已经存在了七十多年，在东欧存在了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它在中国还继续存在着；至于应该用什么名字去描述这种经济体制的争论，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兴趣点所在。这里之所以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去描述上述体制，是因为尽管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指出它们并未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理念，尤其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所非常看重的民主原则；但它们毕竟曾经非常严肃认真地努力推行了某些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主张。私有财产被宣布为非法，生产资料成为公有，“剥夺者们被剥夺”。人们努力地去贯彻这样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决定生

^① 这一理论的关键要素建立在波兰尼著作的基础之上。康纳德和塞勒尼、倪志伟、魏昂德后来都对波兰尼的著作做了详细的阐述；科尔奈在著作中也讨论了波兰尼，尽管他采用的是“官僚协调”（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这一不同的术语。

产目标的，是党及其经济计划者所拥有的实质理性，而不是市场的逻辑和对利润的追求。

对于将苏联式的社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有三种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对其提出了挑战，它们分别是“过渡社会”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命题以及官僚集体主义理论。正如我们在对其进行回顾时所将要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三种理论都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及其运作做了不同的评价。

（一）“社会主义作为过渡社会”的理论

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对苏维埃俄国的第一波“祛魅”（disenchantment）就开始了；一些早期的批评家将苏联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① 不过，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羽翼的丰满与发展，是更晚的事情。最早出现的对斯大林主义的简明批判理论，是由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被背叛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一书中提出的（Trotsky, [1937] 1972）。托洛茨基的观点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早期“理论原型”提出了挑战。

考茨基（Karl Kautsky）认为，列宁已经在俄国建立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托洛茨基拒绝了这种观点（Trotsky, [1937] 1972: 249 - 250）。在托洛茨基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就其特点而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消灭了私有财产、改变了阶级关系并创建了一个工人国家。然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官僚集团扭曲了这一政治体制。官僚阶级的成员从工人阶级那里攫取了权力并使自己成为一种官僚种姓（bureaucratic caste）（Trotsky, [1937] 1972: 248 - 249）。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但它是一个被官僚扭曲的工人国家。

这种对工人国家的官僚式的扭曲，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也具有政治意义。统治集团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稀缺商品的不平等分配，其目的是让官僚阶级获益（Trotsky, [1937] 1972: 111 - 112）。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在流通领域重新引入了市场机制，布尔乔亚（bourgeois）的权力在这一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消费品的市场化分配，成为官僚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

^①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是最早一批对列宁主义国家持强烈反对立场的人，他们将这一体制视为“国家资本主义”（Kautsky, [1920] 1973; Bauer, 1920; Jerome and Buick, 1967: 59 - 60）。考茨基和鲍威尔都对苏维埃俄国早期的独裁特性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他们无法将这个独裁的新国家视为社会主义。

在不平等的肇因。

于是，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既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苏联要想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就必须进行一场社会的反向革命，这就要求恢复私有财产，再造一个有产阶级。同样，迈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也需要革命性的变化——但这时所需要的并非社会革命，而是政治革命。^①

对“过渡社会”的理论家而言，官僚并没有构成一个新阶级。受马克思对波拿巴时期法国国家官僚机构角色的分析的启发，托洛茨基认为，官僚阶层是一个特权种姓（caste）而不是一个阶级。就其政治权力和消费而言，这一集团的成员占据着特权位置。虽然官僚集团拥有对生产工具的处置权且阻止了工人们在生产中直接行使权力，但它自身却并不拥有生产资料。结果是，官僚种姓无法让他们自己的子女成为生产工具的继承者，因此无法构成一个阶级。

托洛茨基的“过渡社会”观点，在理论上来说是精致的，并为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矛盾——工人和官僚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洞见。^② 不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经典立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存在着若干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苏联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观点所隐含的问题很多。托洛茨基关于政治体制的扭曲对经济的影响方式的分析，从理论上看不连贯的，从经验上看也是错误的。首先，托洛茨基并没有解释，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如何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共存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在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官僚的特权并不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的（Nee, 1989; Walder, 1992a; Szelényi, 1978）。相反，官僚的特权主要是对稀缺资源进行行政分配的结果。比方说，官员们从公家那里获得免费住房，而工人们却不得不自己建房子。戴维·斯塔克（David Stark）所提出的“镜像比较”（mirrored comparisons）的观念，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市场和行政分配在制造不平等等中所扮演的角色（Stark, 1986: 492 - 504）。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制造了基本的不平等，但国家在一定程度减缓着这种不平

① 因此，托洛茨基号召苏维埃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从而重新获得权力。在托洛茨基看来，伴随着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一社会革命本来就已经完成了。

② 几十年之后，在其出色的《工人国家里的工人们》一书中，米克洛什·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从经验上证明了生产一线的工人们确实将官僚看作是“他们”，而自己则培育出一种“我们”的身份认同（Haraszti, 1977; Burawoy, 1985: 156 - 208）。

等；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情况正好相反，行政分配制造了不平等，那些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必须借助市场来改善自己的境遇（Nee, 1989; Szelényi, 1978）。

（二）社会主义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

关于苏维埃经济体性质的第二轮批判性理论——第一个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命题的自成一体的构想——是由此前托洛茨基的信徒们提出的。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于1939年达成协议之后，^① 这些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尤其是托尼·克利夫（Cliff, [1948] 1974）和马克斯·沙赫特曼（Schachtman, 1962），发现托洛茨基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是不能被接受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命题包括两个版本。这两种理论对于是什么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有着非常不同的假设，其各自的政治含义也不相同。第一种自成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张是由托尼·克利夫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的（Cliff, [1948] 1974）。克利夫将官僚集团视为一个新的国家主义形态的新统治阶级，并将斯大林主义者的掌权看作“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的标志。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理论，由后来的毛主义者查尔斯·贝特尔海姆（Charles Bettelheim）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提出（Bettelheim, [1970] 1976）。贝特尔海姆将企业管理层看作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将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

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托洛茨基认为，官僚集团并没有构成一个统治阶级；克利夫反对这一主张，而且他大体上认为，托洛茨基将苏联概括成一个工人国家的做法是经不起检验的。克利夫认为，将官僚集团的角色限于分配领域是有误导性的，因为他们也对生产关系进行干预。实际上，斯大林主义下的官僚不仅对生产资料予以行政管理，而且还成为事实上的（尽管还不是法律上的）所有者。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有所不同。它既不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法律上的财产权，也不作为个体行使其财产权。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是一个集体性的私人所有者——它以整个官僚阶级的名义控制着私有财产。

^①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苏联曾经成功地完成了它的社会革命。这一主张意味着，可以认为苏联要比最好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进步。但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议（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译者注），使得这一立场再也站不住脚。

由于在法律上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克利夫将官僚集团定义为一个新的支配阶级。克利夫还认为，这一社会形态应该被理解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克利夫的这一主张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资本的积累。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使这个国家走上了加速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道路。对克利夫来说，官僚集团因此承担了通常情况下是由资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规划，被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转变为一种关于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战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得以复辟，尽管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国家主义的形式。

克利夫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官僚对苏联体制的扭曲仅限于分配领域。虽然与西方的资产阶级相比，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在消费上并不算很有特权，但这一集团确实生产环节上采取“专制统治”（Burawoy, 1985: 12）。

克利夫关于官僚集团阶级特性的观点，相对而言说服力较弱。原因之一在于他并没有对财产权进行充分的理论概括。由于缺乏一个恰当的关于财产权的理论，由于对哪“一束权利”能够将一种社会关系定义为私有财产权这一问题缺乏充分的理解，在对官僚集团获得了一些财产权的观察中，克利夫得出了官僚集团是这些财产的私人所有者的结论。这种理论归纳造成了一种无边界的关于私有财产的概念，因为如果说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的话，那么，在人类历史中，私有财产权和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普遍现象了。

克利夫关于苏联式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主张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克利夫将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称为资本主义，因为它走上了一条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道路。对于哪一种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才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从马克思到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家们已经有过更为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一个体系要想被界定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就必须发生在市场基础之上，积累的利润必须通过经济手段产生，而且利润要被投资到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上。苏联式经济不符合这些标准中的任何一个：20世纪30年代，调配利润的主要手段是强制；资本的配置指导原则也并非出于纯粹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

毛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

与克利夫相似，查尔斯·贝特海姆对个体性的私有财产和集体的私有财产进行了区分。古典的资产阶级是由个体性的私有财产所有者构成的；而苏联

的国家资产阶级，则是由集体性的私有财产所有者构成的。在这种相似性之外，贝特尔海姆试图去界定是什么东西构成了私人财产，并得出了一个更具理论说服力的结论。

在贝特尔海姆看来，资本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不同生产单位（units of production）彼此之间的相互分离（Bettelheim, [1970] 1976: 85）。因此，当生产单位被转换成企业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浮现出来了。各个企业在经济上是相互分离的，并通过市场这种中介发生联系。贝特尔海姆认为，当两种关键的经济活动——劳动力的配置和资本商品的配置——通过市场得以调节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就已经被确立起来了。如果劳动力和资本都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得到配置（在这里，劳动力的价格和投资品的价格都由供求规律决定），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就出现了。这意味着生产者的生存手段和生产工具之间发生了分离，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从而，那些占有资本货物（capital goods）的非生产者，就成为私人所有者或资本家。

从劳动力与资本市场、生产单位的分离，企业的出现，私有财产以及利润最大化行为等方面来对资本主义加以定义，听上去是非常有道理的。贝特尔海姆的分析中所包含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经验上的。贝特尔海姆声称，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赫鲁晓夫经济改革时期，资本主义以一种国家主义的形式在苏联重建。虽然贝特尔海姆正确地指出，推行这些改革会将苏联送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实际上，这些改革倡议并没有得到落实，各种中央计划机器仍然掌握着对投资品的配置权。没有适当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就不可能在市场上得到配置。相反，劳动力的供给和资本一样，受到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控制。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法律强制要求劳动者出售他们的劳动。因此，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不是经济需要，而是法律强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假设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是不合理的。

贝特尔海姆的错误还在于，他将改革倡议中的精神误读为苏联经济管理层的实践。直到最近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俄罗斯才开始真正尝试推行这些政策。

（三）社会主义作为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晚期，布鲁诺·瑞兹（Bruno Rizzi）这位不甚知名的意大利人，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的官僚化》（*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的书 (Rizzi, [1939] 1967)。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该书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特征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大多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理论家不同,瑞兹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也没有接受过多少学术训练。《世界的官僚化》可以被当作一本政治小册子来读,既可以被理解成是一位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无所不在的渗透的随笔,也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法西斯主义同情者一厢情愿的预言,即法西斯主义将成为人类的未来。

不过,瑞兹著作的关键之处在于指出,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在全世界出现。对瑞兹来说,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新政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都有一种新的共同特征。这些新的形态背离了其早期的更为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于是瑞兹转而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且颇依赖于国家官僚集团的力量。对瑞兹来说,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瑞兹称其为“官僚集体主义”(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下,国家官僚集团自身构成了一个新的支配阶级。这一阶级的权力基础,是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Carlo, 1974: 45-49)。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官僚集体主义这一提法被安东尼奥·卡洛(Antonio Carlo)重新捡了起来(Carlo, 1974),并对加斯托瑞尔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产生了长远的影响。^①卡洛和加斯托瑞尔迪斯都试图将官僚集体主义看作是“运动的法则”,声称苏联已经“沉醉于”经济增长。卡洛接受了瑞兹的观点,认为苏联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官僚集体主义的社会。与克利夫一样,卡洛将资本积累看作是这一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为了利润而生产,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生产,官僚集体主义的社会则是为了生产的目的而生产。

赫勒、费赫尔、马库斯在《对需求的专政》(*Dictatorship over Needs*)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Heller, Fehér, and Márkus, 1983)。^②与卡洛一样,这些学者声称,苏联不可以被称作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满

① 事实上,加斯托瑞尔迪斯更倾向于称苏联为“全能的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官僚集体主义,但这与卡洛的提法只有一种细微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区别(Castoriadis, 1978-1979: 46)。

② 尽管作者们使用了一个多少有点儿拗口的词——“对需求的专政”——来作为官僚集体主义的同义词,这篇非常有才气的文章却仍然属于“官僚集体主义”学派一脉。

足人类的需求，而这肯定不是苏联式经济的驱动力。这些学者同时指出，苏联式经济也不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操纵需求并制造新的需求，甚至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增长的目的而制造虚假需求。

作为一种替代，苏联事实上实施的是一种“对需求的专政”。它压制人们的需求，为的是调动所有的资源来为了生产的目的是生产。赫勒、费赫尔、马库斯的理论与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不认为官僚集团构成了一个阶级。按照这三位学者的说法，在苏联式社会中，掌握权力的是“国家机器”，但是它并不是以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集团”（group）的身份来行使其“集体权力”。在我们看来，这一说法与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区别，更多的是术语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通过强调苏联式经济“沉醉于”增长和生产，这些官僚集体主义取向的理论对苏联式经济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分析；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理论多少有点让人觉得不安。另外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理论的付梓是1974年以后的事，而那个时候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已步入了最后的衰落阶段。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起飞一样，这些理论来迟了。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社会主义经济体确实经历了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但是在1975年之后，除了中国之外，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出现过经济扩张。

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优点在于，它试图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体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征。然而，官僚集体主义理论是在一个理想化了的社会主义概念内打转，使用了承载许多价值判断的术语。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去判断社会主义是否值得追求，而是去理解它：我们要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细节，对它在制度上的真实情况做出严谨的说明。

三 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

（一）波兰尼关于再分配的理论 and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社会学家，都从波兰尼那里得到了启示（Konrúd and Szelényi, 1979; Szelényi, 1978; Nee, 1989; Walder, 1992a）。波兰尼区分了经济整合

的三种模式：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其中，再分配的概念对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显得特别有用。不过，在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若干重建。这一重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波兰尼对古代经济再分配的分析，必须予以改造以适应现代社会；第二，波兰尼将再分配这一观念当作一个制高点，从而对市场的性质提出批判性的洞见。为了确保我们对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分析不带有辩护的味道，我们必须提出一种对再分配的“批判理论”。

波兰尼使用“再分配”这一术语并不是为了形容现代经济，而更多地是为了描述早期帝国的古代经济。^①再分配机制的关键特征在于：从生产者那里抽取来的剩余被集中到一个中央威权部门的手中并根据这一威权部门的政治意志而进行配置。早期帝国的再分配权力因传统威权而获得合法性，其使用再分配权力的目的，是为了维系社会—生态系统的再生产。

在现代社会主义体制中，再分配权力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获得正当性。社会主义可以被描述为另一种“目标理性的威权”（Rigby, 1980）或一种“超级理性的经济体制”（Heller, Fehér, and Márkus, 1983）——在这里，中央计划的制定者宣称自己拥有抽取剩余的权力，并在其所拥有的“目的论的理性”（teleological rationality）的基础上，对这些剩余加以配置。这些“目的论的再分配者”（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宣称，他们要比生产者 and 市场更有能力来决定如何最有效地使用剩余。或许可以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称为“理性的再分配”体制，因为威权获得正当性的基础，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理性；而且，这种经济是以增长为取向的（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换言之，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再分配的目的不像古代体系那样是为了体制的简单再生产，而是调动剩余来确保增长。

波兰尼提出过两对二选一的概念：剩余的调拨和分配运动、市场交换和再分配。在我们看来，这两对二选一的概念之间的对比，揭示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所存在的最为根本性的差异。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货物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分配；而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货物通过中央威权来分配。在经济过程中，资本主义也许会允许而且确实常常允许一些再分配性质的干预，

^① 波兰尼非常清楚地知道，苏联式经济与那些通过再分配整合起来的帝国经济有许多共同点。尽管如此，他以及他的追随者，从来没有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苏联式经济的理论。

但是，在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由国家进行资本货物的分配都是不能被容忍的。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从镜子中看到的相反的形象”（Stark, 1986）。社会主义也许会允许市场力量在消费品的配置中发挥作用，但是它会坚决抵制对资本货物进行市场分配。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会从波兰尼再分配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意义（Szelényi, 1991）的角度，来对其进行重建。波兰尼规划的核心目标，是对市场经济提出一种批判性的分析。他使用再分配这一概念，是为了显示市场制度的暂时性，以及辨识出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波兰尼从再分配视角提出了一种对市场的批判理论。在本文中，再分配不是建构批判理论的出发点，而是予以批判性审视的目标。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研究规划是波兰尼研究规划的“镜中形象”：为了实现对社会主义再分配的分析，我们对市场的使用，是从一个批判性的视角来进行的。与其说我们要用一种对再分配的单向度批判来替代波兰尼对市场的单向度批判，毋宁说我们要用一种对再分配的公正批判来平衡波兰尼对市场的批判。

（二）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理性”

有必要对“理性”这一概念做出几点评论。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是一种实质理性，而不是形式理性。从“形式理性”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会被看作是非理性的或者无理性的，因为这种经济体并不寻求投资者利润的最大化。然而，称这种体制是理性的仍然是合适的，因为再分配者试图通过理性的标准而非传统的标准，来使其处理剩余的权力得以合法化。

赫勒、费赫尔、马库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需求的专政”的“目标一功能”是什么（Heller, Fehér, and Márkus, 1983）？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他们的回答将会是这样的：再分配者试图通过将他们所能控制的剩余数量最大化，从而扩大其再分配权力（Kornai, 1959）。因此，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一个首要特征就在于其“投资饥渴”：这些体制倾向于过度投资，且有可能导致一种过度消耗和体制性短缺（Bauer, 1981；Kornai, 1980）。相反，市场资本主义的慢性病是过度生产。渴望将再分配权力最大化这一机制，与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是类似的。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确实一直存在以下四种内在倾向（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①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最大限度地扩大投资；②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消费而最大限度地扩大集体

消费（因此，消费决策权从个体消费者那里转移到中央手中）；③将剩余从利润较好的企业重新分配给利润较差的企业（Kornai and Matits, 1984）；以及相对应地④将投资引导到“第一部门”而不是“第二部门”中去，即最大限度地促进重工业增长和能源供给，而使消费品的生产最小化（Kornai, 1972）。

因此，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理性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理性是相反的。人们也许会说，这样的体制并不是理性程度较弱，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再分配者执行的是一种更广义的理性——也就是赫勒、费赫尔和马库斯所说的“超级理性”（hyper-rationality）。相反，市场的形式理性让自我调节的力量来决定经济行为的具体目标。再分配的实质理性则否决了这些市场机制——赫勒等人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还不够理性。通过将经济活动的目标设定带到理性判断的领域中，再分配者实际上是在践行一种“超级理性”。

再分配者的“超级理性”并不能确保再分配者总是或常常能实现其所设定的各种目标。与此相似，市场也常常导致不曾预期的以及/或者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悖论意味的是，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的，是计划的无政府状态。

再分配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党到各级政府的诸多行动者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计划”或“命令经济”这样的概念相当具有误导性的原因之一。与极权主义理论十分相近的是，“命令经济”这一思想假定，一小群组织有力的精英有效地将他们的意志施加于整个经济（或社会）。对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实际经济过程的分析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东欧的经济学家已经使用“计划—讨价还价”（plan-bargain）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再分配者之间发生的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这些再分配者的分布范围极其广泛，他们位于官僚结构的不同层级与位置之中（Bauer, 1981）。因此，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和相当弥散的权力体系。结果是，再分配经济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Bauer, 1981）。要想对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加以描述，最好的切入点是去关注位于再分配官僚机构中各级机构和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所存在的激烈竞争和讨价还价行为。这一体制平稳运行的关键，在于网络（Granovetter, 1985）、庇护关系、“腐败”和“黑社会”（Galasi and Kertesi, 1990；Grossman, 1977, 1982）等所发挥的功能。

这一复杂的再分配网络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产权变得“不清晰”。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那样（Campeanu, 1980），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下，产权是真空的。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的观念模糊不清、难以捉摸：没有清晰的标准可以确定，是什么层次和什么位置上的制度性结构，能够对财产权进行配置。

（三）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

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为经济学家理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制度性微观基础做出了杰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Kornai, 1980）。他的分析与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宏观理论是一致的。不过，科尔奈对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企业层面的运转提供了丰富的洞见。

科尔奈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引入了“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科尔奈花了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所具有的产生“长期短缺”（chronic shortages）的趋势。在其早期的著作里，他提出了好几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这种短缺会循环发生，并对试图将这种短缺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各种建议进行了评价。譬如，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化过程进行了描绘和分析。他认为，虽然过度的集权化确实构成了某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但是去集权化并不能解决短缺的问题。甚至是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有可能选择加速增长战略，进行过度投资，从而制造出各种短缺。

科尔奈还指出，不去强调增长也不会解决短缺的问题。即使没有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计划制定者也可以实现和谐的增长。科尔奈对激进的价格改革的可行性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允许按照供给和需求来调节价格是可行的（Kornai, 1971）——但是，他的结论是，均衡的价格并不能成功地消除短缺。当企业对市场实施垄断时，价格的增长也许根本就不能消除短缺。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绩效证明，短缺也许并不排斥通货膨胀。

如果过度的中央集权、加速增长以及非均衡的价格体系都不是导致短缺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短缺呢？在《短缺经济学》中科尔奈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施加到社会主义企业身上的软预算约束。按照这一说法，我们可以根据企业各自承受的预算约束的特征，将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区分开来。私

营企业一般在“硬预算约束”下运行：它们必须满足利润标准。在公共所有权的条件下，这种“硬”约束则被解除了。只要能获得满足继续生产的可供利用的各种资源，企业就能继续运行下去——约束程度要软了很多。那些利润不佳的企业会被政府“盘活”，只要还能获得必要的资源，它们就能继续运转。

硬预算约束的存在会导致过度生产的现象。如果对利润的渴求限制了一家企业能运行多久，那么，这种渴求也会限制这些企业所产生的需求。在硬预算约束下，企业倒闭所导致的消费者需求的缩减和失业的增加，产生了“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在软预算约束下，情况正好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赢利的公司仍然在运转，继续满足着消费需求并保证着充分的就业，结果产生出过多的需求。它们的增长只能通过原料不足来加以限制。因此，在一个以软预算约束为特征的政体里，对增长施加限制的，将是生产资料投入的短缺。

科尔奈的分析是对微观经济学的一次实践，他关注的是发生于个体企业层面的各种经济过程。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分析，陶马什·鲍尔（Tamás Bauer）将科尔奈的工作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下。

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晚期，鲍尔对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Bauer, 1981）。^①与科尔奈一样，鲍尔强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是由过度生产的周期性发作所驱动的，但驱动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却是一种走向过度投资和生产不足的趋势。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能“治愈”短缺这一问题的话，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过度生产的问题。一个利润受到约束的经济体，是否比一个资源受到约束的经济体更具有吸引力呢？过度生产就一定比短缺好吗？乍一看来，科尔奈和鲍尔的分析，似乎是不偏不倚（even-handed）和价值中立的。

事实上，在工业化早期，或者说所谓粗放式增长（extensive growth）^②时期，无论是来自硬预算约束还是软预算约束，它们对经济所造成的限制都是无

^① 在鲍尔之前，安德拉什·布洛迪（András Bródy）注意到，就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一样，社会主义经济也会陷入经济周期之中。布洛迪搜集了大量的经验素材（Bródy, 1967）。受布洛迪的启发，鲍尔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是如何运转的；同时，受到科尔奈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肇因部分的启发，鲍尔提出了一套合理的假设。

^② 也有人译为“外延式增长”。——译者注

足轻重的。人们甚至可以认为，相对于硬预算约束来说，软预算约束还具有一个优点：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持续的水平时间要更短，扩散范围也更小。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更有可能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下降，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只是意味着增长的减缓。

然而，随着经济步入“集约式增长”（intensive growth）阶段，这一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对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们来说，“粗放式阶段”和“集约式阶段”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Jánosy, 1966）。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开始面临一些新问题。在早期，它们的增长主要是“粗放式”的。粗放式经济形成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农业生产、小商品生产、服务业或者家庭经济涌向工业生产部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没有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可供利用，那些经济上最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就面临着局限性。由于这些国家无法继续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就使得提高生产率成为必然。当增长主要是由不断提高的生产率造成的时候，“集约式增长阶段”也就到来了（Robinson, [1956] 1969）。

科尔奈的理论暗示，对这种从“粗放式增长阶段”到“集约式增长阶段”的过渡来说，软预算约束造成的危害或许是致命的。20世纪60年代，琼·鲁滨逊（Joan Robinson）就曾预言过这一观点。她认为，社会主义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加速增长的战略；在她看来，这是一种相当成功的战略；不过，她也预言：社会主义将不能够满足“集约式增长阶段”所要求的提高生产率的要求。

（四）软预算约束、经济整合机制和财产关系：宏观视角

在《短缺经济学》中，科尔奈反复强调，他的分析是一种微观经济学层面上的分析。不过，他的分析具有一些很明显的宏观意义。科尔奈对硬预算约束和软预算约束的区分，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区分。在所有具体的经济体制中，人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企业，有的预算约束要硬一些，有的预算约束要软一些。虽然在预算约束的性质、宏观经济条件和产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亲和”，但并不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着硬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专利。可是当我们探究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以及如何让它们“变硬”的时候，软预算约束和再分配体制之间的“选择性亲

和”就会凸显出来。^①在《官僚协调与市场协调》一文中，科尔奈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对经济的“官僚协调”（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导致了软预算约束（Kornai，1983）。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性亲和不仅存在于预算约束的性质和经济的整合类型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经济整合的类型与财产权之间。这一点在《短缺经济学》中表述得并不是很清楚。要求国家不去抽取企业的收入而是对企业“征税”，就相当于要求国家放弃它作为企业财产所有者的各种权利。行使再分配权力的，是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将这种权力从国家拿走，就意味着剥夺国家的所有权。这就要求明确后续的所有者是谁（1989年之后的东欧确实这么做了）；而当私人所有者追逐前国有产权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消灭再分配制度的进程也就开始了。《短缺经济学》实际上是一本预言性的著作：它预言，或许社会主义经济是无法改良的。用市场协调来替代再分配的整合机制，意味着产权和阶级关系的一次巨大变动。这种变动并不亚于一场革命。

四 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瓦解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古典的社会主义经济（classical socialist economy），这种形态只存在于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时期。现在，我们将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改革尝试进行解释，并评论为什么这些尝试没有阻止这个体制最后的垮台。

随着社会主义的古典模式向集约式发展阶段迈进，这些经济体开始显出衰退的态势。其经济增长放慢，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下降，人们的不满也在增加。此外，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在科技和军事上的差距也在扩大。

^① 在这一点上，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理论表现出了趋同。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作为所有者所具有的一种倾向，即干涉资本的积累过程。如果中央计划权威部门愿意停止对积累过程的干涉，不再从更赢利的企业抽取利润，那么，人们就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体中“解决”软预算约束的问题。从原则上讲，这一方案是很简单的：政府不再从企业抽取收入，它应该按照同样的税率向各个企业征税。无法缴税的企业应该被允许破产，而那些能够缴税和创造利润的企业应该被允许继续发展。换句话说，如果国家停止通过再分配来干涉资本积累过程，就会诞生硬预算约束的企业。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保持其在军事上的竞争力，以及/或者出于缓解群众不满的需要，社会主义政权开始了改革的试验。

（一）市场社会主义

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福山（Fukuyama, 1989）声称历史的辩证运动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这个终点即自由资本主义中理想的自由。但佩里·安德森（Anderson, 1992）指出，福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如果福山真的是黑格尔，他应该得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结论：如果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命题，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它的反命题，而一种综合了两种体制特征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则代表着未来。

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市场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些学者包括奥斯卡·兰格（Lange and Taylor, [1939] 1966）、亚历克·诺夫（Nove, 1983）、约翰·罗默（Roemer, 1992）、戴安娜·埃尔森（Elson, 1988）等。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也曾进行过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并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匈牙利的农业）。有人甚至认为，尽管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的东欧社会在措辞上十分亲近资本主义，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毕竟，在这些国家，公共所有权至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也许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让私人所有权成为常态。最后，中国实行的也是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当前，中国的体制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集体的所有权和市场交换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的结合方式，促成了过去十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显著上升（Huang, 1990, 1991; Oi, 1992; Walder, 1992a, 1992b, 1992c）。在对东欧和中国的这些试验的经验事实进行重新审视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市场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模型：一是“将市场社会化”（socializing the market），二是“积累的双重循环”（dual circuits of accumulation）。

（二）将市场社会化

大多数政治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将市场整合等同于私有产权。虽然本文并不完全将市场等同于私有产权，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选择性亲和。不过，我们至少还需注意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市场并非完全独一无二，它在私有产权占主导的经济中也不是特别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和运转，往往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

想象的那样。“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绝少是“完美”的，其建构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影响。为了创建各种类型的市场，必须花费大量的资源：销售人员、营销专家、广告商、股票经纪人、商品交易员、公司法律顾问以及其他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构成了实质性的“交易成本”（Elson, 1988: 10）。此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与价格相联系的市场占据着主导优势。消费者没有太多的选择，由于大公司往往过于强大，因此，在大公司和个体消费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讨价还价”。^①

其次，可以想象的是，公共所有权和市场是可以共存的，市场整合也可以解决国有企业一些固有的低效问题。奥斯卡·兰格（Lange and Taylor, [1939] 1966）是最早的支持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同时保留公共所有权的学者之一。^② 在兰格所憧憬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制定者将设定最初的价格，而这些价格随后通过市场中试错过程的调节而最终实现均衡。如果中央计划委员会预见到了短缺，它就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价格；如果出现了过剩，就可以降低价格。投资品（investment goods）将由中央计划委员会进行配置。兰格认为，与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相比，这样的体制具有如下一些优势。

首先，因为设定价格的试验次数更少，其价格均衡的实现将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其次，按照兰格的说法，这一生产组织仍将获得经济社会化所具有的各种优势。^③ 再次，其收入分配要比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收入分配更为公平。最后，这样的体制将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社会主义经济循环：它将阻止过度生产或长期短缺这样的周期性趋势发生。

兰格没有充分解释的是，当投资品被排除在市场力量之外的时候，这一理论框架将如何运行。我们为什么要假设，当企业不得不与中央计划机构就投资品讨价还价的时候，它们会对市场刺激做出什么反应？没有了资本市场，消费

① 这并不是说大公司就没有硬预算约束，因为它们确实也参与到了寡头卖主垄断式的竞争之中。

② 兰格没有觉得有什么理由要取消竞争性的小工业和小农业，尽管他觉得大公司的公共所有权更加令他向往。

③ “建立在私营企业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能够去考虑，但不会周全地去考虑生产中牺牲和变现的各种替代物。大多数重要的备选项，比如生活、安全和工业的健康，都在没有被视为生产成本的情况下被消耗掉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则能够将这些都放到经济考虑的因素之中。”（Lange and Taylor, [1939] 1966: 104）

市场似乎并不能解决长期的短缺问题。因此，戴安娜·埃尔森（Elson, 1988）、马顿·塔多斯（Tardos, 1982; 1986）和其他一些学者建议将资本货物也囊括到市场分配的过程中去。比如，塔多斯就建议设立一种“控股公司”或投资银行，所有的生产性资产都以股票的形式属于公共所有的控股公司所有。这些公司将在市场上相互竞争，它们的表现将完全按利润标准来评判。这将使得社会主义经济既拥有完整的市场整合，同时又保持了生产性资产的公共所有权。

（三）积累的双重循环

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二种版本中，存在着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再分配部门，另一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整合部门（Nove, 1983）。按照这一观点，大多数企业并不需要硬预算约束来实现有效运转。在集约式增长阶段，只有一部分企业必须是私有的并在市场上相互竞争。因此，为了创造活力，可以通过放松管制抵消再分配经济及其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积累的双重循环”这一思路最近的一个支持者，是亚历克·诺夫（Alec Nove）。在诺夫的模型中（Nove, 1983），经济体的特征体现在两个领域：更具主导地位的部门，由被中央计划体系整合起来的大型企业组成；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但处于从属地位的私有部门，这一部门由靠市场整合起来的规模稍小的企业组成。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可以在这种双重经济中并存。诺夫相信，生产组织的多样性与民主的政治目标是颇为相容的，因为这种多样性能够确保人们在最为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各种选择（包括国有企业中工人的自我管理）。

值得重申的是，这一理论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原理，即认为混合体制要比单一体制更具有优越性。首先，由于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权力轴心（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一个以再分配等级制为基础），这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创造出更多的策略空间，普通人也可以利用市场和再分配精英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使自己受益。^①其次，人们也应该能够从市场和官僚网络中获得资源，这样，人们就更

^① 当然，人们也可以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两拨精英会使社会冲突更加激烈。两拨精英也许不会增加普通人的自主性，而是会创造出一种“双重剥削”的体系。

有可能在安全网崩溃时免遭不幸。最后，鉴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存在着经济周期，因此，混合体制也许能够降低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破坏程度。

（四）社会化的市场和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历史试验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试验，结果有好有坏，从总体上说，情况并不像其倡导者所预期的那样乐观。至少存在三个主要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一是波兰，其试验开始于1956年，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开始；二是1968年后的匈牙利；三是1978年后的中国。这些实际存在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是如何组织的？其试验的结果如何？对上述三个案例进行比较，并非易事，因为每一个案例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在波兰，市场社会主义看上去从未运行良好；在匈牙利，改革一开始在某些经济部门是成功的，但是最终瓦解了；在中国，至少在目前看来，试验是相当成功的，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体。人们会问，匈牙利在一开始时取得的成功，是真实的抑或仅仅是一种表象？市场社会主义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吗？或者，仅仅是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波兰和匈牙利的命运是中国的未来吗？中国的经济仍然在扩张，是否有可能因为中国仍处于粗放式增长阶段？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吗？或者，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带有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吗？

从本质上讲，对上述问题可以做如下的回答：成功的改革，或许要求在产权和协调机制之间求得平衡，要求产权的多元化以及再分配和市场的混合。波兰对私有财产非常宽容，但是却没有有效地撤销对经济的管制，且其市场力量仍然受到太多的限制。匈牙利确实给予市场颇多的自由，但对私有财产却严加限制。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创造足够多的私有财产和充分多的市场自由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使得经济体制（至少在粗放式增长阶段）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波兰。在对波兰试验所做的分析中，诺夫将波兰经济的失败归咎于改革的不彻底。在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和吉瑞克（Edward Gierek）统治时期，波兰的党国精英们都对市场改革消极怠工。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波兰确实是一种二元经济（它的农业部门从来没有被集体化），但是它并不容许市场力量对资本货物或劳动力进行配置。法律禁止人们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波兰的官僚对私人农业的容忍，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事实上，波兰政府对农业

课以重税，对信贷、贸易和生产过程都加以政治干涉。20世纪70年代和所谓“波兰第二次工业化”时期所过度借用的外国资本，并没有被用于刺激第二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增长。事实上，大部分外债被再分配机构分配给了处于衰落中的公共部门，试图使其现代化。剩下的贷款则被用来换取政治和平：人们的实际收入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长，但并未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结果到了70年代晚期，波兰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增长率下滑。这促进了团结工会运动的出现和最终的军法管制的压迫。

匈牙利。匈牙利的情况与波兰相比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将它的农业部门集体化，对私有财产施以严格的限制。虽然在产权方面匈牙利要比波兰更为保守，但其市场改革却比其他东欧国家要走得更远。大多数消费品的价格管制被撤销了（Berend and Ranki, 1985）。在70年代，干部精英试图逆转经济改革的进程，但是这种反攻并没有阻止第二经济的扩散。第二经济非常有活力，尤其是在农业和服务业。看上去，一个不受长期短缺之苦的社会主义经济正在出现。^①

由于缺乏私人资本的积累，加上对私有财产权所施加的各种限制，匈牙利的经济奇迹最终烟消云散了（Kornai, 1989；Szelényi, 1989）。第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并产生了可观的个人收入，但是由于没有私有部门，这些收入都流向了消费领域。匈牙利开始向西方大量举债。这些贷款主要被用于抽取第二经济中产生的收入。结果是，经济增长开始停滞，而在国际贷款的压力下，通货膨胀爆发。到1982~1983年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们开始预言他们的经济体制的崩溃。

中国。虽然波兰的改革在经济上明显失败了，匈牙利只获得过短期的成功，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事实上，许多评论家都指出了中国年均10%的惊人增长率，并将中国的经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四小龙”）相比。

一个学术流派将中国的成功归结于它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由于中国采取了市场制度，从而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倪志伟的“市场转型命题”（Nee，

① 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匈牙利被视为“冰箱”社会主义或“土豆烧牛肉”社会主义的样板（也就是拥有丰富消费品供应的“大众消费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提出了短缺经济学的理论。

1991) 可以被解读为这一假设的有力阐述。

然而, 这一理论忽视了中国经济异常复杂的现实。正如戴慕珍和魏昂德已经指出的那样 (Oi, 1992; Walder, 1992a, 1992b, 1992c), 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产权的转变, 以及一个更加分权化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出现。^① 事实上, 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 这样描述中国也许最为准确: 在中国这种社会型构中, 通过一个 (削弱的) 中央再分配等级制以及各种省际和省内市场, 地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得以整合起来。

正如魏昂德阐明的那样 (Walder, 1992a), 并没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产权在中国遍地开花。财产由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 而不是转移到私人那里。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也许不会成为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黄宗智 (Huang, 1991) 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不是私营经济。相反, 中国最有活力的增长发生在乡镇企业, 而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的。农业部门的去集体化远未完成: 集体制存活了下来, 而且还有发生再集体化运动的若干迹象。

那么, 中国对产权的特殊安排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 对它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学者们指出, 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好几种不同的产权安排 (Sen, 1990)。总体来说, 中国的特色是一种多元化的产权形式, 而不是向私有产权过渡。此外, 所有这些企业都在市场和再分配等级制混合的环境中运转。所有权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谁占有最核心的产权——既不是中央政府, 也不是私营企业, 而是村集体。正如戴慕珍 (Oi, 1992) 和林南 (Lin, 1995) 所指出的, 经济计划和再分配并没有完全被市场所消灭或取代。更准确地说, 通过分权, 再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到了地方。乡镇所有权尤其如此, 而对城市经济来说, 也许其程度要轻一些。

比如, 在对中国北方一个十分成功的村庄 (大邱庄) 进行个案研究 (Lin, 1995) 时, 林南发现, 这个村子是由一个与当地企业并列的族长 (通常是各个大家族的首领) 委员会控制的, 这些人分享利润, 拥有土地、住房、

^① 戴维·斯塔克对东欧也做出了类似的评判 (Stark, 1992)。在一篇富有才气的文章中, 斯塔克指出,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 遵循着一种路径依赖式发展的轨迹; 因此, 当前的变迁最好被理解为基于当前制度的转变, 而不是一种未来目的已经设定好了的转轨。本文的其中一位作者也对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过类似的判断, 他预言东欧也许会重新步入它此前在社会主义时期偏离的轨道, 而不是只会奔向资本主义 (Szelényi, 1988)。

学校、医院、交通和通信系统。这个委员会同时还负责当地的福利事宜，为务工的村民设立最低工资。因此，村子里的私人企业就像是一个大公司里纵横交错的部门。

（五）工人的自我管理

工人的自我管理曾被鼓吹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替代性的选择，支持者认为，这种做法既实现了经济计划和决策的去中央集权化，同时又保留了集体所有权。工人自我管理的支持者们试图成立“工作自治社”；在那里，生产性财产被看成不可分割的社会财产并废除了雇佣劳动（Horvat, 1975）。作为一种理想，这种体制的思想根基可以追溯到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著作；他设想，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由生产者管理的合作社组成的联合体。后来，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强调，有必要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改革拓展到经济领域。工人自我管理的倡导者们也将他们的思想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①

有意思的是，工人们试图分享经济决策权的各种努力，往往发生在精英内部发生斗争的环境下。比如，1956年匈牙利工人的反抗，就是在知识分子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从而产生了一种权力真空之后发展起来的。随着苏联的干涉和卡达尔政权的建立，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运动后来都被镇压下去了（Lomax, 1990）。

与此类似，南斯拉夫工人的自我管理也是在精英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出现和实施的，不过这一次，斗争发生在斯大林和铁托之间。1948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封锁。在此之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接受了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工人的自我管理被党所发现，出现在1948年之后，而这很显然是在与斯大林发生冲突之后激发的。到1958年，南斯拉夫的官方观点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清除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资产阶级，同时也增强了国家的权力”（Singleton and Carter,

^① 比如，在对巴黎公社的讨论中，马克思就曾指出，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做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也就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Marx, [1891] 1972: 321）。与此类似，恩格斯也曾说过，“工人们只有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自我管理的拥护者们将此解读为一种有关社会所有权（social ownership）而不是国家或集体所有权的主张（Horvat, 1975: 19）。

1982: 120)。现在，自我管理成为阻止中央集权产生的关键。南斯拉夫走向自我管理，是它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争执的结果，铁托需要利用这种手段来让他新生的独立政权获得合法性。^①

工人的自我管理在南斯拉夫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贯彻。这种“去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制度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1950年，工人的代表组织得以成立。1954年，企业的自主管理机构被授予了在生产方面自主决策的权利。1957年，这些企业获得了对提高个人收入有影响的资源的控制权。1965年，生产者在计划内生产中的权利被扩大，试图增强市场作用的改革得以推行。

南斯拉夫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运行得非常不错：人均消费率和生活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例如，1962~1966年间，个人收入增长了244%（Singleton and Carter, 1982）。此外，尽管有人担心自我管理的企业不能将收入用于生产能力的扩大，但这一时期的投资总额还是增长了392%（Tyson, 1980）。不过，在70年代中期，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开始攀升到了警戒线的水平。

劳拉·泰森（Laura Tyson）已经指出（Tyson, 1980），匈牙利1956年改革的目的，是增加对市场的依赖，但改革最终未能降低失业率或通货膨胀，因为这些市场受到了阻止商品自由流通的地区障碍的扭曲。这些地区障碍包括：顽固且不公平的价格控制、市场经济中的特别干涉等。于是，一系列因素导致了资本的次优配置。这些因素包括：资本流动的地区障碍（银行和企业更愿意投资它们自己所在地区的“政治工厂”）、人为的低利率和价格控制、有缺陷的“信贷定量分配规则”以及缺乏对总体的资本稀缺的一致测量。

泰森的结论是，有些人将南斯拉夫的问题主要归咎于自我管理制度，这是不准确的。虽然工人们常常不用对糟糕的经济决策负责——这也许是自我管理制度运行不善的重要因素——但自我管理制度下工人的生产率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此外，在一些企业里，工人们确实承受了糟糕的经营决策带来的损失。因此，软预算约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更多地是由政治因素而

^① 工人自我管理的试验获得了某些成功，尤其是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试验。比如，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im）就建立在工人自治的基础上：所有人都参与决策，管理层轮流上岗，社员的需要以一种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满足。虽然基布兹贡献了以色列农业产出的三分之一和工业产出的小十分之一，但是其成员人数还不到以色列活动人口的4%。

非经济因素决定。^①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南斯拉夫陷入政治、社会和经济灾难之中。然而，不应该过早地将其归咎于自我管理的“内在不足”。市场和再分配的混合，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中国产生了出乎预料的活力；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南斯拉夫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经济自我管理体制的过渡，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学者们需要仔细地研究，到底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试验的失败；经济低效、政治合法性问题、共产党政治统治下的种族—宗教关系紧张，这些因素也许都各自扮演了某种角色。

五 结论

现在尚不清楚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在东欧的垮台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还是由更加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动力机制驱动的。现在的普遍常识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不管用。出于以下几点原因，这看来是一个多少有点简单的结论（Szelényi and Szelényi, 1994）。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时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的国家，看来曾经取得过不错的经济成就。比如，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发展确实缩小了它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许多指标来看，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表现得很好，包括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文盲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在内的指标都很不错。尽管承受着美国的制裁，古巴仍然被认为是拉美地区的一个成功典范。整体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说，在1975年之前，与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平均表现并不差。

必须加以解释的是，1975年之后这些经济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可能

^① 按照科尔奈的说法（Kornai, 1980），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原罪”是，不允许利润不佳的企业破产。许多人则指出，工人的自我管理加剧了这种问题。工人们的首要利益，是保住他们的工作，而如果权力被给予了直接生产者，非赢利企业破产或向更加赢利企业重新注资的可能性就会下降。然而，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的经济确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保持了高速增长。就像中央集权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样，去中央集权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因此，看来南斯拉夫的经济衰退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都是经济和政治行动者复杂互动的结果。

的解释是，这些经济体只有在粗放式增长阶段才能有效，而它们的崩溃，与它们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型有关。

其次，对那些主张社会主义不管用的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反例。自1978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国家仍然是集体所有权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看上去经济中的公共和私有部门仍然很有活力。事实上，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是乡镇企业（Huang, 1990; 1991），这些企业一般都是集体所有和管理的。中国也许在走向资本主义，但是在当前阶段，它绝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与此相似，它的活力也不能被归结于私有部门。

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看来是一系列因素互动的结果：内部的经济困难、来自世界市场的压力（包括第三次产业革命、债务增加，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计的用来改变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政策）、1981年之后加剧的军备竞赛、内部的政治变化、生活水平下降所导致的此前就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加深、异议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精英内部的冲突等。

因此，将社会主义的政治崩溃单纯地归咎于经济失败，是一种非常草率的做法。如果将我们的中心论点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话，我们会主张：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评论相反，我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并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纯粹就经济来说，社会主义也许能存活下来。它的倒台，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无法维系一个合法的政治体系，尤其是在存在着精英的内部冲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来说，发展出一套民主的制度要比实行促进有效经济增长的经济改革难得多。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1989年之前，社会主义经济体曾面临十年之久的经济困难期，但这些经济体的崩溃却发生在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瓦解之后。如果经济危机是这些政权倒台的原因的话，后共产主义政权现在也该倒台了，因为它们的经济失败程度超乎想象。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年之内下降了10%~15%，失业率从0上升到15%~30%，债务、不平等和通货膨胀都在扩大。

如果仅仅是经济表现这一个因素就能决定某一体系的成功的话，后共产主义政权应该都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后共产主义的经济秩序崩溃了，但社会上却基本没有什么骚动。

再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治：人民之所以接受生活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

下降，是因为他们希望政治体制发生民主转变。1993年4月，叶利钦赢得了一场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尽管他的政府的经济表现欠佳。俄罗斯人民相信了叶利钦的领导并拒绝了人民代表大会，因为他们判定议会并不民主。

上述看法并不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辩解，而是号召对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的表现与命运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认为社会主义必定失败以及假定后共产主义必定管用，这两种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都经不起批判性的审视。我们所呼吁的，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做出更加中肯的分析。

吕鹏 译 刘建洲 校

参考文献

- Anderson, Perry. 1992.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Bauer, Otto. 1920. *Bolshev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 Bauer, Tamás. 1976. "The Contradictory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under the New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15: 3-23.
- . 1978. "Investment Cycles in Planned Economics." *Acta Oeconomica* 21: 243-260.
- . 1981. *Berubázási ciklusok* [Investment circl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Berend, Iván, and György Ranki. 1985. *The Hungari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ettelheim, Charles. [1970] 1976. *Economic Calculations and Forums of Property*. Translated by John Taylo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ródy, András. 1967. "Gazdasági növekedésünk üteme 1924-től 1965-ig" [Economic growth in Hungary 1924-1965].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7.
- Burawoy, Michael.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 Burawoy, Michael, and Pavel Krotov. 1992. "The Social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orker Control and Economic Bargaining in the Wood I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6-38.
- Burnham, James. [1941] 1960.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ampeanu, Pace [Casals]. 1980. *Syncretic Society*. Armonk, NY: M. F. Sharpe.
- . 1980. *Origins of Stalin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 Carlo, Antonio. 1974. "The Socio-Economic Nature of the USSR." *Telos* 21: 2 – 86.
-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78 – 1979. "The Social Regime in Russia." *Telos* 38: 212 – 248.
- Cliff, Tony. [1948] 1974. *State Capitalists in Russia*. London: Pluto Press.
- Elson, Diane. 1988.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New Left Review*, 1723 – 1744.
- Esping-Andersen, Gö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 1985.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3 – 18.
- Galasi, Peter, and Gabor Kertesi. 1987. "The Spread of Bribery in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Acta Oeconomica* 38: 371 – 389.
- . 1990. "Corruption and Ownership: A Study in Property Rights Theory." Department of Labor Economics, Karl Marx University, Budapes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 – 510.
- Grossman, Gregory. 1977.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26: 25 – 40.
- . 1982. "The 'Shadow Economy' in the Socialist Sector of the USSR." Pp. 99 – 115 in *CMEA Five Year Plans (1981 – 1985) in a New Perspective: Planned and Non-Planned Economics*. Brussels: NATO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Directorate.
- Haraszti, Miklos. 1977. *Workers in a Workers' State*, translated by Michael Wright. London: Penguin.
- Hegedus, Andras. 1976. *Socialism and Bureaucracy*. London: Allison & Busby.
- Heller, Agnes, Ferenc Fehér, and György Márkus.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orvat, Branko. 1975. "A New Social System in the Making: Historic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elf-Governing Socialism." In: *Self-Governing Socialism: A Reader*, vol. 1, edited by Branko Horsat, Mihailo Slarkovic, and Rudi Supck.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 Huang, Phillip.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 – 198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17: 299 – 341.

Jánossy, Ferenc. 1966. A gazdasági fejlődés trendvonala és a helyreállítási Periódusok [Tren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riods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71. “Gazdaságunk ellentmondásainak eredete és felszámolásuk útja” [Origins and solutions of the current contradictions of our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8, nos. 7–8.

Jerome, W. Abraham, and Adam Buick. 1967. “Soviet State Capitalism?” *Survey*, no. 62, pp. 58–71.

Kautsky, Karl. [1920] 1973.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translated by W. H. Kerridge. Westport, CT: Hyperion Press.

Konrád, George, and Iván Szelényi. 1979.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Translated by Andrew Arato and Richard E. All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ornai, János.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Hungarian Light Industry*, translated by John Knapp.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1. *Anti-Equilibrium*.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1972. *Rush versus Harmonic Growth*.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1983. “Burokratikus es piaci koordinacio” [Bureaucratic versus market coordin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30: 1025-37. In English in *Osteuropa – Wirtschaft* 29 (1984): 306–319.

———. 1989.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Hopes and Reality.” Pp. 32–94 in: *Remain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edited by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ános, and Agnes Matits. 1984. “Softness of the Budget Constraint—An Analysis Relying on Data of Firms.” *Acta Oeconomica* 32: 223–249.

Lange, Oscar, and Fred M. Taylor. [1939] 1966.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McGraw–Hill.

Lin, Nan.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Rural Reform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Lomax, Bill. 1990. *Hungarian Workers’ Counci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x, Karl. [1867] 1977. *Capital*, vol. 1,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891] 1972.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663 – 681.
- .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267 – 282.
- Nee, Victor, and Peng Lian. 1994.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A Dynamic Model of Declining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State Soci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23.
- Nove, Alec.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Unwin Hyman Ltd.
- Oi, Jean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99 – 126.
- Polányi, Karl. [1944]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 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Pp. 243 – 69 in: *Trade and Market in Early Empires: Economic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ited by Karl Polá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 Rigby, T. H. 1980.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 Essays Dedicated to Leonard Shapiro*, edited by T. H. Rigby, Archie Brown, and Peter Reddaway. London: Macmillan.
- Rigby, Thomas H., and Ferenc Fehér, eds. 1982. *Political Legitimation in Communist States*. Oxford: Macmillan.
- Rizzi, Bruno. [1939] 1967. *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 translated by Adam Westoby. London: Tavistock.
- Robinson, Joan. [1956] 1969.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 Roemer, John. 1992. "The Mor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rket Socialism." *Ethics* 102: 448 – 464.
- Schachtman, Max. 1962. *The Bureaucratic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he Stalinist State*. New York: Donald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1942] 1975.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Sen, N. C. 1990. *Rur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Singleton, Fred, and Bernard Carter. 1982. *The Economy of Yugoslav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tark, David. 1986. "Rethinking Internal Labor Markets: New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92 – 504.
- . 1992.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17 – 54.
- Stark, David, and Victor Nee. 1989.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State Socialism." Pp. 1 – 31 in: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edited by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zelényi, Ivá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 61 – 87.

———. 1985.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Socialis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 284 – 297.

———. 1989. "Eastern Europe in an Epoch of Transition: Towards a Socialist Mixed Economy?" Pp. 208 – 232 in: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edited by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Karl Polányi and the Theory of a Socialist Mixed Economy." Pp. 231 – 248 in: *The Legacy of Karl Polányi*, edited by Marguarite Mendell and Daniel Sale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zelényi, Iván, in collaboration with Robert Manchín.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 Cambridge: Policy Press.

Szelényi, Iván, and Balaz Szelényi. 1994. "Why Socialism Failed." *Theory and Society* 23.

Tardos, Márton. 1982. "Program a gazdaságirányítási es szervezeti rendszer fejlesztésére" [A progr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Közgazdasági Szemle* 29: 715 – 719.

———. 1986. "A szabályozott piac kialakításának feltételei" [Condi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a regulated market]. *Közgazdasági Szemle* 33: 128 – 198.

Trotsky, Leon. [1937] 1972.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Tyson, Laura. 1980. *The Yaroslavl Economic System and Its Performance in the 1970s*. Berkeley, C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lder, Andrew. 1992a.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c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524 – 539.

———. 1992b. "Marke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ural China: A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Public Choice Society, New Orleans, March 20 – 22.

———. 1992c. "Corporate Organization and Local State Property Rights: The Chinese Alternative to Privatization." Forthcoming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and Reforming Communist Systems*, edited by Vedat Milor.

Weber, Max. [1922]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translated by Ephraim Fischhoff et al.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住房体系与社会结构*

伊万·塞勒尼

一 住房作为一个社会问题

许多学术文章、书籍和新闻报道都以相似的句子开始：“住房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紧迫的问题（或者至少是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匈牙利、瑞典、美国、印度和波兰的读者都会认为，这句话很有说服力，不需要做进一步的举证。这个一致意见让我们得出结论说，20世纪，或者至少是20世纪下半期，住房问题在整个世界都存在。但是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做出这个论断，同样引发了一些疑问。当我们与瑞典、美国或者印度的同事谈起“住房问题”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吗？这些国家的实际住房状况差别很大，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指数甚至是社会体制也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描述住房问题的文章却同样表示不耐烦和不满，都认为情况糟糕。这难道不需要一些解释吗？瑞典人和匈牙利人对各自的住房标准均感到不满，印度人也一样。一个瑞典人觉得糟糕的住宅，在一个普通的匈牙利城市居民看来可能是很理想的。一个生活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里的人，可能觉得拥有像在布达佩斯最近被拆毁的贫民窟地区的一室一厅的公寓是件很愉快的事情。斯科特·格里尔（Scott

* 这篇文章原文发表于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s*, February, 1972, pp. 269 - 297。

Greer) 正确地指出, 如果把美国的住房条件跟更贫穷国家的住房条件相比较, 很明显, 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不好的住房 (Greer, 1966: 519)。毕竟, 在匈牙利被认为是标准的、直到今天才刚刚达到的两人一室的居住密度, 在美国可能足以让一个地区被称为贫民窟。^①

不仅是(横向的)国际比较,(一国之内的)纵向比较在这方面也会造成混乱。举例来说, 在匈牙利, 最近十年中新建了 60 万套住宅, 各种住房指数都提升了, 即使是这样, 今天, 关于住房问题的讨论并不比十年前或更早以前少。让我们希望会有另外 40 万间住房在未来的五年中建造起来, 换句话说, 150 万人将搬进新的公寓或者独幢房屋中, 但是今天, 任何匈牙利人都很难想象在接下来的五年中, 我们会解决住房问题。即使到了 1975 年, 被访者还是会同今天一样对民意调查者说住房问题是他们最大的个人或者家庭问题。^②

以上所述已经足以证明“住房问题”不能以一种完全无歧义的方式被理解。说明这个问题的社会本质, 至少对我而言, 不仅从理论角度来说是重要的, 而且也会对从事社会实践, 在这里主要是制定住房政策, 有很大帮助。

住房问题植根于何处? 它的社会意义和重要性是什么? 有两种不同的回答: 一些人认为住房短缺是住房问题的关键所在; 另外一些少数派, 试图把住房问题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把它看成一个分配问题或者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住房短缺和分配肯定不是毫无联系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你不能分配不存在的东西), 但是在下面的讨论中, 这两种类型的观点将被分别看成表示态度的两种“理想型”。这是为了精确地得出匈牙利住房政策的一贯原则。

① 1968 年, 在匈牙利, 平均 2 个人住一个房间, 而在 1960 年, 平均 2.63 个人住一个房间。参见《跟匈牙利住房情况有关的数据》(以匈牙利文发表), Szovosz: Budapest, 1969。

② 1970 年秋天, 一个问同样问题的民意调查在马克镇 (Mako) 进行。虽然人口样本很小, 是试验性质的, 但是是随机选取的。大概有半数的被访者说他们遇到了麻烦, 将近 40% 的人认为他们的住房问题是最紧迫的, 其他问题比如健康、子女教育、金融、工作等都远远地落在后面。他们认为住房问题跟城镇问题中最紧迫的问题一样重要, 甚至比最紧迫的问题还要重要。实际上, 一个像马克镇这样工业落后、没有足够公社服务供给的小镇, 认为住房问题是最紧迫的问题的人, 居然是认为跟工业或商业有关的问题是最紧迫的问题的人的三倍, 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当然, 我们不能从这样的雏形研究中得出牵强的结论。我们不能立即拒绝这个假设, 即大部分匈牙利城镇会提供跟别的城镇一样的分配。

（一）关于住房短缺

很多国家的政治家坚信，住房问题是由住房短缺造成的，更精确地说，这些国家的现有住房低于这个或者那个“标准”。换句话说，住房问题可以通过在未来建造更多的住房来解决，唯一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如何在住房和其他活动之间进行分配。这个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因为在那里国家对住房市场的干预特别多，相对来说很大一部分的住房建设都是由财政预算出钱的。结果是，国有住宅的权重在可用住房中占很大的比例。这里的政治家很容易就相信，住房问题能够解决的那一天要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财政资源，或者可以任意建设有潜力的工业设施。这个观点在匈牙利被广泛传播。这足以引起大众报刊的关注，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和甚至社会学家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们可以向持这些观点的人询问：什么是住房问题的根源？两种回答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人给出了经济之外的原因，另外一些人倾向于给出经济原因。

一些非经济原因看起来也是不证自明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人主张，住房是历史遗留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论点被用来解释所有事情，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建造的房屋越多（也就是说，这些房屋是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中建造的），现在的体系就越不应该对目前的状况负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越多的房屋在战争时期被损毁或者至少被严重破坏，“解放”前的社会体系和战争本身就on应该对住房短缺问题负责。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论点失去了影响力。没有证据显示，战争破坏对匈牙利任何一个现有经济生活部门来说有那么严重，而且我们只能预期，大约四分之一的住房在未来十年中将被重建。换句话说，如果住房建设已经以现在的速度持续了一段时间，“新”住宅也许已经占了大多数。我们不能怪罪“历史遗留问题”。从长远来看，住房问题的存在必须从当代社会的实际运作中寻找破解之法。

很多年以来，将住房问题归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最近，责备其他非经济原因也变得寻常起来，其中主要提到的是两个跟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原因：从农村到城市的内部移民的增加，以及被称作“人口爆炸”的比以前更快的人口增长。在匈牙利，进城移民被当作重点，因为人口实际上一直增长缓慢。住房短缺在匈牙利首先是一个城市问题，

这是没有疑问的——虽然在一些村庄，人们也必须找到用于转租的栖身之地。一些村庄有“空置”房屋〔匈牙利实际上已经有了“空”村：在20世纪70年代，巴兰尼亚州（Baranya）的谷日夫（Gyurufu）几乎已经无人居住〕。大众媒体已经不止一次地采访了相关的地方委员，他们抱怨说，不负责任的移民放弃了他们良好的乡村房屋，搬进了城市的贫民窟和寄宿点，并且正在排队争取房屋。这种观点表达了老城镇居民的想法。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如果把这些移民送回他们来这儿之前住的地方，住房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虽然像这样的激进想法还没有付诸实践，但是类似的行政措施（偶尔甚至以警方行动的形式）已经被采纳。比如，有些规定使得在布达佩斯定居变得更为困难，有些命令禁止人们将非法的住处注册为自己的住址。我们应该对市政领导层的这些担忧表示理解。他们虽然在努力地加快住房建设，但却没有收到什么成效；这个事实显然惹恼了他们。如果他们建造更多的房屋，就会有更多的人搬到城镇上来；于是，作为一个悖论，住房短缺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负责任”的移民，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原来的乡村房屋可能条件艰苦，或者他们发现，他们早前住所的公共服务可能特别让人无法忍受，或者，那里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换句话说，如果定居不只被看作是拥有物质财产，如果定居被认为是以特定的方式完成的一种活动，那么，即使这些移民是搬进城乡接合部最糟糕的活动房屋中，他们也可能认为，自己的住房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移民使得本来潜在的住房问题暴露出来。因此，用非经济因素来解释住房问题不是特别有说服力。非经济因素至多解释了特定地区的问题，甚至即使在这些地区，这些因素的解释力也仅维持了较短的时间。它们的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我们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移民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而且落在农业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后。当与农业雇用的人口数进行比较时，我们完全可以说，农村人口在匈牙利多得不合理。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工作，但是有一半多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调在逐渐扩大，可以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工作的）通勤（commute）现象来解释，而且，通勤者（commuter）的数量还在快速地增长。

基于经济因素的主张的影响力多少要更大一些。他们的要点可以这样总结：房屋建设的总量跟国民收入水平不成比例。

比如，在美国，作为总投资一部分的住房投资比例从20世纪初开始渐渐

下降了 (Meyerson et al., 1962)。而且我们能够想象, 这个趋势在其他国家也正在发生。在完全市场化了的地方, 投资也许已经对住房建设兴味索然。随着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兴起, 资本摊销 (amortization of capital) 的速度在所有领域都有显著增长, 但是在住房领域却没有多大变化。工业投资在 5 ~ 10 年内收回成本, 住房投资则是在 25 ~ 40 年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家们因此对住房不是特别热情。这也许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靠市场运作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有住房问题。企业家们不愿意建造廉价的出租公寓。另一方面, 昂贵的公寓却容易建设过多。更贵的公寓能保证更高的利润率以及更快的资本摊销。缓慢的资本摊销与建筑业缓慢的技术进步以及较大的劳动力投入有关, 劳动力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但是要说清楚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并不容易。是住宅建造的低利润率导致了建筑业的技术落后, 还是建筑工作的性质决定的缓慢发展, 反过来导致资本摊销的速度缓慢? 然而, 能够确定的是, 住房投资在市场充分运作的地方迟缓下来已经是一种趋势, 这个事实本身提醒我们, 不要对市场运作可能在住房方面产生的效果存在幻想。我之后会再谈到这种完全信任市场力量的有效性的观点——对我来说, 完全相信市场是一个有点过于乐观的想法。

那么,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当以上提到的自发力量被经济发展计划所取代的时候, 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在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情况下, 住房和投资的对立似乎变得更为尖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住房投资似乎是完全没有回报的, 住房建设甚至不会被当作经济投资, 而是国民收入中拿出来的补贴。这导致了住房建设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跌至绝对最低水平, 此后直到现在, 住房建设的速度加快, 但住房还是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必须同意那些力主在住房领域给予市场力量更多空间的学者 (参见 Liska, 1969), 因为做生意一样的市场至少可以废除这个管理系统中的非理性因素, 把住房生产再次转变成一个狭义上的经济活动。我再次强调, 市场只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 而即便在纯粹的市场条件下, 我在前面提到的经济问题也会表现出来。

还有些人则是根据需求来解释住房投资放缓。路易斯·温尼克 (Winnick, 1956) 宣称, 在总体的消费需求中, 对于住房的需求正趋向于减弱。舍曼·J. 梅赛尔 (Sherman J. Maisel) 和路易斯·温尼克调查了家庭预算中的住房开销 (Maisel and Winnick, 1966), 他们发现, 当收入增长时, 在住房上的花费所占

的比例以较快的速度减少，尽管总体住房花费呈自然增长趋势。对住房的有效需求的相对减少可以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它可能暗示着一定程度的饱和。在谈到对住房的满意度时，巴拉诺夫（Baranov, 1965）总结到，对于住房的需求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在一个适度的高水平上会达到饱和点。如果巴拉诺夫是对的，这肯定不会造成住房短缺问题，而是提供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决定家庭预算中住房消费的，可能不仅是对住房的需求，而且也有其他开支项目的压力。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肯定，有效需求的缺失意味着实际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不认为，住房短缺是由于供给失衡。蒂博尔·利斯卡（Liska, 1969）倾向于主张匈牙利的住房短缺问题是由出租限制引起的，租金过低，需求肯定会超过供给。所以，如果租金由市场来决定，“被夸张”的需求会很快达到终点，市场平衡也会在住房领域里成为主流。利斯卡进一步主张，市场决定租金不仅会从形式上解决住房问题，也会刺激房屋建设。利斯卡的论断肯定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住房问题的本质在于住房的管理而不是仅仅在于“建设量”这个观点，可能有特别的探究潜力。然而，市场平衡会解决短缺产品分配引起的社会冲突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对某人来说过高的、难以支付的物品价格并不意味着他不会感觉这种剥夺是一种不公平。在匈牙利也是如此。在今天的匈牙利，同样存在一个住房市场，尽管不是出租公寓的市场，而且平衡价格在那里已经盛行。任何人如果有钱的话，都可以买一个独栋小楼或者平房，或者一个公寓中的“家庭单元”，但是那些没有足够住房的人，不会觉得他们没有“家庭单元”的原因是因为收入不足。

为了理解住房问题的本质，我们必须比这些关于住房短缺的不同解释走得更远。建议增加新建住房量的观点，虽然明显很进步，但却有一种反作用力，因为总是会有人反驳说，国民收入水平不允许建造比现在更多的房屋。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要想以社会学的方式来理解住房问题，以及如果要基于合理的社会学基础来设计住房政策的话，住房体系必须从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和冲突角度来审视的原因。换句话说，住房必须被看作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分配和奖励系统的一部分。

（二）住房问题中的社会因素

对住房问题的原因和结果的调查至今仍然非常有限。住房社会学主要关注住房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被认为经典研究的是彼得·罗西（Peter Rossi）

的《为什么要搬家》(*Why Families Move*)(Rossi, 1955)。还有一定数量的作品研究住房供给的社会心理学维度(Merton, 1948; Merton et al., 1950; Festinger et al., 1950),另有一些社会学作品关注住房建设的建筑学维度(比如 Riemer, 1951)。

严格来讲,很少有社会学的住房调查能帮助我们把住房问题放置到社会性的背景(societal context)当中。比如,如果我们想了解,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住房状况如何反映社会不平等,或者对不同国家的住房政策是否强化或者削弱了其他领域(比如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以及住房是否对死亡率、流动性造成影响——到目前为止的调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某些家庭社会学(Chombart de Lauwe, 1959 - 1960; Mitchell, 1971)、社区研究(Gans, 1962; Young and Willmott, 1957)中的作品非常出色,另外一些城市规划的研究(Gans, 1961a, 1961b; Greer, 1966)也会对宏观社会学分析有所帮助。

就像前面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只能在分析住房体系在特定社会的奖励和分配系统中的角色,来理解住房问题的社会影响。我们已说明,特定产品的有限供给这个事实本身不会产生社会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不是人人都拥有一辆汽车,或者高收入者能够买更大的车,就说存在“小汽车问题”。所有商品在获取难易程度上的差异,必须被看作是所有结构化了的社会的正常现象。住房标准和获取住房机会的差别之所以变成了一个问题,是因为住房在奖励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中都是如此。斯科特·格里尔(Scott Greer)颇具说服力地指出,当很多人觉得他们本可以得到的住房是在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时,住房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难题。当某人考虑自己的住房状况时,他把这当作是社会的奖励。如果某人认为自己工作努力、正直、值得尊敬,并且在其他领域获得认可,但是觉得他还不能获得一套体面的公寓或者一幢房子,他就会感觉被欺骗了(Greer, 1966: 519)。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人们感觉被欺骗,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住房状况和社会其他成员的住房状况有着不可调和的巨大差异,反映了过度的社会不平等。作为美国研究社会住房政策的领军人物,伊迪丝·埃尔默·伍德(Edith Elmer Wood)也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住房的实质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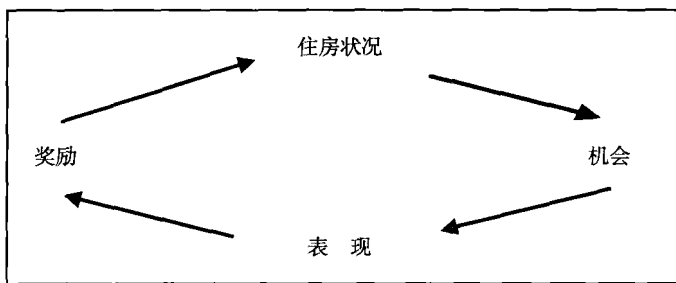
“住房问题是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而且这个问题往往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供给和需求解决不了它,因为新建住房的成本和收入

分配（之间的鸿沟），导致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无力对新住房提出有效需求。虽然一些更老的房子勉强可以接受，但很多房子的条件是非常差的。”（Wood, 1934: 137）

换句话说，住房差异反映了社会中的不平等，所以引发了冲突。但是我们也可以假设，住房条件本身也会对社会结构起反作用，变成让社会结构更僵化或者更开放的因素之一。因此，当格里尔说许多人认为住房分配的方式不公平时，他是在谈论一个使得这一客观现象变得可以感知的过程。

我们只有做出如下假定才符合实际情况：住房影响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住房因素也形塑了人们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契约结构，甚至影响到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上的表现。

斯科特·格里尔（Greer, 1966: 526）把社会结构和住房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称为恶性循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住房代表了社会如何评价和奖励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住房条件意味着机会，它们有助于决定人们用以结束恶性循环的各种表现（那是人们可以给予社会的东西），因为在所有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奖励都注定是由人们的表现决定的，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也是如此。下图对此做出了清晰的说明。



换句话说，如果某人未能被看作是社会中特别重要或者有用的成员，他非常有可能得到一个较差的住房。这样的住房条件妨碍了他想要给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欲望，他的生产效率会变低，他子女的学业表现也会受到影响，等等。换句话说，表现差为奖励差提供了依据，而奖励差为表现差提供了理由，如此循环下去。生活在简陋小屋中的吉卜赛孩子没有地方做他们的家庭作业，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连小学八年级也无法上完，所以他们无法接受任何技能培训，他们无法获得社会评价较高的工作，所以他们继续在简陋的小屋中生活，他们

的孩子也在那里出生，如此循环下去。

当住房体系的运转促成了社会特权的维系和社会桎梏的累积时，该体系的运转就转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此关系参见 Pahl, 1968）。在我们看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是我们提出任何社会政策的社会学基础。很清楚，社会政策的目的是打破这类恶性循环。

这才是我想说明的唯一主旨：住房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住房短缺，而在于住房体系本身，特别是取决于住房的分配结构。住房问题在表面上表现为住房短缺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人们必须建造更多的住房，否则恶性循环就不能被打破。但是比建造量更重要的，可能是什么类型的住房正在被建造，以及谁将能够获得这些新建的住房。做一些跟房屋量有关的事情本身不是社会政策所要考虑的内容。即使住房建设总量可能上升（尽管后面要谈到“过滤过程”，但这种情况一般不太可能发生），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上述恶性循环会变得更为僵硬和封闭；换句话说，即便在住房总量上升的情况下，住房问题仍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只有有意识地确保住房条件不会导致社会桎梏的累积和挫伤社会流动（或者至少这些负面现象应该被限制在最低限度），我们才能把某项住房政策说成是社会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更具体地说，在匈牙利，住房问题可以被这样理解吗？住房问题是匈牙利的社会问题吗？或者匈牙利仅仅是在遭受住房短缺问题吗？把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雷·帕尔（Ray Pahl）或者斯科特·格里尔的观点机械地套用于匈牙利的状况肯定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住房管理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住房管理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20世纪40年代末设计出来的社会政策基本上依赖于平等的原则，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使得住房和社会地位彼此不相关，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最好的公寓的租金固定在较低水平，即使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也支付得起的原因。恶性循环作为原则问题被打破了，因为住房被理解为津贴而不是奖赏——用经济学的说法来讲就是住房没有被当作商品。

然而，在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社会学研究（Konrád and Szélenyi, 1969; Zivkovic, 1968; Duris, 1969; Musil, 1966）让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住房的商品层面并没有完全走向终结，获得一个高质量的新公寓的机会与社会地位不是没有关系。我们于1968年在佩奇（Pécs）和塞格德（Szeged）以及1969年在索尔诺克（Szolnok）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目

的，就是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勾勒出匈牙利住房体系的运行状况，去说明匈牙利各社会阶层获得不同质量和产权类型的房子或者公寓的机会，同时展示住房的性质如何影响特定家庭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是努力对这个恶性循环的两个半圈进行解释。提交给城市规划科学和计划研究所的详细报告上刊载有相关的研究数据，我也在与捷尔吉·康纳德（György Konrád）的合著中详细讨论了有关住房流动性的数据（Konrád and Szelényi, 1969）。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里，我试图从现有数据中得出最可能的一般性结论，描述匈牙利住房体系的运行模式。第三部分会讲到社会住房政策的基本原则，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能够为促成一个以社会学方式看待事物的社会政策做出贡献。

二 匈牙利住房体系的特征

（一）住房流动性问题

大家都知道，住房统计数据同样也显示了不同社会等级的住房状况有着显著的不同，而且随着收入的提升，住房质量也跟着上升。住房条件的社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问题，于是，使用一个更为动态的研究方法变得很有必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对既有状况的描述，我们还必须指出住房状况中的流动性和变迁。

过滤（filtration）的概念，是由研究住房问题的经济学家们提出来的（比如 Ratcliff, 1945；1949）；其他学者（Fischer and Winnick, 1959）则进一步修正了这个概念；在更晚近的一篇文章中（Grigsby, 1963），当作者试图把握住房体系的动力机制时，这个概念也被证明是最有效的。令人惊奇的是，它至今没有引起社会学家的注意。创造“过滤”这个概念的学者们把住房看成由不同质量类型所组成的等级体系，或者至少是一开始，他们把不同人群系统内的地位变化看作是过滤的本质。社会学家则首先是对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如何改变他们在住房体系中的位置感兴趣。这种移动在下面会被叫做“住房流动性”（housing mobility）。

很容易发现，对于一个彻底的住房流动性研究来说，关注住房已有的质的区别还不够充分。如果某人改变了他在住房体系中的地位，就应该算作流动，即使他的居住质量并没有改变。所以，比如，如果某人从一个两居（外加日

常设施)的出租公寓中,搬到一个他自己所有的同样大小和条件的家庭单元中,那么他毫无疑问地改变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显示了流动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由雷克斯(Rex, 1968)创立并由雷·帕尔进一步提炼的住房阶级(housing class)这个概念被证明是最有用的。雷克斯立足于韦伯的阶级概念。在韦伯看来,社会阶级不仅可以由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同位置的人组成,比如,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或者把他们的劳动转变成商品的带薪工人,而且更普遍的情况是,社会阶级是由那些在任何可能的方面处于相同的市场位置的人以及那些在市场中有着相同利益的人组成。以同样方式思考的雷克斯认为,我们可以谈及房东阶级(the class of landlords),即那些与租房者不同的、拥有住房的人。

在匈牙利的住房体系中,我们可以划分出六大住房阶级。他们在下文中仅会被简要地描述。我在之前提到的那篇和捷尔吉·康纳德合著的论文中已经详细地谈到了他们(Konrad and Szelenyi, 1969)。他们是:①租赁新建的国有住房的人;②租赁老的国有住房的人;③“家庭单元”公寓的所有者;④新式一户式独幢小楼的所有者;⑤老式一户式独幢小楼的所有者;⑥住在设施不完备的居所里的人。第一类和第二类住房阶级的不同在于,国家对第一类住房阶级的租金补贴力度更大,换句话说,那些房屋的租户获得的补贴也更多。第四类和第五类住房阶级的根本不同,并不完全在于新旧这两个形容词。更重要的在于,老式独幢小楼在过去大部分满足的是匈牙利农村中的农业生产功能,即使在地方小镇上也是如此。所以,因为已经不再用于农业生产,它们已经过时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无法修复。也许上述已经说明,住房流动性不等同于搬家,而住房体系和可利用住房的存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住房流动性意味着在住房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而住房体系是社会关系和利益的一个特定结构,它与住房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品有关。

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不同,住房流动性的机会也就不同,换句话说,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中的成员来说,进入或者离开此类或者彼类住房阶级的机会是不同的。这个事实是住房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正如前文已经说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进入或者离开一个特定阶级的机会几乎是按照租金和收入的区别而自动做出区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住房政策则不同,住房分配的原则与收入、职业或者和职业地位没有关系。本文的篇幅不允许我在这里从这一角度对匈牙利的住房政策做充分讨论,

但是我可以肯定，上文已经足以表明，我们的住房政策意在通过固定的低租金、国家建设新住房的大宗计划以及全部按照同一个标准新建住房来制造绝对平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住房政策已经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然而，住房政策在1970年的《党和政府的决定》之前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意在平等化的住房政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证所有人有平等的流动机会？如何解释跟本意相左的实际过程？住房管理的新系统可预期的结果是什么？

让我从指出这个事实开始。就我所知道的来说，我们在佩奇和塞格德的研究（Konrád and Szélenyi, 1969）跟所有其他在匈牙利的研究结果相符，^①那就是不同部门和社会阶层的住房流动性是不同的。那些收入和资格比平均水平更高的人基本上移到了住房阶级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尽管第一类和第三类的主要来源是第二类和第六类。那些在第六类住房阶级中的人收入和资格更低，一般都成功地移到了第四类住房阶级，其中有一些已经达到了第二类住房阶级的标准。^②

如果这个图景被简化，主要依据收入来考察住房流动性，我们就遇到了一种悖论：那些最可能在第一类住房阶级中找到的人，即那些获得国家补贴最多的阶级中的人，是那些收入最高的人；补贴最低的第四类住房阶级，即那些自

① 安吉斯·洛松齐（Anges Losonczy）对贝凯什县（Bekes）的住房流动性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个研究特别有意思是因为当时只能得到镇一级的数据。由伊斯特万·喀迈尼（István Kemény）指导的在赛培尔（Csepel）铁矿区和钢铁工厂进行的研究也同样显示，工人，特别是那些资历较浅、工资较少的工人，倾向于通过建造自己的小屋来得到足够的住房。相似的结果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得出，这些研究由伊斯特万·悉齐（István Szucs）指导，在布达佩斯的多个地区由布瓦蒂（Buvati）具体执行（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6份报告）。这里所提到的研究结论必须被当成假设来对待，因为至今没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全国性调查或者至少是全国城镇的调查，看来是非常有必要的。

② 尽管如此，通过描述这个运动我应该给出佩奇和塞格德的一些数据。它们可以在前面被引用的文献中被找到，也可以在康纳德和我合作的研究报告中被找到（参见Konrád and Szélenyi, 1969；一个更新的版本由城镇规划研究所出版）。一个关于佩奇和塞格德的有代表性的样本是，37.1%的身居领导岗位的人都从市政当局那里分得一套公寓（70.8%的这样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1200福林），25.8%的人可以建造自己的公寓或者房屋。与此相比，20.8%的非技术工人得到了市政当局分配的公寓，44.2%的人可以自己建造房屋，只有18%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1200福林。这些数据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得到现有的住宅？”数据没有显示在不同类型房屋中居住的人数，但是它显示了那些通过市政当局得到公寓（而不是在战前通过交换或租赁获得公寓）的人数，以及自己建造房屋而不是继承房屋的人数。在我看来，这些数据更真实地指出了房屋管理在不同的社会部门和社会阶层的住房流动性中扮演的角色。

已建造一户式独幢小楼的人，却绝大多数属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人群。这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新建国有公寓的租金被固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换句话说，它们之所以被补贴，应该是为了让低收入的人群能付得起租金。租金补贴的初衷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从而刺激生产效率。然而，如果这些公寓被高收入人群系统性地占有，补贴的效果就走向了反面，生活水平的差距被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租金补贴因而变成了工资的补充，扩大了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不同的研究中重申我已经重复引用过的发现：住房分配的行政系统被证明是无效的，它导向了与它宣称的目标相反的结果。

然而我必须强调，在像匈牙利这样的分层社会中，把住房政策建基在平等原则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更近距离地审视为什么那些享受更高工资的人在获得新建供出租房屋的人群中比例过高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住房分配的实践必然发生这样的逆转。

基于平等原则的住房政策就是不能解决稀缺“产品”的分配问题。按需分配曾符合平等原则，但是事实很快显示，住房不能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分配。简单的原因是有太多的家庭曾经或正在“需要”这些公寓（在任何一年中，一些小镇有比在建公寓多20倍的家庭的需求是“正当的”）。^①这个巨大的落差，使得使用类似的“排队”系统去保证“公正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显然没有耐心去容忍一个意味着要等10~15年甚至是20年的供房名单。人们要求现在就有房子住，而不是在10年之后。当局必须去寻找另一个分配原则作为“需求”原则的补充，而这个原则当然可以是“功绩”。如果一大群人需要住房，那么就让我们把优先权给那些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人、那些更值得分到房子的人、那些为获得一套公寓更心存感激的人。按照管理住房分配的法律规定，正当的考虑必须给予那些参加物质生产的人，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规定。

使用“功绩”或者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规范住房分配的价值，在逻辑上听起

① 在何种程度上对“需求”做出界定，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从理论角度来讲，对这个概念展开更细致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在本文中无法就此展开论述，我们却必须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很明显的是，与“要求”（demand）不同，“需求”（need）有一个客观的内容。比如，当我们说住房需求的时候，我们暗示的是，它指的是一个多多少少客观的住房样式，这种样式或标准与人的欲望或者意识无关，而是每个人应得的东西。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提高住房的标准，而这在别的国家已被接受。必须承认的是，在匈牙利，有很大比例的住房低于这个标准。

来很完美。然而，恰恰是这个“论功行赏的原则”应该对上面提到的悖论负责。毕竟，那些“更有用”的社会成员，同时也是那些工资拿得更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挣得更多的人，同时也就是那些住在新出租公寓里的人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一过程的形成是必然的，而且不能用“官僚作风”或者政权“腐败”来解释。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从与继承性不平等做斗争的角度来说，这个住房政策获得了不少成功。在20世纪50年代，不同阶层和部门的住房状况之间的分化已经比30年代小了很多。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比以前更加牢固之后，由社会分工中的不同位置所导致的差异变得不可避免，这些差异在住房分配中也开始起作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分层的社会；我们知道，只要社会根据实用性或者工作重要性来评价其成员，这样的差异也会在分配像住房一样重要的产品时发挥作用。有人可能也会主张说，住房作为收入的补充也是有道理的：匈牙利人的工资差距不大，没有充分反映劳动分工的程度，没有人想要拉大住房差距，但是社会经济力量利用住房拉开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合理差别。众所周知的是，工业企业经常用公寓为饵来招收有技能的雇员。企业提供的薪水不能反映企业对能人的需求，因为工资系统（主要是对平均工资体系的控制）不会允许职工在工资上有过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可以质疑用住房作为激励的合理程度。公寓的成本相当于十年的平均工资，提供相当于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激励不是特别理性的经济行为。当被公寓吸引过来的雇员在一年或两年以后就离开了的时候，工人等于是欺骗了企业，企业较好地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非理性的一面。不管用公寓作为奖励是否合适，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它们扮演了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政策进行“调整”的角色。鉴于这篇论文专门讨论住房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无法讨论住房在工资分化中发挥的功能，而工资分化本身是社会分层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我试图要说明的是，住房政策与原来的目标相背离，必然反映了匈牙利社会的本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试图改善住房分配的行政官僚系统的行政努力必然要失败。媒体已经意识到，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搬进新公寓中的家庭，一直是收入水平要比平均收入高的家庭。媒体已经报道过在新住房前停放的小汽车的数量。人们已经使用各种方法试图让由当局执行的分配更加“民主”，人们建立了社会委员会，还采用各种方式来完善分配的方法。比如，分到公寓的人的名字必须在市议会公示一段时间。如果到目前为止争论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话，那就是所有这些

正在采取的措施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1970年5月的《决议》之后，党和政府采用了焕然一新的方法来解决住房问题，宣布将住房管理体系的改革作为它的目标，在我看来，这和我一直主张的是一致的。党和政府宣布，租金必须反映住房的价值。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是，高质量国有公寓的租金将上升。我们已经知道了匈牙利住房体系如何运作，我们可以说，提高租金并停止建设“免费”的政府住房配置系统，也是对社会有益的，因为它把生活水平差异这个一直被掩盖的问题托出了水面。要结束这种状况，就需要提高租金，它可能要求对工资和价格结构进行整体性的改变。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1970年5月《决议》的地方，我只想吸引大家注意一些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极其重要的特定维度。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家对出租公寓特别是新公寓的补贴还将继续。拉开新公寓的标准之间的差距也被认为是必要的（这些标准现在也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以后将建造比现在的标准更为适中的公寓。作为社会政策的工具，拉开标准之间的差距可能在住房建设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① 住房合作社问题也在《决议》中有所论述，在工人公寓的建设方面，它也发挥了适当的作用，等等。总的来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租金应该反映公寓的价值；同时，在给予市场力量更多的空间之外，人们也已经认识到，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水平，要求社会政策安排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不提供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社会性住房”（social housing）。匈牙利的发展表明，恰恰是由于猛然叫停了市场力量，使得用计划手段对社会性住房进行管理变得不再可能；因为住房建设中市场的缺失，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住房都是“社会性的”（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的）。我们的结论是——恐怕这一结论对西方读者来说有点保守——如果我们要给穷人做点儿什么的话，就需要用市场的力量来应对富人的住房问题。在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我会回到住房的社会政

① 受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国有公寓“没有差别”的问题做更详细的讨论。这是住房能够直接显示建筑活动的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我认为，统一标准的新住房只会减少那些地位较低和收入较低的人得到公寓的机会，因为（以现有标准建造的）所有公寓对高收入者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可以想象的是，住房标准上的差距一旦拉开，就可以建造那些高收入者不想要的公寓，他们更愿意等待更合适的房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将现有的标准拉开差距，这两种方式取得的效果是一样的：把现有标准公开地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也就是说，建造比现有标准更好或更差的公寓。对于这两种解决途径，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讨论哪种方式更加激进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策层面。但是在此之前，我必须仔细考察“恶性循环”的另外一半，也就是说，必须讲清楚住房体系的分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和流动性。

（二）住房状况和家庭机会

不同社会阶层获得不同质量的住房，这个事实本身不会把住房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除非社会成员认为这种差别是不公平的，而且境遇糟糕的人必须认为，是他们的住房条件阻碍了他们在社会中寻找一个与其天赋和能力相符的位置。社会学家们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讲，问题的关键在于“下一代”的命运——因为即使我们认为那些居住条件糟糕的人只配得到糟糕的住房（尽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也不能接受的是，让糟糕的居住环境继续妨碍孩子的发展。克服流动性障碍当然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要求，从逻辑上说，还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的本质。毫无疑问，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显然，所有违反社会开放性的东西，也会限制社会的活力。^①

住房状况会影响广义上的流动性和社会调整，这种认识与住房条件应该是平等的这一要求联系在一起。在揭示“机会平等”的意识形态如何不可信这一点上，社会学已经贡献良多。克服了社会流动性的封建障碍之后，好像任何人都享有了平等的机会。这在“美国梦”的意识形态中有着特别明显的表现——“美国梦”宣称没有封建传统束缚的美国社会遍地都是机会。社会学研究则揭示出，当实际的社会条件仍然不公平的时候，机会均等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关于匈牙利社会流动和教育系统的出色研究清楚地表明，尽管社会主义社会废止了一些最重要的障碍，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匈牙利社

① 有没有“最佳”的社会流动性是值得争论的，夸大社会流动性也是有可能的。有些人认为，与解放后不久的那几年相比，匈牙利社会的流动性现在放缓是正常的，因为刚解放时的社会流动性太夸张了。有些经济学家甚至主张，要利用“家庭背景”的优势：一个以最小的努力培训最多人口的教育系统，比一个意在抵消家庭背景差别的教育系统成本更低。最佳流动性问题是社会结构的普遍问题，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尽管如此，为了满足科学客观性的标准，将我的价值判断单独表述出来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加上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动态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阻碍和限制流动性是与我们的价值系统背道而驰的。当然，克服了这些障碍是否就会自动导致流动性的加强，这一点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利用流动的机会，因为消除财政和体制因素对于流动的限制，并不代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也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解放后不久）“夸张的流动性”现象，可以被解读为某种中心意志对流动性的强化。换句话说，只有被强迫的流动性才可以被称为“夸张的流动性”。

会的本质以及它的社会分工，仍然对不同社会部门和阶层的流动性产生了影响。因此，在其他一些以匈牙利为对象的研究中，人们也可以顺着这一脉络提出如下的假设：住房条件的差异也对社会流动性产生了影响。

我已经指出，迄今为止住房社会学没有对社会学的宏观层面给予足够的注意。不管是在匈牙利，还是在社会学更为发达的其他地方，社会结构在住房体系中得以表现的机制和程度都没有被描述过。住房体系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则被讨论得更少。大多数有关住房条件的后果的研究，主要处理的，是糟糕的或者过度拥挤的住房所产生的社会心理或者社会卫生后果。比如，威廉·C·洛林（William C. Loring）（1956）指出，住房密度过高跟社会解组有联系。在上文曾经提到的著作中，雄巴德劳维（Chombart de Lauwe，1959-1960）将住房条件和家庭内部冲突联系起来。罗伯特·E·米切尔（Robert E. Mitchell）（1971）在住房密度和家庭内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病理特征之间找到了相对较弱的联系。从有关匈牙利的各项研究中可以得到的数据，至多给我们提供了以下的特定假设。

我将从住房条件（拿居住密度做指标最好）如何影响教育表现讲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很明显的。所有跟这个主题有关的研究都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佩奇和塞格德所做的研究也在这两个变量之间发现了紧密的关联。学生在校的表现和父母的职业、教育标准之间的联系仍然是最强的，^①

① 下面这个表格显示的是，在佩奇和塞格德这两个地方，学生在校（只是普通小学）的表现和居住密度的联系。

居住密度（平方米/人）	平均分
<5	3.2
5.1~6	3.3
6.1~12	3.7
12.1~16	3.9
16.1~20	4.1
20以上	3.9
跟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相比，平均分如下：	
比8年小学教育更少	3.5
8~11年	3.7
高中	4.1
大学或职业学院	4.6

如果父亲的职业或者受教育水平被看成自变量，可以看到相似的分布和关联。应该记住的是，有关社会地位的自变量虽然在这两个城市中的位置是相似的，但当住房密度被这样对待的时候，它们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是居住密度的决定因素。当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量时，居住密度对学业表现的影响弱化了，而这并不值得惊讶。米切尔还发现，如果对“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加以控制的话，居住密度的社会后果会显示为最小。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他的数据不是在美国获取的，而是在中国香港获取的；在美国，相对较好的住房条件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结果，但是要知道，香港的居住密度是很高的（Mitchell, 1971: 27）。如果我们调查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而不是学业表现的话，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所有这些都显示，住房状况是关于流动性的一个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作为中介变量，如果住房条件跟比例失衡的人口生态分布相联系的话，它的效果可以在一开始就很明显。当糟糕的住房在空间上集中并形成贫民窟的时候，住房状况就变成了一种限制因素。

发现在何种程度上住房条件决定了家庭自身的社会调整也是很有意思的。这里有更多严肃的测量问题，但是住房条件在这方面也有可能仍然只是一个中介变量。利兰·伯恩斯（Leland Burns）、塞西尔·汤普森（Cecil Thompson）和周匡（Khing Tjioe）在探索住房条件对生产效率的作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关系，这个关系通过一系列中介因素产生效果（Burns, Thompson, and Tjioe, 1965）。他们发现，虽然住房条件的提升在一定时间内提高了生产率，但是这种作用很快就消失了。这也许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那些住在社会性补贴住房中的人，如果他们的收入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就会失去继续住下去的权利（我在匈牙利没有见过对住房和生产率关系的研究）。

很明显，住房条件对家庭的社会调整和代际流动是有影响的。也有可能的是，住房影响社会联系，特别是交友，这个反过来也影响了代际流动的机会以及娱乐和消费的习惯。

真正要紧的可能是实际的住房状况而不是住房流动的特征。比如，消费模式研究已经指出搬家对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寄宿状态搬到设施齐全的出租公寓，决定了一个家庭在若干年之内的生活方式和预算习惯，对自己盖房子的人来说，这种影响显然要更加明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流动或者向下流动，导致了一种挫败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流动的渴望。

我在这个阶段想揭示的是，如果想比假设更进一步的话，我们有必要去做

什么样的研究。一个初步的假设是，住房条件的实际水平，特别是糟糕的地方，跟代际流动最为相关，住房流动性的事实和本质与代际流动有关。现在，让我对有关匈牙利住房体系的运作的讨论做一个总结。

(1) 住房是我们奖励系统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论是基于业绩或者其他什么考虑，只要社会在给社会成员提供的激励上拉开差距，人们的住房条件也会随之拉开差距。

(2) 如果这种差距不是通过市场产生的（市场被废除了或者其运作严重受限），那么生产这种差距的，将是在非市场住房分配系统中各种潜伏的社会力量。社会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些力量，否则它的目标将不太可能成为社会现实（这样的目标可以是不同社会部门或者阶级之间住房条件的完全平等，而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导致非预期的或者不理想的结果）。

(3) 住房条件和住房流动性可能只是家庭机会和代际、代内流动的中介变量。但当住房特别糟糕的时候，住房条件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

三 反思社会政策

刚开始我们论证说，至少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由于分配中存在的的不平等，住房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也说明不平等是因为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平等必然要出现，但是努力去克服不平等也是同样必要的。这就是社会政策的任务。

在区别了“基本性”和“差异性”消费后，安德拉斯·黑格杜斯（Andras Hegedus）和玛丽亚·马库斯（Maria Markus）试图为这样一个社会政策提供准则（Hegedus and Markus, 1969）。他们主张说，社会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水平”的消费，且确保所有成员都能享受到构成这一基本水平的商品免受市场运作的影响。市场应该只被允许对那些“基本性消费”之外的“差异性消费”（differentiated consumptions）发挥作用。

确保一定的基本消费水平是所有社会政策实践的一部分，我们甚至不能说，这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经济发达国家在19世纪就试图消除痛苦和饥饿，它们已经多多少少成功了。在所谓的“福利国家”里，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确保获得维系生计的资料、某些免费医疗服务，甚至是一定的最低标准的住房。原则上，没有人会因为饥饿而死或者无家可归，或者没有最基本

的收入和医疗。(过去十年的研究指出,类似的悲惨事情和营养不良,甚至在诸如美国和瑞典这样最富有的国家也会发生,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要讨论为何在有社会政策发挥作用的地方仍然会发生这种事情,会让我们离题太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说明,根据基本生物需求来确保某种基本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令人满意地处理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参见 Miller and Rein, 1966; Rainwater, 1970)。社会学观点的共识是,工业社会的贫困,并不意味着某种最低限度的物质水平,贫困是根据社会不平等来界定的。

确保消费基本水平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分界线画在哪里,什么样的商品必须被看作基本性消费的一部分,却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安德拉斯·黑格杜斯和玛丽亚·马库斯没有给出答案。他们似乎把基本消费看成一个规范性类别(normative category),它的决定因素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研究,比如,如果我们要决定住房的角色,道德论断不会给我们太多的启示。我们能说住房本身是一个基本消费品吗?(如果是,我们必须把匈牙利以前的住房管理系统看作是理想的——尽管我希望我成功地证明它肯定不是。)或者,某种最低质量的住房应该被认为是基本性消费的一部分,而其他更好的住房则被当作差异性消费的一部分?然而,这进一步引向另外一个问题,用密度、房间数和现有设施来表示的最低住房质量,能够而且应该被看作最低消费吗?有没有用经验的方式建立这种标准的方法?

李·雷恩沃特(Lee Rainwater)指出,仅仅确保人们基本生计(生存)的条件是不够的,在他看来,必须保证每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享受所有权利,换句话说,就住房领域而言,基本消费水平意味着允许某人成为社会“成员”的住房水平。不幸的是,社会“成员”的概念并没有带我们走多远。它的意义和操作性定义还有待确定。理论猜测可能在这里有帮助。如果某人熟知各种机会,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各种可能性对他开放的话,如果他又掌握了需要使用的资源以及能够使用它们的话,我们就可以称某人为社会的一部分。

让我们现在回到第一部分说的内容。格里尔主张说,糟糕的住房把我们带进恶性循环中去,糟糕的住房导向社会封闭的累积。换句话说,糟糕的住房条件使得某人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社会成员。所以我倾向于主张,有关住房的社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让住房无法继续成为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因素。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二部分的内容就特别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服务

于社会政策的社会学研究必须试着建立住房标准，使得住房状况不再作为决定家庭机会的中介变量，或者至少使它的作用，特别是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减小到最低点。

如果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假设可以被证实，有这样一个基本水平就变得很清楚了，它同时也意味着，对于社会调整来说，完全的物质或者“技术”平等不是必要的。

这最终把我们带回到本文刚开始提出的悖论上：是什么把住房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是住房短缺还是住房的分配？也许，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不再是一个中庸的方法，因为在不再导致社会封闭的累积的住房领域确实存在短缺，但是只有当作为一个整体的住房体系运行良好的情况下，这种短缺才能减少。所以有关住房的基本性和差异性消费不是互相敌对的两种力量。如果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差异性消费，那么更少的资源就留给了基本性消费。根据过滤的规律，差异性消费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跟基本水平相符的住房，现有的差异性消费当然是基本性消费的未来，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基本性消费是一个社会的而不是生物学的概念，所以它必定要持续地向上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也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尽快为每个人确定合适的基本消费标准，就需要以社会政策为基础的规划。市场不会，其他任何形式的自发力量也不会保证这个标准。

我们的论证必须在这里停止了，因为接下来要涉及的关于住房政策的实践措施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能够表达出这些社会学思考，我已经感到满足了。这些社会学考量和经济或者法律论证结合到一起，可以帮助制定作为社会政策的住房政策。

思考现有条件下可行的社会政策的社会学条件似乎是一个适时的目标。当计划指令系统运作的时候，市场在很多领域（包括住房领域）受到了限制，特别的社会政策似乎就不需要了，因为管理的基本准则似乎就是“社会的”。对住房体系运作的分析显示，这是一个幻觉。对公寓的官僚分配所导致的结果，与通过市场可能进行的分配的结果相近。然而可以设想的是，一个经济管理的新系统将会允许更精确、在方法上更有差别的社会政策。我应该强调，在过去的2~3年内，我看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不在于收入分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增长，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差别在早就已存在，尽管它们当时往往被掩盖了起来，但现在它们以经济形式出现了，并受理性经济手段的影

响。生活在出租公寓中的家庭的生活水平，比实际收入相当但是居住在自家小屋里的家庭的生活水平要高。减少对前者的国家补助，会使这种隐性差别变得可见，并以经济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我确信，管理的新系统也为社会计划和对社会不平等的限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现在该是以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为基础，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需要干预自发的社会经济过程，以及什么措施是必须采取的而且是最有效的时候了。

王颖曜 译 闻飞 校

参考文献

- Andorka, Rudolf: *Social Restratiification and its Demographic Effects in Hungary*. Report issued by the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Research No. 30. Budapest, 1970.
- Baranov, A. V. : "Social Model of Housing." In: *Stroitelstwo and Architectoura*, 1965, No. 10.
- Burns, Leland, Thompson, Cecil, and Tjioe, Khing: *Report on Pilot Study of Worker Productivity in Relation to Housing Condition*. Los Angeles: Real Estate Research Program,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5.
- Chombart de Lauwe, Paul: *Families et Habitation*, Vol. I - II. Paris: Centre National de lad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59 - 1960.
- Duris, Vojislav: "Housing as Problem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Sociologija*, 1969, No. 3, pp. 417 - 440.
- Ferge, Zsuzsa: *The Stratification of our Society*.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1969.
- Festinger, Leo et al. : *Social Pressure in Informal Groups: A Study of Human Factor in Hous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0.
- Fischer, E. M. and Winnick, L. B. : "A Reformulation of the Filtering Process."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59, No. 1 - 2, pp. 47 - 85.
- Gans, Herbert: "The Balanced Community: Homogeneity or Heterogeneity in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1a, August, pp. 176 - 184.
- Gans, Herbert: "Planning and Social Life."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1b, May, pp. 134 - 140.
- Gans, Herbert: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2.
- Greer, Scott: "Problems of Housing and the Renewal of the City." In H. S. Becher (ed.):

Social Problem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6, pp. 517 – 548.

Grigsby, William: *Housing Markets and Public Policy*. MD, U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3.

Hegedus, Andras and Markus, Maria: “Alternative and the Choice of Values in the Long-term Planning of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1969, No. 9, pp. 1047 – 1061.

Konrád, Györgé and Ivan Szelényi: “Soci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ing.” *Valóság*, 1969, No. 8, pp. 28 – 39.

Liska, Tibor: “The Notion of Trade in Rented Flats.” *Valóság*, 1969, No. 1, pp. 22 – 35.

Loring, William C. :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Disorganization.” In: *Journal of Social Problems*, 1956, January, pp. 160 – 168.

Maisel, S. and L. B. L. Winnick: “Family Housing Expenditures: Elusive Law and Instructive Variance.” In W. Wheaton et al. (eds.), *Urban Plann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6, pp. 139 – 153.

Merton, R. K. :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ousing.” In W. Dennis (ed.): *Current Trends in Social Psycholog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48, pp. 163 – 188.

Merton, R. K. et al. : *Patterns of Social Life: Explora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Housing*. New York: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1950.

Meyerson, M. et al. : “Housing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Housing, People and Citie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2, pp. 19 – 31.

Miller, S. M. and M. Rei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Policy.” In H. S. Becker (ed.): *Social Problem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6, pp. 426 – 516.

Mitchell, R. E. : “Some Social Implication of High Density Housing.”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1, February, pp. 18 – 29.

Mrs. Aladar Mod, Mrs Sandor Ferge, Mrs. Gyorgy Land, and Istvan Kemeny: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Hungary*. Periodical Statistical Reports No. 90, Budapest, 1960.

Musil, Jiri: “Sociology of Urban Development Areas: A Study from Czechoslovak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1966, 15 – 16, pp. 213 – 238.

Pahl, R. : *Spat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1968.

Pahl, R. : *Patterns of Urban Lif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 1970.

Rainwater L. : “A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From Subsistence to Membershi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Family Research Seminar, London, 1970.

Ratcliff, R. U. : “Filtering Dow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Substandard Housing.” In: *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1945, November, pp. 322 – 330.

Ratcliff, R. U. : *Urban Land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9.

Rex, J. A. : "The Sociology of a Zone of Transition." In R. Pahl (ed.) :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London, Pergamon Press, 1968.

Riemer, S. : "Architecture for Family Living."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51, No. 1 - 2, pp. 140 - 151.

Rossi, P. : *Why Families Mov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5.

Szelényi, Iván and György Konrád: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s of New Housing Estate*.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69.

Winnick, L. B. : "Housing: Has There Been a Downward Shift in Consumer Preference?"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5, February, pp. 85 - 97 and 1956, May, pp. 314 - 323.

Wood, E. E. : "A Century of the Housing Problem."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934, March, pp. 127 - 323.

Young, M. and P. Willmott: *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7.

Zivkovic, Miroslav: "The Segregation in Our Cities." In: *Sociologija*, 1968, No. 3, pp. 37 - 58.

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

伊万·塞勒尼

古代的古典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些城市是以土地所有权和农业为基础的；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被看作王公的堡垒，被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的乡村化的历史。

——卡尔·马克思^①

将一个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然后详尽说明其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的准确时期和阶段，这有助于我在理论上组织自己的分析。不过，反过来这种推论却并不成立：将一种社会形态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并不能说明它同空间的关系，反倒更经常地会误导我们的研究，使我们仅仅安于根据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对立，去呈现与资本主义逻辑相反的一面，而不是去揭示发生于这种新的社会形式中的各种真实过程。

——曼纽尔·卡斯特^②

* 本文原发表于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0, No. 2 (Mar., 1981), pp. 169 - 205。

①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77 - 78。此处的译文参考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480页。——译者注

②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rnold, 1977), 64。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这一段话或许是对历史的、比较的城市社会学之主旨的“城市问题”(urban question)的最简练和最富启发性的阐述。另一方面,当马克思谈及“现代历史”时,显然,他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言。经过60多年的、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经验和试验之后,现在将社会主义这一更为“现代”的社会形式下的“城市问题”的本质与“城乡”关系纳入上述阐述中的条件已经成熟。我强烈同意卡斯特的观点,即不能将这一新的阐述建立在意识形态考量的基础上,而是要建立在对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实际过程”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建立在下述洞见的基础之上,即在当代东欧“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能够从经验上发现城乡对立所包含的新的阶级内涵,它不仅与古典资本主义中的城市/农村之间的矛盾不同,而且也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郊区/城市的核心之间的各种冲突。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我将结合诸多经验阐释来描述这些新的阶级冲突,并描述剥削(这通过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剥夺来实现)以及农民工(peasant workers)/新工人阶级反对剥削的斗争。^① 在本

① 记录东欧城市和区域不平等的经验性文献汗牛充栋,这些文献多是波兰语,有些则是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以及其他东欧语言,甚至是俄语。英语文献一直都不多,但在最近几年中,从经验的角度记录城市和区域实际过程(通常更聚焦于“城市”而不是整体上的区域不平等)的英文出版物,似乎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从这一点看,有两个主要的资料来源十分有用:《国际城市和区域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的特刊(1979, No. 2),收录了国际社会学会城市与区域发展分会于1978年1月在波兰雅布沃纳召开的会议的参会论文,来自波兰、俄国、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最近出版的由弗伦奇(R. A. French)和汉密尔顿(F. E. Ian Hamilton)主编的《社会主义城市》(*The Socialist City*) (John Wiley, 1979),对那些寻找城市生态数据的学者是有帮助的;据我所见,这本书收录了东欧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城市研究的最好的文章。很少有文献试图从理论上诠释上述文献所描述的经验性不平等,也很少有文献试图揭示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城市/区域不平等的本质是阶级性的,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全新的,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崭新的、特殊的社会主义机制的产物,在何种程度上它们不过是传承下来的、继续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休·斯特雷顿(Hugh Stretton)的《富国和穷国的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中的相关章节,是最富有洞察力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我也曾经试着建构一个关于城市社会不平等的来源和特点的更加系统化的理论解释,拙著《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城市社会不平等》(*Urban Social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Pergamon Press, 1980)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能给出的最完整的解释。本文建立在上述著作的基础上,但却试图有所突破。一方面,本文试图将城市和区域不平等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第一次将城市里的不平等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城乡之间的矛盾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本文也试图历史地解释造成这些新型的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的特殊管理体系的出现与存续,同时在此过程中试图说明其革命前的历史渊源。

文的第三部分,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城市和区域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阶级矛盾,是一种在历史上罕见的、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新的区域管理体系的直接产物,我将这种区域管理体系称为“城市和区域管理的社会主义再分配”。^①这一体系不仅与古典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的城市管理”及当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城市拨款经济”(urban grant economy)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是东欧“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总体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体系与当代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逻辑是一致的,^②且在“原始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普列奥勃拉任斯基臭名昭著的术语)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该体系既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又是其结果;只是当整个经济管理体系开始改革之后,它才得到修正。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尽管当前东欧的再分配区域管理应该被称作“社会主义的”(至少经验研究者除了认可它是社会主义区域管理的一种可能形式外别无选择),但它既不能被简化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以解释。无论是革命之后的俄国还是东欧的社会经济现实,还是更为具体的革命之后的城市管理或城市冲突体系,都不能被意味深长地诠释为“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的“体现”(或因为同样的原因

① 这里的“区域”(和/或“城市”)管理的概念等同于,或至少类似于卡斯特在定义其“城市结构的要素”时所指的“行政管理”。根据卡斯特的观点,行政管理是“调节P(生产)、C(消费)和E(交换)的过程”,他分析的个案是“市政管理、城市规划”。参见 Castells, 126-127。在本文中,我构思了一个关于区域管理体系的类型学,该类型学建立在对各种手段进行探究的基础上,尤其是财政手段(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就是“剩余”)如何被配置到区域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开发中去的,这些手段的资金来源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主体和机构能够获得这些手段并拥有处理它们的权力(这些主体和机构是否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机关、私营企业等)。

② 在较早发表的一些作品中,我试图提供一个对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或理性化再分配的主要决定特征的更加系统化的描述,尽管遗憾的是,我承认我并不能提供一个成熟、综合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在某些早期作品中,我至少有意识地超越对城市/区域环境的狭隘定义,而试图抓住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整体逻辑。参见 George Konrád and Iván Szelé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Harcourt and Brace, 1979); 以及 Iván Szelényi, “Social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8, No. 1-2), 63-87 (该文已收入本文集中——译者注)。

被视为“背叛”)。我们不仅能够从革命之前的东欧历史中,还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蓝图中,找到这些体系的根源。本文的第二部分并未质疑1917年发生于俄国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于东欧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只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东欧的区域管理体系具有其历史连续性。与“第二次农奴制”相对应的容克地主庄园、农业体系一样,该体系可以被理解为当前的农业合作社的早期形态,即所谓的 kholhozes。(我要强调指出,早期形态也意味着它们当然也是不同的形态!)社会主义再分配的区域管理体系的某些特征同样可以追溯到革命之前东欧的区域管理。本文的第二部分认为,如果将“易北河以东地区”在15~17世纪之后发生的变迁称为“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是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能够讨论“城市管理和区域发展的普鲁士方式”。就像“普鲁士道路”在农业组织方面能够与“美国式道路”相比较一样,在该时代的广袤地区里,这种城市和区域管理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城市与区域管理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

如果以上假设被接下来的经验和理论工作证明,那么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些新的关于“转型”理论的争议性问题,尤其是“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该理论所关注的是城市在从前资本主义形态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提出一系列相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转型理论所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中的兴起能否通过内在于“封建生产方式”的阶级斗争而得到充分解释,抑或封建主义是被“外在”于自身的各种力量所摧毁,譬如对外贸易和(或)

① 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两条道路的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容克”指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主要是征服易北河以东地区并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的德意志骑士领主的后裔。1848年德国革命后,容克的庄园经济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但是在容克庄园中,雇农仍然处于半农奴的地位。——译者注

城市自治。^① 不过，如果说在西欧，城市自治即自我调节的城市管理体系的出现有助于资本家的发展，那么在东欧，城市自治的衰落以及中央集权的“区域发展管理的普鲁士道路”的出现，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这些地区的发展与同时期发生于“易北河以东”通常被认为是“第二封建主义”的现象之间的差异，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简言之，从西方变迁模式的角度来看，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提出这样一个有启发性的观点：如果城市自治是导致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内在力量之一，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把城市自治的衰落及其被中央集权的“普鲁士式”城市管理所取代，视作资本主义为什么从来不曾于易北河以东充分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向社会主义的转型才得以发生。

同样，城市自治在迈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是如何应对诸如“城市”、“城市主义”（urbanism）、“社会”（Gesellschaft）等现象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并非抽象的学术研究问题。该论题不仅是本文主要的社会关怀的核心所在（即通过对乡村的剥夺来实现对新工人阶级的剥削），同时它对于理解带有“向社会主义转型”特征的某些激烈斗争，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能否仅仅以波尔布特^②的疯狂来解释高棉式的梦魇？或者像越南难民所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样，将柬埔寨大屠杀仅仅当作一个真正的问题的病态表达？就像19世纪的“逃离土地”（Landflucht）现象、发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的大规模贫困与贫民窟现象，以及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国家中的难以想象的贫困和城市拥挤现象（这导致了营养不良、高死亡率等现象）需要理论解释一样，从柬埔寨大屠杀到越南难民逃离南越政权统治的自杀性逃亡，以及东欧大多数国家的“低度

① 我关于这一问题最初的阐释，是基于罗伯特·布伦纳的出色总结。参见 Robert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July-August, 1977), 25–92。对存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内部，主要是弗兰克、斯威齐和沃勒斯坦一派与多比一派之间的争论，布伦纳做了一个综合性的梳理。关于城市自主性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非结果的重要意义，非马克思主义者予以了清楚的阐述；其中，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的无疑当属韦伯和皮雷纳的阐述。参见 Henri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Doubleday, 1956) and Max Weber, *The City* (The Free Press, 1958)。

② 波尔布特（Pol Pot, 1925–1998），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1976~1979年间出任柬埔寨总理。在他统治期间，柬埔寨有200多万人被屠杀，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译者注

城市化”^①，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现象的连续谱，也开始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我并不想分析亚洲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更加令人瞩目的各种问题，因为发生于东欧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的阶级冲突，才是我的分析主题。我之所以论及亚洲共产主义的“城市问题”，仅仅是为了简要指出社会主义和城市主义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我将紧密围绕上述一般性理论问题展开阐述。让我们重新回到文首所引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那一段文字：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既不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也不是城市乡村化的历史。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尽管在这里，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至少我会尽可能清楚地对这一问题加以描述。之后，我将对东欧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状况予以进一步的研究，而将亚洲的个案留给对其状况更为知情的人去研究。本文所发展的理论构想对于他们解释发生于共产主义亚洲中的区域过程和矛盾是否有些许帮助，他们最有资格做出判断。

一 “城市”与转型问题

吊诡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城市社会学家却对“城市”这个词本身产生了质疑。在1968年和1969年的两篇很早的文章中，^②卡斯特强调了城市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他指出，“城市主义”这一主流城市社会学的核

① 我从阮德润 (Nguyen Duc Nhuan) 那里借用了“去城市化”这一术语。参见 Nguyen Duc Nhuan, “Desurbanisation et developement regional au Viet Nam (1955-7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No. 2), 330-350。按照阮德润的说法，城市人口在北越的比重从1960年到1974年稍微有所上升 (从9.8%上升到11.0%)；实际上，该比重在1965-1974年没有发生变动。作者认为这是在普遍的工业化浪潮中有意识地优先发展“农村工业化”政策的结果 (p. 344)。他还指出，南越的发展遵循的是另外一种模式，其城市人口从1960年的20%上升到1971年的43% (p. 331)，而在共产党掌权之后就出现了快速“去城市化”。例如，在这一去城市化过程中，从1975年到1977年，岘港的人口从120万减少到31.2万，而在西贡的400万居民中，流失了大约80万人 (p. 336)。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与捷尔吉·康纳德 (George Konrad) 合著的论文中，我提出“低度城市化”这一概念，来描述我们在东欧发现的这一现象，即城市人口的增长可能仍在持续，但却落后于工业劳动力的增加。参见 George Konrad and Iván Szelenyi, “Social Conflicts of Under-urbanisation,” in Michael Harloe, ed., *Captive Cities* (John Wiley, 1977), 157-174。

② 这两篇文章最早用法语发表于1968年和1969年，其英文版参见 “Is There an Urban Sociology” 和 “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二者都发表于 C. G. Pickvance,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6), 33-84。

心概念，仅仅服务于一个目的：“掩盖”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剥削。他在其代表作中如此写道：“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宣称‘城市主义’独立地存在于创造了它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状况之外）将劳动力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等同于‘文化’……这样，统治文化就掩盖了其阶级特征，因为一方面它代表着该社会所有成员的普遍文化，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似乎是一种近乎必然的进化的结果，因为决定它的是自然关系的模式。”^① 在这里，卡斯特挑战了沃思等作者的“城市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假设，即可能存在一个关于城市的一般性理论，它能够独立于城市所赖以生存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存在。在卡斯特看来，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解释从古代罗马到当代纽约的关于“城市”的一般性理论，因为“城市”只有在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理解。与卡斯特相比，哈维（David Harvey）更加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有着一种特别的含义；在将其运用于其他社会环境时，城市的意义（及现实状况）必然会发生巨大的转换。”^② 简言之，“城市”的概念是同资本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各种城市性冲突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定的历史冲突的表达（或“掩盖”）；当我们试图将“城市”用于非资本主义社会时，应该持谨慎的态度。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城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特定关系？如果我们将城市这一概念应用于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例如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意义转换”？对于上述问题，有些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学家采取了一种过分简化的立场，他们认为城市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在拉马绪（Francois Lamarche）看来，“即便在经济层面上存在一些只在城市中才会出现的问题，城市中的社会关系依然并不存在什么特别之处。这里存在的，只不过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各种阶级关系”^③。根据这一看法，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某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模型，而所有的问题（包括“城市问题”）都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种矛盾，从这一“纯粹”

① Castells, 429 - 430.

② David Harvey,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Inter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101.

③ Francois Lamarche,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Urban Question,"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72), in Pickvance, 86.

的模型中推演出来。遗憾的是，卡斯特和哈维都未完全摆脱这种过度的简化论的影响。即使是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表现出对城市化的历史分析有惊人洞察力的哈维，^①也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这样宣称，“有重要的证据表明，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首要矛盾的形式适用性，已经遭到了挑战”。他继续写道：“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此刻，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在资本的实质性支配之下——劳动分工的这种表现形式（即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失去了其特别的重要性。”^②卡斯特似乎也同意这一说法：“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空间组织的一种核心形式，大都会地区减低了物理环境在决定功能的和社会的关系体系上的重要性；它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将构成其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情境（historical conjuncture）置于空间/社会动力学的前沿。”^③本文的主要任务是阐明以下问题：“城市”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于社会主义形态（或者说，如果哈维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在运用时需要何种“意义的根本性转换”）？城市/乡村矛盾在向社会主义转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特殊角色？有鉴于此，我不能对卡斯特、哈维和拉马绪提出的复杂问题予以过多的评价。他们对城乡矛盾的拒斥以及将“城市”或“城市主义”视为反映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某些分析范围内（例如，用于分析当前的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或法国）是有一定意义的。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大多数现在处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国家，就会发现其乡村已经被“城市化”或“郊区化”，因此它们的“城市问题”实际上仅仅表现为资本从初级循环到次级循环的堵塞（这里使用了哈维的术语），或者“集体消费方式”的社会化本质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特点之间的矛盾（这里使用了卡斯特的术语）。在这样的环境下，“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就失去了其意味深长的含义。但是，要得出上述结论，我们必须（像哈维那样清楚地）假设，只有晚期的、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我们还必须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部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剩余部分分离开来。我认为这两个预设都是错误的。它们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者所犯下的典型错误，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

①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Edward Arnold, 1973), esp. chap. six, "Urbanism and the City," 195-285.

② Harvey, "The Urban Process," 114.

③ Castells, 23-34.

“城市”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真实关系，反倒模糊了这种关系。只有在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理解跨国资本流动（这包括对处于这一世界体系边缘的广阔农村地区的剥削的分析），发生于核心国家大都会中心中的各类财政危机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① 同样，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这与“集体消费方式”的社会化本质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好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本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它实际上预示着这一纯粹形式的终结。^②

从上述分析中我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①“城市”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城市问题也不能从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模型中的再生产矛盾中推理出来。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城市”至少是一种相对独特的现

① 从这一观点出发，戴维·斯莱特（David Slater）最近的论文值得注意。参见“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ization in Peripheral Capitalist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26-52。我认为，他的分析的有趣之处在于，他试图展现农业/农村部门对于边陲国家的依赖性来说是必需的。

② 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在其关于国家角色的分析中，受到了结构主义偏见的限制。他们通常陷入关于国家角色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循环论证中：因为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它仅仅为满足资本主义再生产服务。就我视野所及，洛伊坎是唯一试图打破这一结构主义循环论证的人。参见 Jean Lojkin, *Le marxisme, l'état et la question urbai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7), 尤其是第一章第二节的第 52-81 页。我可能无法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但是我不能确定的是，洛伊坎除了表达他对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不满之外，能否提供一种走出这一问题的方法。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一点也不看重他跟普兰察斯的争论的意义。我发现令人惊奇的是，在城市社会学之外，过去十年的文献中似乎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创新。最主要的贡献显然包括：Ju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Heinemann, 1976), Henri Lefebvre, *De l'Etat, De La Mode de Production Etatique* (Inedit, 1978)。在哈贝马斯-列菲弗尔的观点之后，显然是不断增加的“社会化”过程，它预示着一个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的新阶段，列菲弗尔甚至准备将其称作“生产的国家模式”。我试图在我的论文中运用这一概念来理解城市化过程，参见“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 or State Mode of Production,” in M. J. Dear and A. J. Scott, eds., *Urbanis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Methuen, 1980)。但是，让我诧异的是，即便是“韦伯主义者”雷·帕尔在对该文的评论中也认为，拒绝以下的假设是荒唐的，即区域过程中不断增加的控制，即使它包含着关于投资决策的中央计划的控制，也能够被诠释为一种脱离资本主义的运动。参见 Ray Pahl, “Response a Iván Szélenyi,” *Urbi*, (1979, No. 1), 73-76。我不同意帕尔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却认可列菲弗尔的看法。我认为，“政治”对“经济”的侵蚀——正是围绕着这种侵蚀才产生了当代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区域开发这一领域则表现为所谓的城市财政危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逻辑不同的东西。这并不是说，干预使得资本主义在一夜之间崩溃，而是说我们仍然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远非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象；它既生产了资本主义，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②对资本主义来说，存在于城市/乡村之间的各种矛盾不仅不是不重要的，事实上，反而构成了其最核心的矛盾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范”功能的运转，以一个非城市化的、可以被摧残的和从中剥夺剩余的乡村为前提。如果这一前提在某一国家的范围内无法实现的话，它就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这种前提。我相信，上述这两个假设彼此之间是互为前提的；假设①只有在假设②成立的前提下才能够成立。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哈维和卡斯特似乎都断然拒绝了城乡对立的重要性；不过，与拉马绪相比，他们对从资本主义中兴起的“城市的自主性”问题要更加谨慎，他们也从未预设一个简单的、单向的决定过程。让·洛伊坎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甚至要更加明确，他直接谈及了“城市现象的显著自主性”；他还谈到了“城市形式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资本主义的诞生，而且城市的某些（甚至是其当前的）特征，也并不直接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最后，他还这样宣称：“马克思避免将城市化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简单的、直接的和单一的因果关系。”①

显然，就上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引文而言，让·洛伊坎是正确的。马克思并不认为“城市”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或者“城市”仅仅是掩盖唯一真实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直觉好得令人惊讶；他认识到，不同生产方式能够与发生于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不断变动的矛盾联系起来，从而以一种新的、有趣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的马克思是一个历史社会学家，而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主要特征，是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不断斗争，以及因为城市中心的扩张而导致的乡村的逐渐消逝：“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而乡村的城市化过程，则否定着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认为“城市”的概念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而且城乡之间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英国南部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区域而言，这一观点是适用的。但是，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其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乡村中并为了生存而斗争吗？城市向非城市地带的扩张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和将劳动力持续转化为商品的需要。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极具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整个世界

① Jean Lojkin, “A Marxist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sation,” in *Pickvance*, 124.

体系都被城市化了，又将发生什么事情？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未来学家；同时，我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将出现一个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东西。这一方法论的立场，与汤普森在其阶级分析中以及他对阶级的结构主义定义的批判中所采纳的立场相似。城市化的进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在国家或世界范围内将非城市转变为城市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与资本主义的扩张相互交织在一起：它既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前提，促进着其扩张，又因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得以进行。如果这个过程走到终点，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我们正在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形态。或许，马克思的看法是正确的——古典的历史实际上是“城市的乡村化”，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持续的斗争过程。不过，当这种城市的乡村化获得成功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古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我们首先必须清楚，为什么转型的问题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城市”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古典社会学——滕尼斯和韦伯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拒绝了粗俗的经济和阶级的决定论观点，它正确地提醒我们，我们所界定的“城市社会”或“城市自治”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其出现不过是与市场经济的兴起相一致罢了。滕尼斯的“社会”（Gesellschaft）概念是一个颇具洞察力的概念。在其深奥、精妙的语义分析中，滕尼斯相当有创见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人们使用“社会”的概念时，他们至少可能指的是以下三种不同的东西：①“资本主义”，一种建立在金钱和市场交换基础之上的经济体系；②“社会”（society），基于这一区分，现在分析者可以弄清“个体的”与“社会的”、“社会的”与“自然的”以及“社会的”与“经济的”之间的区别了；③“都市”、“城市”，亦即沃思意义上的“城市主义”，这意味着匿名的社会关系、角色分裂以及各种阶级关系。滕尼斯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隐约地主张，上述从分析的角度有所区别的三种现象，似乎是同时出现的。用现代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就是，除非已经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否则你就不能够将“社会”概念化，你就不能得出一个“关于社会的理论”。在滕尼斯的启发下，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哈维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城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具有其独特含义，而这一含义在理解处于其他社会环境中的城市时必须发生根本的改变”。毕竟，从滕尼斯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是被齐美尔和沃思将其与“城市主义”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得到了发展，否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无法

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只有城市（Stadtluft）、“城市氛围”和“城市主义”，才能带来能够成为雇佣劳动者的“自由人”：是所谓“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没有城市自由，就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资本积累——更进一步说——就没有城市的自治。

我无需总结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分析。显然，西欧部分地区的中世纪城市所获得的政治、行政和经济/财政方面的自主性，构成了为什么资本积累会首先发生于这些城市的原因；同样明显的是，此种自主性的缺乏，大多数东方城市作为“王公的堡垒”的本质，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很多亚洲社会无法生根发芽，即便是后者在中世纪时的技术进步比那些逐渐转向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要高出很多。“市民权”的概念必须被创造出来——概言之，必须先有“市民”（burghers），才可能有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实际转型发生之前，资产阶级这一新阶级的种子就已经播下去了。韦伯的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西方城市取得“不法权力”的新的城市自治的“政治经济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自我调节的城市管理体系”必须被创造出来，在这一体系下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是自主的，它获得的“不法权力”使其能够就城市共同上缴给封建地主的租税进行交涉，这使得它有可能积累资本，如果这种交涉变得更加有效的話。当前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争论，^① 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封建主义的转型是由内在于封建主义的力量发动的，还是由各种“外在”因素（如城市自主性）发动的？是阶级斗争，即陶蒲（Dobb）所说的封建农业部门的农奴反抗封建地主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封建主义的解体，还是如被布伦纳称为“新史密派马克思主义者”（即沃勒斯坦和斯威齐）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城市的兴起以及源自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的资本积累，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在下文的分析中我将揭示，关于东欧的证据支持“新史密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滕尼斯和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的看法。城市自主性的缺乏，或者更准确地，在所谓的“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的兴起时期对那些城市机构的压制，似乎在“为什么资本主义从来不曾于易北河以东充分发展起来”这一问题上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很可能更少的是由于乡村阶级斗争的虚弱，更多的是由于市民在维持其城市自治中的早期失败，阻止了资本主

^① Brenner, 25 - 92.

义的积累以及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例如，某些匈牙利城市在13或14世纪时就取得了与一些西欧城市相当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却又逐渐在15世纪被削弱。16世纪声势浩大的多热农民起义^①在反对封建秩序时再次失败，因为它无法与城市市民结成联盟，后者在之前曾经被限制了权利，其“合法性权力”也被严重限制。多热起义的失败，以及随后土耳其于1526年征服匈牙利，为第二次封建主义、第二次农奴制以及更加集权的城市管理开辟了道路；它几乎直接导致了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导致了一个中央控制的城市和区域行政与管理体制。“易北河以东”其他地方的发展大同小异。这些事实广为人知，我不是历史学家，在这里，我也不想对这些过程进行任何细节分析。但是，正是这些事实使得“新史密特派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军人物沃勒斯坦相信：诸如城市自主性的发展这样的“外部”因素，对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成功转型具有重要意义。^②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想提出一个无论是对于社会学理论还是对本论文的主旨来说都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城市自主性的被压制，以及这种自主性被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城市管理体系所取代，这一事实的社会学意义究竟是什么？因为它阻碍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因此对沃勒斯坦来说，这意味着它导致东欧走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边陲，这与在和西欧比较时，用“落后性”来解释东欧所处的地位的更为传统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东欧从革命前到社会主义时期转变中的某些过程和制度的惊人的连续性，我们或许会开始怀疑“边陲”或“落后性”的解释是否准确。这些解释看上去更像是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对东欧转型进程所做的解释，而不是从东欧内部有机发展的角度出发所做的解释。换言之，15~17世纪期间所发生的、将易北河以东的东欧部分区域带入一个不同的历史轨道中去的变迁，究竟是使东欧被锁定在一个边陲的、落后的位置上，还是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这些相对于西方模式的偏离，究竟是落后的表现还是“向社会主义转型”进程中的第一步？如果说，至少直到19世纪仍然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城市自主性的发

① 中世纪匈牙利农民反封建起义，领导者是出身小贵族的边防军军官多热·哲尔吉。——译者注

② 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cademic Press, 1974); 以及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I.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6.

展，“社会”（Gesellschaft）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应的作为资产阶级雏形的“市民”的出现，构成了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能否有理由假设，相反方向的发展就导致了向“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转型？在下文中，我将力图发掘当代东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就存在的发展道路中的各种历史根源。我将试图证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从“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到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再到整个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其彼此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延续关系；同样，在城市管理和区域发展的普鲁士道路与当代社会主义再分配的区域管理体系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连续性。

二 革命前东欧历史中的根源：“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 以及“城市管理和区域发展的普鲁士方式”？

“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在14世纪到17世纪的西欧，农奴制逐渐衰落。出于各种不同的复杂原因，农奴首先转变为具有或多或少自由的农民，接着又从农民变成了企业农民（entrepreneur farmers）、农业工人或（更多地）成为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建立在受到法律束缚的农奴的各种劳动服务基础之上的封建庄园经济开始瓦解，并部分地被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农庄以及以商业生产为导向、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庄所取代。随着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效率增加，其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开始下降，出现了对一个不断扩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的需求。于是，先前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通常是被迫离开），迁入城市并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为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供应劳动力，并创造出农业商品生产的市场。这些都是人所周知的过程，同样为人所熟知的是，易北河以东、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Empire）以及俄国（从伊凡一世就已开始）却在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迈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封建主义”和“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东欧的农奴也开始获得解放，但这一趋势在15世纪到17世纪却发生了逆转。这里的农奴不允许被变成农民，他们拥有耕种自己土地的权利也没有得到承认；相反，他们的财产被集中于庄园式的、容克类型的地产上，他们的农奴身份也在法律上被再度确认。第二次封建主义被建立起来，其中庄园地产（manorial estate）所扮演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在农业发展的普鲁士模式中，大庄园是建立在农奴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的

基础上，在这里不存在生产性的农业商品经济，小农（peasants）也不能成为市场导向的农户（farmers）。在此体制下，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经济上来看，劳动力都被束缚在农业中。实际上，经济力量在19世纪末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在农奴制从法律上被废止之后，它们强大到足以维系既存的农业体系并将劳动力束缚在农业与乡村之中。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是与基于相对比重较大的农业人口的经济增长策略相适应的。这个比重实际上要高于技术上所证实的比重，因此这些经济体系是建立在持久的农业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它确保着对农业劳动力的高度剥削，以及为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各种法律和经济手段确保了农业人口所占的较大比重；在“第二次农奴制”之下，农民——如果还能够将其称为“农民”的话——既不被允许自主离开他们的地主，同时也缺乏这样做的经济或社会动机。他们不拥有土地，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失去土地；不过，他们却在容克的土地上遭到极端的剥削；作为交换，他们从地主那里获得家庭自留地（family plots）以维持生计。大的容克式庄园则将大型农业企业的市场取向的商品生产与农民家庭性的生存经济结合起来；发生在庄园中的对劳动力几乎不受限制的剥削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家庭自留地上的食品生产在确保着家庭的生存。向城市或城市工业的永久迁移即便在法律上是可行的，其风险也显得太大，因此劳动力的流动被视为临时的解决之道，目的是支援仍旧留在乡村的家庭（形成悖论的是，即使是19世纪末从东欧向美国的农民流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此种想法的推动）。特别是在俄国，某些社会纽带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不久之前还存在的村社（obshtina）使得个人迁移变得极其困难。即便是在19世纪，那些被允许在城市从事工业性工作的人仍然被视为村社的成员：他们必须向村社共同体支付部分收入，且随时可能被召回。“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在东欧这句话的正确性当然没有在西方那样大。

普鲁士道路的后果：农业就业不足，更缓慢的城市增长。如果我们想要描述前革命年代东欧的城市化，那么我们会强调其相对比重较高的农业人口，普遍存在的农业就业不足，以及被延缓的城市中心的生长。事实上，甚至是那些特点并不怎么鲜明的东欧西部地区，上述描述也同样是适用的。即使是普鲁士这样在历史上城市化相当高的地方，在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其城市发展也被大大延缓了。与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西欧的“逃离土地”（Landflucht）现象不同，东欧人口被留在农村并接近农业，这一点与东欧工业

化的模式是相适应的。前革命时代的工业不能简单地被描述为落后的；尽管工业人口比例较小，工业品的内部市场也发育不足，这种工业却是高度集中的，建立在相对较发达的技术基础之上；早在18世纪（在某些重工业领域）俄国就已经是工业世界的一个强国。基于高度的生产力水平的工业发展，其所需的劳动力更少，对城市化的依赖性也更小。此外，因为工业投资更多地集中于生产资料领域，且较少受到消费者市场的直接影响，因此工业增长并不要求大众消费能力的增长，也不要求乡村生存经济的衰落以及劳动力向商品的大规模转化。因此，工业可以在漫长的时期内伴随着大量的农业人口发展。

城市的自主性被抑制，地方政府处于中央政府科层管理的控制之下。如果说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城市的“不法权力”是其资本积累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与东欧相反，其资本积累不是由于市场扩张而更多地是由于国家制度的发展而得到保证），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两者在城市管理上存在一个相应的不同之处。韦伯在分析作为亚洲区域管理体系的制度性特点时，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它具有以下力量，如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将其成员束缚在“村社”并因此而使得其社会身份停留在封建结构之中。城市所具有的权力，如将其居民从封建义务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自由的城市平民”等，在俄国要比西欧更受限制。实际上，在17和18世纪，诸如确保地主对坏人进行惩罚的绝对权威（即便是他们逃脱出来并暂时藏身于城市）的各种法律，被不断地引介进来并得到加强。^①东欧其他地区所发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即便其并非表现为这种极端的“亚细亚模式”。在匈牙利，城市在15世纪之前取得的“不法权力”（该时期相当于西欧的封建时期，或被土耳其占领所导致的权力真空时期）被持续不断地加以抑制。例如，居住在城市中的贵族的税收豁免权被重新引入，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即便没有被废除，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这不仅仅是一种体制的再封建化，因为即便是贵族的地域性组织（在匈牙利是县），也与正在浮现的资产阶级在城市中的自我管理政府一样，受到了攻击。一个新的城市和区域管理体系出现了，在这一体系下，无论其所表达的是贵族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地方利益，都屈从于中央政府所界定的“中央利益”。选举所产生的地方代表的权力，不论是在贵族的县政府还是资产阶

^① 关于调节俄国农奴运动的法律的僵化，参见 Lionel Kochan,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 (Penguin Books, 1973), 第74~75页及书中其他地方。

级的市政府，都受到被委派到地方政府的国家官员的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如同俄国的彼得大帝或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一样，致力于“自上而下的革命”，试图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激进改革，用区域性政府（其边界得到了合理的界定并赋予被任命到各级地方政府中的国家官员以绝对的地方权力）来取代封建的郡县体系。当时，他最激烈的一些变革失败了，但是地方政府结构的变迁显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朝着他所希望发展的方向发展，尽管他的初衷是更快地推进这些变革。

城市管理和区域发展的“盎格鲁—撒克逊”道路与普鲁士道路：两个形成对比的理想类型？因此，到19世纪末，普鲁士政府控制地方事务和地方政府、规制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各种制度与机制，就已经同盎格鲁—撒克逊体制形成了对比，在后一体制中，地方当局大体上被当作地方利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表达者和捍卫者。尽管在英国和美国，^①中央控制甚至得到了逐渐的扩展，但是民主选举的地方政府仍然首先对其选民负责；因此，他们无论是在财政上还是在诸如教育、警察、司法等事务上，都保持了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性；而在东欧的任何地方，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

对任何国家体系的分析都要求更多的精确性，而我对于城市管理与区域发展的“盎格鲁—撒克逊”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简单化区分，并不能引导我们在经验研究上走得更远。法国的国家本质以及由此导致的其在地方行政和“区域规划”（*aménagement territorial*）中的角色是相当特殊的；或许存在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一样多。例如，在匈牙利，中央政府从未成功地——至少在法律—行政层面——使地方屈服于中央利益；中央—地方的矛盾是各级地方政府结构之中所固有的。这一点被以下事实合法地表达出来：地方政府同时受到两个官员的领导，一个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被认为代表地方利益的官员，另一个是被任命的官员（依据职权代表着中央的利益），他们互不从属，却共同分享权力。在任何比较经验研究中，与国家特色有关的各种发展类型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上文分析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社会主义再分配的区域管理体系的某些制度（首先是地方政府的结构）早在革命前的东欧就得到了发展。在十月革命之前，列

^① 关于地方政府改革的一个全面而并非很新的分析，参见 K. B. Smellie, *A History of Local Government* (Unwin University Books, 1968; first Published in 1946)。

宁发现，如果配合以政治革命，德国“战争经济”中的各种经济管理合作制度就能够被社会主义社会拿来“为我所用”。^①我认为，这对于新出现的城市与区域管理体系同样是适用的，其本质更多的是来自“更为东欧式”的增长问题，而不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问题或其派生的各种意识形态问题。

三 区域管理的社会主义再分配体系的出现： 变迁及其连续性

“议会民主”：区域管理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普鲁士”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当地方性的苏维埃在1905年短暂出现、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立即出现，他们早期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他们被认为代表着另一种处理地方和中央利益冲突的激进方案，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体制对这种冲突的处理方式是如此无效率，而独裁的普鲁士政府的处理方式则是如此的不民主。地方性的苏维埃开始作为直接的大众权力的工具而运作——这是在左派革命中不断出现的一个论题，如较近期的智利和葡萄牙。

尽管经验证据很分散，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在1905年的彼得格勒以及1917年夏秋之际的俄罗斯，早期的地方性苏维埃确实是直接的大众权力的表达。他们的程序并不严格符合各种“民主的”规则，苏维埃成员的选举以及苏维埃做出的决策，或许也并不被“西方民主”认为是“妥当的”。然而，由于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垮台且不能够再进行领导，因此在真正的自我管理的需要和渴望下，苏维埃（即便很快就被布尔什维克所控制，后者希望迟早将其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得以建立。当然，布尔什维克的“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口号显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宣传，布尔什维克政党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有意识地培养干部以掌握苏维埃领导权，它并不打算允许“自发的群

^① 卡尔令人信服地对列宁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根据卡尔的观点，列宁热诚地“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即“论‘左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来论述这样一个观点：德国代表着“国家社会主义最为复杂的典范”和当代大型“资本技术和计划组织”的最新成就（last word）。德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唯一缺点在于，其政府是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府”。如果用“苏维埃即无产阶级政府”来取代其位置的话，“你就会得到社会主义所能够提供的所有条件”。参见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2 (Penguin Books, 1971), 98.

众力量”无限地占据因旧体制崩溃而造成的权力真空。然而，在1917年夏天，党的精力完全用于克服其内部斗争。为了取得对中央国家机构的控制，它不得不允许人民在自己的社区、工厂甚至是军队中进行自我管理，不得不加强法律和秩序以保证维持生计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有序分配。党不得不等到新秩序稳固之后，直到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良好训练、了解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布尔什维克先锋队能够占领其应得的领导位置，并通过各种新成立的国家机构成功地使人们自发产生的日常经验的利益，服从于科学建构的“工人阶级”的利益。

各类苏维埃兴起之时，曾经存在着一种合法性危机，通过私有产权而获得权力合法性的社会，在其真正在俄国存在之前就已经坍塌。在布尔什维克先锋队的领导下（其合法性来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之上的一种新的、目的合理性的知识，且正处于初生状态之中），不存在将其统治合法化的领导者，这也是我之所以将早期苏维埃看作直接的大众权力的工具的原因，尽管在其运作中存在着诸多不民主的因素。苏维埃体制以革命手段解决了——至少是暂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冲突，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取代了中央政府的大部分职能。这里不再有分别代表“中央”或“地方”的分离的实体，地方上当选的官员在做出中央决策的同时，也在确保这些决策的执行，从而创造了盎格鲁—撒克逊与普鲁士道路之外的一种处理地方—中央冲突的方式。

过早的终结：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地方苏维埃的“国有化”。但是这一革命试验过早地结束了。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所主导的中央政府巩固了其权力。形成悖论的是，托洛茨基，这位第一届苏维埃的主席、最致力于推进直接的大众权力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后来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的最激烈批评者，却创立了理性化的军队组织（它在总体上拒绝士兵苏维埃的无政府主义），还执行了镇压民众捍卫苏维埃权力、反对党和国家不断滋长的官僚权力的客琅施塔得叛乱的不光彩任务。而早在客琅施塔得叛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布尔什维克政府“地方社会的国有化”进程就已经在其掌权的初期开始了，这一进程的推进较少地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而较多地出于一个理性化和有效运作的中央政府的需要。早在1918年1月，法律就不断出台，其目的是抑制地方苏维埃的权力、^①削弱其经济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此之前几乎是不

^① E. H. Carr, 146.

受限制的)、规范其税收权利,以及最大限度地从它们身上抽取金钱和实物到中央政府。国家支出开始呈现螺旋式上升,这种上升正如其后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再也未曾停止过:起初的理由是因为内战的花费,后来则是为了加速发展的工业化,最后却是逐渐被用于支付不断膨胀的党和国家机器(其功能是执行计划和管理、行政和控制)的花销,这构成了一种隐藏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发展过程背后的独特力量。

很快,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各种牺牲的,他们的劳动果实是不能被消费的,自私的(个体或团体)利益应当受到压制,更多的资源不得不用于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计划(首先是电气化计划,随后是其他各种计划)。人们原本预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商品充裕、分配平等仅仅是一个长期目标,它不会马上实现,而可能要等到下一代才能实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方苏维埃应当领导这一过程,教育人民,加强其阶级意识,必要的话还要同阶级敌人及所有不愿意理解革命要求的人作斗争。当然,苏维埃的任务还包括确保其各自的社区为“共同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贡献,譬如,征收尽可能多的税,不允许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自己的消费而过分存钱,以及发现那些囤积居奇的各类“犯罪分子”。换言之,地方苏维埃认识到他们的革命使命就是从其人口身上抽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并将其转化为国家预算。很快,地方苏维埃就成了中央政府纯粹的税收工具,他们自己则什么收入也没有;一种新的精神得到了如此有效的灌输,以至于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官员从不梦想截留或留下部分剩余,这些想法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这就是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城市紧缩经济”,它建立在低度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之上,而这在市场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导致了同样无法想象的高度的“生产性投资”。地方当局成为向人口抽取剩余的工具,成为党和国家在地方上的运作工具,即便他们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官员也成为中央权力的代表和中央意志的执行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西部地区的发展——再分配的区域管理的苏维埃版本的引进,还是普鲁士道路的再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延伸到东欧西部,这一“过渡时期”的地方政府组织的本质已经表现得足够清晰,任何将地方政府组织变成真正的自我管理的直接民主组织的企图,都被当作“小资产阶级幻想”或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而禁止。匈牙利的非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尤其是还没有“完全理解我们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的民粹主义者，^① 呼吁对地方政府进行激进变革，试图打破旧的地方政府科层制的普鲁士模式。基于其在“国民议会”中所取得的自我管理经验，各种地方组织纷纷主动出现，他们在苏联人之前占据了原本属于旧体制官员的城市和乡村议事厅，尽管当地的人民并没有什么领导。他们在寻找各种组织，以便有效地表达地方利益、用人民的自我管理来取代先前的官僚体制。由于深谙苏联历史，这些“官方”匈牙利共产党人士（大多数共产党的新领袖都在苏联受过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政治庇护，他们是和红军一起回来的）也许从未认真对待这些改革建议。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盟时期，他们允许围绕这些提案进行科学研究，但这些研究的结果却在联盟结束后被立刻装进档案，也许永远尘封其中。匈牙利及东欧其他地方的新地方政府组织遵循了苏联的地方苏维埃模式。因为无论如何，继承下来的机构已经被高度集权的国家官僚机构所塑造，以保证对中央命令的遵从和执行；这些几乎被原封不动地接受过来，只是市政厅更名为市苏维埃，市长改名叫地方议会主席。这些改变也许仅仅意味着人事上的变化，或者在某些时候仅仅是对前官员的再教育而已。前政权中专业的“城市和区域管理者们”会发现，学习新的“精神”并不困难；对他们来说，这些“新精神”或许根本就没有那么新；在贴上新的意识形态标签之后，他们的专业技能在新时期被证明是继续有用的。简言之，1951年匈牙利的第一次社会主义地方政府改革引入了地方苏维埃制度，不过是继续了过去两百年所发生的改革，根本就不代表一种革命性的变迁；而且，这一改革遵循了早期改革者的思路，只不过是因为过去的政权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执行这些措施，因此，它显得是激进的。

再分配的区域管理体系：社会主义粗放型工业化下的经济增长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出现的城市和区域管理体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结构，并非社会主义的，但的确是一种社会主义体系，它不仅受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必要性的影响，也受到意识形态考量的影响。这一体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的社会中运作；在那里，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即便存在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不是由市场来调节的；即便是最直接的生产者

^① 这一改革的主要鼓吹者是左派民粹主义者毕博·伊斯特万（Istvan Bibó）。参见 Istvan Bibó, “A magyar közigazgatásról (1946–47)” (“On the Hungarian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Magyar Füzetek* (No. 4, 1979), 95–122。

也被迫出卖其劳动，而其价格也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经济特征，都在区域管理体系上留下了烙印。类似地，革命前东欧社会经济体系的各种特征，如土地所有制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局限性，以及国家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区域管理制度的历史延续性给予解释。东欧的区域管理执行基本的发展任务，确保剩余的最大化以及这些剩余被用于生产性投资，特别是粗放型的工业化，并将剩余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延缓基础设施建设；而现在，这些却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整个东欧的地方苏维埃在集体农业中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他们组织并控制农业合作社，调节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他们甚至还重新引入了苏联的内部通行证制度，使其发挥类似于村社的控制城市化的职能。不过，即便是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或罗马尼亚，这样的内部护照从未在集体化的动荡岁月中存在过，20世纪50年代初那些希望离开农业部门的人，仍需要一个由村庄委员会开具的工作许可证。地方苏维埃成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那里，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并非由市场进行调节，而是通过中央的规定和科学计划来进行再分配。

从一开始，东欧的城市与区域管理体系就发挥了狭义上的再分配功能——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稀缺资源，通过地方苏维埃来进行再分配。在“紧缩经济”阶段，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职能，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只占整体投资的一小部分：某些时期的住房建设要低于房屋存量的简单再生产所要求的水平；即便是针对集体消费领域的投资——例如，对健康、教育、“集体”娱乐等领域的投资——这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本被认为是具有优先地位的投资，却低于基于西方市场经济计算而得出的平均水平。

20世纪60年代经济改革的微弱成效。随着东欧经济进入集约式经济增长阶段，随着导致“早期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大部分特点的粗放型工业化走到尽头（主要是因为不断加剧的劳动力短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整个东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开始增加。这不能仅仅被解释为目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能够支付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充分的基础设施（首先是住房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供给成为劳动经济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因为在劳动力短缺的产业条件下，只有确保某种程度的服务水平才能够吸引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支出标志着城

市和区域管理体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要求地方政府结构的某些变革。在以前，再分配经济下的区域管理体系的功能是剩余的最大化以及剩余的有序剥夺，主要目的是用于生产性投资。现在，其侧重点发生了改变，城市和区域体系中基础设施开发手段的配置成为基本的任务。先前，地方苏维埃官员更关心查处富农（Kulaks）和其他囤积居奇的反革命分子；现在，他们必须对预算和财政、区域计划和城市更新懂得更多。先前，他们是“党的战士”，其很大一部分时间被用来处理令人讨厌的安全事务，例如，准备“富农名单”或发现那些破坏税务征收的人；现在，他们更多的是中央计划委员会地方机构的工作人员，负责有序地执行区域发展计划和提供制定计划所需要的数据。先前，他们只要表现出相对单一的革命热情就可以了；现在，他们则必须熟悉十分复杂的、理性化的再分配精神，而这种精神用各种观点武装他们，并使其在一些问题上能够说服自己尤其是当地群众：譬如，为什么他们提出的更多拨款的请求，“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公平的”；为什么其他社区可以获得比他们自己的社区本质上更高的人均拨款。

这一变化不仅要求将“干部”变成专业的城市和区域管理者，还要求区域管理的政府结构的重组。显然，对制定区域管理的中央计划的人来说，他们无法将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长的资金无限地分下去，而在各个地方当局之间机械地平均分配，将导致投资的分散和不经济。由于用于发展的稀缺资源的集中不可避免，中央计划制定者更愿意同尽可能少的地方当局（它们相互竞争资助）打交道，倾向于与得到明确定义、从科学上被详尽阐述的等级体系中的每一个地方打交道；在这种等级体系中，地方的等级层次与其所应获得的人均拨款额度是相对应的。在紧缩经济时期，由于地方当局的控制功能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央更愿意拥有尽可能多的地方当局以确保“老大哥的监督”甚至在最小的地方都能够存在。事实上，1951年的匈牙利改革建立了许多新的地方当局。但是，各种尝试都试图使地方行政尽可能理性化和集中化，因为地方当局的控制范围缩小，其任务变得更加简单。在上一个十年中，整个东欧都发生了地方行政的理性化过程，这或许是区域管理体系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之一。譬如，匈牙利大约一半的社区撤销了或者正要撤销其地方政府。那些大的或被计划制定者认为有潜力成为增长中心的乡村，整合了那些相邻的没有增长潜力的社区（这要根据计划制定者的判断），因此这些社区几乎是自动被剥夺了获得进一步拨款的权力，这一过程也因之成为一种关于区域规划的

“自我实现的预言”。经过这种微妙的实践，社区等级次序得以确立。一旦这种等级次序被建立起来，拨款的分配将变得更加简单，尤其是因为地方当局的等级变得与再分配权力的等级相对应的时候；少数的“将军地区”（县中心）将能够从国家预算中切出资金供自己支配。相应地，“中尉地区”（区中心）则从剩余部分中分一杯羹，即便这比其“上级”要少得多，但仍然要多于它们再往下分配的“中士”村庄的额度；作为最低一级的地方政府组织，“中士”村庄处于再分配过程中的最末端，它不得不向其“大兵”（其卫星社区）解释它们为什么不能获得任何资金的原因。根据维基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发表的关于匈牙利某县的政府财政数据，大约50%的基础设施开发财政资源被用于县中心（通常只容纳了大约10%的县人口），剩下35%被用于区中心（容纳25%的人口），最后，大约20%的人口居住在失去其地方政府控制的卫星社区，它们甚至被剥夺了投入到村庄的全部资金的最少的15%。当然，这一数据很可能在统计上并没有代表性，但却反映了区域管理的理性再分配体系是如何运作的。^①

从强调征税到强调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并没有使地方苏维埃的本质发生变化。在新角色中，它们依然不会比以往更多地被期待为了地方利益而表达和斗争。相反，它们是国家再分配机器的地方工具，其运作仍然是基于以下的假设，即相对于中央计划所界定的国家利益来说，地方利益只是特殊的和次要的。上文所简要描述的变化，使得社会矛盾浮出水面。在经历了普遍的关于紧缩经济的“基础设施匮乏”之后，那些发现自己被国家再分配剥夺了权利的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被剥夺了所有资本投资手段的社区中的人，也许会开始奇怪为什么他们同样为国民收入做出了贡献，却只得到了比预期要小的蛋糕份额（被假想是共同的）——是不是这个蛋糕根本就不是大家共同的蛋糕？更进一步，不仅是所切蛋糕的份额大小遭到了质疑，再分配体系本身也遭到了质疑。如果被允许留下其居民所生产的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即便是最贫穷的村庄也能够自己负责自己的财务而且或许还能比现在更多地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必要先剥夺剩余，然后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计算程序来养活一个庞大的政府并进行再分配吗？这一观点的意识形态表达多半会被扣上托洛茨基主

^① G. Vagi, “Mit er egy kozseg-mit er egy megye?” (“The criteria of the distribution of grants among communities and counties”), *Közgazdasági Szemle* (1975, No. 7-8).

义的变种或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帽子。那些将冒着被扣上帽子的风险的人，或许最终会止步于抽象的沉思：例如，那些生产了剩余的人，是否就不能够拥有与中央计划者一样的处理这种剩余的权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一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的议题，在经济改革运动中被技术派代表提出来，这些人基于自己在工厂管理中的经验，深谙中央计划的无效率；他们相信，“给予自发性力量以更多空间”对于区域发展来说，或许并非一件灾难性的事件。在下一节中，我将尝试揭示再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自主财政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再分配问题，就不仅反映着不同技术官僚派系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反映出特定的结构性矛盾，尽管卷入其中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①

南斯拉夫的城市自治试验。南斯拉夫具有对“自治”（self-management）的强烈意识形态信仰，实际上，其“自治”与地方苏维埃的最初概念十分接近。“公社”组织对于东欧其他国家的改革者来说也许仍然是一个模式，如果他们敢于参考南斯拉夫试验的话。那些认为南斯拉夫“公社”是对东欧再分配区域管理的功能替代的人，被强烈建议更仔细地观察其效率和民主本质，而这一点不仅被“官方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质疑，同时也遭到南斯拉夫左派批评者自己甚至是技术专家的质疑。反对按照南斯拉夫试验进行改革的东欧技术专家认为，南斯拉夫区域组织的“无政府本质”及其中央控制效率的低下，至少部分地要为其仍然存在的尖锐的区域不平等负责。实际上，南斯拉夫人自己可能正在朝着更多的中央计划和控制的方向发展，并与其他东欧国家趋同。即便对“公社”有所保留，它仍然代表使得剩余的配置合法化的另一种原则，因为它认可直接生产者直接影响对剩余进行配置的权力，这一合法化的原则不仅与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也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

四 社会主义再分配式区域管理的社会后果： 变动的阶级组成与阶级斗争的新类型

普鲁士道路建立在大规模的就业不足的农业和农村人口的基础之上，而社会主义再分配的区域管理则有助于工业化，它导致了农民的衰落以及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我之前曾指出，革命前东欧的经济增长并未伴随农民逃离乡土的

^① 英文原文似乎有误，当为“还没有意识到”更合逻辑与语境。——译者注

现象，至少与西方相比没有那么明显；城市增长也相对缓慢；工业化（是有限的，且高度集中于工业中的技术进步部门）并不要求一个庞大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因为其商品性农业生产依赖于低工资；在严重的农业就业不足的保证下，即便农奴在法律上被从各种封建义务中解放出来，他们依然没有从整体上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并被推向城市，他们依然被束缚在农业领域，在村庄中处于半是无产阶级半是农民的地位。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这类似于拉丁美洲今天的情况，那里的工业投资同样无法吸纳来自农业的潜在劳动力，这使得经济长期处于农业人口就业不足的状态，且很有可能导致与革命前的东欧类似的处境。但是，与拉丁美洲不同，在革命前的东欧，这没有成为一个城市问题。在很多拉美国家，即使是城市工业无法雇用他们，农村人口也会流向城市，因此农业中的就业不足就会转变为城市中的失业。这些国家变得过度城市化，因为其城市人口的增长远远领先于城市中就业机会的增长。而在革命前的东欧，过度城市化并不存在，因为城市人口的增长大体而言与城市中工业工作的扩张同步，这通常是因为某些乡村的半无产阶级选择冒险移民北美，而不是待在国内城市中失业；当然，这一选择在当代拉美并不存在。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东欧的乡村人口与村庄社区之间的社会经济纽带尤其牢固，就业不足的推力被传统、法律和经济条件的拉力抵消。

因此，革命前东欧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不体现为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其社会矛盾产生于乡村半无产阶级不顾一切的各种努力，目的是改变土地所有制制度并进行土地改革，尽管这并不能使乡村中大量就业不足的无业人口成为城市中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但却至少能够将其变成真正的农民。一个基本的乡村“农民社会”被认为是对现有体制或西方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替代，甚至是对“民粹派”意识形态家们（不仅是俄国的，也包括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所宣称的“城市工业社会主义”的替代（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意识形态在匈牙利也具有很大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它又在恰亚诺夫及其他人的方案中出现）。但是这一“农民的处境”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目标来说则是陌生的。1905年之后，列宁认识到，接下来的革命可以且很可能建立在乡村大众摧毁现有政治体制的“自发运动”的基础上：不过，他仅仅建议与乡村大众进行策略性的联盟，以便布尔什维克先锋队能够取得政治权力，然后利用这一权力来创建一个工人阶级。等待乡村半无产阶级先变成农民（或者更糟糕，变成农户），或者等待农业中有机的资本积累最终导致工业化

进程，这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显得太过缓慢，也太过冒险。国家试图从农业中抽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并将其再分配到工业投资上，在国家的操控下大量乡村人口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拿工资的工人。农业集体化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集体农庄（kholhoz）成为确保从农业中抽取的剩余最大化的组织，这使得大量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同时至少确保了食品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安全性。这导致了农业人口前所未有的消减，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因此能够按照一个比市场经济更快的速度，将劳动力从农业配置到工业。在所有实行农业集体化的东欧国家，其农业人口的比例都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下降得更快。与同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不仅变迁的速度更快，而且它还能够更少的农业人口的条件下运作。这一事实可以在官方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推演出来；尽管农业人口的大略数字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比实际人口所占的比例要更高。如果我们希望计算农业人口的真正显著性的话，就应该将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纳入考虑之中，因为女性和退休人口在当代东欧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根据一项对匈牙利乡村人口的抽样调查，我估算的结论是，年龄处于退休年龄之下且在农业中从事体力劳动的男性或许要低于10%，这对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较低的数字。

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的区域管理条件下，城市人口的增长滞后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东欧变得低度城市化。居住在乡村却在城市工业中工作的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在更早的一篇关于匈牙利城市化的论文中，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并没有伴随着一个相似的城市化程度的增长，因此匈牙利（我们怀疑在很多其他东欧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变得低度城市化。^① 过去20年来城市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职业结构的数据表明，城市中工业工作的增长要远远快于城市人口的增长。我发现，在过去一百年中，城市人口增长率（以十年为基数）几乎保持不变（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几年除外，当时城市人口先减少随后又增加），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之后、工业发展显著提速时，这一增长率并没有发生改变。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的速度不断加快，但是城市并没有容纳这些在农业集体化之后决定接受工业工作的人。结果是，往返上下班的人的数量和比重，尤其是那些从所在村庄住处到城

^① George Konrád & Iván Szelényi, "Social Conflicts of Under-urbanisation," 157 - 174.

市工厂上班的人开始且一直持续增加：在匈牙利，往返上下班的人从1960年的60万增加到1970年的100万。因此，低度城市化这一术语，能够被用于描述快速的粗放工业化时期城市人口增长的相对滞后。

在更近期的一份审慎的统计分析中，穆西尔和林克证明，低度城市化在东欧是一个普遍现象，而根本不是匈牙利发展中的特殊问题。^①他们比较了很多东欧和西欧国家的工业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和农业人口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指标，发现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城市人口普遍低于预期水平，特别是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一问题。在苏联和保加利亚，低度城市化的假设则都被证伪，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之前城市化的水平就非常低。要理解国家之间的差异（在苏联即便是国内的差异也很重要）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依据我们手头的证据，似乎做出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即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初期的粗放型工业化阶段，我们都能够发现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模式，并且与处于可比较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是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的两难困境与矛盾。不过，当代东欧的城市增长问题与第三世界中同样为了工业化而奋斗的非社会主义社会的城市增长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低度城市化只是回应经济发展某个特定阶段增长的挑战的一种选择；而这一模式的选择，则反映了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中各种特定的结构性矛盾。

为了说清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超越对低度城市化的纯粹人口描述，因为它不仅折射了“城市人口”与“工业劳动力”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选择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粗放型工业化时期，最显著的结构变迁就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从就业不充分的农业人口中脱胎而出；这一新的工人阶级基本上仍然是农村居民阶级。例如，在匈牙利，根据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有将近一半的产业工人居住在以前的乡村农业社区，大多数人往返于城市工厂与住处之间。城市扩张主要吸纳的是白领尤其是专业人士；那些移居到城市的人实现了其阶级地位的改变——乡村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专业人士或至少可以上升到“工人阶级中的高级阶层”，他们可以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是从事生

^① Jiri Musil and Jiri Lin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vailable in Hungarian), *Szociologia* (1973, No. 1).

产的计划、管理和控制等工作。我们可以在剩余的直接生产者与剩余的处理和再分配者之间做一个有效的区分，那些搬进城来的人显然属于后者。因此，在过去几十年中，与乡村相比，东欧的城市变得更加“白领化”，城市人口变得比乡村更加“中产阶级化”，而乡村人口则开始丢掉其农民属性，变成“无产阶级”。现在，城乡之分更少地体现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区别，而更多地是一种社会阶级的差异；人们在城乡连续谱上的位置与其资质水平高度相关。非技术工人居住在乡村的比例要远远高于高技术工人，工人阶级中的最低阶层往往居住在最小和最偏僻的村庄里。

在低度城市化的东欧，往返上下班是一个本质上与西方世界“郊区化”不同的现象，后者都是白领人口从郊区住所到城里的单位上班。在东欧也有专业人士和白领这样的通勤者，但是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官员、医生、农业工程师和教师，他们住在城里，上班的办公室则在乡下。这些人要么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要么希望得到更高的收入或更快的提升，才愿意暂时在乡下的办公场所或外省上班，他们同时也不愿意放弃城市生活的“好处”。这些好处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因为城市生活不仅提供条件更好的图书馆、剧院、研究设施，而且还有国家补助的住房与公共基础设施。而大多数往返工人则难以在城里找到住处，因为与他们的老板相比，他们在城里获得一套国营公寓的机会更少。工程师、经理甚至办事员和工头能更加容易地证明他们是如何“不可或缺”；他们还更接近于“决策中心”——这里关系到国营公寓分配的决策。正如关于东欧住房分配的研究所揭示的，工人阶级在国家建造和拥有的住房（几乎全都集中在城里）分配中处于劣势。^①因此，那些离开农业、在工厂里找到工作的人，通常不得不留在他们的原居住地。他们住在村庄中的老房子里，自从出生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或者如果他们存了足够的钱会在原来的村庄自己盖房子。他们几乎很少能在城里盖房子，因为城里地价太高且城市管理禁止或严格限制被排斥于“国家住房”之外的工人建造私房。即便我们把通勤，或者更一般地说，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之间的分离当作“城市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不同的区域管理体系下其阶级后果仍然可能有所不同。在西方，中产阶级在郊区和城市间往返上下班是一种机制——它建立在“区域拨款经济”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途径，富人避免了维持和更新城市中心

^① 参见拙著 *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的财务负担；而在东欧，工人阶级的往返上下班则确保了大部分“新工人阶级”在国家补贴的城市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权利被剥夺，从而保证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更加偏向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居民。

新的阶级内容或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贫民窟“功能替代物”的东欧村庄的衰落。城市居民成了处于较高社会等级中享有特权的集团。他们能够获得更大份额的、通过再分配区域管理体系投向基础设施发展的剩余。城市居民确保自己在区域体系中占据特权地位，这也强化了其从社会结构中获得的其他特权。不过，一个完全发展的再分配区域管理体系并不能被描述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身份对立”，而更像一个基于社区的等级次序的身份等级体系。正如先前的叙述所显示的，在再分配的平均主义之下，不仅城市要比乡村社区“更加平等”，而且某些村庄也比其他村庄要“更加平等”。在对匈牙利乡村社区的研究中，我发现，社区在再分配等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对于发生在社区中的社会过程有着显著的影响。中央计划制定者对社区的排序是根据直接的社会学标准（例如，社区的大小、地理位置是否处于核心地带等），但这却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社会学后果。这在处于最低等级的社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就是这些社区，因为规模太小或地理位置偏僻而被规划者当作基础设施投资的“非最佳”地点，因此被剥夺了发展财政拨款。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社区不仅被剥夺了中央的拨款，甚至立法规定也禁止私人利用个人储蓄进行投资，地方政府也可能不会发放房屋建设或更新的许可证；如果出现了非法建设就会被罚款；政府甚至会将非法盖起来的新房屋推倒。此类社区的数量也很惊人；在匈牙利，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庄属于这类情况，容纳了大约五分之一的乡村人口。

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人口研究已经揭示，人口流动除了发生在城市—乡村之间外，大量的人口流动还发生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某些村庄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小社区的人口急剧下降，而更加靠近中心位置的村庄，其人口则一直在增加。另一方面，在再分配等级制下属于“最低身份群体”的村庄，在其人口快速向外流动的同时，还伴随着向同一个社区显著的人口流入现象。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人口流动比例最高的村庄，其人口规模的减小幅度也最大。这一人口变迁是一个社会选择的过程；流入衰落村庄的人口，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较少有专长，与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其收入也较低。因此，那些最小的、最没有地位的社区不仅人口在减少，同时它们也在变得更加贫穷，成

为“村庄贫民窟”，其自然结构也在退化——因为再分配机制停止分配其发展甚至帮助其生存的费用——这导致了其居民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这些衰落的村庄显然更加具有“农业”特点，但是它们也拥有数量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人口。这些村庄中的居民，其组成不仅包括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意离开家园（他们出生在这里，甚至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老、弱、贫穷的农民，还包括年轻人（大部分没有技术专长），他们有的在农业中工作，有的在城市工业中工作。这些人的家里往往人丁众多（衰落社区的家庭规模令人吃惊地大），他们没有钱在更具发展活力的社区的住房市场上买房子，于是待在这些经济衰落的村庄，或者从位置更核心的地方搬过来，希望在这里找到一处便宜的住所。这些贫民窟村具有双重功能：既是老弱农民的最后庇护所，同时也是工业城市中贫民窟的功能替代物（后者由粗放工业化所引发的、巨大的“逃离土地”潮造成）。当代东欧的衰落村庄与城市贫民窟之间的相似性，表现在其对边缘族群的吸引上。匈牙利的某些衰落社区近来被吉卜赛人所占据——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们大部分属于工业“流氓无产阶级”——传统上，他们不建立自己的社区，但居住在依附于村庄或城市的贫民区中。然而，正如一些对大型工业城镇的生态过程的分析所描述的那样，如今，他们占据了整个村庄并遵循着“侵入—隔离”的生态学法则。

这些村庄贫民窟的出现，是一种围绕着不平等的剩余分配而产生的“衰退综合征”的表现，显然是再分配管理体系下区域规划的一个未曾意料到的但也可能是必然的结果。规划者想要在空间上进行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最佳”依据的是区域规划科学的原则），而要确保这一点的实现他们必须引入机构变革，尤其是地方政府层面的机构变革。有人曾经指出，从征税者到地方开发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伴随着旨在“将行政管理理性化”的各种改革，这将导致地方政府的集中化和那些被规划者认为没有发展潜力的社区地方政府的撤销。这一重组试图将某些社区的地方政府集中起来，在这些社区，为了资本投资的财政手段也是集中的——这毫无疑问是新管理体系高效运作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很多其他机构很快遵循地方政府定下的这一模式。由于接近地方行政中心（中央政府控制它们的主要机构），农业合作社在这一过程中拥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为了与地方政府处于讨价还价的位置上，各个合作社更愿意以同样的规模组织起来，实现同等水平的集中，并将其总部设在同样的地方。事实上，其他机构（甚至个人）在科

层上都依赖地方政府——例如，工业合作社、大商店、学校、“文化室”甚至是医生——都具有同样的潜在利益，都试图更加接近决策中心。

在区域体系的最低层次，那些最近成为卫星城的村庄不仅停止了增长和发展，而且开始丧失一些以前曾经拥有的功能和机构。尤为显著的是，从事专业工作的居民开始离开这些地方——他们本可以代表这些卫星城的利益；医生、教师、地方政府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从卫星村庄搬到中心社区，这里离他们的工作地点更近，也更接近那些决定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的人。区域规划的某些非预期后果，还通过产权市场的运作被传递出来。产权市场在区域上是高度分化的，且对区域发展拨款的再分配所产生的不平等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在增长的中心区域，房屋和土地价格处于飙升状态，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在某些时期甚至翻了两三倍。而在衰落的村庄，房屋市场则一蹶不振；即使房屋能卖出去，其现在的房屋价格甚至都难以分摊十年前建造它们时的成本。那些将积蓄投在“正确地方”的房产投资者，实际上获得了与再分配到这一区域的剩余的数量高度相关的利润。而那些在根据规划者的设计注定要凋敝的社区买房或建房的人，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数量很小的资产一天天地缩水。换言之，通过区域体系而进行的剩余再分配，不仅是不平等地分配了国民收入，还导致了其他财富的再分配，这对那些更加富有的人的利益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此外，产权市场的活力，或许是导致迁入迁出的选择性特征的原因。衰落的卫星村庄可能会因为其低廉的住房和土地而吸引低收入人口；这些群体因为无法承受别处的价格而在这里买房或建房，即便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会让他们的投资缩水。另一方面，在那些外流的移民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有经济能力来“更加有效地”处理其投资，至少其中一些人搬到增长中心是为了将其产权从一个萧条的市场转到一个活跃的市场。这样，比较富裕的工作人口将以当地知识分子为榜样，其流出会更进一步地导致边缘社区社会结构的扭曲。因此，因区域体系而引发的各种变迁——至少部分是规划干预和区域再分配的结果——与社会结构的转换是一致的。

新工人阶级的反攻——东欧农民工用“静悄悄的革命”反抗其所遭受的社会主义再分配区域管理的剥削。在分析当代东欧的区域发展时，我们往往需要牢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居住在乡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而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新工人阶级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居住在乡村，而且还在乡村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

能；而如果他们没有在乡村世界出现，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将面临崩溃。居住在乡村的产业工人中的绝大部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农业生产；很多人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位成员，如妻子或女儿、岳父或岳母是农业合作社的成员，他们因此分到了一块“家庭自留地”，一块大约半公顷的小田地，或者一个同样面积大小的花园。大部分乡村居民都有些田地供家庭耕作，尽管其面积不大，但产出却足够家庭的食物消费，甚至还有节余在市场上出售。社会主义农场与这种高密度耕作的家庭小自留地互利共生：大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来自这些“家庭企业”，后者为大部分乡村人口提供了食物，尽管其耕地只占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一。大地产与小地产的共生、农业中官僚组织与家庭劳动组织的分工，是东欧的一种历史悠久的现象：正如我们早先所看到的那样，容克地产之所以能够转向商品生产，是因为其劳动力的生计通过家庭自留地得到了保证，所以农业劳动者可以仅拿极低的工资干活。从这个角度看，集体农庄体系是东欧农业结构的一个有机的延续。

社会主义集体化对东欧农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的土地早在16和17世纪就已经被拿走了，他们早就习惯了官僚化劳动组织的纪律，也已经适应了这种低工资的报酬体系，作为补偿，他们获得耕种一块地主给予的家庭自留地以获取食物的权利。这或许是除极端的警察镇压之外，他们对集体化的反抗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原因；他们知道自己能够期待的东西是什么，也知道如何操纵这一体系以维持生计。朱哈慈（P. Juhasz）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匈牙利农业合作社的研究表明，^①在劳动、家庭自留地的分配、家庭企业的生产协调等方面，其组织环境与组织程序具有惊人的连续性。至少在匈牙利，劳动组织的等级制早就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合作社从半封建农业庄园接收。只是等级制各个位置的名字改了一下，但是工人可能并不在乎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是不是叫做“组”（brigade），因为他还是干着和从前一样的活，以同样的方式跟自己的工友打交道，像以前那样从老板那里获得命令。更加显著的是，继续在家庭生计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的自留地生产，其调节方式几乎仍然是传统的方式。家庭自留地的大小，在数个世纪里表现出显著的稳定性。17或18世纪匈牙利的大农场不允许有超过半亩以上的田地用于家庭耕作，其原因与现在的合作社一模一样；国营农场则几乎完全不允许家庭耕作。由于需要农民将力气投入农

^① 不幸的是，他的大部分成果从未被允许出版，仅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通。

场，因此不能让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上。某些其他规矩也至少延续了一个世纪：农民过去和现在都不允许拥有马匹，这种古代的象征主义的规矩——只有地主才有资格骑马——其实有着明确的经济动机，因为一旦允许使用马匹的话，即便是自留地都会被用于商品生产。

尽管有着以上的各种连续性，社会主义集体化至少仍然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从大农场的田间耕作中解放出来，使其可以进入粗放型的工业化进程。东欧农业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社会主义大农场所需要的劳动力更少了，它却继续同以前一样依赖于家庭企业的农业生产。新兴工人阶级从此不再仅仅是乡村居民——因为低度城市化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而且还是兼职的农业“迷你企业家”或“农民工”（peasant workers）。新工人阶级的成员可能住在乡村，但却在城里工作；他（她）在工业部门上班，却又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她）按照固定的、与其所生产的剩余无关的价格将劳动出卖给官僚化组织，同时又将家庭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其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当代东欧工人阶级的实际权力建立在新工人的过渡性质的基础之上；由于不是完全依赖于再分配经济机构，工人们确乎拥有一定的对抗能力。保持这种过渡地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就自己的劳动讨价还价；他们还能够影响剩余和再分配权力的配置，因为他们能够保留其出卖劳动的权利。由于他们拥有独立于官僚的国有部门之外的收入，因此即便是被迫出卖其劳动，他们仍然可以在官僚化组织中不那么投入地工作，这样就能保证较少的剩余被剥夺。“农民工”来自家庭自留地的产出（根据最近的估算，农村中大约一半的家庭收入源于此）的收入，只是官方所规定的固定工资之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而城市无产阶级“自发阶级斗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寻找其他收入来源的能力，例如，在生产中怠工或限制产出，尽管这可能导致工资暂时停发或减少。无论如何，只有当他们拥有额外的收入来源时，他们才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一方法。^①当然，工人反抗再分配权力的斗争显然只停留在初级水平上，它并非“有意识的阶级斗争”，而且会被官方意识形态斥为小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中央权力

^① Lajos Hethy and Csabo Mako, *Differential Incentives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est and Powers* (Institute of Sociology,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70). 关于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和内容的很好的记录，参见 Miklos Haraszti, *A Worker and the Worker's State* (Penguin Books, 1978)。

甚至可以分裂工人，让城市无产阶级与新工人相互斗争，因为前者可能眼红后者丰富的农业自留地的额外收入来源，而这些在城市中是少有的。尽管存在这些内部矛盾，但是很显然，至少在以下方面，直接生产者是具有共同利益的：譬如，确保工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而免受科层式工作单位的制约；确保工人与管理方的谈判权，就被剥夺的剩余的数量及其分配（这是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进行讨价还价。从这样一个总体的观点来看，乡村新工人与体制内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结成了一个战略同盟，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短期的利益冲突。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当代低度城市化的区域体系中的社会矛盾，不仅是再分配管理的拨款分配不平等的结果，也反映了直接生产者与再分配体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本性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分配给特定社区或区域的资金不足，也不是因为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资金过多或过少。根本的矛盾来自剩余被抽取以及其后对其进行重新配置的方式和原则。在我们关于低度城市化的社会矛盾的论文在匈牙利发表之后，我们被邀请参加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一个座谈会。大部分规划者都对我们论文中的观点感到恼火，认为这些观点是“破坏性的”。他们持以下论调：

是的，我们确实在规划城市和区域发展方面犯了错误。在政府能追加更多的资金之前，我们并没有能够持足够强硬的立场，这当然延缓了基础设施的增长，也导致了你们所提到的那些矛盾。但是，现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已经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我们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来指导对这些资金的合理配置。我们一年要分配的钱有数百万之多——你们说说，我们应该把多少给城市，多少给乡村？我们有 3300 个社区，如果我们把资金平均地分配给它们就分散了我们的资源，计量经济学会证明，我们这样的投资是没有效率的。所以，请你告诉我们，资金分配应该侧重于哪些社区？如果我们在界定增长中心时犯了错，请指出来，帮助我们发现那些真正有发展潜力的乡村。你们还可以让我们的规划过程更加人性化，纠正我们过分“经济主义”的倾向；你们可以将生活质量、抱负等“人文维度”纳入选择发展地区时的考虑。

这一想法的确是理性的，东欧区域体系的矛盾，的确可以通过这种逻辑方

式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这一逻辑反映的是再分配的理性主义以及再分配机构的利益。从新兴的工人阶级的角度来考察区域发展的过程，或许我们可以重构这些问题。将当前的区域管理转变成一个再分配角色重要性降低的体系是符合工人阶级的既得利益的。发展出一个具有财政自主性的地方政府结构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这样一种结构中，每一个地方政府辖区都能够不依赖于规划者的良好意愿，而至少自动地获取一定的基础设施开发资金份额；这一份额应该与该地方政府辖区居民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相称的。

闻翔 译 刘建洲 校

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

——当代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政策的悖论*

伊万·塞勒尼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论点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不平等基本上是由再分配机制所制造和形塑的。东欧的情况似乎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后者而言，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基本上是出现在市场条件下，且有可能被国家再分配干预所重塑或缓解。

在东欧，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再分配领域的扩张，使得本来就已经有权有势的人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尤为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的利益，则可以随着经济体制中交易性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拟市场（market-like）关系〕的增加而得到最有效的补偿。

我之所以决心提出这个论点，是因为我相信，对于东欧国家试图用自我调节机制来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的经济过程，尤其是其经济改革的社会意义，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欧社会科学界，都存在着普遍的和影响深远的种种误解。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批评的西方左翼人士往往相信，东欧的社会—经济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是残存的或重新出现的市场力量的结果，提高自我调节的经济机制作用的经济改革是在试图复辟“资本主义”，且会增加社会不平等。在这一点上，反威权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西方左派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与东欧的保守派

* 这篇文章原文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1978)。

官僚其实处于同一战线；后者同样反对具有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责他们是在“出卖社会主义最为宝贵的成就”（即能够平等地获取基本商品和服务）。甚至是那些为经济改革辩护的人也常常支持这样的社会学假设：再分配机制虽然有悖于社会公正，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有必要容忍再分配机制所具有的缺陷；换言之，不断增加的不平等乃是我们迈向一个更加充裕的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有这些命题都假设：在社会主义环境下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和再分配机制的社会意涵是相似的或一致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发现的社会经济法则，同样能够被应用到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去。对于这种观点，我从经验和理论的角度提出了挑战。因为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表明，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稀缺商品和服务进行行政配置，其所惠及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而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对特定商品价格的市场监管，在我所知道的所有案例中，都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将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社会经济法则移植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是不可接受的。要想理解某一社会主义社会中再分配机制的真实性质，我们就必须开始对这些社会中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实质性分析，去理解再分配在社会再生产过程，尤其是在生产、剩余的抽取及配置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社会主义再分配机制中出现的平等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面对来自再分配机制的不平等问题，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调查匈牙利的住房经济，尤其是住房的分配之时。

其时我所研究的住房经济，很显然是一种混合经济，它由再分配和市场两大部门组成。在再分配部门，国家是所有者；从原则上讲，租金与公寓或住宅的价值无关，且其分配是行政性的。住房经济包含一个市场部门（market sector）^①——在这个部门，私人所拥有的家庭住房和公寓，其价格虽然由市场调节，但所有权受到法律的限制，一户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宅或公寓；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私有的租赁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

^① 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市场部门”这一术语的，因为从私有住房中获取利润的做法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从20世纪50年代起，政府开始试图转变住房经济的性质。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政府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住房不是一种商品，它不应该在市场上分配；家庭收入也不应该影响这些家庭所获取的住房的户型、标准和面积。为了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目标，所有可能被用来牟利的住房——尤其是各家所拥有的第二套公寓或住房，甚至6个房间以上的大型公寓房或住房——都被国有化了，而租金也被固定在最低收入家庭能够承担得起最好住房条件的水平上。20世纪50年代早期，至少在城市里，所有新住房实际上都是由国家建设、所有和予以行政性分配的。其结果是，在2~3年的时间里，国有住房成为城市住房经济的主要特征（农村的住房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我只能暂时不讨论这一问题）。

这些变化对劳动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早期，急剧的通货膨胀使得东欧各国政府能够对工资政策做出结构性的改变；由于工资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率，使得国家能够从工资和薪金中抽取住房费用，并在国家预算中对其进行积累。用于建设新住房和维修老住房的剩余并没有进入个人的腰包，而是首先被集中到“中央”那里，根据中央的意图进行再分配；于是，住房经济成为一种再分配经济。从原则上说，所有的住房都已经被国有化了，同时租金也一并被废除（就像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尝试过的那样）。

这种住房和劳动经济相配套的转变，是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主要特征。在一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比如在英国，尤其是苏格兰）中，虽然国家所有的住房或廉价公房同样增长迅速（也许与东欧的比例接近），但是用于住房建设的剩余并没有被集中到“中央”的手中。即便在廉价公房体系（council housing system）最为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住房的花销基本上还是依靠个人收入的积累，廉租房是国家为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无力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足够收入来承担住房成本的人而采取的一种对市场状况的干预。国家通过向在劳动力市场上诞生的更高收入的群体征税，亦即通过对实际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来承担这笔费用。我倾向于同意那些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国家进行这一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面对劳动力的增加，由垄断利益控制的劳动力市场无法保证住房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结果是，与劳动经济相对应的住房经济基本上仍然保持了市场经济的特性；只是在市场无法保证住房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时候，才会使用再分配

机制。更加富有的人仍然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房屋租售；对私营企业来说，建设和租赁房屋仍然是一项赚钱的业务。国家的干预帮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回应了它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这种回应所采取的是市场的方式，服务于垄断资本和富人的利益（通过为商业活动维系低价格的劳动力，通过通货膨胀为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所有者提供资本收益，而将被迫求助于廉租房的低收入家庭排除在外）。

基于上述分析，我确信，东欧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发生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变化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东欧将住房经济由一种市场经济转变为再分配经济；通过住房体系，国家不仅像资本主义福利社会那样对市场上产生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而且也对剩余进行再分配。从 50 年代中期起，东欧各国政府不得不去解决再分配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各种问题；因此，住房政策后来的变化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妥协；其目的，是挽救社会主义社会住房体系的再分配性质。

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计划制定者们清楚地意识到，新住房的建设水平不足；从长远来看，住房建设的低下状况并不能满足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住房存量的简单再生产。在未曾追问理论缘由的情况下，实用主义的计划制定者们意识到，至少国家在财政上已无法承受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住房的责任，因此他们提议，应当允许那些有财力的人自己建房。在大多数东欧国家，那些希望保存住房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允许私人建房的“教条主义者”都被打败了；实用的计划制定者允许人们这样做，他们后来还允许通过抵押甚至小额补助的方式，鼓励各家各户自建房屋。另一方面，这些举措只是一种妥协，目的是增加住房建设，住房经济基本的再分配性质并未改变（我们必须将南斯拉夫从上述分析中排除出去，因为该国的情况很特殊，值得特别关注）。首先，国家在住房建设中仍然发挥了主导作用，大多数新住房以及绝大多数新建城市住房都是由国家建设的。国家并没有将住房建设视作商业活动，而激进改革派要求建立一个国有租赁市场的呼吁也一直未被政府采纳：国家郑重其事地宣称，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从住房建设中营利。结果是，租金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上，远低于房屋本身的价值；而住房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依然依靠行政方式进行分配。其次，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私有或市场部门也受到控制，每家只允许拥有一套住房而且不允许出租牟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自建住房的面积也受到了法律条文的限制）。中央计划部门只允许市场力量在

那些再分配机制似乎运转不灵的地方发挥作用。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使用收入的再分配来保卫市场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允许市场运转以便拯救基本的再分配制度。

因此，如果我们在住房经济的主要制度中发现了不平等的根源，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奇。事实上，我在关于匈牙利住房分配的调查中发现，地位更高的群体或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成功人士获得了城市住房体系的再分配部门的绝大多数好处；与此相对应的是，收入与住房所有权、家庭户主的资质与住房所有权之间则呈现负相关——我的这些发现，在其他针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在过去30年里，匈牙利的成功人士（专业人士、白领和高级工人）享用着国家建设和所有的住房，而工人阶级，尤其是半熟练工人和无技术的工人，则不得不自己建房。^① 如果我们将农村住房体系也考虑进来的话，这一趋势将表现得尤其显著。在匈牙利，大约一半的工人阶级——其他东欧国家的比例也大抵如此，尤其是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来没有机会搬进城市，他们无法在城里买房，也没有机会获得廉租房，只能住在乡下靠继承或自建而获得的私房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可以住在廉租房里，而富人可以在市场上买房或租房（垄断了住房所有权所带来的各种好处）；而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专业人士和“中间阶级”（小职员和“工人贵族”）则享受着租赁受到国家大幅度补贴的住房的特权，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在市场上购房或租房。结果是，通过住房经济中的再分配部门，国家对剩余进行了重新分配，使得收入更高的群体从中受益，国家迫使低收入群体用工资或奖金来承担住房的成本，而从原则上说，其住房成本是非累积性的；国家还将所有集中上来的剩余用于补贴成功人士的住房。结果是，在匈牙利，以及也许在东欧各国，住房分配之后的不平等要比分配之前高得多。如果我们想测量这些不平等的实际程度，我们就必须考察那些被系统性地分配给成功人士的优质住房所包含的补贴到底有多少。事实上，这一补贴是非常可观的：一处国有新建公寓每月租金的补贴数额，与工业部门职工平均月收入的水平非常接近（如果尚未完全等同的话）。

结果是，住房经济中的再分配制度在制造着各种不平等，并形塑着不平等的结构。（当然，有人也许认为——包括那些少数能够直面国家社会主义住房

^① 参见本文附录一。

政策事实上确乎具有这种效应的铁的事实经济学家——住房只是对劳动经济中缺失的不平等做出了补偿，因为工资的差距不够，因此差距必须在住房和其他商品、服务的分配中表现出来。然而，这种解释实际上是接受了一种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功能主义的解读的假设，即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具有其“功能”或必要性。这种解读在市场经济中已经很成问题了，而在社会主义的非市场经济中，则更是意义不大，因为对后者来说，劳动力是由中央计划和非物质性的激励因素进行配置的，尤其围绕着不同的资质水平进行。）此外，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说，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是，那些旨在满足从市场上获得房屋的人的需求的改革，大体上来说，确实有利于工人阶级。如果降低贷款利率、如果放宽针对私有住房建设的行政限制、如果对用于私人建房的建材进行补贴，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住房中的不平等会下降；而行政控制的加强以及越来越僵化的再分配，则会增加上述的不平等。

不过，住房不平等只是再分配中所涌现出的不平等的的一个方面，尽管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亚诺什·劳达尼（János Ladányi）对匈牙利消费品价格的国家管制效应进行了调查（Ladányi, 1975b）。一部分消费品的价格（譬如蔬菜或水果）由市场决定，其价格反映了生产的成本；然而，最为重要的消费品的价格则受到行政力量的调控，这些商品的定价包含了补贴或税收因素，“偏离”了它们的真实价值。

对消费品价格的管制，亦即让价格偏离价值或生产成本，被认为是出于社会考虑，或者至少在意识形态上被这些社会考虑正当化。正如匈牙利最主要的价格政策机构所宣称的那样：“作为一种通则，这些产品保持着低价（受到国家的补贴），这在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Csikos-Nagy, 1971: 130）因此，对消费品价格的管制被人们认为是将价值从高收入群体重新分配给低收入群体的一种手段。在一份非常严谨的研究中，亚诺什·劳达尼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测试，测量了通过消费品价格管制而实施的再分配的社会效果。通过家庭开支的官方统计数据，他确认了不同社会地位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补贴最多的消费品在高地位群体的消费结构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测量了开支单位的真实价值，其定义如下：

$$\frac{\sum \text{开支} + \sum \text{价格偏离} (+ \text{补助或} - \text{税费})}{\sum \text{开支}}$$

(因此,如果这一指数高于1.0,则显示被测量对象从再分配中获益;如果低于1.0,则表示被测量对象在再分配中受损)。劳达尼发现,对白领工人来说,这一指数为1.049;对蓝领工人来说,这一指数则为1.043;对农业工人来说,这一指数为0.989。事实上,开支单位的真实价值低估了再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因为高收入群体的绝对开支要比这个高出很多。^①在将开支的绝对值考虑进来之后,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要多享受50%的补贴;事实上,这一逻辑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阶层:不仅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更有特权,而且技术工人也比非技术工人的待遇更好,而农业劳动者则处于最底层,由于价格偏离价值,他们实际上处于倒贴状态中(农业劳动者所消费的是高税收和低补贴的产品)。不过,根据劳达尼的调查研究,这些收益和损失并未对生活水平造成太大的影响,最有特权的群体(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一年的总收益,只比普通工人在两个星期内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一点点而已;而一年损失的最大值,不过相当于普通工人2~3天的平均收入。然而,另一方面,仍然值得关注的是,消费品价格偏离生产成本,确实是在增加不平等。与只考虑收入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相比,将价格偏离考虑进去之后,测量到的不平等程度将会更大——尽管只有大约5%的样子。

因此,消费品分配领域再分配机制的运作方式与住房分配领域再分配机制的运作方式是相似的。两者都制造了不平等。如果消费品价格与生产成本相符,国家不以再分配手段干预价格结构,那么白领工人与那些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者(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将会缩小。

下面我将引用第三份研究成果^②,作为我现在所试图论证的观点的最后一份经验证据。1967年,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对全国居民收入做了一项调查。除了工资和奖金外,中央统计局第一次试图将现金补贴(比如家庭补贴)和非现金补贴(比如医疗和教育福利)都考虑在内。这些数据并没有覆盖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住房体制中的补贴和偏离生产成本的消费品价格,不过,尽管这两个领域并没有被考虑在内,但就现金补贴尤其是非现金补贴来说,我们之前的发现都得到了印证。

就现金补贴来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发现显著性差异。白领

① 参见附录二。

② 参见附录三。

工人家庭的人均补贴要比产业工人家庭高出 20%，农业劳动者家庭的现金补贴则比白领工人家庭少一半。例外的是那些经济上不能自给的群体，他们获得的现金补贴要比最有特权的职业群体高出将近 4 倍；但是对他们而言，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现金补贴也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比如，那些没有养老金靠吃福利而生活的人）。

收入和现金补贴之间具有相关性的数据似乎与我们之前提供的证据相矛盾。我们从统计局的数据中发现，高收入群体的人均现金补贴要更少一些；人均收入最低的那批人要比最高的那批人多获得大约 60% 的现金补贴。然而，另一方面，考虑到现金补贴的大头是家庭补助，这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一个家庭越穷，未必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现金补贴（我们可以从不同职业分层的津贴分布的数据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是家里的孩子越多，获得的现金补贴就越多。

有关非现金补贴分配的数据（主要包括医疗和教育福利这两大部分），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白领工人要比产业工人多享受将近 50% 的人均非现金补贴，而高级管理者和专业人士的非现金补贴额度则是农业劳动者的两倍多。非现金补贴与收入分配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与人均收入最低的群体相比，人均收入最高的群体获得的非现金补贴要多出 20%。基本上，这些数据显示，社会地位越高的阶层，其使用医疗服务和设施的频率就越高，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程度也越高。事实上，统计局的指标非常粗糙，它们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各社会阶层在使用医疗和教育服务时的质的差异。与蓝领工人相比，高级官员和专业人士不仅在次数上更多地使用国家免费提供的医疗服务，而且他们享受的服务质量也要好得多（他们更容易得到优秀专家的治疗，使用紧俏的医疗设施，比如私人病房等）。教育体制内的情况也是如此。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的子女，不仅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在小学和中学期间更有可能进入国家重点扶持的学校就读（比如，城市而不是农村学校；具有语言、数学或其他技能特长的学校，而不是执行普通教学大纲的学校）。东欧的医学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尚未对这些隐性的不平等做出清晰的论证，而在我刚才使用的中央统计局的一般性统计数据中，这些关于隐性的不平等数据向来都是不可能被考虑在内的。

最后值得指出的重要的一点是，中央统计局所计算的现金和非现金补贴是实质收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干和专业人士家庭每月都从这些渠道

获取福利，他们一个月得到的实惠相当于产业工人两个星期的平均工资（更是农业劳动者一个月总工资的两倍多）。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苏珊·费尔格（Zsuzsa Ferge）强调，现金和非现金补贴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要低于工资和薪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Ferge, 1975: 718）。她计算出一个指数——“不平等测量指数”。她用那些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的平均收入，除以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的平均收入，得到1967年匈牙利这一指数的数值是2.32。接着用同样的方法，她估算了现金和非现金补贴的指数，数值只有1.92。^①

另一方面，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在于，现金和非现金补贴体制并没有导致一种平等化的效应。补贴和收入（或社会地位）之间的任何正相关关系都可以证明再分配增加了不平等。因此，如果这样的正相关关系存在，那么，在将补贴考虑进去之后，不平等的绝对程度就会大很多。

上述三项研究告诉我们，如果试图用工资和奖金分配来测量东欧社会的不平等，那将是误导性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生活水平的不平等要大于工资的不平等，因为在上述分析的情形下，再分配机制都偏向那些具有更高资质和收入已经更高的人。通过房屋租金、现金和非现金的福利、偏离生产成本的消费品价格，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将享受到更多的补贴；而处于社会等级制底层的人则受惠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获得这些补贴。

因此，如果哪一天奇迹发生，国家上调住房租金使其涵盖建设成本、停止从消费品中征税和补贴、废除现金和非现金福利，代之以在工薪族中平等地分配上述支出的总款项，那么，这些举措将产生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些举措将会使直接生产者获益，尤其是农业劳动者和坐车往返于城市和农村工作的“新工人阶级”；而且，或许除了那些最具资历的“工人贵族”外，大多数产业工人都会从中受益。

在东欧，那些最为激进的经济改革家希望将国家补贴与各种附属性的福利一并废除；他们提议，消费品价格和住房租金应该计入成本；他们还希望通过将所有的生活成本累计进工资以及废止再分配干预来大幅减少国家预算。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这些主张是在表达那些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利

^① 就是用高于平均水平的人的平均现金和非现金补贴数，除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的平均现金和非现金补贴数。——译者注

益，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表达工人阶级的利益。

基于上述经验证据，我认为，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不平等体制。这些不平等不能被解释成资本主义的历史“遗留”的产物，或者市场关系残存或再现的结果。相反，它们是本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制度确保国家社会主义即再分配体制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的抽取。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内在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之中的不平等。

二 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实质收入的再分配和 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体制

但是这些现象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吗？实质收入的再分配有没有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产生类似的附带效应？从再分配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性质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别？是否存在一种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替代性选择，能够克服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固有的不平等？无论是当代西方还是东欧社会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般理论，是否并不足以解释上述这些不平等呢？为了对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做出解答，我将试图对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理想类型做出详细的阐述，或者说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可能的政治经济图景予以概述。我的观点是，国家社会主义与现代西方福利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其所建立的基础是一种历史上新出现的经济整合制度，即一种与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中真实收入的再分配有着重要区别的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我力图将波兰尼关于经济整合模式的理论，尤其是其关于再分配的理论，应用到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中去，并作为一种现代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性的再分配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或“后市场”经济区别开来。

但是，在这样一个所有国家都加大对国民收入的控制比例并且通过国家预算对其进行重新配置的时代，这种区分是有意義的吗？如果有人說，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种包含着市场因素和再分配因素的混合经济，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仅仅是细微的且可能正在消失，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更为准确呢？

毋庸置疑的是，不管是在英国或在联邦德国，还是在波兰或匈牙利，从技术角度来说，经济领导人和计划制定者都在做着相同的事情，面临着非常

类似的问题，尤其当他们通过国家预算对各种资源进行配置的时候。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对他们所运作的社会经济体制进行理想类型的建构，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展现整合这些体制的逻辑，那么，国家社会主义与西方福利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更加明显。的确，西方社会也会使用各种再分配机制，但只有在市场运转不灵以及有必要使用再分配机制来捍卫主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亦即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才会使用各种再分配机制；与之相似，只有在再分配机制运转不灵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定者才会引入市场机制，而且这种对市场的妥协只不过是一种捍卫国家再分配权力的妥协。

让我们从最为明显且或许是最为表面的差别——产权关系的差别——开始我们的分析。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社会，私有产权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改变（譬如，缺席产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经理层的作用日益强大，国家控制加强，等等），但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权力合法化的体制；换言之，它们并没有挑战生产资料私有权这一权利。在所有当代西方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本身就足以使其所有者对剩余进行剥夺和处置。国家和工会等机构也许会干预、控制和限制抽取剩余的程度，或者影响剩余使用的方式，但是它们都不会挑战这样一个事实，即私人所有者仅仅基于所有权就能够剥夺剩余的权利。当然，对剩余的剥夺也需要其他各种合法化原则的配合，但是私有财产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私人所有权并非一个确保对剩余的抽取合法化的原则（如果这种对剩余的征收存在的话——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存在——它也是“非法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中，使得对剩余的征收和处置得以合法化的主要原则，是那些再分配者的原则：他们声称自己掌握了相关的“科学”知识，知道如何以一种确保经济有效和社会正义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剩余。因此，除了产权关系的差别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主要的合法化原则：一种是私人所有者的合法化原则，另一种是基于再分配者的“科学的”或“技术的”知识的合法化原则。

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和西方福利资本主义两种体制之间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彼此抽取剩余的合法化原则不同，它们对剩余本身的定义也是不同的。哈里·皮尔逊（Harry Pearson）业已指出，我们无法找到一种能够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制形式的关于剩余的形式上的差别，在市场和再分配经济中，剩余具有不

同的意义 (Pearson, 1957)。事实上,也许有人会说,只有在市场条件下,剩余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学概念,此时剩余体现为生产成本和产品的市场定价之间的差异。只有在非嵌入性的市民社会中,即在经济具有自身的自主性、政治领域与社会活动相分离的条件下,这种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剩余才是可能的。^①另一方面,以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一种嵌入性的社会 (embedded societies);此外,皮尔逊还十分敏锐地指出,在再分配经济中,剩余是由权力来加以界定的。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种特殊的再分配经济类型(即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性再分配)的条件下,剩余基本上是由政治权力来界定的。^②在本文中,我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详细的阐述,但在即将出版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③中。我和捷尔吉·康纳德会试图对市场再分配、理性再分配和传统再分配进行系统的比较。这种从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角度对剩余的界定,意味着不同范畴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层级和不平等程度,其表达首先基于政治的考量。从原则上讲,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或其所生产出来的剩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再分配权力会在政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抽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只有反抗才能限制这种对剩余的榨取。1956年的匈牙利或1970年的波兰已经足够清晰地显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对剩余的抽取是有其绝对限度的:如果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或者如果生活水平长时间停滞不前,那么就可能导致工人的自发反抗;调节工资的水平及其变动的,正是这些政治力量。

从抽象的理论层面来看,这意味着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化的商品,因为在这里并不存在一个运转的劳动力市场。或许正是劳动力的商品性或非商品性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福利经济

① 集体谈判和工联主义等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自主性的限制,而且这些制度是在市民社会和多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框架内运作的。

② 显然,这里有必要对再分配经济的不同类型加以区分。波兰尼、皮尔逊或道尔顿(Dalton)等经济人类学家在论及再分配的时候基本上指的是那些“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社会,他们也从没有对苏联式的再分配予以实质性的分析。苏联式的经济体制不仅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与亚细亚生产模式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我认为,可以从再分配权力如何获得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将苏联式的经济体制与亚细亚生产模式之间的差别概括为“理性的再分配”与“经典的亚细亚社会的传统再分配”之间的差异。

③ 参见 Konrád, George and Iva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Yovanovich. ——译者注

之间有了最为明确的区别。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对劳动力的买卖。^①

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参考波兰尼关于“非市场性交易”的观点。在分析汉穆拉比（Hammurabi）的《巴比伦》（*Babylon*）中的贸易时，波兰尼指出，货币的大规模使用和一种发达的贸易体系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存在。波兰尼认为，在这里，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调节，而是由皇家的权威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人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产品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而是受到国王的限制和保护。在实践中，国王可以将某种商品的卖出价限定在买入价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卖得越多其损失也就越大——在汉穆拉比时期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其出现得却颇为频繁。不管怎样，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一贸易的关键特征在于，参与到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个行动者（买家、卖家和皇家权威）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交易，商人和皇家权威之间关系的性质，是酌定性的（*dispositive*）。综述波兰尼的观点，就是：贸易可以在没有市场存在的情况下进行，而这种没有市场的贸易中，行动者的位置是酌定性的；而在市场贸易中，行动者的位置是交易性的（*transactive*）。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用酌定关系（*dispositive relationship*）来界定再分配，用交易关系来界定市场。

显而易见的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那些出售自己劳动的人与购买劳动的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酌定性的关系。这意味着，从原则上来说，其劳动的价格并非讨价还价的产物，而是由行政力量设定的，它并不能反映劳动所生产的潜在价值或剩余的价值。同样极其重要的是，劳动力的所有者自身并没有权利决定是否出售自己的劳动，在这一点上他们受到法律的规制。我认为，这种体制与所有的资本主义福利经济都有着显著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福利经济条件下，总是存在着（集体或个体性的）讨价还价的因素；此外，劳动力的所有者还拥有不想在市场上出售其劳动的权利，试图出售其劳动的产品而不是劳动，试图等到价格合适的时候才出售其劳动，并依靠积蓄或忍饥挨饿度日；或者，他也可能发现无法出售自己的劳动，因为没有人愿意购买。在资本主义福利经济中，工人虽然拥有不出售其劳动的权利，但是也受

^① 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自我雇佣者的比例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都要低，也就是说，更多的劳动力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

到失业的威胁——而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们来说，这些情况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我必须做出一些澄清。确实，在所有我们所经验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的价格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所生产的价值或剩余；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也反映了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譬如，矿工的工资就要更高一些；又如，那些在赫鲁晓夫的规划下准备去开垦西伯利亚“处女地”的人，也被给予了更高的收入。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这些个案发生的时刻，是在计划向市场妥协的时候，是由于无法以其他方式招募到劳工，他们不得不遵守劳动力的供求规律。历史的悲哀的讽刺之处就在于，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早期，劳工集中营的功能发挥得相当出色，正是它们向这些区域输送了大量廉价的劳工，而如果通过市场进行配置的话则需要相当高的工资。今天，很大程度上由于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过程的作用，计划者向市场做出了更多的妥协，强制性的劳动被取而代之。但这些措施（取消强制性的劳动）显然是妥协性的，它们是与理性再分配及其薪酬体系的惯例相冲突的。在理想的情况下，理性再分配体系中的报酬是根据资质水平进行分配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照工作（work）进行分配；而劳动则根据正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被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或熟练）劳动，这里存在着一种很成问题的和注定无法维持的假设，即熟练劳动要比简单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因此，也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这一原则在工资体系中得到了体现，在这套体系中，随着正式资质水平的提高，工资的级别也相应地得到系统性的提高。一个非熟练工人被认为应该比熟练工人挣得少，专业人士应该比工人挣得多，而矿工或西伯利亚“处女地”上的垦荒者打破了这一法则，他们就犯了一种“原罪”，即便这是一种可宽恕的原罪。聪明的做法是，迅速转移到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的领域，抓住机会猛赚一笔，但这种行为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美德。我相信，这种社会风气已经深深地注入东欧社会的肌体之中。少数资质水平不高但挣钱很多的人被一种负罪感折磨着，他们在顷刻之间成为幸运的贱民（pariahs），同时又很清楚自己异类的本质。此外，一个人即使在内心并未接受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风气，将自己的劳动出售给国家的法定义务也在根本上限制着劳动者出售自己劳动的机会。法律强制要求每个人将自己的劳动出售给官方的劳动组织；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可以提出控诉（尽管更经常发生的

情况是他因不工作而被起诉)。^①人们必须工作,他们通常必须在官方的劳动组织里工作,领取由行政机构所设定的固定工资。如果韦伯是正确的话(我相信他是)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制度在于其劳动力市场制度,那么,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核心制度就在于劳动力的非市场性交易。只有当劳动力市场被取消并代之以劳动力的非市场交易的时候,一种经济才得以成为再分配经济。

有必要先来揭示以下问题,即在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中,剩余是如何被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定义的?同时,还需要指出劳动力的市场交易和非市场交易之间的区别,从而彰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福利社会的实际收入再分配与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再分配经济体制的实际收入再分配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质的差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福利国家试图对实际收入进行再分配,不过,这些收入首先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被确定的。虽然由于国家和工会的干预,这一劳动力市场已非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但它仍然是一种市场:在这种市场中,原则上说行动者可以相互交易,可以就劳动的价格讨价还价,劳动力的所有者依法享有不出售其劳动的权利,劳动者的劳动也有可能面临不能被出卖的处境。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剩余进行再分配,剩余从未积累成个人收入,而是直接由国家预算集中,再根据由中央决定的目标和价值进行重新配置。从技术角度来说,二者的区别取决于国家预算的来源: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高度依赖各种形式的税收,而社会主义国家则直接从各类生产性组织那里获得财政收入。我将再次以住房为例,以说明上述技术性差异所导致的深远影响。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住房成本总额的积累体现为个人收入的总额。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收入的分配是极其不平等的。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成员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其劳动,因为劳动力市场被垄断资本的利益操纵,以便谋求一种将住房成本包含在内的劳动力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再生产过程有可能会因劳动力市场运转的失效而瓦解,除非国家实施干预措施并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譬如,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征税并使用这些税收从财政上对穷人的住房予以补贴,从而让收入由高收入群体流向低收入群体。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住房成本并没有被累计进个人收入的总额中,

^① 个人身份证上注有持有者的工作信息,如果警察在检查身份证的时候发现某个人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没有工作,他们就必须对其采取行动。

它们被直接纳入国家预算；国家将为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穷人提供住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通过对实际收入进行再分配，福利国家强化了其社会经济体制的性质。对实际收入进行再分配时的配置原则（社会公正，或者更明确地说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住房）与调节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形成的原则（竞争、讨价还价和交易）是相互矛盾的。这一配置的新原则并不会推翻旧的市场原则；市场原则仍处于支配性地位（既然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也受到了挑战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受到了限制。^① 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的原则在劳动力的非市场交易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正如其在国家住房体系、国家对消费品价格的调控以及现金或非现金补贴分配等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一样。所有这些领域都是再分配性质的，都建立在同一套报酬体系的基础上。结果是，如果资格更高的人“理应”得到更高的收入，那么他们也“理应”获得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医疗服务以及令其子女接收良好教育的更多的机会。因此，以下状况的发生是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惊讶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不平等的剪刀差肇始于劳动力市场且在收入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国家对实际收入的再分配则使得这种不平等稍有缩小；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收入的不平等被国家的各种再分配手段进一步放大——所有的不平等（如收入、住房等），都同等地被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的逻辑决定。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上述两种不同体制中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及其产生机制进行了探讨。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则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些不平等具有其内在的特征，而且正是那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确乎有助于社会平等的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制造着各种不平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以下的说法，即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下的不平等程度要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不平等程度高。对两种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的社会不平等的总体水平进行比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尚未看到任何可信的研究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让我来设计一项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和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比较的研究的话，我的研究假设将是：从获取物质商品的渠道而言，当代东欧社会的社会不平等的总体水平仍然要比西欧、北美或澳大利亚低。

我们当然可以说，“再分配者”是“自私”的，在对各种稀缺资源进行配

^① 从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角度来看，人们也许会说，“统治阶级对利润的渴求受到了限制，这有助于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生存”。

置的时候，他们追逐的是“自身的利益”（或者用更有社会学味道的术语来说，即围绕对再分配的垄断权而组织起来的阶级的利益）。高级官员、他们的“执行者”以及意识形态卫士们，要比工人阶级更容易获得国家新建的住房；尽管从“自然条件”来看，这种特权是相当有限的。作为再分配权力等级体制中大权在握的人物，中央委员会或中央计划办公室的部门领导每天所做的决策，其数额涉及数千万福林、兹罗提或列弗，^①但他们能从一处拥挤和难看的新楼盘中分到一处55平方米的两居室公寓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你确实可以看到少数工人在旅游旺季时住在由工会或党补贴的度假屋里，但是这些“工头”中的大多数得共用卫生间；他们吃的食物也很差，而且有可能连在每顿晚饭前喝两盎司苏格兰威士忌的费用都负担不起。我倾向于认为，即便我们可以说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新统治阶级，他们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穷困的特权阶级。

不过，我所讨论的主要论点并非针对不平等的程度，而是这种不平等的性质和结构。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我在上文中所描述的不平等的类型，乃是根植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独有的生产关系之中的。它们所体现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性冲突，即“直接生产者”和“再分配者”之间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获取稀缺性物质商品方面所存在的各种不平等不过是一些附带现象。如果说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话，那么，该阶级的主要目标是将再分配权力最大化，而更好地获取物质资源则不过是该阶级的成员所获得的一种“附带的好处”罢了。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所有者的消费水平并不一定很高（不要忘记那些认真遵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教导的清教徒）。使得资本的所有者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处于敌对状态的，并非他们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异，而是前者在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既得利益，即其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中的利益。与此类似，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直接生产者和那些掌握再分配权力的人之间对立的真正根源，在于“再分配者”试图从那些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人身上剥夺尽可能多的剩余，尽可能地增加再分配所能够使用的剩余总量，或者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将再分配的权力最大化。中央计划办公室的部门领导如果搞到一套免费的国有公寓，就会给自己的实际收入增加50万福林的补贴（相当于一名普

^① 福林、兹罗提和列弗分别是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通产业工人20年的收入),这些所满足的不过是其个人利益;而他的阶级利益,则在于来年为其所在的部门增加十几亿福林的预算,或者更概括地说,通过国家预算的重新分配,增加其部门预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再分配机制是那些已经大权在握的人用来扩大其权力的工具,再分配机制并不挑战不平等的固有逻辑,它们本身就建立在将这些不平等正当化的价值的基础之上;因此,人们怎能指望再分配机制能够产生平等化效应呢?用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术语来讲,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再分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历史性的“替代”,因为它是一种与福利社会中实际收入的再分配有着本质性区别的现象;而福利社会中实际收入的再分配毕竟是一种补偿性的机制,它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所设定的限度内,或多或少成功地缓和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平等。

三 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制定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

上述存在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补偿性机制,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毕竟,资本主义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发展出这套能够相对有力地表达工人阶级补偿性利益的冲突的体系。房主们获得权力的时间越短,他们就越强调各种共识的意识形态。在别人挑战其权力之前,他们首先不得不巩固自己的权力。

围绕着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的共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各种原则,如对社会资源进行科学配置、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的需要、制定长期计划的必要性、短期利益服从于长期利益的考虑等,对于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是颇具吸引力的;他们自称掌握了有用的知识(技术性的或意识形态上的),能够完成上述意识形态原则所设定的各项任务。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界始终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理性再分配的意识形态——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探寻阶段;不过,学界之所以未能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替代理论,是因为他们陷入了一种幻觉之中,即认为废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会带来他们所预想的各种效应。的确,当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将社会主义界定为生产者对他们的劳动状况和劳动产品拥有直接控制的体制时,他是试图在将分析的重点从所有权关系中转移开来;但是,甚至是他也没有仔细考虑过在

“生产者的直接控制”和“国家（或其他任何公共实体）的公共控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过，在苏联式的社会中，“直接权力”或“直接控制”的理念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辩护性质的意识形态而被保留下来，官方声称无产阶级拥有直接的权力（比如，在所谓的“苏维埃”^①里），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具备这种权力；或者，他们即使拥有一些直接权力，但与那些对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信念（比如，非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或者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权力）相比，这些权力也是相对微弱的。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在这场辩论中选择立场，并对什么是出色的、“更好的”或“真实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描述。本文是一篇描述性的分析，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意图。现在，我们也许已经具有足够的信心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尚未解决的悖论——谁来处置劳动产品？将处置剩余的权力合法化的原则是什么？在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将这种抽取剩余的行为合法化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人们假定再分配者掌握了出众的知识，可以对社会资源进行既符合经济效率又不违背社会公正的再分配。但是，当生产者宣称他们拥有控制其劳动产品的权利时，这一原则就有可能而且事实上也许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受到了以自我调节、自我管理为基础的经济机制的挑战。

另一方面，这种符合生产者直接利益的替代性的合法原则，其表达是很不清晰的。东欧社会是社会意识最不发达的社会之一。不过，与意识形态专家相比，东欧工人阶级或许更清楚他们与“再分配者”之间的冲突，即便是工人的“阶级意识”还处在卢德主义者（Luddites）的水平上。1970年发生在格坦斯克（Gdansk）的暴乱以及随后于1976年夏天在波兰各地发生的工人罢工和骚乱生动地告诉我们，东欧反对派运动的阶级特征也许已经发生了改变。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政治异议活动已成为知识分子的内部事务，政治斗争只是知识分子不同群体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在1956年的匈牙利，正如比尔·罗马克斯（Bill Lomax）在其《匈牙利：1956》（*Hungary, 1956*）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反抗事实上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但工人阶级运动仍然不过是起源于各种知识分子运动的附带现象。因此，在波兰

^① 指的是苏联等国的议会。——译者注

所发生的事件，也许是第一个产业工人发动变革并取得某些成功的历史事件。尽管如此，在那里，有组织的和公开的罢工，仅仅是个别的极端事件；今天，东欧社会的政治控制是如此严酷，以至于公开罢工这些举动都是非常铤而走险的。与以前相比，工人挑战再分配经济体制以及试图表达其对立的利益的努力，要比以前更加普遍；但是，很显然，这些努力仍是相当无意识的或者说是“自发的”。

在分析匈牙利某一重工业中心的劳工—管理层关系时，拉约什·海希（Lajos Héthy）和乔包·毛洛（Csaba Makó）发现了工人们所使用的一种相当微妙的策略：他们将放缓生产过程和撤出生产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来反对剥削性的薪资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与罢工具具有“相同功能”的策略。凭借其敏锐的理论直觉，海希和毛洛进一步指出，工人们事实上是在试图与管理层建立一种交易性的关系；此外，工人们还觉得，他们的策略的成功，构成了劳工与管理层之间在劳动关系上维持长期和平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个案表明，“劳工大众”事实上是在追求交易性的关系，并试图摆脱理性再分配逻辑强加到其身上的“酌定”关系。直接生产者最为基本的利益，就是在劳动力的非市场交易中以交易取代“酌定”，增强自身独立于官方劳动组织的能力。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农民工（peasant-workers）正是这种斗争的典型产物。这些产业工人仍然保留了其在农村的住所，能够在一小块家庭自留地里深耕细作，将产品销售到城市市场，为家里提供经济和食物来源；与除了工资之外再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城市中已有的无产阶级相比，这些农民工对产业雇主的依赖要更少。拥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人，那些无需为食物和容身之处担忧的人，也许并不愿意为了具有剥削性质的工资而工作；如果工资太低，他们也许会辞职不干，等着下一个工作机会的来临。他们甚至可以更好地利用有关“迁徙”的法律，从而避开城市警察当局的监管。1968年匈牙利经济改革的一项未曾预料到的结果，就是非技术工人的膨胀性增长。在改革之前，专家们预测，如果放松对劳工运动和工资体系的行政调控，工资差别将会扩大，具有资质的劳动力的价格将会更快地增长；但与这些预测相反，工资差别在改革之后缩小了，非技术工人反倒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的位置上。不过，这些非技术工人主要是农民工。他们及时地利用了经济改革后更具交易性色彩的劳资关系：如果工业中的工资不够高，他们就返回合作社继续做农活；他们中的很多人把自家的小农田搞得有声有

色，在较少受到管制的城市水果和蔬菜市场上做起了买卖，效益还不错。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从农村合作社购买废弃的旧拖拉机，修好之后用其来提高自家小农田的生产率。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工开始购买小货车，以便便捷地将其产品运到城里。相当多的农业合作社开始按照家庭小农田经营者们所开创的模式进行生产，而不再像工业企业那样，对工资进行严格的限制，它们通过增加工资吸引工人从城市工厂回到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分厂。这些建立在农村的分厂虽然资金不足、设备陈旧，但它们仍然能够与那些遵循再分配经济逻辑而组织起来的大型工厂竞争，因为事实证明这些分厂更具备交易性色彩。

不管是在东欧内部还是在西方，许多经济改革的评论家都将我在上面所描述的过程，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表现；不过，我认为，这些现象是直接生产者挑战再分配经济体制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劳动力贸易中交易性场景对酌定性场景的替代。毕竟，以上所描述的过程并未导致资本的积累，农民工也没有雇用劳工，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试图出售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将其劳动力从官方劳动组织中解脱出来（而且事实上也只是暂时性地解脱出来），从而迫使再分配权力减少对剩余的抽取，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自主空间。人们并没有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提出质疑；经济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并非私有财产，而是一种更具自我调节能力的经济体系，并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提供了更多讨价还价的机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这一发展明显威胁到了再分配权力；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改革做出的让步开始一步一步地倒退，后来变成了再分配权力卷土重来的运动和对工人阶级的规训。法律禁止“私人购买”拖拉机和小型货车，匈牙利在70年代早期允许农业合作社自己开办小工厂作为副业，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农民工更加依赖官方的劳动组织。在70年代早期，作为匈牙利1968年放权改革倒退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些在一年中第二次变更雇主的人必须通过官方雇工机构才能找到新的工作；换言之，劳动者选择雇主的权利被中止了。这一举措再次打击了工人阶级尤其是熟练工人，因为这些人曾利用他们高效的劳动产出作为武器来要求增加工资。

现在，我将回到本文开头的评论和假设上去。我愿意再次强调的是，在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策措施的社会后果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概念工具进行重新评价，因为表面上相似的机制所引发的社会意义和后果，其中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可取的政策应该表达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挑战再分配权力，增加集体

工人或工人个体的谈判权。

如果政治体制允许成立一个真正的、能够致力于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政党的话，那么，这个党将以自我管理、自我调控以及雇员和消费者的自主权等原则为基础，它将详细阐述自己的替代性战略，从而对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对作为再分配权力代表的“保守派”提出挑战。对这样的党来说，其规划的最重要的目标将是保证自由雇佣的法律和经济环境，允许生产者决定是否出售他们的劳动或劳动产品，允许他们在发现劳动价格不利于劳动者时辞职不干（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党也许甚至需要为“失业的自由”而斗争）。这样的党，也许还要为“生产者结社的自由”而斗争，即争取建立替代性的、不受国家再分配权力直接控制的生产组织的权利；在这样的生产组织里，生产者能够自主决定其想积累的剩余数量，以及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的报酬的数额。同样重要的是，它将增加消费者的自主权，并对再分配者更加知道人民需要和应该消费什么提出质疑；它将增加具有个人收入性质的积累并相应地削弱再分配者以“集体消费”的形式进行配置的财政手段。总之，从“直接生产者当家做主”的立场出发，通过限制和挑战再分配权力，这样的党将为争取更多的公正、平等而斗争。

我使用这个想象出来的“工人党”的规划，只是用来作为一种解释工具来引介自己的观点，我并没有暗示说我们能够或应该期待在东欧出现这样一个反对党。历史要比我们更有想象力，它能创造出新的制度和机制，能够创造出新的结构；我也不想对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可能具备的政治体制进行预测。但另一方面，我可以非常肯定的是，通过赋予工人阶级更多的表达利益的空间，通过允许一种挑战再分配权力合法原则的不同“社会风气”的发育，社会主义的成熟阶段将与当前的早期阶段有所不同。目前，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对其内在的不平等和冲突的处理，基本上是一种“博爱”行为，它与19世纪晚期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慈善事业”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总是有“慷慨的再分配者”准备“帮助值得帮助的穷人”，就像19世纪“善良的资本家”一样。但是，伴随着再分配权力的巩固，我们也许能够期待国家将被压迫者利益的表达制度化，并将其作为实际的社会政策发展的前提条件。

本文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超出改良主义框架的范围，上述概略性的“党的规划”是对一个改良型政党而非革命型政党的规划。关于“自我管理

的社会主义”的替代性理论仍然非常不成熟，也许仅仅是由于这一原因，人们很难想象一个以“直接生产者自我决定”为主导性合法原则的社会将如何运转。也许南斯拉夫最为接近这一模型，至少它在意识形态上承认了“自我管理”；但对南斯拉夫模式的经验事实更为熟悉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却对这个社会的自我管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南斯拉夫也许只是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最为人道主义色彩的版本而已。不管怎样，就我目前对那些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过程的知识掌握而言，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强大的再分配权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什么样子；而且很有可能的是，即使到了成熟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合法原则也仍然是理性再分配。因此，东欧更为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也许只是当前体制的一个改良性版本，而不是对其的一种革命性否定。下一阶段的新奇之处也许仅仅在于，与那些在再分配经济中的利益和风气存在结构性冲突的利益和风气，其表达将得以制度化；尽管如此，再分配权力的首要地位并不会受到质疑。

让我再次引用前面虚拟的工人党为例来详细解释这一点。即便“工人党”能够成功地打败“保守派”并获取权力，它也必须接受“再分配的现实”。这个“新的执政党”将接管抽取剩余的旧官僚体制并维持在大多数领域中的再分配——也许只是覆盖范围比“保守派”统治下的要稍小一些罢了。

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中改良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想进入政府就必须学会与私有财产共处一样，“工人拥有自我决定权的党”也许同样会向再分配制度妥协。事实上，我们可以期盼的，仅仅是被压迫利益的制度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成冲突的表达更加明显的体制。

即便在试图预测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可能的路线的时候，我想呈现的，也只是一种诊断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梦想。但是我认为，这些变化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它们是值得向往的，而且在于它们具有现实的紧迫性。目前，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利益的表达还不是很清晰，这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很小的政治骚动就会威胁基本的社会结构，从而导致统治精英无情地镇压任何反对意见。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统治精英变得温和了一点，更加有忍耐力，允许某些意识形态公开自己的声音；从长远来看，这也许将导致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获得有意识的发展，即便这些利益与处于主导地位的再分配利益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

附录一

关于社会地位或收入与住房分配之间的相关性，就我目前所知，尚未有系统性的和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但是我从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能获得的所有数据都显示，一个群体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收入越高，他们就越能获得国有住房，而地位低和收入低的群体则更可能依靠市场来获得自有住房。

关于匈牙利的最为系统的的数据，来自我和康纳德于1968年针对佩奇（Pécs）和塞格德（Szeged）这两座城市所做的一份抽样问卷调查，该调查的样本数很大，代表性不错。不同社会阶层（从国家那里）租赁、自建或者合租住房的比例如下。

	租赁国 有住房	自建	合租	总计 (%)	被试人数
	占住房类型的百分比 (%)				
高干和高级专业人士	58.9	34.4	6.6	100.0	90
其他专业人士	59.4	31.2	9.4	100.0	128
技术官僚	46.9	44.5	8.6	100.0	254
文员	53.6	34.6	11.7	100.0	112
公务机关雇员	50.6	34.8	15.0	100.0	73
熟练工人	40.1	48.7	11.2	100.0	474
半熟练工人	40.6	46.8	12.6	100.0	271
非熟练工人	35.9	52.1	12.1	100.0	217
农业劳动者	8.4	91.7	0.0	100.0	36
退休的白领工人	58.5	32.3	9.1	100.0	99
退休的蓝领工人	44.4	48.3	6.7	100.0*	387

* 此行百分比相加不等于100%，原文如此。——编者注

我所能获得的有关波兰的最好数据，来自韦索沃夫斯基（W. Wesolowski）等人于1964~1965年间在三座波兰城市——罗兹（Lodz）、什切青（Szczecin）

和科沙林 (Koszalin) ——所做的社会分层问卷。他们发现, 在所调查的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住在新建的国有公寓中的比例如下。

单位: %

专业人士	40.6	管理职位的工人	17.4
技术官僚	22.8	熟练工人	12.6
文员	22.8	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	8.8
国家机关雇员	15.7		

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所在的 家庭, 其住在新建国有住房中的比例如下 (收入指的是月收入)。

单位: %

2000 兹罗提	10.6	3001 ~ 4000 兹罗提	34.4
2001 ~ 3000 兹罗提	18.2	4000 兹罗提以上	37.3

资料来源: Slomeczynski and Wesolowski, 1970: 108; 111。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数据, 其系统性甚至更差, 但它们的指向与匈牙利和波兰的是一致的。莉布斯·马科娃 (Libuse Mackova) 在 1967 年进行了一项调查, 对象是那些最常见的、住在标准公寓里的居民。(这些标准公寓指的是总共有 6 居室和总共有 8 居室的住宅。不幸的是, 我不知道这两种新建国有住房的确切比例是多少。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 其他类型住房中的社会分层情况会有所不同。) 她的调查覆盖了波西米亚的所有城市。她发现, 被调查公寓里的居民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分布比例如下。

单位: %

国家机关雇用的非熟练工人	8.2	高干和高级专家	29.4
非熟练工人	0.6	其他专业人士	21.0
熟练工人	32.7	不工作的人	1.6
文员	6.5		100.0 (N = 510)

资料来源: Mackova, 1970: 10。

在另一份于 1970 年所做的针对所有波西米亚城市的问卷调查中，莉布斯·马科娃发现，住在新建国有住房中的家庭，按职业群体分类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

工人	35.7	不工作的人	6.5
白领	39.7	单身母亲	6.4
高干和高级专家	11.6		100.0 (N=930)

资料来源：Mackova, 1971。

附录二

再分配（通过税收或补贴）使得消费品价格偏离生产成本，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显示如下（数据以一年为计）。

职业群体	单位开支的真实价值（福林）	开支总量（福林）	总开支加税收或补贴（福林）	再分配（福林）
高级官员和专业人士	1048	24084	25232.4	1148.4
其他白领	1049	21174	22208.0	1034.0
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	1044	16534	17266.8	732.8
非熟练工人	1038	14076	14604.9	528.9
全体白领工人	1049	21770	22827.4	1057.4
全体产业工人	1043	16133.	16832.5	699.5
有工业和农业收入的家庭	981	14035	13789.6	-245.4
农业劳动者	989	12694	12560.5	-133.5

资料来源：Ladányi, 1975a: 23。

附录三

1967 年时匈牙利公民每月现金补贴额按职业和收入分布如下。

职业群体	每月人均现金 补贴 (福林)	按人均月收入 (福林) 排序的收入群体	每月人均现金 补贴 (福林)
高级官员和专业人士	107	≤600	147
中层管理者	97	601 ~ 800	150
其他白领	110	801 ~ 1000	138
全体白领工人	102	1001 ~ 1200	126
熟练工人	90	1201 ~ 1400	113
半熟练工人	87	1401 ~ 1600	105
非熟练工人	86	1601 ~ 1800	105
全体产业工人	88	1801 ~ 2000	89
农业劳动者	48	2001 ~ 2400	97
不工作的人	398	≥2401	88

资料来源: Ferge, 1975: 719;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72: 183, 188。

每月现金补贴额按职业和收入分布如下。

职业群体	人均每月现金 补贴 (福林)	按人均月收入 (福林) 排序的收入群体	每月人均现金 补贴 (福林)
高级官员和专业人士	260	≤600	156
中层管理者	221	601 ~ 800	167
其他白领	220	801 ~ 1000	171
全体白领工人	235	1001 ~ 1200	167
熟练工人	163	1201 ~ 1400	161
半熟练工人	153	1401 ~ 1600	163
非熟练工人	149	1601 ~ 1800	163
全体产业工人	157	1801 ~ 2000	157
农业劳动者	114	2001 ~ 2400	161
不工作的人	185	≥2401	193

资料来源: Ferge, 1975: 724;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72: 229 - 233。

参考文献

Berényi, József. 1974. *Életszínvonal és szociálpolitika* (Living standard and social policy). Budapest: Kossuth Kiadó.

Csikós-Nagy, Béla. 1971. *Magyar gazdaságpolitika* (Hungarian economic policy). Budapest: Kossuth Kiadó.

Ferge, Zsuzsa. 1975. "Társadalompolitika, szociálpolitika és a központosított újraelosztás típusai" (Social policy and types of redistribu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6, pp. 709 – 724.

———. 1976. "A szocialista társadalmi struktúra dinamikája" (Dynamics of socialist social structure). *Valóság*, No. 11, pp. 13 – 25.

Haraszi, Miklós. 1975. "Piece work in Hungary: I have heard the iron cry." *New Left Review*, May – June, pp. 9 – 24.

Héthy, Lajos and Makó, Csaba. 1970. *A teljesítményelv éry enyészése és az üzemi érdek és hatalmi viszonyok* (Differential incentives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ests and powers: labour-management and infra-labour conflicts in a business organization of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Budapest: Magyar Tudományos Akadémia Szociológiai Kutató Csoportjának Közleményei.

———. 1972. "Work performance, interests, powers and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cyclical slowdowns in a Hungarian factor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No. 17, February, pp. 123 – 150.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72. *A lakossági jövedelmek színvonala és szóródása*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incomes). Budapest: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Ladányi, János. 1975a. "Fogyasztói árak és szociálpolitika" (Consumer prices and social policy). *Valóság*, No. 12, pp. 16 – 29.

———. 1975b. "A fogyasztói áreltérítések hatása az egyes rétegek jövedelmére és fogyasztására" (The effect of price—regulations on th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Budapest: Szövetkezeti Kutató Intézet Közlemények, No. 102.

Lengyel, László. 1975. "Életszínvonal és szociálpolitika" (Living standard and social policy).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1.

Mackova, Libuse. 1970. *Byty a obyvatel v typove vystavbe TO – 8B*. Praha: Vyzkumny Ustav Vystavby a Architektury.

———. 1971. *Vyvoj domacnosti ve statni a druzstevni vystavbe*. Praha: Vyzkumny Ustav Vystavby a Architektury.

Pearson, Harry W. 1957. "The economy has no surplus — a critique of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In K. Polanyi et al.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Early Empires*.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pp. 320 – 341.

Polanyi, Karl. 1957a.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K. Polanyi et al.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Early Empires*.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pp. 243 – 269.

———. 1957b. "Marketless trading in Hammurabi's time." In K. Polanyi et al.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Early Empires*.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pp. 12 – 26.

Ślomoński, K. and Wesolowski, W. 1970. "Zroźnicowanie społeczne-podstawowe wyniki." In W. Wesolowski (ed.): *Zroźnicowanie Społeczne*. Warszawa: Ossolineum, pp. 93 – 146.

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策

——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再分配与社会不平等*

伊万·塞勒尼、罗伯特·曼钦

一 导言

在早期的一篇题为《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的文章中，我们认为，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由再分配机制整合，它导致了主要的社会不平等；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机制则能够缓解这种由再分配机制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这与主要是由市场整合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对照，在那里，市场机制导致了主要的不平等，而政府的福利再分配则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扮演着对各种不平等加以调节的角色。根据匈牙利在过去十年中市场导向的改革经验，现在我们要对这一假设予以修正。本文认为，虽然市场导向的改革确乎具有一定的平等化效应，但它也开始造成各种不平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再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和由市场导致的不平等开始相互强化，而不是彼此相互抵消。对于以上这些新的研究假设，我们将探究其理论意义及社会政策后果。

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对卡尔·波兰尼的理论（很多社会政策理论

* 本文原文发表在 G. Esping-Anderson, L. Rainwater and M. Rein (eds.). 1987. *Stagnation and Renewal in Social Policy*. White Plains, N. Y.: Sharpe, pp. 102 - 139.

家都接受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我们认为,市场并非天然地就会产生不平等,而再分配也并非天然地就会造就平等。相反,我们的“修正版波兰尼理论”强调,总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基本的不平等结构。与波兰尼的旨趣颇为相似的是,我们倾向于混合经济,相信在这样的体制中各种次属机制(secondary mechanisms)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在再分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中,我们能够发现市场的这种最初的平等化效应)。我们现在的这篇论文,既坚持了“修正版波兰尼理论”的基本观点,又根据新的经验发现对其进行了修正与拓展。目前我们的观点是:从整个体系的角度来看,由于次属机制——如果它们足够强大的话——也能够产生自身的二次不平等(secondary inequalities),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既存的主要的不平等(primary inequalities),因此只有同时引进第三方机制(tertiary mechanisms)才可能调节这种复杂的不平等体系。而为了有效地削减二次不平等,这些第三方机制就不得不与主要机制(primary mechanisms)具有类似的特点;不过,由于第三方机制也应该不去强化各种主要的不平等,因此,它们不能等同于处于支配地位的机制。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第三方机制只能是一种再分配机制的修订版,即福利再分配(welfare redistribution)机制。一方面,这种机制将与主要目的是对经济再生产进行调节的再分配机制(为强调这一点,我们称其为经济再分配)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它与调节价格的市场机制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的新理论是对市场与再分配的“修正版波兰尼理论”的一种拓展。

在早期的著作中,我们也认为,在寻求处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社会政策时,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倚仗市场并将其作为政策工具。现在,我们则相信,随着市场确立其地位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混合经济,政府有可能也有必要去创造一种福利导向的再分配干预机制,作为对市场工具的补充。带着这一假设,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政策问题”这样一个方兴未艾的争议性领域。争议(尤其是在匈牙利,这种争议显得特别活跃)的主角,包括“社会改革者”、“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以及“保守—复古主义者”(conservative-restorationists)。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社会改革者建议拓展社会政策和更具福利色彩的政府再分配的范围。这些建议遭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的强烈质疑;他们在过去20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削弱官僚—再分配的整合体制的霸权地位,增强经济的混合特征。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倡导对

国家各个机构的再分配行为施加限制；他们尤其寻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赢利企业的利润剥夺，同时确保政府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处于最低水平。对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来说，更少的再分配意味着对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以及更有效率的国民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一再指责社会改革者背叛了改革的动机。他们担心社会改革者尽管有着良好的动机，但却不过是在帮助某些保守的守旧主义力量；正是这些力量试图利用市场所导致的新近浮现的各种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紧张，来达到恢复旧秩序（the status quo ante）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官僚一再分配的垄断。尽管社会改革者对贴在他们头上的“反改革”标签感到不舒服并想与保守的守旧主义者保持距离，但他们终归没有能够发展出一种推进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共同平台。本文最重要的政策性结论是：这样的一种共同平台、这样的一种有助于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共同策略是可能的。依据我们的理论，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将“经济”再分配和“福利”再分配从概念、制度及资金来源等方面予以清晰的区分。只要来自利润剥夺并被用于投资补贴（也就是经济再分配的财政来源）的资金与福利预算是完全分离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就能够继续其对经济再分配的攻击，并依旧提出其关于扩大政府福利再分配活动范围的建议。资金来自“硬的”、得到严格执行的和被客观定义的税收体系的福利再分配，不会导致软预算约束；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也没有理由不去真正支持福利再分配并反对经济再分配。

二 由官僚一再分配机制所导致的不平等

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的不平等是由市场产生的；而在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平等则起源于政府的再分配及其对稀缺商品与服务的行政配置。此外，在西方，由市场所导致的不平等在事后（有时成功地）被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所纠正；而在东欧，扮演着这种（相对的）平等化角色的，则是市场。^①

^① Ivan Szelényi, "Social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 (1978): 61-87.

（一）经验证据

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主要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所做的对匈牙利住房分配的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补贴性的公共住房，主要被分配给了收入远远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一些群体。低收入群体不得不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以市场调节价格去购买或建造自己的住房。花费在公共住房上的再分配和政府资金越多，富人获得的好处就越多；虽然花费在公共住房上的钱较少，但市场上经过改善的抵押贷款环境等举措对穷人是有益处的。^①

我们相信，在说明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再分配会造成不平等而市场具有平等化效应方面，住房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一定程度上受我们关于住房分配研究的激发，一些经验调查也在好几个领域中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干预会造成不平等效应的证据。以下是其中的一些研究个案。

（1）譬如，亚诺什·劳达尼（Janos Ladányi）对消费商品的价格体系进行了分析。尽管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要求的是社会公正，也就是政府对特定的消费商品给予价格补贴，而对其他商品进行征税；但通过对家庭预算进行分析，劳达尼证明，整体而言，低收入群体所消费的经过价格补贴的商品要比高收入群体更少。概言之，如果没有政府的价格管制，穷人的生活境况将会更好。^②通过这篇文章，劳达尼对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一种观点——价格行政管制确实具有平等化效应——提出了挑战。^③最近的一些研究则出现了观点的分化，苏珊·费尔格（Zsuzsa Ferge）似乎仍然坚持其早期的观点，^④而陶马什·克洛什（Tamás Kolosi）则倾向于认同劳达尼的观点。^⑤

（2）盖博·维基（Gabor Vagi）对社区发展的基金体系进行了分析。他

① Ivan Szelényi, *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Janos Ladányi, "Fogyasztói árak és szociálpolitika," [Consumer prices and social policy] *Valóság* 12 (1975): 16–19.

③ E. Javorka, ed., *Eletszínvonal a Mai Társadalomban* [Living standard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1970), p. 345, and Robert Hoch, "Eletszínvonal tervezés és ártervezés," [Prann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planning the prices] *Gazdaság* (December 1972).

④ Zsuzsa Ferge, *A Society in the Making* (White Plains, N. Y.: M. E. Sharpe, 1979), pp. 281–287.

⑤ Tamás Kolosi, *Struktúra és Egyenlőség* [Structure and equality]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1983), p. 149.

发现，用于发展的补助金被系统性地拨往城市尤其是那些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以及大村落中。小型的、最为贫困的村庄则没有得到任何发展补助金。如果取消中央政府对社区发展的拨款，并赋予社区理事会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征税的权力的话，那些贫穷村庄的境况可能会好一些。因此，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对社区发展的再分配干预，我们或许能够看到一种更为平等的区域发展状况。^①

(3) 约瑟夫·海基达斯 (Jozsef Hegedus) 与罗伯特·曼钦 (Robert Manchin) 分析了人们使用那些获得高补贴的娱乐设施的情况。他们发现，低收入群体很少有机会去享用公司或工会中各种最好的、获得较多补贴的度假住房等设施。如果人们都不得不以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的休假买单的话，那么较高收入的群体就将失去这些补贴，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也将有所下降。^② 基于这些证据，我们认为，一旦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诸如医疗、教育以及福利分配等领域，也能够发现同样的关于不平等效应的模式。^③

(二) 波兰尼的市场与再分配理论

我们相信，上述研究发现要求我们对波兰尼关于再分配与市场关系的著作予以反思，尤其是其关于再分配与市场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的分析。波兰尼主要是对市场经济提出了批评。从《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到其后期的经济人类学著作，他的主要目标在于揭示市场的历史暂时性与缺陷。^④ 在

① Gabor Vagi, “Mit er egy kozseg, mit er egy megye?” [What is worth village, What is worth a country?] *Kozgazdasagi Szemle* 7-8 (1975). 关于政策的后果，可参见盖博·维基的谨慎陈述：Gabor Vagi, *Versenges a Fejlesztési Forrasokert* [Diseases of the health care system] (Budapest: Kozgazdasagi es Jogi Konyvkiado, 1982)。

② Jozsef Hegedus and Robert Manchin, *Udules, ingatlanpiac* [Real estate market and recreation], Manuscript (Budapes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82)。

③ 最近，茱莉亚·萨莱伊对医疗领域中的不平等进行了综合分析。参见 Julia Szalai, *Az Egeszsegügy Betegsegei* [Competing for developmental grants], Manuscript (Budapes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84)。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and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rade and Market in Early Empires*, ed. K. Polanyi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7)。

④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and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rade and Market in Early Empires*, ed. K. Polanyi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7)。

《大转型》中，波兰尼认为，单纯的市场从来都不能够整合经济。正是在写作这部著作的时候，波兰尼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对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加以进一步的限制，大萧条之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重建”，才是可能的。对这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在其经济发展更为复杂的新阶段，什么将能够取代或补充市场的地位呢？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针对这一问题，波兰尼试图给出一个在理论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政治上具有灵活性的答案。在《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Early Empires*）一书中，他发展出了一个复杂的“经济整合模式”理论。在这本著作中，波兰尼区分了三种能够对经济体系进行整合的不同模式。市场仅仅是这三种模式中的一个，另外两种整合模式是互惠与再分配。互惠、再分配和市场整合经济的方式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在于它假设市场是理性的，而互惠和再分配则不过是前现代的因而也是非理性的。尽管波兰尼总是通过列举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的个案来对再分配和互惠经济进行经验描述，但无疑再分配至少也是一种“现代化了的”机制。不过，关于互惠是否能够对现代的复杂经济进行整合却是一件更值得质疑的事情。在对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微观单位（譬如，家庭就能够依据互惠的原则经济地运作）进行整合方面，互惠也许可以发挥作用，但很难想象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以这种方式运行。而再分配功能的发挥则不仅限于小型组织，它曾经是众多伟大帝国的整合方式，而且也能够现代经济中被采用。波兰尼相信，再分配在现代经济中的运用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大萧条证明，市场经济的种种矛盾已经变得更加尖锐。市场所引发的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已经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稳定造成了威胁。只有不断扩展再分配对市场的补充功能并抵消其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的后果，资本主义才能够存活下去。

（三）波兰尼的“再分配”观念对于分析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适用性

我们认可这一波兰尼式的分析。事实上，这种分析是有价值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且自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已经迈向发展的“集约式”阶段，这些不平等也正在逐渐被一种补充性质的、次属的整合机制所抵消，该机制就是福利再分配。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将上述分析推

演到苏联类型的社会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去。^① 波兰尼本人将苏联看作是“再分配经济”的一种现代版本，但他从来没有对这种新的经济整合方式予以详尽的论述。此外，他也没有追问现代再分配体系中社会不平等和冲突的性质与来源。

我们愿意对波兰尼的经济整合理论做两点补充。首先，我们将苏联类型的社会作为现代的再分配经济加以描述，与波兰尼的观点相似，这些经济体在进入集约式增长阶段后也不得不迈向一种混合经济。苏联类型的经济所迈向的混合经济，一方面，再分配维持着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它也使用市场机制作为补充。其次，我们认为，市场并非天然地就意味着“不平等”，再分配也并非天然地就意味着“平等”；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机制在产生着主要的不平等，而一种补充性或次要的机制则能够缓解这些不平等。

依照它们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整合模式，表1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特征进行了描述。

表1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合机制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整合机制
粗放式增长阶段	市场占据垄断地位	再分配占据垄断地位
集约式增长阶段	市场占据支配地位， 再分配作为补充的/次要的机制	再分配占据支配地位， 市场作为补充的/次要的机制

但是，这里所说的“垄断”（monopoly）或“支配”（domination）究竟意味着什么呢？^② 我们相信，所谓的经济整合的支配性模式，指的是它对再生产过程的逻辑进行调节，特别是影响着资本货物以及劳动力的配置逻辑。当代西方经济即便在其福利国家的发展阶段都是一种“被市场机制所支配的经济”；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经济中，竞争性投资市场中的决策者是私人投资者，且这些投资决策都服从于长远的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在这些社会中，再分配机制只能

① George Konrád and Ivan Szelé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1979), pp. 47-63.

② 显然，“垄断”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没有哪一个经济体系的整合，仅仅依赖单一的机制来进行。甚至是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中，在市场的“垄断”下依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惠和再分配机制；甚至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市场也没有被完全取消。

够在经济体系的“边缘”领域发挥作用，它一般外在于“生产领域”——通过对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消费品的配置在消费领域中运作。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被再分配所支配”的经济，因为其多数投资决策源自中央的各类计划性组织。计划者只允许市场在经济的“边缘区域”，也就是消费领域中运作。因此，东方和西方的再分配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西方，再分配指的是收入在国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转移；而在东方，再分配则意味着中央政府各机构将从企业抽取来的税收纳入国家预算，并以政府拨款、补贴或免费救济的形式，将它们重新配置到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中。

不过，上述区分仅仅是一种对“理想”类型或纯粹类型之间差异的区分。事实上，在西方经济中存在着一种趋势，即将国家再分配活动延伸到投资领域以及劳动力配置领域。类似地，市场的力量也“蹑手蹑脚地进入”到东欧再生产的逻辑中。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瑞典，“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开始谈论“投资决策的社会化”；这意味着工会或政府通常会对投资以及资本流动施加某些控制。在一些东欧国家，譬如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建议引入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以确保资本流动遵循竞争性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化标准。^① 上述措施意味着一种重要的趋同运动，包括社会结构的基础性变化。而这样的一种趋同，也只有强烈的社会斗争才可能催生。尽管在许多西方国家，投资的社会化、企业破产法（迈向投资社会化的一种美国式步骤）^② 以及“新计划条约”（new planning agreements）（该术语的创造者是英国工党的思想家）等，^③ 都已经被纳入政治议程之中，我们仍然能够预期，围绕这些议题，将会展开最激烈的政治斗争。私人资本将（以资本罢工的形式）强烈反对国家对资本流动领域进行实质性干预的任何重大企图。同样，我们也预计，大多数东欧国家会进行市场改革；我们推测，党的官僚将尽他们最大的可能去强烈抵制以下各种企图：将投资品“市场化”、创造一个竞争性的投资“控股者”，并以这一领域中的市场调节取

① Marton Tardos, “Program a gazdasagiranyitas es a szervezeti rendszer fejlesztésére,” [Progr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Közgazdasági Szemle* 6 (1982).

② Barry Bluestone and B. Harrison,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losing,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③ Stuart Holland, ed., *Beyond Capitalist Plann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8).

代计划性权力。^① 这些情况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以一种占据霸权地位的整合模式取代另一种整合模式，意味着社会性质、基本的阶级结构以及权力分配性质的变化。

作为东欧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以及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主要理论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种极其相似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概括的方式。^② 在对各种经济体系的雄心勃勃的和跨越历史的分析中，科尔奈对“市场的”（market）、“官僚的”（bureaucratic）、“伦理的”（ethical）以及“强制的”（aggressive）四种协调机制进行了区分。与波兰尼的体系相同的是，在这一体系中只有“市场”和“官僚”这两种协调机制能够整合现代复杂工业社会的宏观经济过程。^③ 尽管在这篇文章中科尔奈并没有对福利资本主义体系和国家社会主义体系进行详细的比较，但如果我们能够阅读该文的同时将其与他的另一重要著作《短缺经济学》^④ 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科尔奈做出以下的解读：①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中，“官僚”协调机制占据着主导地位。②“官僚”协调机制处于主导地位，意味着中央官僚机构通过再分配干预企业的运行（譬如，从赢利企业中抽取政府预算所需要的税收以帮助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走出困境）来达到软化企业预算约束的目的。换言之，政府的官僚一再分配干预这一“制度条件”导致了预算软约束。^⑤ ③预算约束的软化使得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一种“资源约束的体系”（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受到“需求约束”的制约），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软预算不可避免地导致长期短缺，同时伴有一种趋势，那就是日积月累的经济萧条^⑥和强制性的产品替代^⑦。这种对产品质量和生产力的破坏性后果，在集约式经济增长阶段是尤其不能被接受的。对科尔奈而言，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所有的现代经济都是一种混合经济，正如市场和官僚的协调机制

① Janos Matyas Kovacs, "A reformalku surujeben," [In the center of the "reform bargain"] *Valowg* 3 (1984): 30-55.

② Janos Kornai, "Burokratikus es piaci koordinacio," [Bureaucratic and market coordination] *Kozgazdasagi Szemle* 9 (1983): 1025-1037.

③ Ibid., p. 1034.

④ Ja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⑤ Ibid., p. 556.

⑥ Ibid., pp. 30-36.

⑦ Ibid., pp. 36-38.

都在东欧经济中发挥着作用，“但在众多领域中，市场机制将具有更多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值得和有必要去行动，以便限制官僚协调机制并支持市场协调扩张的原因”^①。

就其诊断和所开出的药方而言，科尔奈的分析与我们的分析似乎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官僚一再分配的整合机制支配着东欧经济体系，且正在迈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官僚一再分配的干预功能将不得不减少，而市场的作用则得到了扩大。不过，尽管科尔奈能够解释其药方为什么在经济上是不可避免的（譬如，为了提升质量和生产力等而使得预算约束更加“硬化”），我们却希望能够将社会学的维度增加到分析中去。我们分析的目的是去揭示变动的经济平衡机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后果，揭示那些旨在对占主导地位的整合模式进行限制的各项改革措施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局限。

（四）再分配式的不公平：占支配地位的再分配机制导致的不平等

然而，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讲，我们早期的论文及其经验证据，与科尔奈和波兰尼的观点都是相矛盾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波兰尼而言，“再分配公平”能够纠正市场所产生的不平等这一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且并不需要进一步论证。极其有趣的是，当“社会公平”这一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时，科尔奈以及几乎所有市场取向的东欧改革理论家们都在为官僚再分配“辩护”。经济改革者在效率的名义下要求进行市场改革；对他们而言，不平等不过是人们不得不为效率而付出的代价而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杰斯·海基达斯（Andras Hegedus）是1968年匈牙利经济改革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他将这种两难解释成“最优化”要求和“人道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对于市场最优化要求的扩张，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出于伦理和人道考虑应该对其施加限制。^② 科尔奈也赞成这一观点。他认为，之所以不能够取消官僚的调节机制，原因之一正是在于社会主义需要确保公平的收入分配（另外，还包括“外部性”问题和“垄断”问题）。对科尔奈而言，“市场所导致的收入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的伦理假设……而更加公平的收

^① Kornai, “Burokratikus es piaci,” p. 1037.

^② Andras Hegedus, “Humanizacio vagy optimalizacio?” [Humanization or optimization?] *Valóság* (1964).

入分配，需要再分配的干预……对再分配的社会需求越是强烈，官僚机制所扮演的角色就将越重要”^①。波兰尼和科尔奈都认为，市场会天然地导致不平等，官僚再分配的整合则天然地会造就公平。

我们已在早期的论文中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我们现在仍要对其提出挑战。我们在诸如住房、价格体系、区域管理、福利分配等领域中所发现的证据表明，事实上，再分配确乎是导致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尽管要得出确切的结论尚需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占支配地位的再分配机制所具有的导致不平等的本性，同样体现在收入的不平等中。20世纪50年代，供给与需求因素在决定收入方面还仅仅扮演次要角色，大多数的工资主要由官僚中心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分配；尽管如此，当时东欧的收入分配仍然是相当不平等的。此外，正如沃尔特·D·康纳（Walter D. Connor）、戴维·莱恩（David Lane）、苏珊·费尔格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到至少是70年代中期，当市场开始在决定劳动力配置和工资水平方面得到发展的时候，收入的不平等并未上升，相反，还出现了轻微的下降。^②

因此，我们认为波兰尼和科尔奈都是错误的：任何一种经济调节机制都不会天然地导致平等或不平等。我们的主要理论观点是：总是主要机制导致了根本性的不平等结构，次要的或第二位的机制则具有平等化的效应。我们通过以下的表格方式对该理论假设予以说明（见表2）。

表2 不同社会经济体系中导致根本性不平等或具有平等化效应的经济机制

	机 制	
	导致根本性不平等结构的机制	具有平等化效应的机制
福利资本主义 (以市场为主要整合机制)	市 场	再分配
国家社会主义 (以再分配为主要整合机制)	再分配	市 场

① Kornai, “Burokratikus es piaci,” p. 1035.

② Walter D. Connor, *Socialism, Politics and Eq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David Lane, *The End of Social Inequali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p. 58; and Zsuzsa Ferge, *A Society in the Making*, p. 174.

从上述框架中，我们并不能推论说，在福利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平等的总体水平是一样的。一些经验证据表明，以再分配为主要整合机制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较那些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的经济要更为平等一些。由珀克（Felix Pauker）和费尔格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同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尼系数要比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低一些。^①尤其是在将“非工资性收入”（如租金、利润等收入）考虑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私有制的社会的收入金字塔的最高部和最底部之间的差距，要比那些废除了私有制的社会大得多。而且多数分析者认为，甚至是工资性收入如工资、薪酬等，在再分配经济中的分配也要比市场经济中的分配稍微平等一些。尽管如此，表2的有效性依然未受到影响；因为在假设了两种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的总体水平后，我们这一框架的目的仅仅在于试图去解释这些不平等产生方式的不同之处。

对于阶级分析者们来说，表2是不足为奇的。毕竟，在我们的定义中，“主导”机制调节的是再生产过程（或者，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术语来说，为了扩大再生产而对剩余进行剥夺和重新分配）。在这一主导机制中，包含着阶级关系。因此毫不奇怪，对任何特定社会中的权力与特权的分布，表2都将能予以解释。

为什么说市场配置将意味着不平等？在试图解释为什么市场配置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的“伦理假定”相矛盾的时候，波兰尼的答案并不是很令人信服：“（市场）或许会产生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对于更好的绩效激励而言又是不必要的。高收入产生的基础，可能并非建立在对社会有益的绩效的基础之上，而可能是由于幸运、遗产继承等原因。相反的命题或许也是成立的：低收入的生产也不能够被解释为智商的缺乏，而是由于先赋劣势或不好的运气所致。”^②换言之，市场将导致不平等，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运气的好坏（确切地说，这并非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因此我们将排除这种标准），或者遗产的继承，或私有产权。将私有产权作为肇因意味深长；它暗示并非市场自身在产生着不平

① Felix Pauker, "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Evidenc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2-3 (1973); Ferge, *A Society in the Making*, pp. 168-169. See also P. J. D. Wiles and S. Markowski, "Income Distribution under Communism and Capitalism: Some Facts about Poland, the UK, the USA and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3 (1971).

② Kornai, "Burokratikus es piaci," p. 1035.

等，导致不平等的，是私有产权尤其是对资本的私人占有〔我们要补充的是，这意味着有能力通过“资本性资产”（capital assets）的私人控制去剥削他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看法也是对我们观点的一种支持——只有在成为“主导性机制”的条件下，换言之，就是只有当资本货物被私人投资者通过竞争性市场加以配置的时候，市场才会成为基础性不平等的源泉。

此外，当我们断言再分配机制在一种经济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时候，这其实意味着“资本性资产”的私人控制已经被废除，资本货物也不是通过市场进行配置，而是通过控制着“组织性资产”（organizational assets）的官僚们所施加的再分配措施得以配置。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分析很容易与埃里克·O·赖特（Erik O. Wright）最近所详尽阐述的关于阶级的一般理论联系起来。在《阶级》一书中，他认为，“阶级剥削”的基础是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资产”的控制。^①对赖特而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性资产”构成了剥削（或用我们更为审慎的术语来说即不平等）的基础。而在被赖特称为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随着私人所有制的废除，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浮现出来，其剥削能力乃是基于对组织性资产的集体控制。尽管我们不必全盘接受赖特的新的“关于阶级的一般理论”，在这一点上，他的分析却与我们的分析不谋而合：不同类型的整合机制的主导地位，是以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资产的控制为前提的，是以不同的阶级结构为先决条件的。

在本文中，我们坚持认为，表1和表2所呈现的对波兰尼理论的修正是精准的；不过，基于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将对自己的论点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再评价是必要的，因为至少是在匈牙利，市场改革的扩张表明，在最初的平等化效应之后，市场机制也开始产生出自身的各种不平等。此外，在某些时候，再分配和市场部门所产生的不平等似乎是在彼此强化。

三 市场最初的平等化效应

在过去十年里，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尤其是在匈牙利，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商品的市场配置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住房经济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享有政府补贴的住房在所有新建住房中的比例逐渐从1970年的41%下降

^① Erik O. Wright,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5).

到1980年的34.1%和1981年的19.6%。^①相应地，用于行政配置的住房库存也大为下降。如果官方计划将大多数以前属于国有的存量城市住房重新私有化的话，市场领域的扩张程度将更为深远。譬如，布达佩斯市政当局曾经考虑将30万套公寓（该城市只有200万居民）优先出售给现有的居住者，若他们没有兴趣或者是没有能力购买的话，就在开放的市场上出售这些公寓。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再商品化能够发生——因为过分雄心勃勃的城市专家们将受到愤怒的房客和保守的官僚所引发的“政治现实”的警告——但住房经济迈向市场的普遍趋势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普遍的再商品化趋势对大多数其他消费品和服务也产生了影响，且随着价格受行政调节的的商品的比例的急剧下降，中央物价局（Central Price Office）的角色开始被供需规律所取代。

开放“第二经济”是另一个导致市场角色扩张的重要原因。“第二经济”的增长动摇了对收入水平的行政控制，并产生了一种更多地受供需规律调节的收入分布状况。20世纪70年代早期，官方大大放松了对农业兼职活动的管制，并鼓励人们从事商品生产。追随在农业领域中获得成功，服务业甚至是工业部门中的小型私营企业（ventures）也受到鼓励。匈牙利的住房商品化程度及第二经济的开放程度是罕见的；还没有哪个东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如此深入的推进。因此，这里将要描述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模式”；我们不大可能去预测东欧其他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这一模式。当前，估计至少有70%的匈牙利家庭拥有来自第二经济的现金收入（仍旧主要来自小规模的生产）。^②根据我们对1982年收入调查（由中央统计局实施）的计算，只有10%的农村家庭（农村家庭约占全国所有家庭总数的一半）没有从事家庭式的农业生产。在剩余的90%的家庭中，来自家庭企业的农业性产出的平均价值约为每月1700福林^③（约相当于一位产业工人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我们至少能够用两种方式对这些数据加以解读：①甚至是在匈牙利这样的

①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Statistikai Évkönyv 1981*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1] (Budapest: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1981), p. 292.

② Anna Boros, “Masodik gazdasag-retegzodes,” [Second economy—Stratification] in *Elmeletek es Hipotezisek* [Theories and hypotheses], ed. Tamas Kolosi (Budapest: Tarsadalomtudomanyi Intezet, 1982); István R. Gabor and Peter Galasi, *A Masodik Gazdasag* [The second economy] (Budapest: Közgazdasagi es Jogi Konyvkiado, 1981).

③ 福林是匈牙利货币单位。——译者注

个案中，人们都会轻易地对第二经济创造收入的能力做过高的估计：毕竟，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得依靠从官方机构挣来的受行政调控的工资。^②不过，由于大约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家庭总收入来自以市场调节价出售的家庭产品或服务；如果我们要想对这些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状况予以真实估计的话，就不得不将这种第二经济所产生的收入纳入考虑的范围。

就目前的分析而言，我们不得不追问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从这一相当独特的再商品化的社会试验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样的有关社会不平等的动力机制？这一再商品化的过程，是否具有我们在先前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平等化效应呢？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有限的肯定（a qualified yes）。

（一）住房商品化中的平等化效应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的关于匈牙利 20 世纪 80 年代住房运作的系统研究资料尚不甚充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对 60 年代和目前住房分配中的社会不平等进行适当的比较。基于手头所掌握的资料，^① 我们认为，住房的商品化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平等化效应。

20 世纪 60 年代，匈牙利（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存在这种可能）至少存在着两种有益于精英的住房体系的运作方式：^② ①他们能够优先获得新建的、质量最好的公共住房，并因此享用政府预算投入到新建公共住房中的大量补贴；②甚至是住房体系的非公共领域也受到了政府再分配干预的分割，规划者情有独钟的，是住户密集的和类似于共同所有权公寓（condominium-type）的住房发展规划，不鼓励每个家庭各自独立建房。住房经济中的各种抵押条款以及附加的间接政府补贴，不过是对这些计划性偏好的反映。另一方面，共同所有权公寓的购买者和每个家庭住房建造者的社会构成，也表现出了阶级分化的特征。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精

① 特别参见 Jozsef Hegedus and Ivan Tosics, "Housing Classes and Housing Policy: Some Changes in the Budapest Housing Mark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7, no. 4 (1983): 467-494; Zsuzsa Daniel, "Berlakas, jovedelem, allami redistribucio," [Rental housing, incomes, State redistribution] *Gazdasag* 4 (1982): 25-42; and Zsuzsa Daniel and Jozsef Temesi, "A lakaselosztas hatasa a tarsadalmi egyenlotlensegekre, 1976-1980," [The effects of housing allocation on social inequalities, 1976-1980] *Statistikai Szemle* 7 (1984): 687-701.

② Szelényi, *Urban Inequalities*, pp. 43-84.

英的住所主要集中在共同所有权公寓中，而自家独立建房的，几乎都是工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村庄中的农民工（peasant-workers）。换言之，精英通过对共同所有权公寓市场的控制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

不过，住房的商品化也通过两种方式制约着精英的特权：其一，分配到新的公共住房建设中的国民收入比例被削减，从而减少了能够从穷人转移到富人的收入的数量；其二，随着政府住房建设基金的削减，规划者被迫去寻找鼓励私人建造住房的各种途径，以便私有住房的增长能够补偿公共住房数量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形下，惩罚最具有活力和最廉价的住房领域，即对工人和农民工家庭的建房行为予以处罚，愈加暴露出其荒谬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住房的抵押贷款条款曾经有过一些松动。因此，放松对住房市场的管制，减少政府对住房领域的干预，对穷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尽管海基达斯（Jozsef Hegedus）和托斯科斯（Ivan Tosics）警告我们，不要过高估计放松管制的程度或政府补贴体系被削弱的程度〕。^①

显然，根据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详尽阐释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尤其是表1和表2所勾勒的理论模式，并不是所有对住房市场的放松管制以及所有住房的再商品化都意味着这样一种平等化效应。之所以要强调指出这一点，主要是想将我们的观点和新古典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的城市政策区分开来。^② 我们所描述的放松管制之所以影响到住房市场，确切地说是因为那里并不存在住房的私人产权。在国家社会主义住房体系中，所谓“私有”或“市场”领域，仅仅是就居住权（owner-occupancy）和建造权而言；在那里几乎不存在能够用于牟利的住房产权（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在住房经济的“灰色”领域中，存在着多元化的产权、出租牟利以及住房投机买卖等现象，但这些现象具有边缘性和偶然性，是违法的或处于半合法状态）。因此，放松对纽约城市住房市场的管制将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在那里，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房东“阶级”，而且在放松住房管制的过程中存在着投机性的投资行为。

公共住房的减少对穷人住房条件的改善的另一个好处是，到20世纪80年代

① Hegedus and Tosics, "Housing Classes," p. 488.

② 对新保守主义城市政策的批评，参见 Michael Harloe and Chris Paris, "The Decollectivization of Consumption: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9 - 1981," *Cities in Recession*, ed. I. Szelényi (London: Sage, 1984), and Ivan Szelényi, ed., *Cities in Recession, Critical Responses to the Urban Policies of the New Right* (London: Sage, 1984), pp. 6 - 13.

早期, 尽管新建的政府住房更少了, 但依据我们所能够收集到的信息, 新的公共住房的配置是以一种更为平等的方式进行的。从理论上讲, 随着次属的市场机制开始在住房体系中得到发展, 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再分配领域也开始变得稍微平等了一些。为了检验住房配置体系中这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或许就已经发生的变化, 我们于 1983 年和 1984 年夏季对数位匈牙利住房领域的专家进行了访谈。一些城市社会学中的领军人物——如亚诺什·劳达尼、盖博·斯堪拉迪 (Gabor Csanadi)、约瑟夫·海基达斯以及伊万·托斯科斯——都认为,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新住房发展项目的社会特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住房发展项目的社会构成是测量新公共住房分配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大多数城市的政府住房建设项目都集中在这些发展项目中)。我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调查发现, 布达佩斯和一些省份城市的新建住宅区大多分布在精英聚居区, 其职业隔离状况与旧的资产阶级居住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资料还表明,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这一现象就不复存在了。新住房发展规划的社会声望也处于下降中。它们甚至开始吸收一些“底层阶级” (lumpen) 的成员, 其对精英的吸引力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1980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事实上也显示出这一趋势。譬如, 1980 年从事“非体力性”职业的人口占新建的拉吉门育斯 (Lagymanyos) 住房项目 (该发展项目的建设完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总人口的 66.4%; 而在贝克斯麦格伊 (Bekasmegyér) 住宅区 (到 1980 年仍处于在建状态) 中, 从事非体力性职业的人口比例下降到 42.5%。^① 贝克斯麦格伊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精英聚居区, 因为它的居民的社会构成状况, 与布达佩斯市的平均水平差不了多少。

这里, 我们将对公共住房领域中不平等状况的下降做出两点评论: ①在购买政府住房的人当中, 具有较高收入群体的比例下降与住房市场的扩张有着直接联系。由于一些新建的私人住宅具有比公共住房更高的质量, 这吸引精英及其子女搬出公共住房。随着面向“富人”的市场的产生, “穷人”获得公共住房的机会得到了提升。②公共住房建造所具有的新的“平等主义”效应, 是相对而言的。尽管较低收入群体获得新公共住房的机会有所提升, 但与高收入

^①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1980 *Evi Nel Pszamlalas*. 35. A. *Lakotelepek Fobb Adati* [1980 Population census, Vol. 35: Main data on new housing estates] (Budapest: Ko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1983), pp. 396 - 397.

群体相比，他们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最近一项关于住房不平等的统计中，苏珊·丹尼尔（Zsuzsa Daniel）和约瑟夫·特莫斯（Jozsef Temesi）认为，在1976~1980年间确实发生了住房条件的改善；但他们同时也承认，“这一改进并不足以改变自1976年以来就存在着的最初的住房结构……住房条件中所存在的不平等，依旧要远远高于收入分配中所存在的不平等……与具有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相比，处于收入分布最底层的10%的家庭，仍然要为相同质量的住房多支付超过25%的价格”^①。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住房经济中的基本结构保持着再分配的特征：政府的再分配仍然在制造着住房领域中主要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之所以得到缓解，是由于次属机制——市场——发挥了作用。

（二）第二经济的平等化效应

就像住房市场对住房配置具有平等化效应一样，第二经济的扩展对收入分配也具有类似效应。从意识形态上看，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通过“按劳分配”的业绩原则（meritocratic principle）将其收入分配的体制合法化的。在实践中，测算工作产出的依据常常是文凭即正式的资质证书以及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这里的一个潜在而又未曾得到证明的假设是，劳动生产率与正式的资格水平是成正比的）。结果是，资质水平和收入之间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截断（cross-cuts）了这种收入不平等的体系，这一点在农业性的家庭商品生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我们自己对1982年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收入调查数据的测算，农业体力劳动者群体从第一经济中获得的收入最少，他们从第二经济中获得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有更高的比例。一般来说，如果将农业中的第二经济考虑进去，则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会比以前要小。

工业中的第二经济是如何影响收入的不平等的？要想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可靠的数据更为缺乏；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工业中的第二经济现象比较多元化，而且其所引发的一些结果彼此之间更加具有矛盾性。在工业性的第二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部门当属私人建筑业，它可以在较低的技术水平下运作，也吸收了大量的非技术劳动力就业。似乎有理由去推

^① Daniel and Temesi, “A lakaselosztas hatasa,” p. 699.

测，通过在建筑业兼职或者周末在小型私营企业里打零工，收入低下的非技术劳动力能够提高自身的收入，并缩小其与高技能工人及专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不过，这一推论未必适用于服务业，因为在那里主要是技术性工人在从事第二经济。当然也有一些企业，譬如兼职的咨询企业，就能够为高技能人士特别是工程师提供第二经济的创收机会。在农业部门中，第一经济收入和第二经济收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而在非农业部门中，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或许并不存在。按照陶马什·克洛什（Tamás Kolosi）的说法，第二经济“截断了第一经济中的劳动分工”^①。在更近的一本著作中，他在某种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见解，他认为，“人们对第二经济的参与并未对当前的匈牙利社会造成分层效应”；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在第一经济收入和第二经济收入之间，他并不能发现任何相关性。^②

工业性第二经济的一种最新形式即所谓的“企业工作集体”（enterprise work collectives）组织，似乎也表明“市场造成的平等”与“再分配造就的不平等”是相互对立的。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工人们被容许以契约为基础组织这样的“企业工作集体”；如此，他们能够在正式工作时间之余作为公司的外包工继续从事工作。“企业工作集体”以外包承包者的身份获得报酬，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小型的私营公司。正式企业的内部工资计划对“企业工作集体”成员的收入分配方式并不能产生约束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企业工作集体”内部，工人所挣得的收入的分配是高度平均化的；能力差异和管理服务在分配中并没有得到显著的体现，企业的工资差异也被忽略了。^③在官方要求的时间里，工头、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挣得不同水平的工资；而在工作时间之余，也就是当他们为自己而工作的时候，同样的一群人就会平均地分配所获得的收入。“企业工作集体”的成员常常从他们所工作的“市场”中获得同等的报酬；而当他们在为其官僚的雇主工作时，却赚取着不同的收入。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工人在“企业工作集体”中的生产率通常要远远高于其在官方工作时间内创造的生产率。

① Tamás Kolosi, *Elmeletek es Hipotezisek* [Theories and hypotheses] (Budapest: Ta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1982), p. 50.

② Tamás Kolosi, *Status es Reteg* [Status and strata] (Budapest: Ta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1984), p. 208.

③ Peter Szirmai, “Kisvállalkozások,” [Small enterprises] *Heti Világgazdaság*, July 23, 1983.

所有上述这些新情况都支持我们最初的假设：在再分配作为主导整合模式的经济中，市场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校正角色；而在那些再分配导致了主要不平等的经济中，市场则会纠正和减少这些不平等。

四 由市场所导致的不平等

考虑到匈牙利在过去数年中所发生的事实，我们愿意对上述假设予以一定程度的修正。基于可供利用的证据，现在我们认为，正在浮现的市场机制也开始产生出新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的发展方向具有以下几个趋势：①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关于分层或不平等的双重体系。新的企业家阶层正在浮现，且就其获得稀缺商品和服务的便利性而言，他们的特权将接近于干部精英的特权。②至少有一部分干部精英学会了如何利用市场；如此，他们成功地将自己以前的官僚特权“商品化”。③我们能够在社会等级的底层发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仅是再分配领域中被剥夺得最厉害的一群人，而且他们也并没有获得来自市场的帮助。由于缺乏进入市场的能力和（或）资本，随着再分配机制地位的相对下降，事实上，他们的境况要比市场改革前的境况更为糟糕。

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张以及小型私有商业政策的放宽，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兴起了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匈牙利是这一过程的引领者，波兰则紧随其后，尤其是在后团结工会时代；最近，中国的发展似乎也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一些评论者将苏联所发生的“第三经济”看作是这种企业式发展的一种雏形）。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匈牙利开始出现一个数量较少但颇具活力的新企业家阶层，其私人占有或控制的资本性资产，个别的可达到数百万福林（在工业中其平均收入是每年约6万福林）。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或许是一个名叫德索·科斯佐（Derso Koszo）的人，他是匈牙利南部的一个叫莫罗哈罗姆（Morahalom）的大型村庄中的一位五金店老板。据匈牙利电视台对他的一次采访以及其后《移动世界》（*Mozgó Világ*）杂志的报道，这家商店的年营业额超过了100万福林。① 魔方（Rubik Cube）的发明者厄尔诺·鲁比克（Erno

① *Mozgó Világ*, “Interview with Derso Koszo entrepreneur” 7 (1984): 93-104.

Rubik)^① 是这一“超百万富翁”俱乐部中的另一位成员（其资产估计价值为3000万福林）。虽然缺乏可靠数据来测量个人控制的资本数量，而且我们从匈牙利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一数据的估计也相差甚大，但我们还是相信，存在着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或许是很多家庭），其生产性投资的资本数额在1000万到1亿福林之间。以美元的价值衡量，这并非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目（按当前的汇率，相当于20万~200万美元）；不过，如果将这笔财富与个人的年收入进行比较，并考虑到这笔财富大部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积累的，我们就能够对新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动力机制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拥有上千万福林资产的家庭毕竟是少数，不具备典型意义（我们怀疑，这种快速的资本积累大多发生在商业领域且常常具有投机的性质）。在新企业家阶层中，更具典型意义的成员，是那些从事农业或工业消费品生产的小生产者。在纪录片《地球上的天堂》（*Paradise on Earth*）^② 中，帕尔·朱哈慈（Pál Juhász）和帕尔·施凯夫（Pál Schiffer）对来自农业城市斯曾特斯（Szentés）的一个名叫可瑞可思（Kerekes）的种植西红柿的家庭进行了访谈。该家庭经营着一个极具活力的、面向市场的企业；其资本投资在100万~200万福林，这对于一个全天候运转且在旺季偶尔雇用带薪劳动者的商业农庄的运转而言，是足够的（可瑞可思目前仍然在为家庭产业的存活而挣扎，因为他们不得不在黑市上以令人望而却步的利率——每年30%——借贷其大部分资本。但如果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性资本，他们就可以生活得不错，并会迅速扩大生产）。像这样运作的家庭式企业的数量，或许已经达到了数万个（约占所有家庭数量的2%~5%）。

因此，一个新的精英群体似乎正在从经济体的市场领域中浮现出来，他们的特权乃是基于对资本性资产的占有，而不是由于其在官僚等级制中的级别。总之，这两种精英的存在以及分层和不平等的双重体系（正如图1所示的那样）已经成为一种很明显的事实（特别是在乡村）。1984年夏季，我们游历了匈牙利数个区域的村落，令我们印象至深的是，在这些乡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家庭住房类型。传统意义上的匈牙利乡村社区几乎都是由一层住

① 魔方是匈牙利建筑学教授和雕塑家厄尔诺·鲁比克于1974年发明的机械益智玩具。据估计，自发明以来，魔方在全世界已经售出了1亿多个。——译者注

② 该纪录片片名的意义，在其英译的片名中大都缺失了；在匈牙利语中，单词“paradicsom”既有西红柿又有天堂的含义。

房构成，缺乏两层建筑差不多成为一种民族特征（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村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两层住房都是很常见的）。匈牙利乡村中的第一轮住房建设的高潮，是由农民工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发起的，那时建造的主要是一种新式的一层住房。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突破：人们开始建造两层的家庭住房。这种两层“别墅”突然之间成为乡村地区流行的住房式样。在乡村之旅的过程中，我们试图确认这些新的“住房阶级”或住房所有者与居住者的社会阶层位置。当我们询问这些流行的两层“别墅”的所有者或居住者的职业的时候，当地人的回答常常是农业合作社的主席、党支部书记、农业工程师、地方议会（即苏维埃）的主席，或成功地打入市场的园艺主、奶牛农场主、私营的烤面包店的师傅、花店老板等。从这些零星的“民族志证据”中可以发现，精英似乎正来自两个不同的极端（bi-polar）。要想优先获得令人羡慕的和稀缺的物质商品，有两种机制：一种是在官僚等级制中的级别；另一种是资本的所有权或企业家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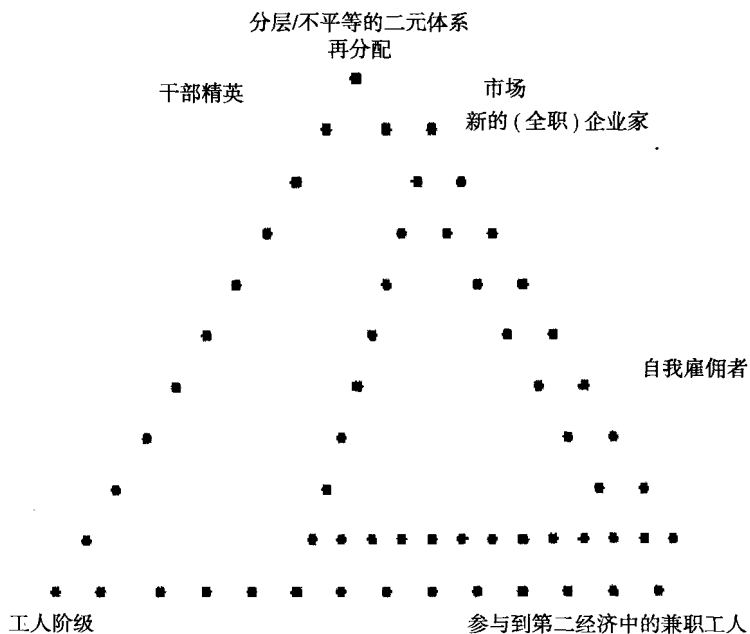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家“暴发户”(Nouveau Riche): 市场中诞生的第二种精英

（一）再分配特权的商品化

有一种假设认为，只有新的企业家阶层才利用了这些新的市场机会所带来的好处。这是一个相当具有误导性的假设。因为就其与市场的关系而言，干部精英自身也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干部精英（对其规模进行确切的计算，需要更为详尽的经验调查）同时享有官僚特权和市场特权。我们不得不做出自我批评，我们在早期著作中低估了干部精英的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过去十年中所表现出的适应力被证明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他们不是坐等市场逐渐剥夺其先前的优势地位，而是学会了如何去利用市场；或许可以说，如果他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如何从市场中谋取利益的话，他们就会赞成市场化的改革。

我们将再次以住房为例来说明这一“再分配特权的商品化”过程；尽管这里所使用的案例仅限于住房领域，我们相信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在过去的十年里，住房经济领域中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家庭财富，其主要原因在于房屋价格通货膨胀的速度要快于一般的通货膨胀率。由于住房经济是一个被分割的体系，因此，从这一高于平均通货膨胀率中产生的资本收益，其分配是相当不均衡的。那些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占据着“主要的住房市场位置”的人攫取了这些资本收益中的大部分，他们在城市或快速成长的村落里的私有住房质量好、房子新；而正在衰落的小乡村的居民、质量较差的住房的所有者，或居住在里面的租客，则并没有获得这种资本收益。以下这些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住房聚积（convergence）（或商品化）的手段。

（1）调节公共住房的立法发生了变化，早期的公共住房黑市也变得半合法的了。那些向地方当局上交本来属于政府的住房的人，能够从当局那里获得一笔资金，其价值相当于一套同等质量的私有公寓的价值的 50%。那些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早期完全免费获得国有住房的干部精英，现在可以将其早期的官僚特权资本化。^①

（2）一些具有很高质量的公共住房被重新私有化。许多奢华的战前的资产阶级别墅被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给其居住者（主要是干部精英中的成员）。

^① 关于住房政策变迁的讨论，参见 Ferenc Boroczfy, ed., *Velemenek, Vimk Lakaspolitikankrol* [Pinions and debates about housing policy] (Budapest: Kossuth Kunyvkado, 1983)。

从而，这些人由于在党内高级岗位或政府岗位上任职而获得的别墅，现在也能够被转化为私有财产。

(3) 公司可以利用的基金以及特别是拨给党政机构的资金本应该用于解决其雇员的住房问题，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却越来越多地被其主管们用于补贴私有住房的建设（早些年，使用这种基金建造的住房会成为政府的资产）。其中一个有影响的公有产权公寓发展项目，即所谓的珀兹索伊街道房地产项目（Pozsonyi Street Estate），就属于这种干部公寓（cadre condo estate）项目，地点位于布达佩斯市佩斯（Pest）北部的中心地带；^① 据说，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公寓是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补贴给其员工的。干部精英的成员们还利用这些公司组织或补贴的公寓发展项目为其子女建造住房。通过这种方式，基于等级的特权开始与基于财富的特权合流。而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通常是干部精英子女的异议知识分子，往往也是这一体制的受益者。

(4) 市政部门已经开始将那些处于中心地带、具有很高价值的城市土地，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位“批租”（lease out）给干部精英的成员们。这一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宣称，那些被认为不具有高附加值的政府土地不应该被私有化；但是，由于这些土地的租约长达 99 年，它们在事实上是以补贴价格被私有化了。而为精英修建的各种新的豪华别墅正建造在这些土地上。

住房领域或许是这种“再分配特权的商品化”得以发生的最为主要的领域；正是在这一领域，官僚的各种特权转化为市场特权。因此，通过投资房产致富是安全的、合法的，甚至能够赢得社会的尊敬。或许，还存在着其他“官僚特权的商品化”的途径，但这些途径看起来更像是“腐败”；因此，这些“官僚特权的商品化”方式或更为隐蔽，或很少发生。例如，某些“第二经济”中的收入或许并非依靠市场。普通群众常常相信，“企业工作集体”组织或兼职性的私人咨询企业为了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会将其部分收入转移给在职官员。对于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或者说这一现象的普遍程度，我们无法加以判断。不过，到目前为止，本文的主要观点应该说是明朗的：在两种不平等的机制（即我们图示中的两个金字塔）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线；导致两种

^① 布达佩斯市由位于多瑙河西岸的布达（Buda）、东岸的佩斯（Pest）和欧布达（Obuda）三个地区组成，因而得名。——译者注

类型的特权累加的各种力量正在发挥着作用；而且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这些力量很可能变得更为强有力。

（二）劣势的积累

在社会等级体系的另一端发生了一种类似的积累过程，即各种劣势（disadvantages）的积累过程。那些在再分配领域中社会经济地位最为低下的群体，最不可能从市场中获得改变其不利地位的机会。尽管对平均收入或稍低于平均收入的群体来说，住房市场的扩张是有好处的，但社会中最为贫困的阶层却不太可能通过市场解决其住房问题：他们首先缺乏的恰恰是进入市场的必要资本。此外，第二经济的社会受益面并未拓展到社会等级体系的各个层面。那些在再分配领域中处于最为不利地位的人并不能获得市场性收入（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约30%的人口没有来自第二经济的收入，且该区间人口的分布指向收入分层的底层）。这一点，颇值得引起社会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为自从1979年以来，人们从“第一经济”中获得的实际工资已经处于下降或停滞状态。只有通过提升第二经济的重要性，才能够阻止大量人口的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对总体人口而言，来自第二经济的收入的增长能够补偿来自官方职业（bureaucratic employment）的实际收入的下降；但这一补偿效应对于收入分层底部的那些人来说并不起作用。这里正在发生的，是一个真正的贫困化过程。

在关于第二经济和市场改革的普遍的兴奋中，艾勒梅·汉基斯（Elemér Hankiss）是少数几个注意到这一贫困化过程的社会评论者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对将社会福利领域的快速改革与工业领域中慢腾腾的改革联结在一起的做法提出了警告。^①他指出，随着消费领域的补贴在市场化改革的名义下被削减，消费品的价格朝着与世界市场的水平一致的方向上涨。但是，如果退休金、家庭补贴以及政府福利支出在总体上并未与通货膨胀的速度保持一致的增长，其实际价值就会下降；老人、穷人以及残疾人就会在不断下降的实际收入和不断上涨的价格的双重夹击下煎熬。同时，市场改革的推进并不具有类似生产领域中的那种活力。主要企业和重要工业机构的经理，由于具备老人、穷人以及残疾人所缺乏的政治影响力，因而能够对政府补助的削减措施予以成

^① Elemér Hankiss, “Kinek az érdeke?” [In whose interest?] *Heti Világgazdaság*, November 27, 1982.

功的抵制。他们力图维持其所在公司预算约束的软化状态，抵制或至少拖延市场化的改革。吊诡的是，在那些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即国有工业的要害部门，东欧的经济改革成效甚微。汉基斯建议，改革应该直接反对各类产业大亨（the barons of industry），并保护穷人免受改革所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影响。

汉基斯对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批评，提醒我们去注意自由主义者对里根经济学的批判（这里指的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批判）。在向往一个“更小的国家”和减少政府的职能方面，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常常会同意新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但是，他们痛恨里根经济学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因为在这种经济学中，福利国家的功能被削减了，而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以及通过丰厚的防务合同而给予军工业的国家补贴）的职能却得到了扩张。汉基斯对这种市场化改革的渴望表示赞同，但却反对以下的改革战略，即只在那些较少遭到抵制的领域（如福利领域）进行改革——仅仅因为遭到官僚的反对，就延迟改革那些最需要变革的领域（如生产领域）。

（三）市场产生的不平等可能引发的某些政治后果

市场所产生的未曾预料到的不平等效应，使得一种反市场改革同盟的建立成为可能。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指出，市场改革运动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① 按照塞果（Andrea Szego）的说法，我们有可能预见到一个由“干部知识阶层”（cadre intelligentsia）（这是她对党内保守官僚的称呼）和工业无产阶级组成的“非神圣同盟”（unholy alliance）（这是我们的术语，塞果是这一同盟的意识形态的辩护者而不是一个批判者），^② 这一同盟将反对知识阶层中的改革派和第二经济中的“新经济人”（Nepmen）^③。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部分党的领导阶层试图在工人反对运动（ouvrierist opposition）的意识形态指引下去执行一种反改革的、保守的、倒退的政策。保守力量集结在各种工会官僚机构中，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名义下，发

① Tamas Bauer, "A masodik gazdasagi reform es a tulajdonviszonyok," [The second economic reform and ownership relations] *Mozgo Vilag II* (1982), and Andrea Szego, "Gazdasag es politika—erdek es struktura," [Economy and politics—interest and structure] *Medvetune* 2-3 (1983): 49-92.

② Szego, "Gazdasag es politika," pp. 79-89.

③ 在20世纪20年代，那些受益于倡导私有商业措施即所谓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的暴富的企业家，在苏俄被称为“新经济人”。

动了一场反对经济改革的攻击。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农业工人。守旧主义者认为，1968年的改革给了农业工人太多的好处；他们宣称，一种收入的鸿沟已经被制造出来以便迎合缺乏技术的乡村无产阶级，从而牺牲了城市中心领域中具有较高技能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采取严厉的措施去限制他们认为是过高的乡村地区的收入。尽管守旧主义者在当时并未获得太多的公众支持，他们却成功地通过了反对农业工人的立法（譬如，宣布私有拖拉机是非法的，对家庭购买私人货车予以限制，等等）。但这一立法的效果适得其反，它导致了农产品产量的下降和城市市场上水果与蔬菜价格的上扬。结果是：在1975年左右，守旧主义者败给了党内的改革派。现在，塞果建议考虑复兴这种反市场改革的“工人反对运动”的可能，她还为党内的这一派别设计了一项政治和社会规划（参见其对自由主义市场改革所潜藏的资本主义—复辟主义意涵的全方位批判）。^① 她相信，这次市场改革的反对者或许会变得更为强大和更加成功，因为市场所导致的负面效应已经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范围——这一次，她或许说对了。^②

官僚集团将成为这一反对阵营的核心。^③ 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就其与市场化改革的利益关系以及对市场化改革的态度而言，干部精英已经成为一个分化的群体。

有相当数量的精英人士不能够获得来自第二经济的各种物质利益，他们的权力也因为各种针对再分配的限制而遭到侵蚀。毕竟，一个县的党委成员或工业企业中全职的党委书记能够从第二经济中得到什么创收机会呢？在最近几年中，党政机构中的高层以及尤其是中层的大部分干部、工会官员和武装力量人员等，都经历了一个物质特权被逐步侵蚀的过程。改革呼声渐起，譬如，人们要求将经济从政治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决策分权、赋予市场更多的空间并限制再分配的范围等，这些呼声无不在警示，官员的权力将遭到更进一步的侵蚀。事实上，在大多数东欧国家，正是这一部分人从1968年起就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功地阻挠了改革的进行（在波兰则带来了灾

① Szego, "Gazdasag es politika," pp. 79 - 89.

② Andrea Szego, "Vita a reform-alternativakrol," [Debatas about the reform alternatives] *Kritiku* 6 (1984): 3 - 5.

③ 关于知识分子精英的内部分化，特别是关于这一机构的特征与利益的论述，参见 Ferenc Fehér, Agnes Heller, and George Markur,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p. 56 - 65.

难性的后果)。^① 不过, 匈牙利改革运动的部分成功, 却可以归结为这种存在于精英之中的党内官僚势力相对弱小, 这也是匈牙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色。值得注意的是, 在匈牙利, 这一官僚势力依旧在觊觎权力中心; 目前, 他们遭受的挫折或许越来越多; 但正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 随着守旧主义运动的复兴, 他们或许会卷土重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大众的支持。

随着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一些不平等后果的凸显, 守旧主义运动可能会变得相当受欢迎。城市中工业无产阶级中的核心成员, 如高技能工人, 尤其是重工业中的技术工人, 构成了由守旧的党内官僚所引领的反改革运动的最为重要的潜在盟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 再分配机制处于垄断地位, 工人阶级中的这一部人获得了最优厚的报酬并最受掌权者的青睐。但现在, 他们最不可能获得来自第二经济的收入; 且随着经济理性化改革的推进, 以及亏损的重工业的倒闭, 他们正面临着失业的威胁。一些评论者认为, 之所以建立“企业工作集体”组织, 原因正在于当局试图对核心重工业领域中无产阶级相对恶化的经济状况予以补偿。^② 在我们1984年夏季所做的访谈中, 中央计划署的官员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 “企业工作集体”是送给核心城市工业中的高技能工人和管理者的一种“筹码”(chips)。^③ 如果我们将“第二经济”中的工作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小型家庭商业中兼职性质的自雇佣工作, 另一种是大企业的“企业工作集体”中的工作——则可以说前者主要是为“边缘”工人提供了增加收入的可能, 而后者则增加了“核心”工人的收入〔关于“边缘”与“核心”工人的分析, 参见卡萨巴·麦可(Csaba Mako)的研究工作〕。塞果和斯塔克都认为, 既然“企业工作集体”组织的建立, 是在政府放宽对兼职性的自雇佣工作的控制之后, 那么它就可以被看作是政治领导层的一种有意识的举措, 其目的在于创建一种制度, 使核心工人也能够分享第二经

① Robert Manchin and Ivan Szélenyi, “Eastern Europe in the Crisis of Transition,” *Social Movements versus the State: Beyond Solidarity*, ed. Bronislaw Misztal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85).

② Szego, “Gazdasag es politika,” p. 88, and David Stark,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Firm and the Macro-politics of Refirm—New Forms of Workplace Bargaining in Hungarian Enterprises,” *States vs. Markets in the World System*, ed.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Evelyn Hubert Steven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5).

③ 亦可参见卡尔曼·鲁普关于大型企业以及半私有化领域中利益冲突的著作: Kalman Rupp, *Entrepreneurs in Re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p. 223–229.

济中的一些好处。这些“企业工作集体”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将核心工人整合到改革的进程中去，要回答这一问题，现在还为时尚早（塞果对其成效持怀疑态度，而斯塔克则更为乐观）；但如果这些举措失败了的话，守旧的党内官僚与处于衰落的重工业中的核心工人之间的政治联盟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工人反对派”，主要是力图将自身建构为城市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新的守旧主义反对运动延续了这一传统，同时也开始将自身表现为社会福利的捍卫者。在两种分层体系中所产生的劣势积累而导致的“贫困化”过程，事实上指向了反市场改革联盟的第三类潜在盟友，即那些老年人和特困户；他们被排斥在新的市场机会之外，削减政府费用的紧缩措施对他们的打击显得特别严重。

在这一部分持守旧主义立场的精英中，最能够发出声音和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工会官员们。这一点并非出于偶然。在东欧，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转变使得独立的社会福利制度被全面取消。于是，这一在西方通常是由政府福利性官僚机构执行的功能大多被工会接管。工会官僚机构更多地是支持再分配体制而较少赞成市场体制。因此，他们同时创建了一种新的政治联盟体制，以便维护其特殊的官僚利益和对大多数福利支出的控制权。

本文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东欧整个改革运动的政治脆弱性。保守的守旧主义者是否一定支持解决社会福利问题？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能否创造出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信且可行的社会政策蓝图？

在这里，匈牙利近期的社会福利改革史是颇具启发性的。几年前，在该国的一位社会学领军人物苏珊·费尔格的领导下，匈牙利政府和党实施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计划。这一社会政策研究小组不仅从事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且被委以设计社会政策改革方案的重任。^① 该研究小组提出的建议是，成立新的社会福利部（Ministry of Social Welfare），并在全国建立下属机构——这意味着政府再分配的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建议遭到了忙于削减政府机构数量（譬如，他们刚刚撤销劳工部，并将几个专业部门合并到一个名为产业事务部的单一部门中去）和削减中央政府预算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们的极端怀疑。他们的

^① Zsuzsa Ferge, et al., *Javaslat a Szociálpolitikai Rendszer Módosítására* [Proposals for the modifica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social policy], Manuscript (Budapes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82).

目标是减轻行政管理权过分集中的程度，并通过削减政府支出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对这些经济改革者而言，增加社会福利部这一新部门的想法以及增加政府预算，似乎正是对改革精神的背叛；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将社会改革者们贴上诸如“保守的”、“反改革的”之类的标签，并指责他们实际上与守旧主义者是一丘之貉。社会改革者们对贴到他们身上的“保守的”标签感到颇为不满，他们并不想被认为是守旧主义者们的盟友。帕尔·扎维达（Pal Zavada）这位社会政策研究小组中的年轻成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的手稿中颇有说服力地指出，要将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统筹起来。^① 考虑到经济改革运动的政治脆弱性，这一统筹不仅是值得向往的，同时对于继续推进经济改革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统筹呢？追求这样一种两难的政策是否可能，即一方面要求它反对再分配、扩张市场领域和硬化预算约束，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够促进社会福利？我们的早期论文由于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会带来平等，因此这种统筹显得相当简单。而一旦考虑到正在浮现的由市场所产生的各种不平等，这种统筹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任务显然要比我们当初所预想的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承认，即使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也会产生各种不平等，那么，呼唤这样一种既反对再分配同时又支持社会福利的政策，是不是要求政策制定者们去完成一项“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简要概述经过修正的理论；我们相信，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我们能够制定这样一种统筹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政策。同时，我们也将详细说明我们的分析所包含的一些政策意义。

五 理论的和政策的结论

（一）对“再分配非公正”理论的反思

我们关于“再分配非公正”的“修正版波兰尼理论”，不得不根据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导致不平等这一经验事实来加以修订。我们仍然坚持我们初

^① Pal Zavada, *Gazdasagi Reform Szoeiulis Reform* [Economic reform, social reform], Manuscript (Budapes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83).

始理论的基本原则，即市场并不会天然地导致不平等，再分配也不是天然地就会产生平等，总是主要的经济整合模式造成了不平等的基本结构。不过，我们承认，次属的机制也能够产生其自身的不平等（我们称之为二次不平等）；此外，更值得社会政策制定者注意的是，或许有一种力量正在将主要的不平等与二次不平等混合起来或累加起来。

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早期论文中的一些看法是颇为幼稚的，譬如，关于福利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再分配具有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西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确实能够实现某些平等化的客观目标。例如，在一些拥有大量公共住房部门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若不将住房花销纳入统计口径，其不平等的程度要更大；而在计算实际收入的时候，一旦将国家对公共住房的补贴也纳入进来，则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①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福利再分配确实也会产生一些不平等。譬如，正像大量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免费的高等教育——西方国家存在着这样的制度——就意味着数额庞大的国民收入通过再分配从穷人那里向富人转移。毕竟，这些大学的学生主要是中产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的子女；相对而言，穷人或工人阶级的子女进入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可能性较小〔参见理查德·布兰迪（Richard Blandy）的研究工作〕。或许，我们能够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的这一状况称为“市场特权的科层化”（这里套用了我们的“官僚特权的商品化”这一概念）。这意味着富人学会了如何利用各种国家科层制度，尽管这些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对他们的特权加以限制。换言之，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和福利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平等的产生是一个颇为相似的过程；在这两种体制下，处于补充地位的机制确实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次级不平等。

同样，我们认为，这一证据并不能用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混合经济或市场化改革，或者用以反对福利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福利再分配。这些次级不平等显然要比初级不平等轻；为了达到完全取消不平等的目的，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些次级不平等，并将其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政策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无能为力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福利体制要求将各种社会政策工具结合起来以便应对各种不平等，同时特别注意去防止因分层的竞争性体制所导致的劣势积累。在一篇优秀的论文中，科尔奈将

^① 参见 Ronald Henderson, *Poverty in Australia* (Canberra: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s, 1974)。

经济学与医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医生为病人开出药方一样，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出有疗效的操作方案。^① 一个国家的经济常常会受到好几种“疾病”的困扰；经济学家必须决定应该优先考虑应对哪种疾病，因为在应对一种疾病的同时，常常会导致另一种疾病的恶化。科尔奈的隐喻同样可以被运用到社会政策中去。与各种药物一样，每一种福利工具都具有其副作用。大剂量地使用这种药物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或许有必要开出第二剂药方，去抵消第一剂药方所产生的令人不舒服的副作用。

但是，这种能够抵消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各种不平等后果的“令人不快的副作用”的“药方”，即社会政策工具，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它就是再分配？在西方，再分配对于纠正市场所产生的不平等是有效的，为什么不能够同样将其运用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呢？围绕这些问题，社会改革者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一次和本文的一位作者的谈话中，苏珊·费尔格这样说道：“为了实现各种社会政策目标，再分配是多多益善的。”她的看法是正确的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有限的肯定——因为它取决于再分配的性质。

至此，我们不得不对“经济的”再分配和“福利的”再分配进行区分。让我们再次使用科尔奈的隐喻：若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策所“开出”的“药方”是“普通药物”（再分配），这就会加剧初级的、最初的疾病（再分配导致的不公与经济无效的并发症），这对“国家的社会健康”造成的损害最终将超过它所带来的益处；因此，要寻求一种能够抵消次级不平等的政策工具，就不得不创造“第三种机制”。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第三种机制”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市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机制或许与再分配机制十分“相似”，但由于其更深层次的目标是防止初级与次级不平等的积累，它必将与占支配地位的再分配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突破关于再分配的通常概念，并澄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导致不平等的再分配机制的性质，然后努力去想象另一种能够满足“第三种机制”要求的再分配类型。我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调节机制是“经济再分配”（economic redistribution）；但我们也能够想象，存在着一种与之有明显区别的“第三种机制”——“福利再分配”（welfare redistribution）。这就是我们所提供的解答上述所谓“不可能完

^① Janos Kornai, "A nemzetek egészsége," [The health of nations] *Valóság* 1 (1983): 1-12.

成的两难任务”的答案的本质所在：这样一来，社会改革者们就能够一方面参与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中，去批判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再分配”；另一方面又通过削减经济再分配，呼唤更硬的预算约束；同时又赞成“福利再分配”。

但是，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区别呢？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在作为经济再分配者与作为福利再分配者时，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在前一种活动中，它扮演的是一种“经济国家”（economic state）的角色，国家此刻作为企业所有者和雇主而存在。^①而在后一种活动中，国家执行的是“政治国家”（political state）的功能，此时国家将人们视作公民（citizens）而不是雇员。因此，随之而来的一个推论是：只有经济国家与政治国家彼此在制度与财政方面至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的情况下，才可以对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予以区分。其次，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标或社会功能。通过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再分配机制，国家对再生产的动力与比例进行调节；国家从企业提取“剩余”或财政收入，并为了扩大再生产对其进行再分配。而福利再分配的目标则是将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从公民中征收）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人，从富人转移到穷人，从经济活跃的部门转移到非营利性组织，从健康人转移到病人，等等。再次，这两种类型的再分配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一般而言，更多的经济再分配意味着更高的积累率和更快的增长率，但同时也意味着更软的企业预算约束。尤其是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国家要想通过从企业提取财政收入并强制性地对这些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达到有效行使其所有权的目的是，那么它的固有属性就是不得不软化预算约束。科尔奈也注意到，在预算约束的软化程度与经济再分配以及积累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他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企业具有“无法满足的投资饥渴症”。^②更多的福利再分配则会限制积累率的增长，但不会对生产性企业预算约束的软硬造成什么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统筹能够建立在对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进行区分的基础之上的主要原因。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因

① 关于国家经济功能的有趣讨论，以及对“所有权”（ownership）和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功能的区分，参见 Taniau Sarkozy, “Szervezetrendszeri adalekok az állam gazdasági szerepének újracélelészéhez,” [Organizational considerations for a re-evaluation of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s] *Valocag* 10 (1983): 14–16, 1–22。

②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pp. 191–195.

为据称软预算约束是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主要症状——短缺——的最终原因。^① 如果将福利再分配与经济再分配从制度上和财政上予以分离，那么，在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程度与福利预算的规模之间就不再存在什么联系了。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指出，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们对经济再分配持批评态度，他们试图尽可能地削减经济再分配。但是，这一改革主义（reformist）的“削减”也有着其社会学的局限性：尽管这样做可以大大缩减经济再分配的范围，但只要该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还存在，这种经济再分配就很可能依然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主要调节机制。只有资本货物的再分配配置被资本的市场配置所取代，这种经济再分配机制才会停止发挥其作为主要调节机制的功能。而这一变化，无疑意味着放弃有效的国家所有权，意味着基本权力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这很难说是改革主义者们所能够完成的任务。在过去的数年里，更为激进的匈牙利经济改革者们已经开始计划着创立各类投资品市场。我们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甚至是在资本配置领域，再分配权力都会遭遇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一种“激进的”的国家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或许也会为资本货物的市场配置留下若干空间，但这些空间仅仅是在再分配制度所设定的逻辑与框架之内。在本文中，我们的假设是：在可以预见将来，东欧社会并不会发生“革命性的”结构式变化；这些社会将仍旧维持其国家社会主义特征，其经济体系虽然经历了改革但仍保持着再分配整合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约束条件，我们对社会政策的性质进行了探究。我们对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所做的区分，也假定经济再分配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

表3 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差异的解析

特征	再分配的类型	
	经济再分配	福利再分配
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经济国家而存在；企业的所有者和雇主	作为政治国家而存在，国家 vs. 公民
干预的目的	对再生产的动力与比例进行调节	将收入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人
资金来源	财政收入、利润	税收
社会经济后果	增长率的最大化，软化预算约束	限制增长率，但又不会软化/硬化生产性企业的预算约束

^①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pp. 191 - 195.

让我们从历史的和分析的双重角度对这两种形式的再分配机制之间的差异予以区分。从社会政策观的角度来看，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粗放式增长阶段（在该阶段，再分配实质上拥有垄断地位）是有问题的，因为此时根本就看不出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之间的区别。尽管中央计划权力常常通过兼顾社会公平而努力维持自身的合法化地位，但它的主要功能却在于实现经济目标，即“促进”或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在粗放式增长阶段，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获得了很高的积累率，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把精力放到消费领域——无论这种消费是私人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而是放到了“生产性投资”上。这就是为什么费赫尔（Ferenc Fehér）、赫勒（Agnes Heller）以及马库斯（György Márkus）等将这种经济体制称作一种“对需求的专政”（Dictatorship over Needs）的原因。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以及发展经济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优先地位压制了对于福利问题的考虑，并直接导致了不平等主义（inegalitarianism）的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各种“经济刺激”方式的集体消费资料，其分配也是不平等地向特权者倾斜，且都被整合到早期社会主义的论资排辈的薪酬体系（meritocratic reward system）中去了。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各种经济和福利的功能设置被打倒并被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再分配体系中，这对社会政策造成了破坏性后果：它不仅要为该体系中的不平等负责，而且也使得社会公平的观念一文不值。

因此，这里我们要从分析的和历史的角度，质疑费尔格的假设（尽管我们对她的其他杰出的研究工作颇为推崇）：再分配是多多益善的。我们的观点是：更少的经济再分配和更硬的预算约束，或许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市场，而且意味着越来越有效的福利再分配。

因此，我们所确认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第三种机制”，即福利再分配机制，既能够有效地阻止次级不平等的发生，又能够防止初级不平等和次级不平等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这样的一种“第三机制”是否也正在运行之中或处于形成之中？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存在着“第三种机制”发展的“余地”，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再分配也产生了自己的不平等，而且通过“市场特权的科层化”也出现了初级不平等与次级不平等的积累效应。但是，在西方，这一“第三种机制”将是什么样子的呢？运用我们的分析逻辑，我们预计，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这种第三机制应该至少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它应该是非科层化的；其二，它应该是非

营利性的（这样，这种“第三机制”才能够与第一机制和第二机制完全区分开来）。提到这种机制，我们首先会想到慈善机构或私人慈善事业。事实上，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们确乎建议削减福利再分配并以私人慈善事业取代其位置。新右派抨击福利国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认为科层化的政府再分配并没有到达真正的穷人那里，而常常作为施舍（handouts）被发放到那些并非真正需要它们的人手中。当然，关于私人慈善事业的设想并没有多少新意。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慈善事业不能够完全发挥作用，才需要去建立政府再分配制度。那么，为什么慈善事业现在就能够发挥作用了呢？关于“第三种机制”前景的一个更具有“左翼”政治色彩的设想是自助（self-help），即将公共资金用于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使其具备照料自己的组织能力，而不是通过发放免费券而令其感到羞辱。譬如，面对因营利部门无力创造出足够多的工作岗位而导致的失业问题，与以失业福利的形式发放政府免费券（以及处罚各种“自助”行为）相比，鼓励人们参与到非正式经济中难道不是一种更为友好的方案吗？可不可以鼓励人们主动地去分摊工作而不是处于失业状态？科尔奈或许会将这些称为“伦理性的调节机制”并将它们与其所谓的官僚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区分开来。^① 我们无力在这些争论中确立自己的立场；我们只是想记录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第三种机制”问题，在西方似乎并未得到解决，这里还需要其他创造性的思想。

现在，我们准备修订这一理论假设；具体可参见表4。

表4 不同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经济机制、社会福利工具以及社会不平等

	福利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
导致根本性不平等的主要机制	市场	经济再分配
补充性机制，抵消初级不平等，但也会导致次级不平等	政府的官僚再分配	市场
“第三种机制”，减轻次级不平等，同时阻止初级不平等与次级不平等的叠加	慈善事业，自助，伦理的协调机制	福利再分配

^① Kornai, “Burokratikus es piaci,” p. 1027.

（二）各种政策性后果

现在，让我们远离这些相当抽象的理论建设的高地，回到社会政策的“真实世界”中来。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正处于集约式增长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一幅社会政策制度与手段的蓝图；鉴于本章的目的是理论分析，我们不得不将构想有关政策建议的任务留给其他人。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将运用上述的理论见解，力图对今天匈牙利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问题予以关注（我们希望能以一种“建设性的批判”的方式进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证明，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与当前的这一争论，不仅具有经验上的联系，同时也具有理论上的关联。

将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彼此分离开来的思想——这一点对于我们当前的分析至关重要——与费尔格及其在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小组中的同事们所提出的关于社会政策改革的建议并非相互背离的。^①从我们的分析观点来看，他们关于制度改革的提议，其最重要的内容在于以下几点。

（1）这一提议的提出者们建议创立一套新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他们请求在最高的内阁层次上，建立起代表福利利益的制度性措施；事实上，他们期待能够创立社会福利部以取代传统上由工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所承担的大多数社会政策职能；这一部门还将能够对从国家到地方社区各个层次的全国性社会福利制度网络的运作予以监督。

（2）这一提议坚持认为，社会福利部应该拥有自己的预算（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它必须独立于“经济再分配”）。社会政策研究小组的成员们倾向于建立一个高度分权的财政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地方各级福利组织能够对各种福利资金的配置予以强有力的控制。该提议希望通过对财政和决策结构进行分权化的改革，减弱福利体制的官僚特性；他们还提出了对福利机构进行“民主控制”的各种建议。

在我们看来，这些建议都在朝着“正确方向”迈进，尽管它们或许还说不上是“足够的激进”。无论是创立一个拥有自己的全国性网络的新社会福利部，还是从中央政府预算那里为社会福利谋得一小杯羹甚或是切得一大块蛋

^① Ferge, et al., "Javaslat a szocialpolitikai."

糕，这一设想依旧没有超出“统一的再分配体系”（unified system of redistribution）的框架。我们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者们仍然对社会改革的思想持怀疑态度的原因；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怀疑这样的改革将成为软预算约束的一种新的潜在来源的原因。基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前提，我们乐意去鼓励社会政策的改革者们，在关于如何挑战“统一的再分配体系”的问题上，去参与和设计更具创造性的思路。

数年前，一群政治异议分子创立了一个名为SZETA（帮困协会）^①的私人慈善组织（匈牙利当局从来都没有承认该组织），它代表着对现有制度设置的一种挑战。SZETA的创立者是一群年轻的社会学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著名社会批判家伊斯特万·喀迈尼（István Kemény）的指导下，从事着一个应对贫困和吉卜赛人（gypsies）问题的研究项目。SZETA创立的初衷，是去帮助研究者在实施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贫困者。该组织募集资金、食物、衣物，并发起募款运动，如举办慈善音乐会和展览等。他们甚至通过地下渠道非法出版了一本书，其内容包括一些知名知识分子（由于政治审查的原因）而不容许被出版的作品；这一出版物以数倍于普通书籍的价格出售，其收入也被用于慈善事业。

SZETA中的活跃分子不仅将这些捐赠分给穷人，他们还开始以压力群体的身份捍卫穷人、残疾人以及被迫害者的利益，并以个人身份提供法律援助，游说政府机构。1984年夏季，我们访谈了一位名叫盖博·哈瓦斯（Gabor Havas）的SZETA组织的核心成员。盖博·哈瓦斯告诉我们，有时候甚至是饱受挫折的官方社工也会向他寻求帮助。当社会工作者意识到他们遭遇到官僚的繁文缛节障碍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他并将他“推到风口浪尖上”（put him on the case），因为这些社会工作者知道，作为独立于官僚结构之外的人，他或许能够更有效地突破繁文缛节（盖博·哈瓦斯本人并非专业社工，而是一名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统治集团曾试图将该组织整编到现有的政治组织框架中。政府也曾经计划将SZETA“安置”（house）到所谓的“全国阵线”（The National Front）中去，该机构是共产党创立的一个中央直属组织（umbrella organization），目的是进行群众动员。譬如，“全国阵线”会组织议会和地方政府选举，并积极参与组建文化俱乐部和志愿者组织，促进社区发展，等等。

^① 该名称为匈牙利语的缩写，英译为“Association to Assist the Poor”。——译者注

SZETA 成功地抵制了官方的这一整编尝试；其积极分子坚持认为，独立于各级官僚组织和国家机构，正是他们的福利活动取得成功的源泉。

当然，SZETA 是由一小群具有非凡勇气和献身精神的人所创造的一个乌托邦，它并不能作为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一种蓝图。但我们之所以欣赏该组织，是因为它强调与现有的国家机构的制度性分离。相信私人途径能够解决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福利问题，显然是幼稚的。SZETA 中的积极分子自己也不会倡导这种办法；他们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毕竟，对社会制度框架进行立竿见影的改革，从政治上来看是不可行的。不过，如果让我们在 SZETA 类型的制度和建立一个新社会福利部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们将站在 SZETA 这一边。在我们自己详尽的理论阐释中，我们已经发展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分离。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看出创立社会福利部这一设想的主要问题在于，该部门将会过多地沦为国家经济机构的一部分；而在这样一种整合性的制度体系中，经济再分配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雇主和所有者的利益将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社会福利部将不过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最为弱小的合作者。当然，尽管类似 SZETA 这样的慈善组织独立于经济国家，但它终归是对公共问题的一种私人性的而非公共性的解决之道；因此，从长远来看，它未必能够确保自己获得必要的资源，确保组织的稳定性和活动的公正性。

尽管我们对 SZETA 的许多方面颇为欣赏，但对用私人慈善事业的办法去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做法，我们还是持若干保留意见的。SZETA 的活动范围终归是有限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失去资金来源。一些 SZETA 的创始人可能会对该组织作为自治的在野政治运动的潜力而不是济贫抱有兴趣；随着对该运动的政治兴趣的消退，其资金来源将减少。很难设想，一种有效的福利体系能够建立在自愿捐赠而非强制性征税的基础之上。我们之所以批评设立社会福利部的想法，是因为它可能会沦为经济国家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而 SZETA 的优势与劣势，正在于它是完全外在于国家的。特别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并不存在营利性收入或者说这种收入的数量并不大；因此从长远来看，很难想象私人慈善事业能够募集到充裕的资金，并实现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之间收入的实质性转移。毕竟，公共问题需要公共的解决之道。

最后，我们对福利再分配的财政自主性问题予以若干评论。社会福利

政策的建议者们强调，有必要创立一种独立的福利预算。从我们的理论观点出发，我们并不认为这样做就是足够的。清晰地分离经济国家与政治国家以及经济再分配与福利再分配，或许还要求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收入来源以及独立的预算。在经济再分配体制中，经济国家扮演的角色是“所有者”；国家基于财产权从其企业中抽取利润和财政收入，并将这些剥夺来的剩余价值用于确保总资本（Gesamtkapital）的最大化，也就是处于再分配控制之下的财富最大化。捷尔吉·马库斯等人将这种做法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功能”。^① 另一方面，福利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国家履行着其对公民的“社会契约”。因此，至少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福利资金的来源应该是税收和来自公民与各类组织的自愿捐赠。在当前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府预算的主要来源是从企业征收来的财政收入；而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个人所得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十分重要。此外，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府收入并没有得到区别对待而是被纳入同样的预算中。从我们的理论观点出发——我们相信个人所得税应该是福利再分配资金的主要来源——可以得出两个政策性结论：①个人所得税的大幅度增长是不可避免的；②来自企业的财政收入与来自个人所得的税收不应该被混淆到同一个预算中去。理想的状态是，应该存在两种资金：一种资金主要由来自企业的财政收入组成，并被用于发展经济；另一种资金则由各种税收构成，其用途将具有社会的性质（福利事业仅仅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有趣的是，社会改革者们对于个人所得税角色的扩张显得颇为忐忑不安。他们怀疑，引进恰当的累进制税收体制，只会使新一轮的收入不平等增长的浪潮被合法化。他们倾向于认为，也应该向各种公司组织征收福利费。“再分配是多多益善的”口号也被应用到了这里：我们不要为了社会福利事业而放弃动用企业的利润。

只要经济国家和政治国家还没有实现分离，只要用于经济再分配和福利再分配的资金还没有分开，我们就会依然关注个人所得税增长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怀疑，税收性财政收入的增长或许会被用于补贴陷入困境的经济并导致预算约束的软化，而不是被用于满足各种福利需要。我们认为，只要能从财政上将这两种功能清晰地分离开来，个人所得税增长的好处就会超过坏处。

^① 参见 Fehér, Heller, and Márkus,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p. 68.

这种建立在个人所得税基础之上的福利再分配机制，其优势何在？^①就我们的看法而言，这似乎是保护福利部门免于与其他更强有力的对手（如重工业等）争夺资金的唯一途径；它还能够将社会政策从作为经济政策的仆人的地位中解救出来，并确保对福利问题的考虑不至于屈从诸如劳动力需求等问题的考虑。^②个人所得税为对政治国家进行民主控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不要忘记，美国革命是在这样的口号中开始的：“没有代表权，就不得征税。”^①对于东欧的民主革命而言，“没有代表权很可能导致没有税收权”的警告，或许正当其时。或许，一个国家的民主运转，确乎需要一种合适的税收体制；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的一些同事对我们的“再分配不公正”理论提出了批评；其理由是认为我们并没有对所谓民主控制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对这些批判者而言，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这种再分配所导致的不平等是能够被克服的。我们只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种看法。只要经济再分配和福利再分配被混淆为一种单一的体系，经济再分配就会压倒福利再分配，且各种民主机制也很可能被操控和利用。只有在福利再分配成为一个建立在个人所得税基础之上的独立体系的条件下，我们才倾向于认同批判者们的意见；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民主控制才是有意义的，才可能成为决定该体系公平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③或许，这种建立在个人所得税基础之上的福利再分配体系的最为直接的政治优势是，它联结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规划。科尔奈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统一的、得到严格执行的普遍的税收体制，不会导致预算约束的软化。^②只要各种福利花销的资金建立在得到普遍定义和严格使用要求的税收的基础之上，那么无论这种花销增长到何种地步，经济改革者们应该都不会反对。而一旦社会改革者们接受了这种将福利体系建立在个人所得税基础之上的思想，他们应该也能够支持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探求一种可以将社会改革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结合起来的“平台”。社会改革者们能否接受这样一种策略，即一方面站在支持福利再分配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对官僚的

① “没有代表权，就不得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独立战争期间北美殖民地人民喊出的最为响亮的口号。该口号原本是英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英国贵族在其与王室的斗争中曾经使用过这一口号。——译者注

②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p. 307.

再分配调节机制持批判的态度？本章的结论是：要想获得整个改革运动的成功，这种将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整合起来的尝试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需的。市场力量的扩张以及因市场而引发的各种不平等的再次浮现，产生了一种如此复杂的社会冲突体系，以至于只有设法化解市场所导致的无效率和不平等，经济改革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要么是将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统筹起来，要么是改革的停滞，这正是东欧所面临的真实选择。

刘建洲 译 郑雯 校

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

——社会主义匈牙利家庭农业企业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史*

伊万·塞勒尼、罗伯特·曼钦

一 集体化社会主义经济中家庭农业生产的程度和动力机制：以匈牙利为例

当共产党政权于1949年左右在东欧获得了垄断权力之后，农业的集体化成了优先议程中的优先议题。

在农业政策中，东欧的共产主义者们只是追随了苏联的先例。虽然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暂时性地支持农民在俄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对取得和稳定政权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又不信任他们的农民盟友，怀疑农民和其他所有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是潜在的资本家。列宁在1919年论述革命后的经济和政治的一本小册子中，毫不含糊地声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俄国经济系统代表了……对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是新近从小商品生产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之后，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农民的耕作一直是小商品生产。这里，我们有一个极其广泛、发展完全和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基础，在与共产主义的痛苦斗争中，资本主义以此为基础负隅顽抗或者重新崛起。”（Lenin, [1919] 1971: 290 - 291）布尔什维克也相信家庭农场是低效的，所

* 原文发表于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ume 8, 1989, pp. 253 - 277。

以农业最后必须依据科层化管理的大型公司的产业组织模式进行转变。

实际上，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一开始的某些犹豫之后，绝大多数的苏联人到30年代中期都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家庭农场参加了集体农场（Kolkhozes）（Nove, 1969: 160 - 186）。一开始，这些政策遭到了来自农民的抵抗，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当权者镇压了。“在某个时候，”阿历克·诺夫（Alec Nove）简洁有力地写道，“一千多万人‘在人口统计上’消失了”（Nove, 1969: 180）。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之前，也就是共产党开始在苏联以外的东欧地区夺取政权之前，情况似乎是，即使苏联的集体化试验成本很大，最后它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还是成功了。苏联把大多数食物生产都建基在科层化管理的大型农业企业上。由此，通过瓦解个体农民财产所有者，使其成为单一的、相对同质的工薪劳动阶级，农业集体化直接把以前的农民放置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化的道路上，因此堵住了他们走向资产阶级化的道路。

东欧共产主义者立志并且致力于效仿这个模式。1949 ~ 1953年间，虽然成功程度不同，但所有的东欧国家都试图模仿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集体化（例外的是南斯拉夫，它的领导层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之前就走上了一条自治的政治道路）。随着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和之后修正主义的崛起，修正主义者的改革政策在整个地区使得集体农场的事业遭受了挫折。在波兰，在罗马天主教會的帮助下，农民的力量被证明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被搞定，从而有助于农民保护他们的家庭农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在东欧的其他地方，这种挫败只是暂时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事实上所有的卫星国（除了波兰，以及一开始就不是苏联卫星国的南斯拉夫）都完成了农业系统的集体化过程。

匈牙利是集体化中的后来者之一。1956年，大多数的集体农场已经衰落，政权还不稳定的匈牙利共产党，允许私营企业在革命受挫后多存在几年。最终在1960年，政权决定向前迈进。农民也意识到抵抗最终是无效的，所以，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在一年之内参加了生产合作社。

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一个有意思的悖论是，当大型集体农场集中了大多数的耕地时，它还是允许很多兼职性的家庭农业生产在小块土地上存在，这些小块土地一般是给集体农场成员分配的自留地（houseplot）。换句话说，所有上述国家中的集体化都允许农民保留他们的自留地（大约每个家庭一英亩）。它在集体化提倡者的眼中好像是长期的，但仍然是暂时性的让步，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农学家们相信，从长远来看农业将依据工业原则进行组织，自留地上的生

产是原始的，他们必须做出这个让步是因为农民仍然是落后的，仍然有着一定的小农意识（Vágvölgyi, 1976: 270）。对农民们来说，自留地的存在使得吞下集体化这味苦药变得更容易一些（Fazekas et al., 1985: 155; Biró et al., 1980: 34 - 36）。

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暂时性让步对农村社会结构产生了惊人的、出乎预料的后果。广泛存在的兼职耕作的结果是，匈牙利和其他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农业人口超多的情况下，完成了粗放型的工业化，而在后工业时期，它们也仍有可能维持庞大的农业人口。在完成集体化 20 年之后，当匈牙利经济进入集约式增长阶段时，家庭农业生产还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十分之六的匈牙利家庭参与了食物生产。1982 年，90% 的农业人口和 30% 的城市人口种植农业产品。在这个国家里，有大约 150 万个“迷你农场”，这些农场里的 1000 万居民耕作着这个国家 12% 的耕地，生产额占农业总产值的 34%。1981 年，扣除成本后，农业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 1765 福林，而产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 4332 福林（见表 1）。

表 1 匈牙利家庭农业生产的程度：1981 ~ 1982 年

家庭企业数（个）	1500000
在这样的企业中耕种的土地（公顷）	810000
占有可耕种土地的比例（%）	12.2
占有生产农业产品的家庭的比例（%）	60.6
占有生产农业产品的农村家庭的比例（%）	88.3
农村家庭月生产的净值（福林）	1765
国有工厂的人均工资（福林）	4332
家庭企业的贡献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	34.0
家庭企业的贡献占农业商品生产的比例（%）	25.3

资料来源：CSO（1982）、Oros（1984）以及我们对 1982 年中央统计局（CSO）收入调查的计算。

表 1 暗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悖论。当社会主义经济以比资本主义经济快得多的速度减少全职农业雇佣人口时，它也进入了一个有着比人类历史上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要多的半无产阶级、半农业和半企业家人口的后工业时期。

以上数据只用来描述匈牙利，它们捕捉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一个静止的

画面。这里需要提出两个问题：①在何种程度上，家庭生产在其他东欧国家或者苏联扮演了类似的角色？②家庭生产的性质和重要性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

与其他有着集体化农业的东欧国家不同，匈牙利农业生产的更大一部分是来自家庭企业。但是这不应该让人们去夸大匈牙利情况的特殊性。在中东欧地区的每个地方，家庭生产都很重要，特别是苏联，在50年集体化之后，四分之一多的农业产出还是来自自留地（参见 Shemelev, 1981: 44; Wadekin, 1973: 56-68）。即使在农业集体化比任何地方都进步的民主德国，在特定关键产品（比如鸡蛋和家禽）上，自留地的产出仍然占全国总产出的40%~50%（Münch and Nau, 1983: 688）。

我们系统地比较过匈牙利家庭农业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80年代早期的数据。这里，总图景是稳定的，其中进行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的家庭企业有一个预料之外的激增。从一定的角度看，家庭农业生产者确实输给了集体农业，因为家庭农业生产者的数量在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由家庭生产者耕作的土地数量也在减少。但是那些剩下来的家庭生产者开始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家庭生意上，把更少的时间放在工作上。虽然家庭生产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了，但是其在农业商品生产中的比重仍然保持稳定，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还有稍许的增长。

20世纪70年代，家庭农业生产的绝大部分还是非常传统的。但是在80年代，市场导向的具有创业才能的小型企业重新出现。它们的运营者不是小农，而是主要面向市场的企业家。

虽然家庭自留地的总生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只增加了10%，但是它们的商品生产几乎翻了一番。20世纪70年代，家庭土地主要是生计导向的（只有40%的产品在市场上售卖），但这一点在8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60%的总产品是为了市场而生产。同样，农民家庭在70年代生产了所有农业商品的24%；到1981年时，这个数目增加到了25%。

二 集体化社会主义农业中的家庭生产理论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有不少人试图从理论上概括社会主义社会家庭农业生产的社会学特征。在波兰（Kolankiewicz, 1980）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作品。然而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把文献回顾限制在匈牙利这个

国家，尽管它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

关于集体化社会主义农业中家庭生产的社会学特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无产阶级化理论（proletarianization theory），农民工理论（peasant-worker theory）和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interrupted embourgeoisement theory）。

（一）无产阶级化理论

这个理论被苏联式农业的官方理论家宣扬了几十年（参见 Böhm and Pál, 1985: 77; Vágvölgyi, 1976: 270）。根据这种理论，家庭农业生产是暂时性现象，应该归咎于落后的小农意识，以及集体农场中技术和组织发展的不充分。鉴于社会主义农业将渐渐地但是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工业的、工厂式的体制形式，在适当的时间后，以前的小农会被完全护送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

比如，有学者就认为，家庭农业生产者应该被看作是转型中的一个阶层（Vágvölgyi, 1976: 270）：

这个阶层在很多方面都有双重特征。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阶层中的成员仍然跟小农身份相连；他们的价值系统及生活方式中的小农特征较多，小农的旧习还在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转型阶层的成员既仍然没有成为工人，也不再是农民了。当他们沿着从农民到无产阶级生活的轨迹前进的时候，他们的特征会逐步变得无产阶级化。

我们可以从这个理论得出如下一些假设：

（1）家庭农业生产者很有可能变成农业手工劳动者，特别是集体农场的农民。而在产业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通勤到城市工厂上班的人中，这样的生产者的比例会小一些。

（2）有年长户主的家庭更可能成为“迷你农场”的运作者。年长的人对小农价值社会化的程度较深，所以他们会坚持原来的方式。

（3）既然集体化农业中家庭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生计，我们可以预测说，生产的数量将根据不同家庭的人口组成有所不同。

假设（1）和（2）暗示了农业人口中的哪些人会有可能生产农业产品，假设（3）试图解释在这些生产者中，谁会生产得更多。据此，我们可以想出三个子假设（sub-hypotheses）。

①受抚养者更多的家庭将生产更多，鉴于他们更大的消费需求，他们因此更可能成为大生产者。

②家庭内的生产数量也取决于劳动力的可获得程度。所以妻子没有工作的家庭可能生产得更多；如果成年人更多，则同理。由多个家庭组成的家庭，也就是所说的三代同堂的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ies），会被预测为最大的生产者。

③需要抚养的小孩数量与生产将呈负相关，因为即使他们提升了消费需求，他们也不会为增加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做出贡献。

(4) 在社会流动性方面，无产阶级化理论没有提供任何假设。家庭农业生产被看成只涉及一代人的现象，当在这样的小农家庭里长大的人退休或者死亡之后，家庭农业生产就会消失。

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证据开始挑战无产阶级化理论的有效性。首先，社会主义下的家庭农业生产并非像这个理论所暗示的那样，是过渡性的或者暂时性的。家庭生产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无产阶级化理论是否有能力精确地预测家庭生产者的社会和人口构成也变得十分可疑。当集体农民的第一代变老并且不再在自留地上耕作时，有更年轻的工人甚至是白领家庭成员开始接手生产。最后，观察者开始注意到，一些农业家庭开始把更大一部分产品在市场上进行售卖。

（二）农民工理论

伊斯特万·马库斯（István Márkus）可能是第一个在无产阶级化理论之外提出自成一体的替代性理论的人。20世纪70年代早期，马库斯在匈牙利的格拉噶山谷（Gлага Valley）进行田野调查，那是一个位于布达佩斯东北部的村庄，以园艺市场为特色（Márkus, 1973）。他观察到，有一些农村家庭（其中许多家庭的户主是产业工人）正积极地参与非常有创造力的家庭农业生产。

一些家庭开始在他们的果园或菜园中加强生产，表现得更像是农场主（farmers）而不是小农（peasants）。为了描述这个新现象，马库斯采用了亨利·蒙德拉斯（Henri Mendras）（1967）所提出的“后小农身份”（post-peasantry）这个概念。

“后小农身份”这个概念描述了一种质变的新现象，而不是简单的“小农”和“工人”的简单混合。后小农有着新的文化和经济行为的特征，他们

生活在两个世界（城市/农村、农业/工业）中，并且试图从这两个世界中都得到最大的利益。

20世纪70年代，伊斯特万·喀迈尼（István Kemény）（1972）对匈牙利工人阶级的社会分层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大约有一半的产业工人是出身小农的第一代无产阶级，或者，他们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和农业有关。他强调说，这个“新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是从米勒（Miller，1964）那里得来的〕与老城市无产阶级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居住在农村，并且继续参与家庭农业生产。“后小农身份”和“新工人阶级”这两个概念互相补充，它们都挑战了之前的无产阶级化理论。

从一个角度来讲，马库斯和喀迈尼都仍然坚定地保持了无产阶级化理论中的传统：他们都认为“新工人阶级”或者“后小农身份”的地位是走向无产阶级化的过渡性步骤。他们只是假定，完全的无产阶级化被一代人延迟了。

我们涉及这一议题的论著（Konrád and Szelényi，1971；Szelényi，1981）深受马库斯和喀迈尼的影响。我们试图综合他们的作品，但是我们也扩展了针对无产阶级化理论的批评：我们开始质疑家庭农业生产的过渡性质。

在我们的综合中，重点放在把家庭农业生产视为一个创新的、成功的工人阶级的战略上。结果是，新产业工人可能比传统的城市无产阶级境遇更好。居住在农村的工人能够从市场导向的、日渐高效和热情高涨的小型农场里补充他们的收入。所以，我们开始假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期从事兼职农业活动的可能性。

马库斯最近的一篇文章又为这个理论添砖加瓦：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家庭农业生产者的社会起源的假设（Márkus，1980）。他将贫穷的小农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匈牙利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推动了土地改革，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并且成为村庄和集体农场的管理人员。他们还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后小农身份的核心，商品生产的兼职家庭迷你农场也是他们发明的。

农民工理论可以从经验上加以验证的假设如下——这里的农民工是后小农身份和新工人阶级的同义词。

（1）大多数家庭农业生产者可能是参加农业体力劳动的工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最可能来自产业工人。

（2）年龄和家庭生产的相关性可能比无产阶级化理论所预测的要弱。年轻的家庭成员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加入到迷你农场运营者的队伍中去。

(3) 家庭的人口构成作为生产数量的测量指标，并不像无产阶级化理论所暗示的那样精确。对预测家庭生产的程度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现有职业和位置，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也是同样重要的。

(4) 贫民和那些父母是贫农的人，在后小农身份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尽管农民工理论毫无疑问地向前迈出了很大一步，但最近关于迷你农场生产动态的大多数证据开始显示这种路径的局限性。1972~1982年间，家庭生产呈现集中的趋势，特别是“更大”的生产者的商品生产。对前5%~15%的家庭生产者中的某些人来说，市场导向正在成为主导，从而带来了质的变化，即小型农业家庭企业的诞生。这些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至今还没有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它们可能处在发展成为全职生意的过程中。虽然大部分的丈夫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工作，但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些妻子已经辞去了她们的官方工作，成为全职的管理者。而且，这些小农场正在变得高度专业化，因为它们现在主要是为市场进行生产。换句话说，这些不久之前还是把唯一注意力放在尽可能消费上的工薪劳动力，已经开始像真正的企业家一样行动起来，参与到积累活动中来。

可能只有很少的农场（可能是所有家庭农场的1%~2%）符合上面的所有条件；大部分农场只是符合一个或者几个条件。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可以被仅仅作为创新的工人阶级策略的迹象来理解。他们更多地是企业家阶层出现的标志。帕尔·朱哈慈（Pál Juhász）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尝试对这些新现象做出概括。

（三）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

作为一个理论家，朱哈慈第一个意识到，一些市场导向的小农场的运作者并没有遵从“工人阶级的策略”。对他们来说，工作本身、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消费的水平，并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东西。他们经营农场就像经营企业一样考虑投资的回报，他们开始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和资本。他们不是带薪工人而是企业家，是“资产者”（burgers）或者用一些匈牙利社会学家更喜欢的概念来说，是“资产阶级分子”（bourgeois）。这里描述的社会过程不是“无产阶级化”，或者“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而应该被称为“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或者“bourgeoisification”）。

1945年以后，随着乡村士绅统治的崩溃和土地改革，资产阶级化的浪潮开始了。然而，这一浪潮却被1948~1949年的斯大林主义打断，被迫转到地下。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的关键思想是：市场导向的家庭农业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初期重新出现，应该被理解成同样的资产阶级化过程重新浮出了水面。

我们在这篇论文中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是：就我们所理解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来说，我们可以梳理出什么样的在经验上可验证的假设，并用经验材料来证明。

(1) 如果我们排除了家庭农业企业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跟户主的农业职业相关的可能性，那么，在解释为什么这些家庭为市场生产了超过生计需要的更多商品时（或者，就此而言，在解释他们到底为什么要为市场进行生产时），“户主的农业职业”这个变量就失去了解释力。

(2) 在预测商业生产的增长方面，年龄的重要性会下降。我们应该会看到年轻人也进入了企业家阶层。

(3)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预测商品生产的增长，家庭的人口特征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劳动力供给依然重要，但是消费需求的意义应该在下降。

(4) 在新企业家中，前中农或者富农的子女应该占绝大多数比例（over-represented）。

以上阐述的各个假设，描述了关于家庭农业生产的不同理论，这可以通过下面的表格表示出来（见表2）。

表2 谁是家庭农业生产者：不同理论提供的假设

	无产阶级化理论	农民工理论	资产阶级化理论
生产者的现有职业	农业体力劳动者	产业工人	无假设
年龄	更老	更年轻	没有相关性
人口构成	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消费需求的家庭	一样，但是关联更弱	跟消费没有相关性，与劳动力供给有弱相关性
家庭背景	无假设	贫农	中农和富农
生产的性质	生计	有一些市场的生计	主要是市场

我们赞成“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理论”，因此我们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我们的分析，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对它进行了修正。

(1) 我们想要完成被中断的资产阶级理论、农民工理论和无产阶级化理论的整合。企业家身份只是一个可能的结局，资产阶级化理论在解释谁会达到那个目标方面特别有用。但是农业人口中的大多数不太可能参与创业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多数人仍然是农民工（我们预测农民工理论在确定这些人的特征方面会很有帮助），但是一定数量的少数人已经被无产阶级化了（无产阶级化理论对此很有发言权）。所以，我们视这些理论为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解释。

(2) 我们需要提出这个问题：企业家身份如何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这里，我们会探索关于企业家身份起源的生活史的重要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解释为什么，以及在哪个方面，30 或者 40 年时间跨度的家庭背景对现在的企业家身份有重要的影响。在没有物质财富传承的情况下，通过选择学校教育的类型和层次、工作的性质和在家庭早期社会化中的价值内化，“企业家精神”被保存并传递到了下一代。因此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称为“重新进入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轨迹的理论”（theory of re-entry into the interrupted embourgeoisement trajectory），这个理论强调的是，生活史以及在命令经济时期采用的策略，对一开始的家庭动力产生了很关键的改进效应（modifying effects）。沿着论题的逻辑，我们提出，那些本来家庭背景“合适”但后来生活史发生变动的人，不太可能利用在今天开放的创业机会。所谓家庭背景本来“合适”指的是，在 1949 年前家庭成员已经走上了资产阶级化的轨迹；所谓生活史发生变动（incongruent）指的是，这些人太早或者太深地被无产阶级化了，或者在干部岗位上待得太久。

在另一方面，还可以想象到的一种情况是，那些背景“不合适”的人〔比如，前贫农，甚至（及/或）雇佣农民〕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有用的技能，变得相对自主，因此很有可能加入企业家的队伍。

我们会试图从三个维度来测量生活史对资产阶级化的效应：权威（authority）、自主性（autonomy）和技能（skills）。我们预计，在权威和现在的企业家才能之间多少有一种曲线关系（curvilinear relationship）：在权威岗位上待得时间太长或者太短，都跟企业家身份呈负相关。一个人要是没有在权威岗位上

的经历，则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太无产阶级化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权威位置上待的时间太长，则可能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扎根在干部岗位上了。关于自主性，我们假设，对自主性的渴望越大，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前重新进入资产阶级化轨迹的机会也就越大。

换句话说，那些有能力抵制集体化，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私营农场主的人，更有可能在70年代晚期成为企业家。

在技能领域，我们也预计有一种曲线关系：那些没有基本技能的人变得无产阶级化了；而那些参加集中培训项目，也就是进入夜校的人，可能已经变成了干部，所以不太可能再对重新出现的创业机会感兴趣。

三 检验理论的模型

我们通过嵌套（nested）的方式建构回归模型，来检验这三个理论和我们自己修正过的理论的相对解释力。

我们使用无产阶级化理论作为一个基准模型：我们用第一个模型（模型A）检验人口因素对家庭农业产出的差异的影响（用“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来测量，英文缩写为FAP）；我们还测量了户主现有职业所带来的影响。

人口变量是无产阶级化理论的关键，因为它假定接下来的几代人将越来越被社会化到带薪工人的岗位上去。因此，无产阶级化理论所预测的人口效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它预测户主属于更年长的一代的家庭，更容易成为家庭农业生产者。为测量年龄，我们用了年龄（AGE）和年龄的平方（AGESQ）两个变量，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尽管该理论预期年龄和家庭生产呈正相关，但假定非常年长的人实际的产出更少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可以想象的是，生产的可能性在“中年人”那里达到峰值，而不是“老年人”。

（2）根据无产阶级化理论，家庭的劳动力供给越多，生产就越多。我们假定，如果“活跃的挣钱者数量”（ACTIVNO）多（户主的配偶没有工作，但是在家里进行全职工作），或者还有“其他没有雇佣工作的成年家庭成员”（HOMEDUTY）的话，那么家庭的劳动力供给也就多。我们也假设，受抚养的小孩将消耗成年家庭成员，特别是家庭主妇的时间。所以我们预计，19岁以下需要抚养的小孩数量（CHILD）会跟“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呈负

相关。此外，我们还假设，如果家庭中“退休人员的数量”（RETIRNO）更多的话，劳动供给和家庭生产会更多。我们还预计，“双亲家庭”，也就是既有丈夫也有妻子的家庭（ONECOUPLE）和“三代同堂的家庭”（MORECOUPLE）会比“单亲家庭”或者破碎的家庭，生产更多的农业产品。

在模型 A 中，我们也探索了现有职业的影响。根据无产阶级化理论，户主仍然在土地上耕作，没有获取工业工作，没有参加合作社并成为农业体力工人的家庭，可能在家庭农业生产中表现得更为活跃。在模型 A 中，我们引进了一个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代表“作为体力工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户主”（AGRAR）。我们期望模型 A 中包含的变量会有一些解释力。我们相信，无产阶级化的过程确实发生了，所以，一些家庭生产者其实是那些受传统驱动“仍然”在生产的人。我们的论点是，上述变量虽然跟家庭参与兼职耕作的动机和潜力有着很明显的紧密联系，但在解释到底谁是农业人口的生产者方面，是具有合理的解释力的；如果我们的任务是探索在这些生产者中，谁生产得更多，以及更具体地说，谁主要为市场而生产，（上述变量）也许就不是那么有强大的解释力了。我们希望可以依靠农民工理论，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理论所提供的洞见，来对谁生产得更多以及谁主要为市场而生产做出更好的解释。

我们用第二个模型（模型 B）来检验农民工理论和资产阶级化理论的解释力。我们在这里的假设是，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家庭背景会对家庭生产的价值产生独立的影响。换句话说，根据资产阶级化理论和农民工理论所赞同的理论原则，我们预计，那些在 1949 年社会主义革命前家里就有企业家的人，更可能在 1982 年成为更大的家庭生产者。

这里，我们试图测量两种效应。首先，我们假设，那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已经在为市场生产的家庭，更有可能在今天参与商品生产，且“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会更高。其次，在模型 B 中，我们在方程中加入了一个虚拟变量，用以表示“户主在 1944 年拥有多于 10 霍尔德（hold）^① 土地的家庭”（OFARMR44）。这意味着引进了 1945 年土地改革前排名在前 20% 的家庭农场（Berend and Ránki, 1972: 150, 230; Donáth, 1969: 361）。虽然 10 霍尔德土地其实没有大到能经营商业农场的地步，但是这些前 20% 的家庭农场有值得注意的商品生产，运用了管理和企业家的技能。以 10 霍尔德作为分割点并不是

① 1 霍尔德等于 1.422 英亩，1 英亩相当于 4050 平方米。——译者注

特别严格的划分，但不是没有道理的随意发挥。就研究东欧农村的资产阶级化这一现象来说，1945~1949年这个阶段尤为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激进土地改革掀起了资产阶级化的新浪潮，它是资产阶级化的“起飞”阶段。因此测量土地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于是我们在模型B的方程中，加进了一个虚拟变量，用以表示与1944年可获得土地相比的1948年的土地规模(REFORM)。

最后，我们用第三个模型(模型C)测量了自己关于“重新进入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轨迹的理论”，我们试图证明，如果我们打算解释“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中的差异，特别是如果我们意在解释“更大的生产者”和商品生产者的性质，则必须把户主的生活史考虑进去。

为了努力让生活史变量的测量变得可以操作，我们依赖于我们以前的分析。为了测量对无产阶级化和干部化的抵制程度，我们引进了一个变量，用以表示户主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BOSYEARS)。而且，我们预计，那些当“老板”时间太长的人，或者在企业家是无产阶级化和干部化之外的替代性选择的时代(比如，1945~1949年，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1955~1959年)成为“老板”的人，已经变得干部化了，因此，不太可能成为“大”的生产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那些从来没有占据权威位置的人，即那些无产阶级化的人，同样也不太可能在家庭企业中生产很多。所以我们预计，在“户主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和“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之间会出现一种弱的曲线关系。

此外，我们试图捕捉“自主性渴望”对家庭生产的意义。这里，我们试验了两种测量。我们在公式中引进了两个变量：①户主在合作社里待的年数(COPYEARS)，②他或她作为自我雇佣者的年数(SELFYRS)。

测量技能的效应是比较复杂的。“过多”和“过少”的技能可能都会妨碍资产阶级化。那些受过“过多”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接受非技术类教育的人，和那些在工作后为了加强他们的权威位置的合法性而获取“文凭”的人)，变得干部化了，所以失去了要资产阶级化的动机。在量表另一头的“过少”的教育，暗示了这些人接受了社会中的依附位置，即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向上流动的渴望。

在模型C当中，我们在方程中加入了两个教育历史变量：一个用来表示在高中或者大学文化程度夜校进修过的人(EVENING)，另一个表示那些从来没

有接受过超过五年教育的人 (FIFTHYR)。如果我们的生活史理论是正确的话, 我们预计, 这两个变量都会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上述三个嵌套模型在图 1 中得到了表现。我们的主要论点是, 在理解“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的差异方面, 与模型 A 相比, 模型 B 和模型 C 的效力会有显著提高。所以在解释社会主义兼职农场活动的现象时, 它们为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 (模型 B) 和我们对资产阶级化理论的扩展与修正 (模型 C) 提供了经验支持。

自变量	因变量
模型 A ----- 人口决定因素 (a) 年龄 (年龄; 年龄的平方) (b) 劳动力供给 (活跃的挣钱者数量; 其他没有雇佣工作的成年家庭成员; 19 岁以下需要抚养的小孩数量; 退休人员的数量; 双亲家 庭; 三代同堂的家庭) (c) 职业决定因素 (作为体力工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户主)	家 庭
模型 B ----- 原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户主在 1944 年拥有多于 10 霍尔德土地的家庭; 与 1944 年可获得土地相比的 1948 年的土地规模)	农 业 生
模型 C ----- 生活史的效应 (a) 权威 (户主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 (b) 自主性 (户主在合作社里待的年数; 户主作为自我雇 佣者的年数) (c) 技能和教育 (在高中或者大学文化程度夜校进修过的 人; 从来没有接受过超过五年教育的人)	产

图 1 三个嵌套理论和它们的统计测量

四 检验不同理论关于社会流动性和生活史的假设：数据和结果

我们的数据来自两个调查（1982 年收入调查和 1982 ~ 1983 年的社会流动性与生活史调查），这两个调查由匈牙利中央统计局（CSO）执行。承蒙 CSO 的好意，我们得到了这些数据的记录带。两个调查都是关于相同家庭的全国性样本。我们合并了这两个数据库中我们可以确认收入和社会流动性记录的所有农村家庭，得到了 7754 个家庭。其中 7000 个家庭是农业产品的家庭生产者。

我们分析中的因变量代表“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①，用福林^②来结算。这一数值包括用于自身消费的产品和在市场上售卖的物品。两个值都由中央统计局基于现有的市场价格计算。家庭农业生产值是一个净数值，也就是说，生产成本被从销售和自我消费的总价值当中扣除了（但是家庭成员花在生产上的时间没有被考虑进去）。我们的任务是解释哪些家庭从“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当中获得收入，以及在那些获得这些收入的人当中，用什么可以解释“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的差异。

在我们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希望寻求两个不同问题的答案。

(1) 我们想要解释谁在生产，以及在预测（7754 个农业家庭总量中的）7000 个家庭里谁将被认定至少从事一定程度的生产上，哪些变量特别重要。

(2)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在这 7000 个生产者中，谁更有可能生产得更多。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发展出了一个最大似然联立二方程组样本选择模型（maximum likelihood simultaneous two equation sample election model）。第一个方程产生关于谁参与了家庭农业生产的概率预测（probit estimate），以及（在我们分析的最后一阶段）再次产生对谁在从事密集型商品生产的概率判断。第二个方程估计了用不同方式获取的家庭收入的对数值，同时，通过带入这些

① 当我们估计“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的差异时，我们用了收入变量的对数变换（参见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288-289; Hauser, 1980: 4-5）。

② 福林是匈牙利货币单位。——译者注

对数值，估测第一个阶段（即在选择阶段）运行的变量的统计效应。^①

在这个部分，当我们从模型 A 转到模型 C 时，我们将讨论样本选择模型中个体变量的参数变化，我们也会对模型的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进行总体评价。

让我们简单地再陈述一下，在统计工具的特定性质的帮助下，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标。这是对我们理论的第一次经验检验。我们是在对自己的理论最不利的条件下展开这项检验。我们只使用了家庭农业生产的总净值，这个数值没有具体指出，有多少产出是为了消费、有多少产出是为了市场，尽管我们在模型 B 和模型 C 中为了测量创业取向而明确规定了新变量。我们允许被我们批评的理论“能先咬上一口”，让它们解释它们所能够解释的极限。然后，我们试图说明，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从我们自己的理论得出的假设能完善对被调查现象的理解。总的来说，我们试图在分析中得到以下效果：①当我们从模型 A 转到模型 C 时，模型的拟合程度会有显著提高；②相对来说，人口和职业变量在第一个方程中表现得更好，而在解释第二个方程时，我们则从社会流动性和生活史变量中获益更多。相伴随的情况是，当我们从模型 A 转到模型 C 时，我们应该发现人口和职业变量的解释力大大减弱，而社会流动性特别是生活史变量的解释力在增强。

在表 3 中，模型 A 展现了无产阶级化模型的解释力。特别是，如果我们的任务只是解释在农业人口中，谁会在家庭经济中生产农业产品，那么这个理论得到的假设确实能解释很多东西。

在模型 A 的第一个方程中，年龄和年龄的平方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变量〔我们暂时不考虑“作为体力工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户主”（AGRAR）这个变量；我们在后面会回到这个变量，看看在我们解释完人口变量时它如何表现〕。按照解释程度的重要性排序，居其后的是“双亲家庭”（ONECOUPLE）、“活跃的挣钱者数量”（ACTIVNO）和“退休者的数量”（RETIRNO）。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任务是用人口变量去预测在农业人口中谁最有可能去生产，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户主是中年人的家庭；②双亲家庭，也就是核心家庭；③有较多的经济上活跃的成年人的家庭；④有更多退休人员的家庭，他

① 我们感谢罗伯特·梅尔（Robert Mare）和戴维·格伦斯基（David Grusky）在我们寻找合适的分析模型时，对我们的方法论提出建议。

们的劳动可以为了家庭生产而被调动起来。

表3 为模型A设计的样本选择模型中未被标准化和标准化后的参数
($N=7754/7000$)

	概率			回归系数		
	未被标准化 的参数	标准化后 的参数	T 值	未被标准化 的参数	标准化后 的参数	T 值
年龄	0.107	1.746	12.7	0.071	0.071	15.5
年龄的平方	-0.0009	-1.102	-11.1	-0.0006	-0.0006	-15.0
活跃的挣钱者数量	0.236	0.160	5.7	0.157	0.157	10.1
其他没有雇佣工作的成年家庭成员	0.305	0.081	4.5	0.121	0.121	4.5
退休人员的数量	0.339	0.161	6.4	0.122	0.122	5.7
需要抚养的小孩数量	0.073	0.076	2.8	0.010	0.010	0.8
“双亲家庭”	0.418	0.258	6.3	0.427	0.427	13.6
三代同堂的家庭	0.190	0.108	1.1	0.402	0.402	6.3
作为体力工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户主	0.661	0.296	10.8	0.455	0.455	20.2
常数 (Constant)					4.654	37.3
希格玛值 (Sigma)	0.824		118.3			
曲线饱满值 (RHO)	-0.017					

在模型A的第二个公式中，两个有关年龄的变量都失去了很大的解释力，“退休人员的数量”这个变量也是如此（它只有微弱的显著性），而“双亲家庭”（ONECOUPLE）和“活跃的挣钱者数量”（ACTIVNO）保留了它们的解释力。“三代同堂的家庭”（MORECOUPLE）这个变量在第一个方程中的相关性和显著性较弱，但是现在它在第二个方程中获得了强度，成为一个显著变量。这个最简单的模型已经显示，如果无产阶级化理论不仅想要解释家庭生产的事实，还想对有些家庭生产更多的原因提出假设的话，那么这种理论注定要遇到一些困难。跟“双亲家庭”和“活跃的挣钱者数量”这两个变量的稳定性相比，年龄、年龄的平方和退休者的数量这三个变量的解释力相对弱化了，这说

明在那些生产者当中，年轻的和中年的家庭成员扮演了更多的角色，这正好与无产阶级化理论的假设相反。我们也注意到，那些据设想应该跟过去的小农生活联系最紧密、最执著于传统的退休人员，在解释“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的差异时，却不是那么重要。

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们的方程中，将“活跃的挣钱者数量”这个变量考虑在内后的效应。就像表3所显示的那样，它说明了两点：①无产阶级化理论的一个优点实际上在于，它关于农业体力工人更容易成为农业家庭生产者的假设。在第一个方程中，“活跃的挣钱者数量”是继“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之后最重要的变量；②令人惊讶的是，“活跃的挣钱者数量”这个变量在第二个方程中丧失了解释力，比年龄变量的解释力丧失得更厉害，它被“双亲家庭”这个变量挤到了第四的位置。

所以，模型A为无产阶级化理论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当手头的任务是预测生产者的人口特征时，这个理论比较适合，但是当我们需要探索谁会生产比他们的消费需求更多的农产品的时候，这个理论遇到了困境。在我们寻求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时，从无产阶级化理论得出的两组最重要的变量（年龄和现在的农业雇佣状态）在预测谁是“更大”的生产者上，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面对在第二个问题上更有解释力的变量，支持无产阶级化理论的学者们无法轻松地做出概念归纳。毕竟，无产阶级化理论无法解释的是，与仅仅是测量生产者的情况相比，在生产规模更大的生产者中，比例更大的，是较少拘泥于传统的年轻人而不是中年人。对于那些从事非农职业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让我们看看，当我们转到模型B，并在样本选择模型上加上社会流动性变量时，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就像我们所预测的那样，表4呈现的结果说明，两个家庭背景变量实际上都和“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户主在1944年拥有多于10霍尔德土地的家庭”（OFARMR44）和“与1944年可获得土地相比的1948年的土地规模”（REFORM）这两个变量表现良好，尽管它们在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方程中都不是特别出色。正如我们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第二个方程中，两个变量都获得了解释力，因此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当任务是解释谁生产得更多时，它们毕竟是最有用的变量。

表 4 为模型 B 设计的样本选择模型中未被标准化和标准化后的参数
($N=7754/7000$)

	概率			回归系数		
	未被标准化 的参数	标准化后 的参数	T 值	未被标准化 的参数	标准化后 的参数	T 值
年龄	0.102	1.615	12.0	0.67	1.051	14.6
年龄的平方	-0.0009	-1.406	-10.5	-0.0006	-1.037	-14.4
活跃的挣钱者数量	0.160	0.172	4.3	0.131	0.141	9.1
其他没有雇佣工作的成年家庭成员	0.179	0.064	2.4	0.092	0.033	3.1
退休人员的数量	0.277	0.194	5.6	0.103	0.072	5.3
需要抚养的小孩数量	0.079	0.083	3.1	0.014	0.014	1.1
“双亲家庭”	0.535	0.242	8.9	0.467	0.211	6.2
三代同堂的家庭	0.468	0.114	3.0	0.497	0.121	8.6
作为体力工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户主	0.603	0.269	9.8	0.425	0.189	18.9
户主在 1944 年拥有多于 10 霍尔德 土地的家庭	0.470	0.179	6.3	0.332	0.126	12.6
与 1944 年可获得土地相比的 1948 年的土地规模	0.366	0.147	6.0	0.182	0.073	7.4
常数 (Constant)					4.749	38.2
希格玛值 (Sigma)		0.816		118.3		
曲线饱满值 (RHO)		-0.004	(有限)			

在第一个方程中，“户主在 1944 年拥有多于 10 霍尔德土地的家庭” (OFARMR44) 这个变量位列第六，在两个年龄变量、“作为体力工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户主” (AGRAR) 和“双亲家庭” (ONECOUPLE) 之后，离“退休者的数量” (RETIRNO) 不远。在第二个方程中，它还是位列第六：现在“退休者的数量” (RETIRNO) 落在 OFARMR44 后面，而“活跃的挣钱者数量” (ACTIVNO) 在回归方程中超过了 OFARMR44。但更重要的是，在第二个方程中，OFARMR44 开始接近年龄 (AGE)、年龄的平方 (AGESQ) 和

“作为体力工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户主”(AGRAR);相对来说,当把它和在无产阶级化理论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的两个变量(年龄以及户主的农业体力职业)相比,它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在概率回归中,“与1944年可获得土地相比的1948年的土地规模”(REFORM)比“户主在1944年拥有多于10霍尔德土地的家庭”(OFARMR44)的显著性稍弱,它的解释力在第二个方程中进一步减弱了。

模型B因此给予了农民工理论和资产阶级化理论有些薄弱的但是明确的经验支持(鉴于流动性变量是根据资产阶级化理论来具体化的,它因此支持资产阶级化理论而不是农民工理论)。如果社会学家想要理解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家庭农业生产的幸存程度,家庭背景就是一个必须被考虑进去的因素;如果任务是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生产得更多,那就更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回到模型C,以确定我们对资产阶级化理论的扩展和修正是否找到了经验支持。

与我们的理论相符的模型C显示,当我们从收入选择转到对收入的回归评估时,人口变量的相对强度会减弱(尽管最重要的“年龄”变量仍然强劲,实际上,它在所有的变量中最为强劲)。“户主作为自我雇佣者的年数”(SELFYRS)和“户主在合作社里待的年数”(COPYEARS)这两个变量对于模型解释力的相对贡献在第二个方程中增加了。它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我们强调了生活史变量对解释企业家身份的重要性。

“户主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这个变量对于这个模型的贡献是适度的,但是它的效应从第一个方程到第二个方程发生变化的方式则非常有意思。在选择性方程中,“户主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的参数是负数。在实质性方程中,该变量的参数符号又变为正号。以下要说明的对于这个发现的理解,多少仍然是假定性的。在第一个方程中,该变量对于模型的贡献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是在第二个方程中,它的参数失去了显著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图去理解这个变量的参数变化。这些发现(见表5)很好地说明了分析生活史变量时的问题和前景。虽然意识到了这个理解的局限性,我们还是希望,在对我们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出更明确的界定之后,“户主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和企业家身份之间假定的关系,也会在我们分析的某处呈现统计上的显著相关。

表 5 为模型 C 设计的样本选择模型中未被标准化和标准化后的参数
($N = 7754/7000$)

	概率			回归系数		
	未被标准化 的参数	标准化后 的参数	T 值	未被标准化 的参数	标准化后 的参数	T 值
年龄	0.096	1.512	10.9	0.052	0.878	11.1
年龄的平方	-0.0008	-1.372	-9.5	-0.0005	-0.905	-11.6
活跃的挣钱者数量	0.169	0.182	4.4	0.118	0.142	9.3
其他没有雇佣工作的成年家庭成员	0.181	0.065	2.3	0.077	0.031	3.0
退休人员的数量	0.286	0.201	5.7	0.102	0.080	5.8
需要抚养的小孩数量	0.084	0.088	3.2	0.018	0.021	1.61
“双亲家庭”	0.515	0.233	8.3	0.323	0.159	11.5
三代同堂的家庭	0.395	0.096	2.5	0.321	0.089	6.4
作为体力工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户主	0.461	0.205	6.9	0.309	0.115	10.2
户主在 1944 年拥有多于 10 霍尔德 土地的家庭	0.415	0.158	5.3	0.211	0.091	8.9
与 1944 年可获得土地相比的 1948 年的土地规模	0.356	0.143	5.7	0.119	0.054	5.4
户主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	-0.009	-0.045	-2.1	0.003	0.015	1.4
户主在合作社里待的年数	0.023	0.180	5.2	0.018	0.162	15.1
户主作为自我雇佣者的年数	0.011	0.074	2.4	0.012	0.087	8.4
在高中或者大学文化程度夜校进修 过的人	-0.424	-0.132	-6.9	-0.077	-0.025	-2.2
从来没有接受过超过五年教育的人	-0.285	-0.102	-4.4	-0.132	-0.052	-5.0
常数 (Constant)					7.270	447.4
希格玛值 (Sigma)	0.797		113.9			
曲线饱满值 (RHO)	-0.112					

“户主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的参数变化有什么重要性呢？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太长，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变得完全“干部化”了，所以我们假设，

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跟家庭农业生产呈负相关。另一方面，在少数生产大户中，权威的经验可能会变成一笔财富。干部或者以前的干部不生产任何东西，但是一旦他们从事生产的话，就会更可能成为相当大的生产者。

这个“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所带来的矛盾性结果，支持我们之前关于该变量的一些猜测。我们确实从一开始就预测，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可以同时表示“干部化”和对无产阶级化压力的抵抗。能给某人带来权威的工作相当于发射卫星的“暂泊轨道”（parking orbit）的功能，保留这样的工作一段时间可能方便人们重新进入资产阶级化的轨道。为了让“在权威位置上待的年数”和其他表示权威的指标支持我们的理论，我们必须对这些变量花费更多的心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微调。身处权威位置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其影响的方向和强度将不仅取决于人们曾经在这些位置上待了多久（由在该岗位上所待的年数直接测量），也取决于他们是如何以及在哪个历史时间点上到那些位置上的。

迄今为止，我们比较了每个模型中个体变量的参数。通过这些做法，我们试图证明，由流动性和生活史变量分别产生的参数是显著的。它们有时还比从无产阶级化理论那里得出的变量要显著得多。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比较每个模型。将这些变量包含进来以后，会如何影响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呢？如果当我们从模型 A 转到模型 C 的时候，模型的总体拟合程度越来越高，我们是不是也因此可以说，将这些变量包含进来是合理的，从而提议说，越复杂的理论越充分地描述被调查的现象？

就像表 6 所显示的那样，从模型 A 到模型 C，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有显著提升。

表 6 样本选择模型的统计拟合优度：从模型 A 到模型 C

	-2 * likelihood	df
模型 A	21468	7733
模型 B	21266	7729
模型 C	20796	7719
模型 B vs. 模型 A	202	4
模型 C vs. 模型 D	470	10

五 结论

我们提出以上解释性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在解释“家庭农业生产的净货币价值”，以及从更理论性的角度来讲，在解释家庭企业家身份的重新兴起时，我们必须同时将家庭背景和生活史考虑进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以上结果是可靠的。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

(1) 从无产阶级化理论得出的假设，确实为家庭农业生产的程度提供了一些洞见，但是它的解释力是比较有限的。对于这个现象的理解，要求我们囊括进其他一些无产阶级化理论所没有假设到的变量。

(2) 农民工理论和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包含了两组无产阶级化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变量，这些理论正确地强调了，如果要解释家庭生产特别是企业家身份的重新浮现，就必须把家庭背景考虑进去。如果我们根据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对家庭背景变量做出清晰的界定，即：如果我们假设有着中农或者富农家庭背景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家庭生产者特别是大型生产者，那么，这个模型的解释力将有显著的提升。

(3) 上述证据同样支持我们用“四种归宿”和“重新进入资产阶级化轨迹”的思想对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所做的扩展，以及我们对生活史的强调。在它们的联系方面，我希望提出两个要点：我们把“总农业人口”和“生产者人口”之间的差别，或者从技术上来讲，从 7754 个家庭样本中挑出 7000 个家庭的次级样本这一筛选过程，看作是对人们不同归宿的第一轮粗略区分，也就是相当于做出这样的区别，即一边是无产阶级化的和干部化的家庭，另一边是农民工和企业家家庭。虽然在人们对人们的不同归宿做出这样的第一轮粗略区分之后，我们能够显示，在解释谁可能成为农民工和企业家时，社会流动性特别是生活史变量是特别重要的；但是通过对归宿的测量方式做出更精确的界定，我们可以更有说服力地呈现我们的观点。如同人们可以从上述解释性分析中得出所期望的结论一样，我们关于生活史重要性的论点得到了上述经验研究的全力支持。将对生活史的测量纳入样本选择模型中，不仅提升了我们的模型的预测能力，而且它们也显示出与“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或者“家庭背景”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强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宣称，我们为我们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找到了坚实的经验

支持。让我们通过回到文章的第一部分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来为本文做结，同时，我们也希望清楚地说明我们所做的调查在元理论上的一些意义。

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为家庭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活的社会学原因和可能的结果提供了一些洞见。这个理论可能对社会形态理论（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s）有一些启示。实际上，出乎意料的是，社会主义在完成自身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上是不太有效的。众多幸存的农村半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出乎人们的预料，我们的研究证明，他们对主导的官僚协调的经济部门的失败起到了补偿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和中国的经验（Whyte, 1985; Unger, 1983），以及近期在苏联所发生的至少是部分地“去集体化”的相似趋势，引导着我们去相信，兼职私营经济活动并非简单地是一种暂时性的让步，它不会随着官僚部门的巩固而消失，而是在这里稳定下来，兼职私营部门甚至可能会扩展成为社会主义成熟经济形态中的全职私人财产部门，尽管仍旧是附属性的。

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对阶级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也有启示。匈牙利农村社会的近期历史，从某一方面来说，为成功地抵制由秉执现代化理念的共产党精英所倡导的现代化提供了例证，就像它为群众成功地抵抗强精英主义驱动的强迫的现代化提供了例证一样。匈牙利的农民给他们的干部精英上了一课——他们慢慢地说服精英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性，他们表明，如果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可以让经济运作得更有效、让社会运转得更协调。一些西方学者最近关于东欧特别是匈牙利的一些研究注意到，官僚控制远没有完成，工人确实还有——或者至少有获得——一些力量和自主性（Sabel and Stark, 1982; Stark, 1986; Burawoy and Lukács, 1986）。我们的研究为这些主张提供了一些元理论上的支持。成功地抵抗来自无产阶级化压力的匈牙利农民，在最后的分析中，已经显示了无权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王颖曜 译 郑雯 校

参考文献

Berend, T., I. and G. Ránki. 1972. *A Magyar Gazdasága Száz éve* [One Hundred Year of the Hungarian Economy].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Biró, F., G. Sós, B. Szalai, and I. Szlamenczky. 1980. *Merre Tart a Magyar Mezőgazdaság?*

[Recent trends in Hungarian agriculture]. Budapest: Kossuth Kiadó.

Böhm, A. and L. Pál. 1985. *Trásadalmunk Ingázói – Az Ingázók Tarsadalma* [Commuters in our society and the society of commuters]. Budapest: Kossuth Kiadó.

Burawoy, M. and J. Lukács. 1986. "Methodologies of Work: A Comparison of Firms in State Socialism and Advanced Capit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6): 723–737.

CSO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1982. *A Mezőgazdasági Kistermelés* [Famil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dapest: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CSO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1984. (Vol. I) and 1985 (Vol. II). *Idofelhaznalas a Mezőgazdasági Kistermelesben* [Uses of time in famil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dapest: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Donáth, F. 1969. *Demokratikus Földreform Magyarországon, 1945–1947* [Democratic land reform in Hungary, 1945–1947].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Fazekas, B. et al. 1985. *Mezőgazdasági Szövetkezetek Magyarországo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Hungary]. Budapest: Termelő szövetkezetek Országos Tanácsa.

Featherman, D. L. and R.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auser, R. M. 1980. "On Stratification in Dual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702–712.

Juhász, P. 1973. *A mezőgazdaság fejlődésében megjelenő tehetetlenségről* [Continu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e]. Budapest: Szövetkezeti Kutató Intézet. Közlemények.

———. 1975. "A mezőgazdasági szövetkezetek dolgozóinak rétegződése munkahelycsoportok, szarmazás és életút szerint" [Stratification of workers of farming cooperatives according to types of work performed, social origins and life histories]. Budapest: Szövetkezeti Kutató Intézet. Evkönyv, pp. 241–278.

———. 1976. "Adalékok a háztáji és a kisegítő gazdaság elméletéhez"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family mini-fundia] (Manuscript). Budapest: Szövetkezeti Kutató Intézet. A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1982 as "Agrárpiac, kistüzem, nagyüzem" [Agrarian market, small enterprise, large enterprise]. *Medvetánc*. No. 1: 117–139.

Kemény, I. 1972. "A magyar munkásosztály rétegződé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Hungarian working class]. *Szociológia* 1 (1): 36–48.

Kolankiewicz, G. 1980. "The New Awkward Class—The Peasant-Workers in Poland." *Sociologia Ruralis* 20 (1–2): 28–43.

Konrád, G. and I. Szélnyi. 1971. "Social Conflicts of Under-Urbanization." In: *The Captive City*, edited by M. Harlo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Lenin, V. I. [1919] 1971.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Pp. 288 - 297 in: *Collected Works*, Vol.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ewin, M. 1975.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London: Pluto Press.

Márkus, I. 1973. "Az utóparasztság arcképehez" [On post-peasantry]. *Szociológia* 2 (1): 56 - 67.

———. 1980. "Az ismeretlen főszereplő? —a szegényparasztság" [The unrecognized driving force of history: the poor peasants]. *Valóság* 23 (4): 13 - 39.

Mendras, H. 1967. *Le Fin des Paysans*.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Miller, S. M. 1964. "The Working Class Subculture." In: *Blue Collar World*, edited by A. B. Shostak and W. Gomber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Münch, A. and H. Nau. 1983. "Zur Stellung, Bedeutung und Organization der Individuellen Tierproduktion unter sozialistis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5: 667 - 678.

Nove, A. 196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USSR*. London: Penguin Books.

Oros, I. 1984. "Small 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32 (1 - 2): 65 - 90.

Sabel, C. F. and D. Stark. 1982. "Planning, Politics, and Shop Floor Power: Hidden Forms of Bargaining in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1 (4): 439 - 475.

Shemelev, G. 1981. "Social Production and Personal Household." *Problems of Economics* 6: 840 - 849.

Stark, D. 1986. "Rethinking Internal Labor Markets—New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 492 - 504.

Szelényi, I. 1981.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in Eastern Europe." *Theory and Society* 1.

The World Bank. 1984. *Hungar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Unger, J. 1983. *The Chen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ágvölgyi, A. 1976. "A mezőgazdaság fejlődésének társadalmi hatásai" [Social impacts of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Pp. 152 - 161 in: *A Változó Falu* [The changing rural community], edited by V. Kulcsár. Budapest: Gondolat.

Wadekin, K. E. 1973.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Soviet Agri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hyte, M. K. 1985. *Social Trends in China—The Triumph of Inequality?* (Manuscrip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E
AN

第二编

新阶级





新阶级理论的三次浪潮^①

伊万·塞勒尼、比尔·马丁

艾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首印于1979年。该书不仅是古尔德纳所有著作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理论的一个里程碑。该书及与之相伴随的另两本著作，构成了古尔德纳的“三部曲”；尤其是《辩证法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Dialectic*），为他提供了将自己的激进知识社会学运用到与他同时代学者的各种激进的社会理论上去的工具。而他对左翼“反对文化”（adversary culture）的自我批评，也构成了其对关于现状的政治右翼理论的较早批判分析的一个补充。

《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不仅是激进知识社会学古尔德纳式规划中的一个最大的进展，同时也对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社会理论中的新趋势进行了独特的综合。对1968年的中产阶级激进主义，新保守主义曾予以各种批评；古尔德纳对这些批评持赞赏态度，保留了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分析性的有用洞见，并将其整合为一种层次更高的左翼激进理论。

要实现这一整合的目的，“新阶级”被证明是一个对古尔德纳来说极其有用的概念。在古尔德纳看来，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了技术知识分子阶层与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强大联盟，出现了技术理性（technocratic reason）与批判思维的联姻。对古尔德纳而言，这一联姻可能导致一个新阶级的形成。由于这一新阶级的权力将建立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因此它对权力具有我们可以想到的最为普遍的要求。同时，新阶级和历史上其他各种行动者

^① 原文发表于 *Theory and Society*, 1988, Vol. 17, No. 5。

(agents) 一样, 有着自身的利益追求, 因此它做出的普遍主义宣称具有致命的缺陷。古尔德纳将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有缺陷的普遍阶级的观念, 是对各种极具差异的理论—意识形态传统的大胆综合; 对那些想把握并对 20 世纪 60 年代及 70 年代期间受过较高教育者的激进主义的兴起与消退进行经验分析的人来说, 该观念提供了一个极其有用的起点。

对《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持批评态度的人, 其主要的异议有二: 其一, 他们会强调指出, 吊诡的是, 在古尔德纳的书付印之际, 他所反映的经验现象已经处于衰落状态, 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淡出”, 而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新保守主义者则“正当其时”。其二, 许多批评者怀疑, 阶级概念对于古尔德纳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来说是否适用。换言之, 在古尔德纳出版其著作的时候, 新阶级已处于迷失状态, 无论如何它绝非一个真正的阶级。如果事实确乎如此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为古尔德纳及其新阶级理论费心呢?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力图回答“为什么还要为古尔德纳及其新阶级理论费心”这样一个问题。首先, 我们将诸多新阶级理论包括古尔德纳的理论, 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框架中, 并去揭示这样一个现象: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 新阶级的概念一直都在顽强地重新进入批评新社会理论建构的议程之中。我们的核心假设在于: 上个世纪的历史, 可以被解释为一部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群体追求其最终权力的历史。到目前为止, 所有这些追求权力的规划都失败了, 不过这些规划却都是真实的, 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古尔德纳分析过的现象就不会再次发生。其次, 尽管确乎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新阶级究竟是不是一个阶级, 但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知识分子身上, 或将该方法更广泛地运用到那些对权力和知识的垄断地位的特权有所要求的人身上, 至少是一种富有洞察力的做法。自巴枯宁之后的新阶级理论家们, 一再提醒社会科学家去批判性地检视权力—知识之间的联系。新阶级理论家们第一个强调, 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将知识理解为权力的附属物; 知识同样能够成为权力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阶级的理论建构所强调的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 并可能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理论工作给予启示。

一 新阶级理论：定义及其社会—理论含义

大约在1870年，米哈伊尔·巴枯宁在其著作《鞭笞统治的日耳曼帝国和社会革命》（*The Knoto-Germanic Empire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中创造了“新阶级”这一术语。在分析关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案的可能的社会后果时，他写道：“这里将会出现……一个极其复杂的政府，它不会像今天的所有政府所做的那样，满足于对群众进行政治上的统治和管理，而会在经济上管理群众……所有这些都需要无限的知识……这将导致科学知识的统治，它是所有政体中最具有贵族色彩，最为专制、自负和傲慢的一种。这里将出现一个新的阶级，一个由真正的和虚假的科学家与学者构成的新的等级制度，世界也将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知识的名义下实施统治的少数统治者，另一部分是数量庞大的蒙昧的大多数。”（Bakunin, 1966: 80-97）

从那时起，这一新阶级的观念，以及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t）阶级社会浮现的可能性或危险性（这一阶级社会的统治建立在知识垄断权而不是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就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

“新阶级理论”的表达方式可谓各式各样。在试图追寻一种无所不包的关于新阶级理论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发现新阶级理论家们只是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①资本主义体系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②不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将是“无阶级”社会或“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的构想，却并没有实现。所有的新阶级理论家都断言后资本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这个社会将被一个新的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所统治。除上述两点外，不同的新阶级理论家并没有什么一致之处。可以说，一部新阶级理论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政治与理论分歧的历史。

经过一个世纪的富有成效的争议，新阶级的理论建构依旧处于混乱状态之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称，新阶级这一概念是“混乱的”（Bell, 1979）；在1982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丹尼斯·朗（Dennis Wrong）递交了一篇论文，对新阶级是否还是一个新事物、是不是一个阶级以及新阶级的重要性等问题提出了质疑，他的答案是可以预料的：“新阶级并非一个新事物；新阶级并非一个阶级；即使它是一个阶级，也不再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Wrong, 1982)

贝尔和朗的反应，是对新阶级理论建构艺术的状态的确切描述。究竟谁将是新统治阶级位置的可能候选人？是官僚、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者，还是那些“批判的、反文化的、坚持反对文化的知识分子”？经过一个世纪的争论，新阶级理论家们并未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阶级的统治将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其统治将建立在它在国家中的科层位置之上，还是建立在知识垄断的基础之上？哪种类型的知识是那些最可能成为新阶级的主体所需要的？是专家治理的（technocratic）知识还是目的导向的（teleocratic）知识？是技术性的（technical）知识还是理论性的（theoretical）知识？新阶级在什么样的社会将成为主导阶级？是在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抑或是在官僚集体主义社会（bureaucratic collectivist）？新阶级更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是在苏联式的社会，还是西方，抑或是同时出现在这两种体系之中？这一新阶级将是“进步的”，是“历史上我们手中最好的一张牌”（our best card in history）（Gouldner, 1979），还是所有统治阶级中“最为暴虐的”？新阶级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一个“等级”（estate）、一个支配“群体”（a dominant group）（Heller et al., 1983）、一个官僚圈子（officialdom）（Bauman, 1974: 129 - 148），还是一个“新的神职集团”（new priesthood）（Schelsky, 1975）？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理论家给出了全然不同的答案。尤为糟糕的是，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验证据以便去检验这些理论的问题上，他们很少给出指导。为了裁决诸如新阶级的形成是在社会主义东方还是资本主义西方、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还是在专家治国的美国发展得更快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将如何知道新阶级成功地“罢免”（unseat）旧的统治阶级的时间节点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判断新阶级的失败并最好彻底放弃关于新阶级的规划呢？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对先前的新阶级理论加以综合，并发展出一个研究议程，以便在一个比较的框架范围内，对不同国家和历史环境中新阶级形成的进程予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回避此前有关新阶级的“阶级性”（classness）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我们的研究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这种建立在知识的垄断基础之上的统治，对建立在财产所有权或者官僚职位基础之上的统治所提出的挑战或者替代这种统治的意义何在呢？

尽管贝尔和朗已经提出了警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进行这样一种综合的尝

试，会成为一次有价值的冒险。不过，在相当广泛地阅读有关新阶级的文献时，我们并不能够发现一个满意的理论，此外，这些文献欠缺具体性和明朗性，这一点常常令我们恼火。不过，我们围绕新阶级理论的知识之旅被证明是令人兴奋的。我们获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诸多洞见，这对于批判性地反思主流马克思主义或分层主义对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解释，可以说是无价的。

那些世故的新阶级理论家常常表现出一种反讽感和一种自我反思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分层主义者对知识分子的权力和特权进行分析时所缺乏的。对新阶级的批判性反思，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的批判性反思：如果新阶级存在的话，我们这些批判知识分子，或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都是其组成部分。当古尔德纳提出“摄影师站在何处好”这样的问题的时候（Gouldner, 1979: 9），他实际上是在很艰难地对这一新阶级研究的中心问题给予明确的表述。换言之，我们知识分子在何处比较合适？知识生产者的权力——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力的话——来自何处？事实上，新阶级理论建构的主要力量，正源自其所具有的批判的自我反思性。

在探究这一问题的时候，新阶级理论家们在本质上是在实践批判理论。那些较精致的新阶级理论的学者则是在将知识社会学激进化。自从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著名段落（在这一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2: 44）之后，或更具体地说，自从有了卡尔·曼海姆的贡献之后，我们就知道所有的知识都是以存在为基础的（Mannheim, 1971: 59 - 115）。我们知道，在知识与利益、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不过，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知识社会学的第一次浪潮确实做出了这样一个假设：知识生产者自身是中立的工具，正是通过他们，其他社会主体、阶级、世代以及种族群体等的特殊利益才得以表达出来。马克思和曼海姆都没有追问这一问题，即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知识生产者的利益，会对其所生产的知识一定的影响吗？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知识生产者是某个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Gramsci, 1980: 5 - 23）；而对曼海姆（他是这些理论家中的佼佼者）来说，知识生产者是“与社会相疏离的”（socially unattached）（Mannheim, 1972）。从一定程度上讲，各种新阶级理论是沿着批判理论所规划的边界向前推进了一步。现在，他们将理论家即知识生产者置于严格的检视之下。当然，检视的对象也包括知识生产者们的反

讽和洞察力。

与一些新阶级理论对知识社会学的激进化相伴随的，是由尤根·哈贝马斯、皮埃尔·布迪厄以及米歇尔·福柯所推进的批判理论或知识理论的激进化进程。对于事实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将其权力建立在知识垄断之上的新统治阶级，甚至是其存在的可能性，这些学者都表示怀疑。相反，他们所号召的是一种免受支配的话语，正是这一话语构成了真正的人类解放的前提。他们强调文化资本或作为相对自主源泉的象征性支配（Habermas, 1979），或者是权力与特权的不同形式（Bourdieu, 1977: 487 - 511; 1984; 1987）；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强调权力/知识这一对孪生概念的重要性（Foucault, 1980）；因此，一些新阶级理论家（艾尔文·古尔德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确实和那些近20年或30年中最富有创造力和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一样，强调的是同样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新阶级理论或许能够对围绕当前社会理论所展开的主要讨论做出一定的贡献。

本文试图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我们试图区分新阶级理论的不同浪潮或者类型，揭示每一理论的力量所在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特有洞见。通过这种反思，我们希望提供一种关于新阶级的“观念史”并对理论的每一次浪潮予以内在的批评。其次，我们将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纳入分析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力图建立不同浪潮或者类型的理论与关于新阶级形成的不同的、失败的尝试之间的联系。我们的主要假设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不同群体确乎都有过自身关于权力的渴望，并确乎在不同的历史时间节点追求过“集体动员规划”（collective mobility projects）（Sarfatti-Larson, 1977），或者说“新阶级规划”（参见 Gouldner, 1979）；但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不同的新阶级规划都被证明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这些不同的新阶级理论可以被解释为对上述集体动员规划或新阶级规划的批判性或辩护性的反映，同时也是过于笼统的或过于早熟的反映。可以说，这些不同的理论之所以表现出残缺和碎片化的状态，并不是因为理论家们犯了分析方面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所概括的这些可以从经验上加以辨识的规划，本身就是早熟的、不一致的和矛盾的。最后，我们提出一种关于新阶级的“综合理论”。用一句半开玩笑性质的话来讲，从对关于新阶级的批评出发，我们现在就是要成为这些新阶级的思想家。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人能够汲取历史教训并制定一个规划以便将知识分子推向权力之路吗？关于新阶级的完整理论，以及具有较高

受教育水平者的成功的阶级规划将是什么样子呢？在这样一种“综合理论”的指引下，我们还试图对成功的新阶级规划在西方和东方的前景予以评价。

二 新阶级理论的不同浪潮

我们区分出关于新阶级理论的三次浪潮：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阶层的无政府主义理论（the anarchist theories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20世纪30~50年代官僚—专家阶级理论（the bureaucratic-technocratic class theories）；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阶级理论（the knowledge class theories）。每一次浪潮的理论都提供了不同的见解，且各自从某一角度把握了新阶级的不同方面或其阶级形成的不同维度。从对新阶级理论进行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可以区分出其中所包含的三个阶级形成的维度：主体性（agency）、结构性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意识（consciousness）。尽管理论家们确乎对上述三个维度的特征都有所把握，但他们对所选择的维度却有所侧重。如此，我们发现第一次浪潮的新阶级理论所强调的是主体性，第二次浪潮的新阶级理论强调的是结构性位置，而第三次浪潮的新阶级理论强调的则是意识。

我们的关键假设在于，一个新阶级的完全形成，需要满足上述所有三个前提条件：首先是准备接管阶级权力的主体的出场；其次是出现能够满足阶级权力运作的新结构性位置；最后，是具有阶级渴望的新主体确乎具备适当程度的意识，以确保新结构性位置上的阶级权力能够得以实施。我们认为，对阶级形成的这三个维度的分析，能够被运用到所有的阶级研究中去。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或许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评价；不过，这一区分更多地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的新阶级这一现象。毕竟，至少到目前为止，新阶级还是一个形成得颇不均衡的阶级，其形成的历史更多地是一部充满挫折而非成功的历史。

（一）知识分子阶层的无政府主义理论（1870~1917年）

无政府主义者很早就看到了马克思规划的社会主义中的精英主义以及潜在的科学主义。在第一国际的共同合作中，巴枯宁对马克思进行了抨击，其抨击的焦点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中央集权主义特征（statist features）。他认为（参见上文所引），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经济与社会，会对知识的复杂性提出

很高的要求，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学者与知识分子的统治。

迈克杰斯基 (W. Machajski) 是一名波兰—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他从无政府主义的论点出发，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愿景：工人们期望社会主义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知识分子则将国家权力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 (Machajski, 1937; Nomad, 1959)。迈克杰斯基认为，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愿景的设想是自私的，知识分子希望利用工人阶级运动提升自己在国家官僚机器中的权力地位。基于这一愿景的社会将是一个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不平等社会，只不过在这一社会中基于私有资本产权的特权被基于知识垄断的特权所取代而已。

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即将扮演的角色，巴枯宁和迈克杰斯基都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在群众斗争中将政治斗争置于经济斗争之上，轻视平等这一目标而把目光放在国家权力的性质上，这些想法只不过是服务于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渴望罢了，它们根本无助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解放。

总之，第一次浪潮的新阶级理论所集中关注的是主体性问题：谁将可能成为一个正在试图成形的新阶级的主体？为什么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真的能够完全相信知识分子确乎是无私的、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那样）的说法吗？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知识分子最后实际上是在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追逐着自身对权力的渴望？

（二）官僚—专家阶级理论（20 世纪 30、40 以及 50 年代）

从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起，陆续出现了一些理论，它们声称，在苏联、西方资本主义或这两个体系中，一个官僚的、技术的或者说管理的新统治阶级正在形成之中或者说已经掌控了权力。这些理论彼此之间观点迥异：在它们各自的预想中，即将成为新阶级的核心主体是相当不一样的（从斯大林式的官僚到美国式的管理者）。一些理论家坚持认为新阶级的形成仅仅限于苏联，而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出现了新的统治阶级的发展。不过，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有一个论题是相同的，即旧的、基于资本的、私人所有的阶级权力诉求已经被取代了；一种新的结构性位置被创设出来，以便去执行经济指令。

尽管在凡勃伦 (Veblen, 1963)、伯利和米恩斯 (Berle and Means, [1931])

1968)等人的著作中,这种分析的发展是独立进行的,而且仅针对西方社会;但大多数官僚—专家阶级理论,其实都可以追溯到里昂·托洛茨基的著作(Trotsky, [1937] 1972),追溯到对早期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的经验分析。

当然,托洛茨基本人并非一个新阶级理论家。他断然否认官僚制具有阶级的特征,甚至在苏联兴起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后,他还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不过,托洛茨基还是令人信服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实际上为后来的各种官僚阶级理论开启了理论空间。

事实上,首先将苏联描述为一个被官僚阶层统治的社会的综合性理论,是由此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们(Trotskyites)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斯大林—希特勒缔结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下,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的说法是不可接受的。于是,托洛茨基的前信徒们比其老师走得更远,他们指出了处于统治地位的苏联官僚阶层的阶级性质,从而提供了一种关于苏联特征的更激进的分析。我们可以区分出这种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官僚—阶级”理论中的两个版本:①对一些人来说(例如,托尼·科利夫),苏联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斯大林主义官僚使得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了(Cliff, [1948] 1974);②另一些人则在布鲁诺·瑞兹(Rizzi, [1939] 1967)的影响下,宣称苏联所代表的乃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体制,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而应当称之为“官僚—集体主义”(bureaucratic-collectivism)(Schachtman, 1962)。国家官僚统治着官僚—集体主义社会,他们构成了所谓的新阶级。不过,无论是早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还是官僚集体主义理论都认为,官僚的阶级权力奠基于一新的产权形式之上,那就是:官僚们共同拥有生产工具。

这种将苏联看作是一个被集体产权阶层(即官僚)所统治的新阶级社会的早期理论,其影响较为深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一些理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余波。不过,在后斯大林时代还是出现了一些对早期官僚阶层理论的重新思考:①吉拉斯(Djilas)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库容(Kuron)、莫泽莱夫斯基(Modzelewski),都接受了这一新的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阶级”的说法,认为其权力建立在集体产权的基础之上;不过,他们依旧将这种苏联类型的社会,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或“国家垄断的社会主义社会”(Kuron and Modzelewski, 1968)。②毛主义者——其中最为明确的

当属查尔斯·贝特兰 (Charles Bettelheim) ——则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新版本 (Bettelheim, [1970] 1976)。他们认为, 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并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但与后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家们不同的是, 这些毛主义者相信, 导致这一复辟的主体并非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 而是企业管理者。不过, 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 贝特兰与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官僚—阶级”理论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从事管理工作的技术官僚 (managerial technocracy) 的阶级权力, 建立在其对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之上。^③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 在安东尼·卡洛 (Antonio Carlo) 的著作中出现了一种官僚集体主义的新版本 (Carlo, 1974);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一新版本也出现在卡斯托瑞尔迪斯的一些作品 (Castoriadis, 1978 - 1979) 中。他们都认为苏联沉醉于经济增长, 这导致了一种“为了生产而生产”的经济体制的诞生 (Carlo, 1974: 55)。因为这种生产所满足的, 乃是生产的兴趣而不是真正的社会需求, 苏联的官僚集体主义 (卡洛的说法) 或全能的官僚资本主义 (卡斯托瑞尔迪斯的说法) 最终所服务的, 是官僚阶级的利益。

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中个体的私有财产消失了, 旧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被那些实际上掌控着生产工具的人的权力所取代, 这一思想对于那些分析西方社会结构转型的学者的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些西方“新阶级理论”的一部分, 可以看作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对苏联社会进行分析的一个分支。作为一名前托洛茨基主义者, 詹姆斯·伯纳姆 (James Burnham)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发展出一种“管理社会”理论 (Burnham, 1962), 他认为, 俄国革命使得管理人员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一个统治阶级。他还宣称, 管理革命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就像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迈向管理主义一样, 法西斯日本与德国同样在迈向此种管理主义。这样, 伯纳姆发展出了一个东西咸宜的新阶级理论, 它预示在西方世界同样会出现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 一些学者以辩护的方式, 另一些学者则通过批判性的暗示, 强调了现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技术—管理转型的重要性。伯利和米恩斯令人信服地报道了美国所发生的管理权力的膨胀 (Berle and Means, [1931] 1968)。他们宣称, 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转型, 私有财产正

处于消解之中，私人所有者所占据的经济权力的位置正被管理者所取代。^①

有好几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甚至是哈贝马斯在其早期的著作（Habermas, 1970）中，也对现代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做出了类似的、更具批判性质的分析。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将这些社会看作是一种技术畸形的社会。^②他们将早期资本主义描述为自由的和民主的，因此对发达的、专家政治的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技术不断地侵入所有的生活领域，甚至是文化与政治领域。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科学的、专家治国论发展的极端表现形式。在这些著作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立场接近于后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专家或实证主义科学家扮演着统治的角色（尽管在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家中，没有一个批判理论家接受新阶级理论）。

第二代新阶级理论家所关注的是结构性位置这一问题：为了获得新统治阶级的资格，各种新阶级主体必须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新的结构性位置，它能够替代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由私有与个人的资本产权所确保的位置？一些理论家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盘踞在国家官僚位置上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在功能上类似于或等同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所有者所扮演的角色。基于同样的理由，也可做这样的理解，所有者的位置被“管理者”、“技术结构阶层”或“专业官僚”所取代。

（三）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阶级理论

尽管有少数例外，早期的这些理论通常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实践的左翼性质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期间，政治右翼（新保守主义）首次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新阶级理论。他们的观点是，左翼知识阶层发展出一种“反对文化”以便瓦解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价值体系，^③并建立起一种由具有道德说教色彩的左翼知识阶层组成的现代“祭司”的权力（Schelsky, 1975）。他们认为，左翼知识阶层通过媒体、现代福利国家、学术圈子或对上述制度的综合使用，施加着非民主的压力，从而建立起自身的阶级统治（参

① 对这一观点的批评，参见 Zeitlin, 1974。

② 特别参见马尔库塞（Marcuse, 1941）以及波洛克（Pollock, 1978）的论述。

③ “反对文化”这一术语，最初见于莱昂内尔·特灵的概念（参见 Trilling, 1965）。

见 Moynihan, 1982)。

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Bell, [1973] 1976)中,提出了一种较少政治色彩但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观点。^①在贝尔的著作中,科学家被认为是在后工业社会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新角色。相应地,科学理论知识也成为后工业时代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一个主要动力。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出现了能够接纳新的、象征社会进步的知识阶级的空间。^②

贝尔和新保守主义者都是知识阶级理论家。和贝尔一样,新保守主义者指出,一种新的知识特质的存在,为知识阶层的阶级渴望提供了依靠。对贝尔而言,这种新的知识特质就是理论性(theoreticity);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这种新的知识特质则不过是左翼知识分子所倡导的那种新文化在各个方面所具有的破坏性和颠覆性。

古尔德纳关于新阶级的研究规划,起先是作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革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批判的知识社会学而存在(Gouldner, 1975 - 1976)。古尔德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其“隐喻性”特征(Gouldner, 1976)——特别适合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假装代表普遍利益的情况下去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由于配备了这种知识,革命的知识阶层就能够以自己替换无产阶级并作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从革命中浮现出来。在其关注这一主题的两本主要著作——《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辩证法》(Gouldner, 1976: 9 - 13, 23 - 63, 195 - 294)以及《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Gouldner, 1979)中,古尔德纳发展出了一个新阶级理论,该理论不仅涵盖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锋队对权力的渴望,也考虑到了专家/科学家们不断增长的权力这一现象。古尔德纳发展出了一个被称为“批判性话语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的核心概念,该概念可以说是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专业人员、技术知识分子以及敌对分子或反文化的知识分子所享有的知识的共同特征与特质。当这些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人的知识采取批判性话语文化的形式出场的时候,他们就获得了一种文化资本,这使其不仅能够从国家社会主义的“旧官僚阵营”那里,也能够从私人资本家与金融资本所有者那里“篡夺”权力。

① 与新右派相比,贝尔当然较少批判正在浮现的新阶级论题,同时对其更具同情心。

② 凡伯伦对工程师的未来也持类似的观点;追随贝尔,加尔布雷思则发展出一种对“专业技术结构”(technostructure)的类似分析。参见 Veblen, 1963 以及 Galbraith, 1967: 71 - 82, 97 - 108, 291 - 303。

大体而言，各种不同的知识阶级理论是对西方变动的社会关系的不同反映。本文的作者之一，在其著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也发展出了一种与古尔德纳类似的分析（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我们在那本书中认为，东欧的知识阶层就其对“目的性知识”（Teleological Knowledge）的本质垄断而言，已经提出了对阶级权力的诉求；事实上，在后斯大林时代，已经出现了一种要求官僚向知识阶层开放并分享权力进而变成一个新阶级的趋势。

新阶级理论的第三次浪潮所探究的是知识的变动的性质。这些理论大多认为一种新的知识类型（无论称其为反对文化、目的性知识还是文化资本）正在扎根，这一类型的知识所有者也与统治者有了一种全新的勾连。而这种新的类型的知识所有者也被认为具备一种对权力的自发要求。

对所有这些既有的新阶级理论，我们的主要批评在于它们的不完备：它们过于强调“新阶级现象”中的某一个维度，或者是新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某一方面。在表1中，我们对不同浪潮的新阶级理论进行了粗略的评价（表中的+号越多，意味着该理论越是强调某一维度）。

我们的理论建构的中心任务，就是将这些零散的见解联结为一个能够包含所有三个维度的连贯的理论。

表1 不同理论所提供的关于新阶级形成的不同维度的看法

新阶级理论的浪潮	主体性	结构性位置	知识的类型
知识分子阶级	+++	++	+
官僚/专家阶级	++	+++	+
知识阶级	++	+	+++

三 对不完整的并因此失败的新阶级规划的反映： 不完整的理论^①

将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解释为一部对新阶级的形成进行若干尝试的失败的

^① 本节英文标题为“Incomplete theories as reflections of incomplete and therefore failed New Class projects”。——译者注

历史是可能的。各种理论的不完备所反映的，并非别的什么东西，它们折射出的是这些集体性的动员规划本身的不成功。

第一个这样的规划的实践者是 19 世纪的那些“与社会相疏离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被拔了根的知识分子，既失去了自身的传统社会地位，同时又不能或不愿意接受市场资本主义提供给他们的新位置（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在这里，谁是那些渴求新的社会位置的主体是很清楚的。但是，较不清晰的却是那种位置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它所要求的知识类型是什么，以及主体要获得这样的位置应该做什么？

巴枯宁和迈克杰斯基都是这些行动主体（agents）的批判理论家。他们所面对的经验现实是：在 19 世纪的社会民主运动中，知识分子处于“过分代表”（over-representation）的状态中，他们深信自己就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的”代表。无政府主义者的怀疑并非没有偏见，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像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大公无私。不过在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所做出的种种预言并未成为现实。当然，知识分子也并未掌权。相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死在新兴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所掌控的集中营中。

不过，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在 19 世纪晚期，激进的、“与社会相疏离的”知识阶层确乎有过一个争取他们自身权力的规划。当然，这一规划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规划的主体过于“乌托邦化”；他们对于为了实现自身对权力的渴望而应该获得的结构性位置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但是，这一规划以及巴枯宁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内核确实存在过。

新阶级理论的第二次浪潮则是好几个规划的反映。这些不同的规划包括苏联的官僚规划（Soviet bureaucratic project）、专家治国规划（technocratic project）以及管理规划（managerial project）等；尽管诞生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不尽相同，它们却都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而在上述规划中，苏联的官僚规划或许是距离获取“阶级权力”最近的一个。而吉拉斯所提供的研究个案则或许是所有关于新阶级的文献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个。毫无疑问，在官僚计划体制中创造一个新的“结构性位置”这一点上，苏联式的官僚获得了成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的形成。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另一方面，

这一新结构性位置的占据者是那些颇为“落伍的主体”^①，是那些具有“亚细亚的”（Asiatic）和“前现代”特征的官僚。

不过，苏联式的官僚还不“值得”被称为一个阶级，它所运作的权力类型还带有前阶级的特点。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其统治要求系统地运用高压政治。为了使苏联这种类型的社会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社会”，为了获得基于理性的合法性，这一官僚权力不得使其自身理性化。这种苏联的官僚规划的主要缺陷在于，其理性化的诉求不是很强。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我们试图把握住20世纪60年代晚期与70早期苏联的理性化、科学化改革运动的精神所在。这一改革运动确乎具有这样的潜力，即将苏联类型的社会建立在理性的、合法化的原则基础上，并同时扩大掌握决策权的圈子的范围。另一方面，我们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这本书中我们指出，我们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的适应能力与顽固程度。波兰官僚在20世纪70年代对理性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破坏方式，表明这些社会要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甚至是像苏联这样的官僚规划都不能获得一种新的阶级权力类型。这种规划的优势在于它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的结构性位置，但这一位置却被“错误的”主体所占据，即被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发展一种理性统治体制的人所占据——而这正是获得阶级权力的先决条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在西方出现了一个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群体，确切地说就是那些富有技术能力的人，他们也开始有了对权力的新要求。美国历史上进步时代^②的来临，“科学管理”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的兴起，特别是存在于工程师中的各种运动，标志着这一专家治国规划的开始。凡伯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无论其性质是辩护性的还是批判性的，都将这一规划描述为一个在技术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受过高度技术培训的人士的权力增长过程。这一专家治国规划对苏联的官僚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甚至是苏联官僚也试图利用技术——譬如苏联在航空领域所

① 我们之所以称这些主体是“落伍的”，是想强调他们不能够获得一种社会统治的理性形式。他们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更确切地说，他们应该被称作一个“等级”（estate）而不是一个“阶级”（class）。

② 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期，美国的一批有识之士力图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改革，史称“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译者注

取得的成功——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同样，苏联工程师也掀起了引介科学管理的运动，力图将工程师提升到官僚的位置，总而言之就是使苏联的官僚政治“技术化”（Bailes, 1978）。

不过，这种专家治国的规划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在苏联，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官僚战胜了技术专家；而在西方，与其说该规划是对现有支配体制的挑战，不如说它是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赞同或批判。也就是说，专家的权力被同化了。和官僚规划一样，专家治国规划的缺陷在于它缺乏“意识”这一维度；专家治国的意识最后被证明并非像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具有“颠覆性”。当代西方新阶级理论所强调的是“知识”维度。这确实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西方社会中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的当前规划的独特性与相对优势。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规划贴上“目的论规划”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关于“知识阶级”的文献将左翼知识阶层——所谓的反对文化知识分子——看作是这一新的、以目的为中心的组织的核心，他们建构了一个新的意义系统并将其强加给社会，从而试图颠覆现有的权威体系。他们自以为是，以自身的关于政治与世界的道德观点胁迫社会。换言之，该专家阶层确乎拥有权力，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占据了特别重要的结构性位置，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发展出了一种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意识。专家治国规划的本质在于，它通过建构和重构意义系统而获得权力，进而通过对各种意义的垄断夺取民主话语权。

专家治国规划恰好处于苏联的官僚规划的对立面。苏联官僚在其获得权力斗争中的优势来自他们所占据的位置，而弱点则在于其“意识”；相反，专家的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知识的类型，而弱点则在于除了这种意识外，他们很少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凭借。

鉴于各种知识阶级理论都缺乏可信性，我们不免怀疑，一帮被颠覆性思想武装的左翼思想家真的就能够推翻现有的统治体系吗？此外，这些主体对这一专家治国规划的忠诚程度到底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毕竟，站在专家治国规划背后的主体，其被“拔根”的程度，并不如那些与“社会相疏离的”的主体；文化工业、学术圈以及大众传媒都能够（就这一点来说是很有效地）将他们整合到现有的体系中去。当新右派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代那里获得支持的时候，新左派的专家治国规划的缺点变得明显起来。反对文化失去了其影响力；许多专家治国规划的主体“抛弃了该阵营”，并再次背叛了该规划。

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专家治国规划就此就不能够再恢复元气。毕竟，将新的原教旨主义右派看作是专家治国规划的另一个右翼版本是可能的。早期的理论想当然地或者甚至似乎是错误地假设“知识阶级”必须来自左派，其知识必须是普遍的和世俗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说专家治国规划的本质在于垄断意义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原教旨主义右派，尤其是美国的基督教右派也看作是在追求一种专家治国规划。如果说施凯尔斯基（H. Schelsky）是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批判的新左派知识分子视作一种新的“祭司”，那么那些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右派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呢？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正在浮现的新保守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对左翼知识阶层将政治道德化以及施加道德恐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到了80年代中期，原教旨主义右派知识分子自身也开始以道学家的面目出现。在最近十年中，政治渐次迈向右翼，左翼知识阶层的专家治国规划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规划就永远失去了其动力。

我们力图去全面理解不同类型的新阶级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备、混乱以及自相矛盾；这些理论上的不完备、混乱和自相矛盾，反映了各种新阶级规划的不连贯，而正是这种不连贯成为它们随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过，由于我们在本文中所处理的“经验材料”是各种理论，而不是围绕不同的新阶级规划而浮现和发育着的各种历史偶然性（contingencies），因此，我们不能够对这些规划给出一个满意的社会学描述。

在此，我们期望能够发展出一个研究议程，以便将过去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这些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的运动，解释为失败的新阶级规划，并将重构这些运动的历史的任务留给未来的经验研究。

四 新阶级理论的未来

至此，我们能够建构一个“综合理论”来测量新阶级在所有“三个维度”中的形成，同时避免先前各种理论的缺陷；这一“综合理论”并不将新阶级的出现看作是早熟的，因为它已经在其中的一到两个维度中取得了进展。

新阶级最终形成并满足上述所有三个维度的“阶级性”的前景如何？在我们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是困难的。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们将论及这一问题。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先前的新阶级规划的失败，就简单地推论新阶级在今后就再也没有兴起的机会。我们不仅将东西方新阶级的形成视作一个明显的可能，而且预想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阶级统治下，这两种体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趋同。同时，我们还认为，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新阶级的浮现并非不可避免；我们甚至会倾向于认为，新阶级形成的可能性或许并非如同想象的那样大。

（一）新阶级在西方：前景及其局限性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20年中，西方新阶级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不能够觅得一个结构性的位置。当然，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干预的增强，围绕政府计划的各种制度渐次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性位置。随着西方从竞争性资本主义的过去逐步滑向一个中央集权统治的未来（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一个集权主义的新阶级出现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古尔德纳在相当程度上说服了我们，特别是，既然历史上的附属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因此可以想象，在向“后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也同样不太可能出现附属阶级掌握权力的情况。如果这样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的话，它极有可能是一个具有中央集权统治色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当前的“第三阶级”即新阶级的胚胎，将成为统治阶级。对那些期待这样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人而言，或许古尔德纳又一次说对了——新阶级或许是历史送给他们的“最好的一张牌”。事实上，有效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很可能只能建立在“劳工的力量”与“新阶级”的联盟基础上。另一方面，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西方，这种具有集权主义色彩的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出现面临两个主要限制。

首先，为什么“社会”不能汲取教训并同时抵抗“商品化”和“科层化”的力量呢？对我们来说，新阶级或许是历史上最好的牌，但是也许不这张牌我们会过得更好。作为替代，我们竭力维持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统治体系。与以新主人替换旧主人相比，也许在有两个主人的情况下我们会过得更好一些。与那种通过与其他维度的权力联合以达到攻击处于统治的另一维度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不同，“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更具广泛基础的社会运动对两个统治体系都进行攻击，这一理念或许是当前最为可行的一种行动策略。

其次，大多数新阶级理论过于想当然地假设，那些成为新阶级的主体应该需要来自其位置的权力。古尔德纳确乎考虑到了这一可能性，我们在《通往阶

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但现在我们对这种假设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知识分子即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人是否想要获得“阶级”权力，这一点并非显而易见。即使他们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即使结构性位置对他们敞开大门，即使“社会”让他们成为“新主人”，他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一机会并成为新阶级依旧是不确定的。他们之所以不这样做可能有好几个理由。我们的新阶级理论之旅以及先前的关于新阶级规划的经验告诉我们，受过较高教育者为了获得“阶级权力”而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这一代价就是官僚化。资产阶级社会至少还提供了“自由专业活动”（professions libres）的自由，它还为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者提供了经济保障和学术自由的特权。反之，国家主义官僚化则会危及这些特权。仅仅为了行使权力，知识分子和受过较高教育者就会心照不宣地和自愿地放弃这些特权？吊诡的是，这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可能会抵制自身阶级权力的诱惑，不过这种抵制并非出自什么社会原因上的无私奉献，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此外，通过抵制权力的诱惑，知识分子或许实际上还能够获得一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即“象征性统治”。无论是对政治左翼还是政治右翼的思想家来说，通过对知识或信息的占有而施加影响并在权力剧场的“幕后”操作，总归是一种诱惑。总而言之，新阶级统治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只是一件可能的事情，而并非一件很可能的事情。

（二）新阶级在东方的前景与局限性

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我们对存在于苏联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获取阶级权力优势的当下的迫切性做了过高的估计（Szelényi, 1986: 103 - 144）。尤其是过去十年的经验更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即使有了所谓的理性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推动这些改革的发展动力的进步也是极其缓慢的，从而使得这些社会距离现代意义上的阶级社会还相当遥远。许多国家的改革运动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失去了动力，这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在匈牙利，其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改革的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似乎不再有多少实际的意义，知识分子应该支持改革的态势也显得不再那么明显。简言之，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人被官僚的顽固所激怒。10年或15年前（特别是在1968年前），在许多国家的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当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人乐意与官僚分享权力，将决策过程科学化并使得合法性体系理性化；而现在就很难确定他们是否还愿意那样做了。或许，在上述个

案中，东欧的知识阶层会认为，对他们来说更好的策略是为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而奋斗，以便确保“自由专业活动”的特权，而不是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做作持续的斗争。

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中，新阶级形成的前景并不总是那样光明。是继续停滞于半亚细亚式的（semi-Asiatic）、半现代式的（semi-modern）官僚的统治，还是迈向一种经典的资产阶级发展模式，抑或是向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级社会”迈进，这些都是可能的选择。

不过，伴随着苏联最近的形势变化，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我们能够感觉到新阶级规划的复苏。它意味着向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精神的回归。在20世纪70年代的新斯大林时代之后，重新呼吁技术知识阶层参与到改革运动中去，这标志着苏联官僚又一次试图通过向知识阶层开放权力位置而重新获得合法性。戈尔巴乔夫召唤萨哈罗夫（Andrey Dmitriyevich Sakharov）^①回到莫斯科的举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精神，似乎再次在苏联被唤醒，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共产党官僚体制并与之分享权力。

当然，我们不能判断戈尔巴乔夫愿意或者说能够走多远，历史经验提醒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苏联官僚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虽然在过去10~15年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新阶级运动遭遇到严重的挫折，但知识分子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前景依旧比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要乐观得多。

刘建洲 译 何梅清 校

参考文献

Bailes, Kendall. 1978. *Technology and Society under Lenin and Stalin: Origins of the Soviet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kunin, N. 1966. "Marx, the Bismarck of Socialism." In Leonhard I. Krimmerman and

^① 萨哈罗夫（1921~1989），生于莫斯科，苏联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曾是苏联国内最有影响和最为大胆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被苏联禁止离境领奖，其妻叶莲娜在颁奖典礼上代他宣读演讲词。他处处受到刁难并被送往外地，过着与世隔绝、形同软禁的生活。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让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译者注

Lewis Perry (eds.), *Patterns of Anarchy*. 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Bauman, Zygmunt. 1974. "Officialdom and Class-bases of Inequality in Socialist Society." In Frank Parkin, editor,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Bell, Daniel. [1973] 1976.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9. "The New Class—A Muddled Concept." In B. Bruce Briggs, editor, *The New Class?* New York: McGraw Hill.

Bettelheim, Charles. [1970] 1976. *Economic Calculations and Forums of Property*, translated by John Taylo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erle, Adolf and Means, Gardiner. [1931] 1968.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ourdieu, Pierre.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J. Karabel and A. H. Halsey, editor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Distin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Espace social et pouvoir symbolique." In Pierre Bourdieu, *Les Choses Dites*. Paris: Les Edition Minuit.

Burnham, James. 196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arlo, Antonio. 1974. "The Socio-Economic Nature of the USSR." *Telos* 21: 2 – 86.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78 – 1979. "The Social Regime in Russia." *Telos* 38: 212 – 248.

Cliff, Ions. [1948] 1974. *State Capitalists in Russia*. London: Pluto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albraith, John. 1967.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ouldner, Alvin. 1974. "The Metaphoricality of Marxism and the Context-Free Grammar of Soci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4: 387 – 414

———. 1975 – 1976. "Prologue to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Telos*, Winter, 3 – 36.

———. 1976. *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Gramsci, Antonio. 1980. "The Intellectuals." In: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abermas, Jürgen. 1970.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9. *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Heller, Agnes, Ferenc Fehér, and György Márkus.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Konrád, George and Iván Szelényi. 1979.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translated

by Andrew Arato and Richard E. All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uron, J. and Modzelewski, K. 1968. *Il Marxismo Polacco all'Opposizione*, Roma.

Machajski, W. 1937.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In V. F. Calverton, editor, *The Making of Societ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Mannheim, Karl. 1971. "The Problem of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Kurt H. Wolff, editor, *From Karl Mannhei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arcuse, H. 1941. "Some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9: 414 - 439.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2. "The German Ideology." In K. Marx, F. Engels, and V. I. Lenin,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oynihan, D. P. 1982. "Equalizing Education—In Whose Benefit?"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Nomad, Max. 1959. "Masters, Old and New." In: *The Making of Society and Max Nomad, Aspects of Revolt*.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Pollock, F. 1978. "State Capitalism—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Andrew Arato, editor,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Basil Blackwell.

Rizzi, Bruno. [1939] 1967. *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 translated by Adam Westoby. London: Tavistock.

Sarfatti-Larson, Magali.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achtman, Max. 1962. *The Bureaucratic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he Stalinist State*. New York: Donald Press.

Schelsky, H. 1975. *Die Arbeit Tun die Anderen*. Koln - Oppladen.

Szelényi, Ivan. 1986. "The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 Project." *Politics and Society* 2.

Trilling, Lionel. 1965.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Penguin Publication.

Trotsky, Leon. [1937] 1972.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Veblen, Thorstein. 1963.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Harcourt and Brace.

Wrong, Dennis. 1982. "The New Class, Is It New, Is It a Class and Does It Matter?" Annual Meeting of ASA.

Zeitlin, Maurice.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rch, 1073 - 1119.

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

伊万·塞勒尼

在这篇文章中,^① 我将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描述,指出在这些社会中存在着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的阶级对立。本文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知识分子对权力的要求,源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制度,特别是确保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剥夺剩余的各项制度;正因为如此,这种权力也就具有阶级的属性。

本论文的抱负甚大,其所要挑战的是所有颇具学术声望的关于东欧社会结构和知识阶层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理论。这些思想流派承认当前东欧存在着阶级关系,但其所指出的各种阶级对立(class dichotomies)与我所提出的差别甚大。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区分出苏联存在的两个“非对抗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② 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将其观点建立在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的批判分析基础之上的学者则认为,在工人阶级和官僚或技术官僚之间存在着一种阶级对立——库容(J. Kuron)、莫泽莱夫斯基(K. Modzelewski)及

* 原文发表在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2 年第 88 卷、《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对劳工、阶级和国家的研究》专辑上,第 287~326 页。

① 本文是在对笔者的一篇文章进行根本性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文发表在 *Critique*, Vol. 10-11 上。

② 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分层模式,一般都归功于斯大林(Stalin, 1972)。

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是最好的例子。^① 奥索斯基 (Stanislaw Ossowski) 之后的大多数东欧社会学家都倾向于既不同意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 也不认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立场。^② 在过去 20 年中, 一些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家已经对阶级分析能否适用于东欧社会的研究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 他们试图使用社会分层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东欧社会, 例如, 韦索沃夫斯基 (Włodzimierz Wesolowski)、费尔格 (Zsuzsa Ferge) 以及海基达斯 (Andras Hegedus)。^③ 所有这些学者都反对将知识阶层定义为一个阶级; 甚至对于知识分子是否来自同一个阶层, 他们都持有不同的看法。最后, 那些已经将东欧的知识阶层视作一个阶级的学者, 也很少使用“阶级”这一术语; 他们更多地是对东欧的激进知识阶层如何实现权力垄断, 或者说对其如何为一种或许可被称为“阶级权

-
- ① 米洛万·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发展出了官僚 (bureaucracy) 这一概念, 并将其视作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新的所有权阶级。对吉拉斯而言, “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官员; 而在共产主义国家, 官僚则是一种不同的、新的事物, 是一个新阶级” (Djilas, 1957: 44)。吉拉斯确实承认他自己对社会主义进行批评的知识来源, 可以追溯到托洛茨基的著作; 但他正确地指出, 托洛茨基并不承认官僚的阶级特征。“在以革命的名义批判那些党的官僚的同时, 托洛茨基同时也批判了党的教徒 (cult) 即新阶级, 尽管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Djilas, 1957: 50) 事实上, 与里昂·托洛茨基自己的意图不同, 托洛茨基主义者们的分析, 总是和不同版本的官僚阶级理论十分接近; 众所周知, 萨克特曼与伯纳姆是将托洛茨基的理论拓展为新阶级理论的典型 (Shachtman, 1962; Burnham, 1962)。吉拉斯的分析的优势在于, 他能够将其新阶级的概念与东欧的政治及历史现实结合起来; 他并没有贸然去发展一种关于新管理阶级或新官僚阶级的普遍理论。另一个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关于东欧官僚的批判的有影响的运用, 是库容和莫泽莱夫斯基的“公开信” (Kuron and Modzelewski, 1966)。在这篇文章中, 库容和莫泽莱夫斯基还是相当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他们并未发展出一个官僚阶级理论, 但其分析却遵循了这一方向。自那以后, 库容已经大为偏离这种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 但甚至是在其最近的著作中, 他也没有发展出一种官僚阶级理论 (Kuron, 1978)。
- ② 奥索斯基首先对东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了广泛且鞭辟入里的批评 (Ossowski, 1963: 110-113)。
- ③ 海基达斯以及费尔格的观点建立在奥索斯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们都想用一种对社会结构的分析 (其中劳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来取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他们实际上是用阶层分析替代了阶级分析 (Hegedus, 1977: 47-57; Ferge, 1973: 77-116); 这样, 他们就回避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一个阶级社会”这一理论问题 (在这里, 从“阶级”概念到“社会结构”概念的术语转换可谓意味深长)。东欧这一类型的研究价值在于其经验性——它为东欧的社会分层及社会不平等的经验研究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海基达斯以及费尔格在匈牙利所做的工作, 被韦索沃夫斯基在波兰重复 (Wesolowski, 1970)。甚至是苏联的社会学家们也实施了同样的研究, 他们对分层中的不平等进行了描述, 但却并没有以其研究结论与官方阶级理论相抗衡 (Shkaratan, 1970)。

力”的东西而奋斗的过程予以简单的描述〔如波德耶夫（Berdyaev）和迈克杰斯基（Machajski）〕。^① 他们并没有尝试对这一阶级的经济基础进行定义，没有超越对其所进行的一种意识形态描述从而有所深入。

15年前，在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也和大多数经验社会学家一样，对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遵循海基达斯以及奥索斯基的工作，我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进行经验研究，对东欧社会分层体系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对其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和性质进行测量与解释；事实上，我的经验研究发现进一步证明，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本质上纯粹是辩护性质的，其科学性是不充足的。因此，我不得不寻求其他各种可供选择的理论工具。显然，在研究东欧的社会结构时，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参照框架要比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或分层理论更为适用；不过，对于将官僚定义为一个所有权阶级这一做法在理论上的精确性，我并不是很信服；尤其是对官僚和余下的知识阶层〔或“知识阶层本身”（*intelligentsia proper*）〕所做的这样一种至关重要的区分以及这种区分在经验上的准确性程度，我更是表示怀疑。

我发现，有必要超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相当僵化的和正统的苏联官方解释或托洛茨基主义式的解释；不过，这种超越并非就是接受资产阶级分层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肤浅批判——因为尽管东欧社会学家不得不使用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这种分层理论确乎对我的东欧实证社会学家同仁的方法论及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开始确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结构性冲突的一个有力的工具；不过，其前提是我们必须将其运用到当前正占主导地位的处于剧烈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换言之，就是将阶级分析运用到这样一种工业化社会的环境中去，在那里并不存在私有产权制度，且至少依据这一至关重要的标准应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不再通过私有制使得剩余剥夺合法化，那我们就应该迈向对该社会的特征——剩余的剥夺机制与制度——的本质分析。即使我们没有像马

^① 尼古拉斯·波德耶夫这位前马克思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方途中的一项令人印象至深的研究中建议，为了“理解俄国共产主义的原因……我们必须理解这种被称为‘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独特现象”（Berdyaev, 1972: 19）。他重构了俄国知识阶层的智识史，认为“整个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共产主义而准备的历史”（Berdyaev, 1972: 122）。波德耶夫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关于知识阶层的阶级理论；他仅仅认为，俄国乐意接受共产主义愿景的主体并非无产阶级，而是知识阶层。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波兰裔的俄国革命家迈克杰斯基（W. Machajski）也宣称社会主义是知识阶层的一种意识形态（Gouldner, 1975-1976; 1979: 99）。

克思那样将关于阶级的定义建立在所有权的基础之上，但如果我们去关注这些制度并定义对抗性利益，那么我们就能够将其解释为阶级利益，并与更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保持一致。本文将指出，再分配是确保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剥夺得以进行的主要机制。所有那些在再分配权力最大化过程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人都是新支配阶级的成员，因为其利益与那些直接生产者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样对新阶级进行定义的话，那么显然该阶级的成员就不仅包括官僚，甚至还包括技术官僚，整个知识阶层也潜在地成为其组成部分。

最后，我要在本导言中明确指的是，我所正在谈论的阶级仍然处于初生状态之中。我所描述的乃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静止的状态。知识阶层作为一个群体，从中世纪的教士和僧侣到 19 世纪及 20 世纪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一直到 20 世纪晚期的学者—计划者—专家，无疑一直都存在着实现权力垄断的渴望；但这种对权力的要求，只有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条件下才成为现实。东欧的知识阶层要成为一个具有自身阶级意识的完整阶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发展的较早阶段。我所要指出的仅仅是这样一个历史趋势，即在东欧所行使的权力越来越多地成为知识阶层的一种阶级权力。

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该书写作于 1974 年，1979 年以英文出版）中，捷尔吉·康纳德和我尝试更加全面地记录知识阶层的阶级权力形成的种种迹象。在本文中，我所做的仅限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备选理论的各种不足之处；简要分析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制度与剥夺的基础所在，并揭示建立在这些机制与制度之上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对立；最后，指出将知识阶层定义为一个阶级的局限性，并将其更精确地界定为一个处于初生状态的阶级。

一 对关于东欧阶级结构的不同理论的评价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1959 年晚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统治着东欧的社会科学文献达 30 年之久。指出这一统治地位并非纯粹来自这种观点的学术优势毫无疑问是多余的；那些怀有学术疑问的人，常常被提醒要注意必要的意识形态纪律要求，而不是去关注纯粹的学术方法问题。直到今天，在一些意识形态更为保守的国家，比如民主德国和苏联，

该理论都没有遭遇正式的挑战。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看看最近任何一个版本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苏联教科书就足够了。有时候，在经验研究中，社会学家确实会在“无意中”忽视了官方的阶级划分，而使用职业作为解释其数据分布的变量；只要他们不做出理论结论，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家们便不再反对这样的做法。在更为开明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任何有学术声望的学者都不会严肃地装出接受老套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样子，少数人甚至会公然反对它。总之，人们已经不再谈论阶级。

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具有僵化的正统理论的自负特点。它认为，由于马克思是将阶级定义在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因此同样的方法也就应该适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所有权（ownership）——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那么就应该存在两个相应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对这种形式上的正统理论，每个熟悉马克思阶级分析逻辑的人应该从一开始就明白，马克思的解释是相当灵活的。马克思并没有将其关于基本阶级对立的划分标准建立在各种所有权形式的划分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的系统阐述中，在那些拥有生产工具的人和那些被剥夺了生产工具的人之间存在着阶级对立。不是所有权形式，而是所有权本身（或缺席的所有权），构成了阶级划分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说，马克思自己是将阶级形成的动力归结到不同的所有权形式上。在《资本论》（第3卷第52章）中，他将地主（landowners）视为一个单独的阶级，因为他们拥有与“资本”不同的其他东西；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他将所有权形式看作是阶级之间进一步分化的基础，特别是支配阶级内部分化的基础。^①我想表明的观点很简单，即官方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并非像它所宣称的

① 在《资本论》第3卷第52章中，马克思将第三阶级即地主阶级（the class of landowners）加入到他关于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这两大对立的阶级划分中。通过将第三阶级加入到其框架中，马克思改变了决定阶级的标准。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认为，或许导致阶级产生的原因并非所有权或非所有权，而是收入的身份与来源。遗憾的是，当他开始准备对此进行探讨的时候，手稿却中断了（Marx, 1974: 885-886）。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提供了其关于阶级关系的最为复杂的图示；他同样在“资本”和“土地财产”（landed property）之间做了一个阶级或类似阶级的区分，但这一区分并非建立在收入来源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两个阶级各自拥有的“财产类型”（Marx, 1970: 117）。在后一文本中，马克思似乎区分了各种阶级，如作为工人的潜在同盟者的小资产阶级（Marx, 1970: 119）；马克思还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分析流氓无产阶级（the lumpen proletariat）（Marx, 1970: 136, 144）；他还明确地考虑过农民发育为一个阶级的可能性（Marx, 1970: 170-171）。从这些文本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五阶级或七阶级的阶级模型。

那样，是一种对马克思的不折不扣的解释；事实上，它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主要观点并滑向一个相当边缘化的领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主义者宣称自己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反倒比较名副其实）。

在这种正统理论中还存在另一个方法论上的欺诈（methodological trick），也就是说，从形式上看，该理论对阶级的操作化所依据的仅仅是各种所有权形式；但在用经验事实去检验该理论的时候，我们又需要求助于对工业和农业所做的区分。很显然，常识告诉我们，当前东欧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且他们之间的差别似乎是意味深长的。不过，如果真的是所有权形式决定着阶级划分的标准，那么就不能按照这种方式对阶级进行定义了；农民就不再是另一个阶级，那些在合作社中工作的工业和农业劳动者，以及所有在国有部门中工作的农业劳动者都应该属于工人阶级。相应地，产业工人应该与工厂中的经理甚至是重工业部的部长属于同一个阶级；而那些在集体合作社中工作的农民则应该属于另一个不同的阶级；^①而他们的“邻居们”尽管也从事着相同的农业工作并有着大致相同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却仅仅因为他们在国有单位工作就从属于另一个阶级。^②这一推论显而易见是荒谬的。因此，在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阶级二分法中，有意义的差异并非两种所有权阶级的区分，而是在经济主要部类中工作的人们之间的分层性差异。

这种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和当前东欧的经验现实之间的联系就更少了。实际上，首先发起反对这种理论的无声革命的无名战士当属统计学家，官方期望他们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去分析官方统计数据特别是人口普查数据。到20世纪60年代，至少是在一些统计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还有一些自尊心的国家，如匈牙利，这些人悄然忘却了自身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者的身份（histomat seminars）：在人口普查中，“阶级”这一栏不再出现；统计学家们将职业作为其解释数据分布的变量。事实上，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官方教条所定义的“阶级”，无论是对收入的分布还是住房的分配而言都是毫无解释力的。他们发现，在收入和住房分配上，各个职业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这种差异表现得特别显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学家并不配享

① 根据作者的推论逻辑，该阶级应为农民阶级。——译者注

② 根据作者的推论逻辑，该阶级应为工人阶级。——译者注

有挑战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教条的斗士这样的荣誉。中央统计局（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s）中的那些不知名的公务员，实际上已经从政治上摧毁了这一教条。奥索斯基及其他一些人不过是为既有的统计实践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辩护而已。在东欧和西方，分层理论有着极不相同的历史。早期对阶层分析的批评所强调的是其内在的保守特征。在西方，分层理论是反对具有“颠覆性”色彩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一种保守武器。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和 60 年代早期的东欧，社会分层理论的兴起却是一件相当具有颠覆性色彩的事情，并构成了对具有辩护性和保守性色彩的阶级理论的一种颠覆。今天，那些从意识形态左翼对奥索斯基等人加以批评的人，其实并不知道他挑战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时所需要的智识上的与政治上的勇气。因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二分法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现有的权力垄断辩护。

通过将国家和党的官僚定义为“工人阶级”，官方理论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微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便利的解决办法。不过，阶层分析至少证明社会不平等确实存在，而且在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或许与被意识形态定义的工人阶级并不相同）在整体上属于权利被压制的群体。就像阶级分析曾经在西方表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欧的阶层分析所固有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通过区分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体力工人、办公室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处于领导地位的专业人员”（这一委婉的术语指的是那些具有较高地位的党和国家的官僚），阶层分析能够从统计上揭示白领工人尤其是权力精英与真正的工人之间的分离。但是，阶层分析并没有提供任何理论去解释这一统计上所观察到的各种差异。大多数经验社会学家都使用“工人阶级”这一术语去描述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即那些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却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任何结构性的术语去描述社会等级中具有较高地位的另一半人。我们称其为“在社会等级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具有较高收入的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或者称其为各个阶层，却似乎没有人对工人阶级这一术语的理论意义给予充分的关注。

奥索斯基这位最重要的社会分层理论家认为，随着私有制被废除，所有权已经丧失了解释力，应该用劳动者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去解释社会结构和社

会不平等。^① 但这一理论观点的意义并不明确：它是认为阶级关系不再存在且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只能够用不同职业群体间的不平等加以解释呢，还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以劳动分工来对阶级进行定义？回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那里，显然可以发现马克思本人持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将阶级分析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② 而奥索斯基作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拒绝所有权阶级这一概念并使用劳动分工作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主要变量，但却仍不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随着阶层研究的发展，以下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即东欧经验社会学家通过对劳动分工重要性的强调，试图以阶层分析替代阶级分析，他们并没有兴趣去发展一种新的阶级定义。对东欧的经验社会学研究来说，当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一观点不仅不会令官方的意识形态检察官感到过于恼火，而且还会令西方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后者会发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个成就，居然是将阶级的概念清除出去。波兰最有影响的分层理论家韦索沃夫斯基，甚至对东欧工人阶级究竟是否存在这一问题都表示怀疑，他认为，从理论的角度

① 在奥索斯基看来，在那些生产方式已经被国有化的国家，所有权关系的重要性大为下降（Ossowski, 1963: 182）；他还论及从事非体力工作的白领工人作为一个新阶级或“阶层”浮现的重要意义（Ossowski, 1963: 183）。另一方面，区分这一新阶级或阶层（有趣的是，他似乎对术语间的差别并不是特别重视）的，是其工作的性质而不是所有权关系。奥索斯基还认为，不能将马克思看作是一个仅仅依照所有权对阶级进行二元划分的理论家。在他看来，马克思至少是将三种二分法结合到一起，并发展出了一个关于阶级关系的复杂图示（Ossowski, 1974: 82）。海基达斯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将“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和“经济部类”作为独立变量加入“财产关系”中，形成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数学模型（Hegedus, 1977: 70）。

② 那些试图取代或至少将所有权与“劳动分工”结合起来的东欧社会学家，常常会引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事实上，在该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依旧认为阶级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劳动分工的发展是直接对应的（Marx and Engels, 1972: 18-21）。他们甚至认为，“劳动分工的既定阶段还决定着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Marx and Engels, 1972: 19）。但大约就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发觉这一命题中的问题。特别是当他们试图描述向封建主义的转型的时候，他们发现，劳动分工的定量指标显然不足以解释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手稿在这里中断或许是偶然的，他们甚至也没有试图继续其分析并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进行描述（Marx and Engels, 1972: 21）。我认为，马克思首先应该发展出的是“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这一概念，它能够提供一种讨论生产方式转型和阶级关系转变的更为精致的工具。不过，有趣的是，海基达斯和费尔格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从阶级理论的观点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过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之一——实际上，缺乏生产关系概念的阶级理论根本就不能够被看作是一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参见 Ferge, 1973: 77-78）。

来看，应该将工人更确切地称为一个“阶层”（stratum）。^① 突然之间，我们会发现最初具有颠覆性的阶层分析，现在变得比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更具辩护性色彩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至少还承认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尽管这一社会是由非对抗性的阶级组成——但我们认为这近乎是不可能的），认为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

但是，这一“无阶级性”（classlessness）的问题并非纯粹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通过拒绝阶级分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适用性，韦索沃夫斯基及东欧社会学中的分层学派实际上认为不可能对这些社会中的结构性经济冲突加以定义；相应地，也不可能从结构性经济冲突的角度对现存的社会不平等加以解释。这种观点对经验研究及经验事实的解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换言之，就是一个不受结构性经济冲突制约的社会，那么我们所能观察和测量到的各种不平等，就不能说是这些社会的固有特征了。它们要么是来自资本主义历史的遗留物，要么是种种非社会性因素的产物（譬如，阶层理论的倡导者会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不平等将通过生产力或技术的渐次进步而被克服）。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不平等的结构就不应该再被看作是这些社会的社会—经济规律的反映；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不平等的程度应该会下降。但我的经验研究表明，所有这些假设都是不成立的。我在住房领域、城市结构或区域体系中所观察到的各种主要的不平等都不是传承而来的，相反，它们是从东欧经济增长的社会主义战略中浮现出来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再分配机制而非残存的市场力量造成了这些结构性不平等。最后，很少有证据表明这种不平等会有所缓和（本文的目的不是详尽地阐明这一点，在我的前几部关于东欧住房和城市化的著作中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我发现，自己所观察到的不平等是内在于东欧社会的，且被其基本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结构化；因此，假定在这些不平等背后存在着阶级对抗，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分析官僚和工人阶级之间冲突的性质的时候，里昂·托洛茨基第一个认

① 韦索沃夫斯基是这样陈述其观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废除了阶级结构，从而可以认为……消除了阶级所具有的‘对抗性角色’，工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讲，他们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而是一个‘前阶级’（ex-class）……我们虽仍旧称其为‘工人’，但这一工人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或许称其为‘工人阶层’更为合适。”（Wesolowski, 1974: 123）

为在苏联存在着对抗性的利益。托洛茨基本人从来没有更进一步地将官僚称作阶级。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他将官僚定义为一个与工人阶级相异化的统治精英。^①托洛茨基所发展的关于苏联社会结构的理论是一个颇为古怪的理论。由于假定苏联存在着阶级对抗，因此它基本上是一种阶级理论；但另一方面它所提出的又是一个单一的阶级模式。与被压迫阶级相对立的仅仅是政治精英。不过，这一矛盾又是不难理解的。作为学者，托洛茨基更像一个政治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对于批判地检视苏联体制的经济制度这一问题，他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事实上，他认为（苏联的）经济革命已经完成，苏联体制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新的政治上层建筑。后来的理论家们所遭遇的限制没有像托洛茨基所遭遇的那么大，而且那些试图对由托洛茨基所发现的对抗的社会学性质进行详尽阐释的人，对社会中那个其他的阶级，即苏联式的新的支配或统治阶级的定义问题，产生了兴趣。所有这些学者或直接追随托洛茨基，或受其影响，都将官僚描述为一个新的阶级。这些理论家（吉拉斯是其中最有一个影响的）使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工具将官僚定义为一个所有权阶级，认为在国家社

① 托洛茨基明确拒绝将苏联官僚定义为一个所有权阶级的种种尝试，“将苏联官僚描绘为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的尝试，显然是经不起批评的。这一官僚既不拥有股票，也没有债券……作为个体的官僚，并不能将他国家对国家机构的使用权传递给其后人”（Trotsky, 1972: 249-250）。不过，托洛茨基还是很清楚地看到，出现在斯大林俄国的官僚是一种历史性的新现象。“就其调停和管理的功能、对维护社会地位现状的关注以及为个人目标而利用国家机构设施等方面来看，苏联官僚与所有的官僚特别是法西斯主义者是相似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体制中的官僚能够从支配阶级那里获得如此程度的自主性……苏联官僚不再是一个刚刚从贫困与黑暗中浮现出来的阶级……与之相反，法西斯主义者掌权的时候，是和大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的……苏联官僚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品性，但在它身边却不存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远非一个官僚”（Trotsky, 1972: 248-249）。托洛茨基将官僚定义为一个“阶层”（stratum）（Trotsky, 1972: 249）；当然，这一术语并不能满足他对官僚的寄生性以及资产阶级品性等加以描述的目标（Trotsky, 1972: 250）。因此，他常常用苏联统治集团（ruling Soviet caste）来形容他们（Trotsky, 1972: 253）。事实上，在托洛茨基那里，“统治阶层”（ruling stratum）与“统治集团”（ruling caste）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是可以互换的。托洛茨基的“官僚集团”（bureaucratic caste）概念是一个颇富穿透力的概念，因为它（不像阶层这一概念）确实从质的角度强调了苏联官僚的新特征。不过，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对苏联官僚的身上去的历程，似乎并不那么幸运。马克思·韦伯曾经很精确地指出，等级（caste）是“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或“阶层”（estates）的一个特例，它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位置。韦伯的下述看法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即等级与普通的地位秩序（status order）是不同的，因为等级带有宗教和仪式的色彩（Weber, 1958: 44）。而这些标准对苏联的官僚来说都是不适用的。

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们垄断着对生产方式的配置权。^①

毋庸置疑，面对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的真正性质这一问题，我们能够从托洛茨基或吉拉斯那里获得的教益，比从官方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或分层理论家那里获得的要多；不过，对于将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支配阶级等同于官僚这一观点，无论是从理论的还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我都表示出严正的怀疑。这里的一个基本理论困境在于，官僚能否被定义为一个所有权阶级（ownership class）。该定义将处置权与所有权等同起来，这一点是很成问题的。马克思自己曾经对处置权与所有权有过清楚的区分，没有这种区分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官僚和专家政治现象，关于这一点几乎不需要文本性的证据。如果我们因为其所拥有的处置生产工具的权力就将社会主义官僚定义为所有权阶级的成员，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将同样的逻辑运用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并将其技术官僚称为一个新的支配阶级呢？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优势正在于它对各种中间力量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之所以是有力的，原因在于它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形式上行使权力的人实际上是有利于支配阶级的利益，因为这样反而会使支配阶级自身隐而不彰。如果将所有权等同于处置权，就会使所有权这一概念变得抽象化和普遍化并丧失其全部的理论力量。

此外，如果我们将那些有权对生产工具进行处置的人定义为支配阶级，那么我们就是在技术官僚和余下的知识阶层之间进行一个在经验上被证明是错误的区分。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很难正确判定是谁实际上拥有对生产工具的处置权；这里，我并不想重复这一有名的争论。众所周知，一位工厂经理所拥有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严格说来，如果从对处置权的真正垄断的角度来进行定义，那么任何所有权阶级都会像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一样拥有对权力的独占性，而这将意味着将新阶级的成员局限在 10~20 人的范围内——这显然是荒谬的。即使我们很宽容地看待这些操作化的问题，我们仍然不得不去解释以下的问题：为什么经济部或中央计划署中的一个小官是支配阶级的一员，而一个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教授就不是其中的一员？

对官僚和知识阶层之间的主要差异进行区分的一个现实困难在于，在东欧，知识分子的流动相对较快。布达佩斯一家喜剧院现在的经理，原先是政治

^① 吉拉斯宣称，“这一新阶级的独特性在于其集体所有权（collective ownership）”（Djilas, 1957: 54）。

警察局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前老板，在一个相当于苏联克格勃的匈牙利情报部门工作，现在是一家大型意大利香肠厂的经理。今天的政治警察局的官员，明天就可能只是一个被许可制造政治笑话的人，一位监督意大利香肠生产的经理或者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一个经理，或者一个学者。就个人的职业模式而言，知识阶层与官僚之间的界线是变动不居的。许多有学术抱负的大学毕业生涯伊始，就立即加入党的官僚机构；因为他们知道，在党的官僚机构中的数年工作经历，是获得大学教席或其他较高学术地位的最好的入场券。知识精英的循环是很快的，它按照权力层次出现分层，而不是被分割为官僚/知识分子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或许，从地方层面的权力精英向国家层面的权力精英跨越，要比从科学院向中央委员会迈进更加困难；或者，反之亦然。

我还将说明的是，官僚—阶级理论不但过于强调官僚的权力，还过于忽视非官僚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决策中的影响力。中央计划署中动辄支配数以亿计的兹罗提或列弗^①的官僚，或许并不能行使多大的权力，因为游戏的规则是被严格限定的。而那些能够影响规则制定的人，从专业的经济学教授到具有意识形态号召力的电影导演或诗人，他们虽然并没有什么处置权但或许在事实上要比官僚更有权力。最后，我还想指出，实际上几乎不太可能从物质特权的角度来对官僚和知识分子进行区分。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准基本上是一样的。是权力水平而不是官僚/知识分子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对他们进行了分层。

二 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对抗的经济基础

我发现，现有的阶级理论和分层理论并没有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冲突、不平等的性质及其动力予以解释。尽管这些理论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却都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并将阶级关系定义为所有权关系。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在名义上废除了各种私有制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其阶级抵抗的经济基础，就必须超越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超越对所有权的分析。

毫无疑问，马克思本人是从所有权的事实出发来对阶级关系加以解释的，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回应，要将它运用到对非资本主义

^① 兹罗提和列弗分别是波兰和保加利亚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去，就需要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做重大修正。马克思本人也越来越意识到其方法论的局限性，因为在这里，不同生产方式的结构是从所有权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在分析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一书中，马克思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马克思慎重地考虑到，在理解亚细亚社会的时候，村社（village community）制度可能具有与所有权形式同等的重要性；^①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认识到农村公社（obshchina）在俄国发展模式中的重要地位。^② 他开始区分各种未必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结构。总体而言，我认为，所有权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仅仅是因为马克思是在研究西方社会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在西方社会，私有制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存在并构成了主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对社会冲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这一方法论并不能解释那些不存在私有制的社会的运作；我们也不能在这样的社会中发现导致私有制发展的内在动力。当马克思准备接受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意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或许会直接从农村公社中浮现出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这样一个可能，即这些社会可能会超越私有制的发展。^③ 因此，人类的历史不能简单地以私有制是如何发展的

① 关于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仍然大量存在的农村公社，在社会发展中起妨碍还是促进作用，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的看法和50年代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可参见陈其人《农村公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译者注

② 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大约在1853年，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早期通信中认为，应该对一种独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区分，该生产方式的产生缘于亚细亚封建主义条件下土地的国家所有这一主导性的制度（Anderson, 1974: 476-483）。后来，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似乎成为解释独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主要变量（Marx, 1975b: 66-70）。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早期通信及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分析来看，似乎很显然，马克思并不能判定存在于东方的究竟是哪一种所有权；从中我们或许能够做出一个可靠的推论，就是在判断“生产方式”的时候，所有权并没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③ 1881年，在写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的草稿中，马克思迈得更远；他甚至指出，“俄国能够发展并超越其农村公社的古老形式，而不是破坏它”。私有制的发展是否一种绝对的必要？有没有可能保持他在俄国村社中发现的如此有吸引力的“集体因素”（collective element）？显然，在这些信件中，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态度是犹豫的。最后，他明确地拒绝决定论的立场，并描述了另一种可能：“要么是村社中的财产因素（property element）战胜其中的集体因素，要么相反，即村社中的集体因素打败财产因素。”（Marx, 1975b: 142-145）

以及它为什么在未来会消亡加以解释。

如果上述观点对非欧洲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的形成来讲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强调所有权关系就更具有误导性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假设是，只有所有权关系才会产生社会经济上的对抗，将这一假设刻板地运用到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社会有意识地废除了私有制是因为相信这种单一的历史行为就能够建立起不具有对抗性质的社会）中，就会使这种方法论假设失去其科学的解释力，且可能沦为一种纯粹的辩护学说。这一点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历史上最为革命的理论，在所有接受莫斯科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国家都会沦为一种保守的国家宗教。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质疑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否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这一两难问题；但是，即使以他们自己所确立的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甚至是最精细的犹太法典（talmudic）都难以解释何以正统的苏联理论家能够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认为，苏联理论家选择并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在于，在这种正统的教义中有一些假设契合他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性意识形态的努力，这就是阶级对抗仅仅产生于所有权的冲突这样一个假设。因此，我们要想发展出任何一种分析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现象的批判理论的话，首先就必须与这种所有权决定一切的神话作斗争，并迈向对这一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制度以及机制的实质性分析。过去的半个世纪已经证明，马克思是被自己的方法论误导了。他对废除私有制抱有过多的期望，并没有预想到新社会将产生自己的经济剥夺和政治压迫机制，没有预想到在废除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力后——至少到目前为止——会导致一种同样是异化性质的、政治上更具有压迫性的新阶级权力。不过，如果这种阶级权力真的是一种新阶级权力而不仅仅是统治精英的政治极权主义，那么显然我们就应该能够在特定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在生产方式的国有产权之外发现其根源。这样，我们或许既能够超越对所有权关系的形式化分析，同时又不偏离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一般框架。

为了充分拓展阶级分析的参照框架，使其能够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运用，我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阶级分析的目的在于解释经济剥夺的理性化形式，以及建立在这些形式之上的政治与社会压迫的各种方式。在发展出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理论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感兴趣的，是体现为各

种制度和机制的经济剥夺的资本主义体系，正是这些制度和机制确保了资本所有者能够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剥夺剩余价值。因此，阶级分析的关键任务是去理解剥夺剩余价值的各种制度；如果围绕这些制度能够发现利益的对抗，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在谈论阶级分析。此外，我还将指出，马克思之所以将其阶级定义建立在所有权关系的基础之上，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生产方式的私有制使得剥夺得以合法化。遵循这一逻辑，我认为要检验阶级分析是否完全适用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首先理解对剩余进行剥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剥夺得以合法化的原则加以定义。这样，我们就需要探询以下问题：直接生产者是否处于挑战这种合法化体系的位置上？其利益是否与剥夺者或使剥夺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合法化的人处于系统性的对立之中？

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出种种剥夺制度并将其合法化——它们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且并不存在于其他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这些制度就是各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性再分配制度。在最近发表的一篇主题为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论文（Szelényi, 1978）^①中，笔者试图将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再分配制度与存在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的实际收入再分配机制进行比较。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不能够也不想重复该文的有关观点。我只想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再分配机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依然能够被称为“晚期市场经济”（late market economies）。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并没有否定经济的市场逻辑。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国家仅仅是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而这些收入本身是被市场决定的。此外，能够被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剩余的配置，并非由福利的再分配者做出；是资本所有者或其代理人在按照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做出关键的投资决策。因此，在福利资本主义条件下，基本的阶级分野仍然是资本家（他们掌控着可用于投资的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者或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分野。福利的再分配者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在此阶级分野中发挥调停的功能。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再分配则并不限于对收入的重新分配；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一项剩余都要进行再分配。再分配者的主要任务是配置剩余，其功能

^① 该文已被收入本翻译文集。——译者注

并非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的出卖者之间进行调停，而是替代资本所有者发挥作用。如果说当代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被福利导向的收入再分配所修正的市场经济，那么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再分配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类型。如果说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立，那么当代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或许就在于再分配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对立。我认为，这一分析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应用是一致的：因为这里基本的阶级分野还是围绕生产过程、剥夺以及剩余的配置而展开，围绕主要的生产关系而展开。^①

如果按照其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再分配制度的关系对一种新的支配阶级加以定义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同意吉拉斯或达伦多夫的观点呢？如果决定这一新的支配阶级的是对剩余进行再分配的经济制度，该阶级是不是与那些做出实际计划决策的官僚是一丘之貉呢？如果决定新阶级的是再分配权力，我们是不是要同意达伦多夫的观点，认为在现代经济中阶级的位置已经被政治权力取代了呢？^②

在我的分析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是认为新阶级既不是严格的韦伯意义上

① 我对“当代福利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是对两种理想类型的区分。我知道，经验上可以加以辨认的体系——如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经济或任何给定年代的波兰、匈牙利经济——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上述理想类型的混合物。我们或许能够在瑞典发现一些情况，如国家的功能可能不仅限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它还会对投资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或者，我们也可能发现，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机制甚至会在投资的关键领域或劳动力的买卖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这些经验的“混合”，并不意味着不必去建构理想类型或意味着理想类型的失效：我们依旧可以说，瑞典主要是受“福利资本主义”这一理想类型的支配，而波兰则主要受“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这一理想类型的支配。

② 对达伦多夫来说，“从工业企业的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企业的权威合法性基础的巨大变化……资本家行使权威的旧方式，是通过其对生产工具的占有而行使权威；与这种通过财产而获得合法性的方式不同，经理的权威在很多方面与政治体系中头脑们的权威相似……经理行使命令并期望获得遵从的权力，只在部分程度上来自他所代表的财产权……除此之外……经理必须寻求另一种常常是更重要的权威合法化的基础，即那些不得不服从其命令的人的一定程度的共识（consensus）……与‘纯粹的资本家’（full capitalist）不同，经理不能够以直接的或故意违反其下属的意愿和利益的方式行使权力”（Dahrendorf, 1959: 44-45）。在这里，达伦多夫认为甚至像工厂经理这样的人都是政治权力决定其阶级位置，即基于所有权的经济权力被基于共识的政治权力所取代。我的分析与达伦多夫的分析相差甚远。我认为，取代基于所有权的经济权力的，是建立在再分配者所拥有的辩护性知识基础之上的另一种经济权力。

的官僚，也不是建立在达伦多夫所认为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上。至少，如果我们精确地运用韦伯意义上的“官僚”这一术语的话，那么，围绕再分配权力组织起来的阶级远不能被称为官僚。韦伯和马克思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① 即官僚——至少在其纯粹的形式上——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市民社会被形式理性所整合；这是第一个目的与手段、目的（telos）与技术（techne）相分离而且目的屈从于技术的社会形态。^② 只有在确定目标的理性或目的论式的思维被质疑的条件下，只有理性被狭义地界定为“对实现给定目标的最佳工具进行选择”的时候，市民社会才可能浮现出来。马克思以批判的语气而韦伯则以辩护的口吻宣称，在市民社会中目标的确定是“非理性的”，属于信仰

① 尽管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官僚理论存在诸多根本性差异，它们却都强调官僚权力的执行功能及其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的依赖。也许，我们能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发现马克思对官僚制的最充分和最有趣的讨论。在这里，马克思试图论证：黑格尔关于官僚是一个“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的假设是错误的。对马克思而言，基本的阶级都是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形成的。根据这一分析，国家官僚可以说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执行机构出现的。从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出发，可以推论，对马克思来说，官僚是否能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是一件相当值得怀疑的事情，因为在那里，市民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已经被废除了。对韦伯来说，官僚统治是法理型权威的最纯粹的类型。当然，韦伯并不认为官僚制是资产阶级的执行机构，但他认为形式主义或形式理性是理性官僚制的最主要的标准。对韦伯来说，只要官僚制是在形式理性的框架内运作，只要它使用了技术性知识，只要它不必自己设定目标而是去执行那些由分化的政治机构所设定的目标，那么它就是有效率的。韦伯很清楚，社会主义规划倾向于超越资产阶级的形式理性；他同样很清楚，在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实质理性与法理型权威以及官僚统治所代表的形式理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将……要求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程度的形式化的官僚主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就会出现另一种非理性的要素——也就是社会学经常会遭遇到的那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冲突”（Weber, 1978: 217-226, 特别是第225页）。关于马克思的官僚理论，亦可参见佩雷兹-迪亚兹（Perez-Diaz, 1978, 特别是第10-11页）。

②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理性的批判，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技术（techne）支配目的（telos）的体制的批判，是潜在地进行的。马克思并没有发展出一种体系化的理性理论；马克思的理性理论的雏形，仅仅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有所反映。关于目的与技术、目的理性（teleological rationality）与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主要体现为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屈从、人类需要对利润追求的屈从，以及服从于利润而不是人类需要的满足的生产这一问题。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发展为一种对技术或工具理性的批判，发展为一种对技术支配目的的理性的批判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这种类型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追溯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早期著作（Horkheimer, 1978; 亦可参见 Conner-ton, 1976, 特别是第27-28页; Arato and Gebhardt, 1978, 特别是第8-12页），且后来在哈贝马斯那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特别是参见 Habermas, 1974: 195-252, 268-276; 亦可参见 Habermas, 1970）。

领域，从属于资产阶级政治。在市民社会中，存在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正是在这一领域中，多元的政治体系对目标进行理想化的设定，而执行的功能则留给官僚组织。韦伯在给官僚权力下定义的时候，将这种权力等同于执行任务的权力，并认为它根植于官僚所拥有的专业知识。韦伯坚信，专家并不能够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人们如何去实现根据不受“理性”判断影响的标准选择的目标。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仅仅去执行由独立的政治机构所设定的目标。当然，官僚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拓展自身的权力。他们会宣称，目标设定的功能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唯一可能的行动，就是他们根据“科学方法”所预测的行动；并且，既然并不存在别的选择，政治决策就是不必要的或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最渴求权力的官僚也要在市民社会所设定的框架内行动。他只能在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权力要求。他不能宣称自己拥有科学的、理性的知识因而可以去设定目标。我将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再分配权力的性质基本上是另一种性质的权力，它并非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这种权力的建立并不是基于“目标的设定是非理性的”这一假设；只有对手段的选择才能够被称为和视作理性的行为。市民社会的官僚不得不在“形式理性”的领域内行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再分配者则宣称，他能够在“实质理性”（这里再次使用了韦伯的术语）的框架内行动。^①他宣称自己对所有目标的理性选择拥有垄断权。他宣称自己拥有对技术知识的垄断权。因此，在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和韦伯意义上的官僚相比，目的论的再分配者具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性质。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在提出对权力的要求的时候，

^① 有趣的是，韦伯在其理想类型的一般理论中，并没有对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进行区分，他做出这一区分是在其经济社会学中（Weber, 1978: 85 - 113）。当韦伯开始分析计划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下的计划问题的时候，发展实质理性这一概念对他来说才成为一种需要。笔者用“实质理性”这一术语去描述“目的论再分配者”（teleological redistributors）所拥有的知识的特殊性质，这一描述也基本遵循了韦伯的逻辑。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在计划经济得到完全推行的地方，必须接受形式理性和算计理性的衰落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毕竟，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在末尾的分析中，这一存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根本性的而又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因素，构成了所有‘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来源”（Weber, 1978: 111）。这一引文和第261页注释^①的引文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形式理性是一种官僚理性，被实质理性所引导的目的论再分配者和计划者，并不符合韦伯意义上的官僚的理想类型的标准。

并不挑战基于私有制的市民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官僚或许拥有一些特定的利益要求，但他并不能为自己的阶级权力而奋斗。^① 用更为确切的定义来说，只有在技术支配目的，经济与政治、手段与目的、主体与客体相互分离的世界中，官僚权力才能够存在；而这样的世界，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世界和私有制的世界，是一个在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阶级对立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市民社会中的官僚尽管会对基本阶级之间的冲突加以调和，但其主要兴趣是维持阶级关系的现状，因为挑战这一现状将损害他自身生存的真正的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不仅仅是对狭义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抨击，更动摇着市民社会赖以建立的各项原则。以前的所有批判理论家都是从市民社会的立场和价值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个宣称，不拒绝市民社会及其价值，不拒绝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革命性的转变。^② 他们所构想的理性社会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各种分离的、异化的存在领域将重新得到统一；这将是一个目的重新支配技术的社会，一个实质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当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阶层是一个处于初生状态的阶级；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新社会是对市民社会的否定，知识阶层试图在这里实现对实质理性的垄断。如果他们获得成功的话，则其所要求的权力将具有阶级权力的性质，因为它建立在占有统治地位的合法化原则的基础之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不能错误地认为这一新阶级（及新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物。相反，更现实的说法应该是：为了获得阶级权力，知识分子已经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过去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他们做得并

① 显然，对马克思来说，官僚并不代表这样一种如此独立的利益以至于我们要将其定义为一个阶级。官僚仅仅是将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表达为一种普遍的利益。官僚利益的独特性，正在于它将特殊的利益转换为普遍的利益 [Marx, 1975a: 44-48, 特别是第46页；亦可参见佩雷兹-迪亚兹 (Perez-Diaz, 1978: 28-32)]。

②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0条中，马克思清楚地表示他的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超越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起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当马克思强调其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社会化的人类的时候，他拒绝了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将其事业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抱负，即同时发展出一种对市民社会的综合性批判。

不成功。马克思相信，他的学说将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变成一种物质力量。不过，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是俄国的知识阶层而不是无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并将其转换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①

这一现象之所以在俄国发生并首先被其他东欧国家效仿并非出于偶然。因为这种目的支配技术的新社会，正是从以下这样的社会中浮现出来的：严格地说，在这些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知识阶层”，他们有意识地将其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各种愿望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换言之，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及其新支配阶级之所以在东欧出现，是因为满足了两个条件：一方面，东欧建立了再分配经济体系，该体系为基于计划者和再分配者的目的性知识（teleological knowledge）的阶级权力提供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即知识阶层的浮现，要早于社会主义这一革命性的变迁。就其与知识的目的性成分相联系的重要性而言，东欧的知识阶层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颇为不同。在1917年的俄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欧，随着私有制的废除以及集权的、“科学的”计划经济的建立，新阶级的位置被创造出来，将要占据这些位置的“主体”——知识阶层——也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的历史任务的准备。

因此，笔者分析的一个核心假设在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中的新阶级范畴要比官僚宽泛；它包括所有那些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智识（intellectual knowledge）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具有既得利益的人——这里所说的特定类型的智识，指的是目的性知识，正是这些知识，使得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再分配权力得以合法化。因此，组成新支配阶级的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类型，即知识阶层。

① 古尔德纳并不相信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掌握了权力，也不认为无产阶级有什么掌握权力的可能：“《共产党宣言》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在这一斗争的谱系中，有一个未曾言明的规律，那就是农奴并没有推翻领主的统治，帮工并没有赢得对行会师傅的胜利。最底层的阶级从来没有掌握权力。即使是到目前为止，其境况似乎也是如此。”（Gouldner, 1979: 93）

本文是把知识分子当成一个类的概念来使用。与古尔德纳不同,^①我并不认为所有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我的假设将更为谦逊。我仅仅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条件下,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类型即知识阶层获得了阶级权力。古尔德纳认为,另一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类型——专业人员——也具有阶级形成的可能性;我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古尔德纳断言,专业主义会导致知识分子迈向新支配阶级的位置;^②我则提出,专业主义会使知识分子被整合到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阶级结构中去。只要知识分子接受市场资本主义赋予他们的专业人员的定义,他们就不能够提出自身的阶级权力要求。他们将只是一个半自主性的阶层,或者用埃里克·奥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更为精确的术语来说,他们将依然处于一种矛盾性的阶级位置之中。^③

行文至此,我至少不得不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以及“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这几个概念提供操作性的定义。

遵循古尔德纳的定义,我将知识分子定义为那些因“批判性话语文

① 与大多数左翼新阶级理论家不同(如吉拉斯、伯纳姆或萨克特曼),古尔德纳并不将“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proper intellectuals)排除在新阶级之外,譬如思想家、社会科学家等。左翼理论家大多将新阶级限定在经理和(或)技术官僚以及官僚范围内,古尔德纳则采用了一个更宽泛的新阶级概念,它包括所有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有国家中……由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阶层构成的新阶级……与已经掌控了社会经济的群体展开竞争,无论这一掌控社会经济的群体是由生意人还是党的领导人构成的。”(Gouldner, 1979: 1)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古尔德纳对“知识阶层”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我在本文中的用法极为不同。我认为,笔者的用法更接近传统的用法(参见Gella, 1976,特别是第9~27页)。有趣的是,古尔德纳在使用这一更为宽泛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定义时,依旧将党的领导人排除在新阶级的范围之外,而他也从未解释为什么那样做。

② 古尔德纳认为,新阶级用“文化资本”的统治取代货币资本的统治的工具是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有效地降低了旧阶级的权威。”(Gouldner, 1979: 19)我认为,古尔德纳的看法是错误的:强调技术知识重要性的专业主义,并未构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任何挑战。

③ 埃里克·奥林·赖特采用“矛盾的阶级位置”这一概念来描述阶级结构中的一些位置;在更传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些位置则被称为“阶层”。对赖特来说,“处理阶级结构中的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的一种选择,是将某些位置看作是阶级关系内部客观存在的矛盾性位置……(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的阶级位置都是‘矛盾性位置’;因为阶级关系本质上就是对立的、矛盾的社会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阶级结构中的某些位置是由具有双重矛盾的位置构成的:这些位置所承载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的阶级关系……出于方便,我将简单地把它们视作‘矛盾的阶级位置’。)”(Wright, 1978: 61-62)。

化” (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 CCD) 而聚集在一起的人。^① 所谓 CCD, 用古尔德纳的定义来说就是一个“言说共同体” (speech community),^② 它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从现代的“理念人” (men of idea) 发展而来。这些被我称为知识分子的现代理念人, 确乎在批判性话语文化的内部实现了对某种类型的知识的垄断, 该类型的知识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方面, 它是世俗的 (用古尔德纳的定义来说即除了理性之外它不接受任何权威); 另一方面, 它又是理论化的。知识分子所垄断的知识的理论性, 古尔德纳有时将其与这种知识的“文本可变性” (context-variability) 特点联系起来。^③ 无论处于市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 对所有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 “批判性话语文化” 都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过,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批判性话语文化” 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 在那些现代化与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互重叠的区域, “批判性话语文化” 导致了专业化。专业主义就是“批判性话语文化” 内部的一种知识形式——在这里, 知识的技术性内容, 即知道怎么做 (know-how), 支配着知识的目的性内容。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智力知识中的目的性内容并未屈从于技术性内容——我所说的特定的历史环境, 指的是现代化的蓝图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现实没有发生重叠的地区, 比如革命前的东欧, 以及尤其是社会主义转型后的东欧——知识分子并未被定义为专业人员, 而是被定义为知识阶层。图 1 是我对两种知识分子的区别的类型学示意。

大多数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和哲学文献, 其所关注的地点都是东欧 (尤其是有关俄国和波兰知识阶层的文献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一现象的产生

① 古尔德纳是这样定义“批判性话语文化”的: “批判性话语文化是一套经过历史演化的规则、一种关于话语的语法, 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其所关注的, 是使自己的断言正当化; (2) 其正当化的方式并非借助权威进行; (3) 它更喜欢仅仅在辩论和论证的基础上诱发出被言说者的自愿的共识。” (Gouldner, 1979: 28)

② 古尔德纳将 CCD 称为一种“话语的语法” (grammar of discourse), 因此知识分子这一新阶级构成了一种“言说共同体” (Gouldner, 1979: 28)。

③ 古尔德纳用“文本可变性”这一概念来描述批判性话语文化的特点。“在这里, 一个优秀的言说, 不仅能够使自身的原则明晰化, 还能够遵循这些原则, 而不是去强调文本的敏感性 (context-sensitivity) 和文本的可变性。因此, 在这里, 优秀的言说同时具备理论性。” (Gouldner, 1979: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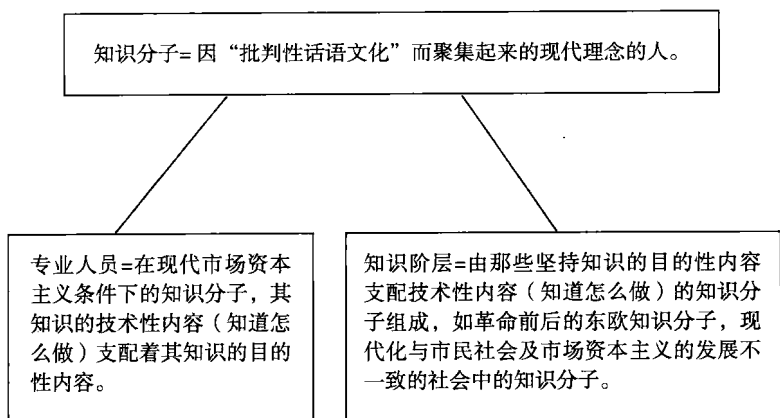


图1 两种知识分子的区别的类型学

并非出于偶然。^①“知识阶层”这一术语最初起源于俄国，我将指出这一事实所包含的重要象征意义。盎格鲁—撒克逊出身的那些作者要想超越“专业人员”这样的观念，需要将这一俄语的表达音译为英语。英国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是专业人员。而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欧洲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东欧专制主义和市民社会之间徘徊的东欧，其所催生的是一个知识阶层。对于一个真正的经验论者（从定义上来看他是“纯粹”市民社会的产物）而言，由于其所接受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训练，因此他会将“知识阶层”这一概念视作一个含糊的前科学的（或不科学的）概念。科学的范畴是“专业人员”这一概念，它包括的是这样一个职业性群体：该群体由那些具有一定资格去执行社会和经济职能的人士组成；履行这些职能又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所谓专业人员，就是那些垄断了知道如何选择手段以便实现已经被选定的目标的知识的人。他们是这样一些专家，那些设置目标的人购买他们的服务。专业人员是市民社会和市场资本主义的产物。专业人员赖以

^① 亚历山大·盖勒（Aleksander Gella）强调，要看到在东欧知识阶层这一概念的独特性：“东欧的其他阶级与阶层都可以在西方找到对应之物；但严格说来，我们并不能在西方找到与知识阶层这一概念相对应的事物。”（Gella, 1976: 10）他认为，应该明确区分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和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这两个概念（Gella, 1976: 11），应该将“知识阶层”这一概念置于19世纪中叶的东欧环境中去理解。有趣的是，他指出，“知识阶层”这一概念的使用，几乎同时首先出现在德国、俄国和波兰（时间分别是1849、1846年以及1844年）（Gella, 1976: 12）。

存在的基础——如同官僚存在的基础那样——是将“专业知识”定义为一种与手段有关的知识，是那些来自目标设定者的对这种知识的各种市场需求。

一部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一部与这种对知识的定义相斗争的历史。最优秀的西方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接受这种从属性的社会角色。他们对那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目标保留着评价的权力。特别是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信仰，即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专业人员，更是社会的批判者。^① 尽管存在这些保留的看法，大多数拥有稀缺知识和能力的知识分子还是不断地被西方资本主义所“腐蚀”。作为对其执行能力的回报，他们获得了高工资；而作为对其知识性失败（Intellectual frustration）^② 的补偿，他们越来越多地被允许去行使官僚权力。

东欧并没有发生过这种从知识分子到专业人员的大规模转换。这些区域从18世纪以来就存在着知识分子在数量上的扩张，但并没有相应地伴随着对专业人员的市场需求的类似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知识分子都是为实现东欧的西方化而奋斗的先驱，而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在俄国，西方的专业化过程对许多知识分子显得越来越不具有吸引力。东欧知识分子越来越意识到不成为专业人员的种种好处。他们将自己定义为知识阶层，不仅具备执行的技能，同时也拥有道义感与历史眼光。这一19世纪晚期的东欧知识阶层对于规划“目的论式的社会”（teleological societies）这样一个为实质理性所支配的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抱有兴趣。东欧知识阶层准备超越西方的专业化运动，因为它已被证明是知识分子通往漫长的权力征途中的一条死路。布尔什维克已经做好准备并号召建立一个历史的先锋队，以便引领社会的革命性变迁，创造一种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新的理性秩序。列宁主义者强调组织的超理性（superrationality），反对任何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自发性，他们将资产阶级的选票至上主义看作一种使选择合法化的手段并对其持怀疑态度；所有这些，不仅对那些持有布尔什维克价值的人而言具有吸引力，

① 保罗·贝恩（Baran, 1961）对“脑力工人”（mental workers）和“知识分子”予以了区分，这对大多数左翼思想家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区分。对贝恩而言，知识分子意味着进行“社会批判”。那些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无论其专业能力有多强——都只能被定义为“脑力工人”。

② 这里的所谓知识性失败，指的是西方知识分子被限定在专业人员的知识领域，只能在工具性知识的范围内行动而不能充当目标的设定者。——译者注

而且对那些认为自己知晓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颇具诱惑力。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做好了夺取权力的准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依靠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同志去填充所有重要的决策岗位。^①这一新社会首先所需要的，是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同志，他们将以其所拥有的目的性知识去引领社会并推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运行。

从上面这一段简短且不可避免是粗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围绕目的论分配者的位置而组织起来的阶级，已经超出了那些做出直接的再分配决策的人士的范围。整合这一阶级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性的再分配精神，它涵盖了所有基于其对目的性知识的垄断而要求获得权力（不仅包括经济权力，也包括文化的、行政的权力）的人。这使整个知识阶层也可能被整合到这一支配阶级中去。这一分析的要义在于，它一方面拒绝接受官僚权力这一概念；同时，又避免了达伦多夫的立场，即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阶级权力正在取代政治的阶级权力。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阶层的要求的合法化方式与对剩余价值的剥夺的合法化方式是一样的。知识阶层的阶级权力虽然超出了经济领域，但其基础却存在于使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各种基本制度中。一些批评者正确地指出，达伦多夫基本上拒绝阶级分析。^②他将政治精英叫做阶级，并认为严格定义上的阶级（classes proper）——也就是从经济对抗中出现的阶级——不再存在。当我认为知识阶层正处于形成一个阶级

① 1917年9月，在试图说服其布尔什维克同事相信党已经做好夺取权力的准备的时候，列宁清楚地指出，迈向这一步，党并不需要获得大多数人甚至是工人阶级的选票。只要党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参与统治的同志，它就会做好统治的准备。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有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将不能够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自1905年的革命后，统治俄国的只有13万名地主……但却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拥有24万名成员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不能够统治俄国……这24万名党员背后的支持者已经不下百万……因此，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具有100万人的、献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了。”（Lenin, 1970: 413）

② 吉登斯认为，达伦多夫并没有对阶级概念进行重构，而是用权威概念代替了阶级概念。“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指责达伦多夫回避了同样是因用词模糊而产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他曾经指责过马克思的问题：‘因为尽管私有财产或许会消失（一个经验的假设），但却并不能够推论出阶级的存在或消失与否（这是一种定义的欺骗）。’在试图重构阶级概念的时候，达伦多夫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他用‘权威’代替了‘阶级’。在社会学中，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完备的用于分析权威体系的概念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将其混淆到‘阶级’这一概念上去。”（Giddens, 1973: 74-75）

的过程中的时候，我所描述的并非政治精英或科层精英；我所使用的，是一个更加宽泛的、以经济为基础的范畴。

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所有试图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尝试——当然包括我自己的——都面临着一个主要的理论问题。那些在东欧进行统治的人，并非一个靠政治权力而构筑起来的精英集团的成员，而是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再生产体系为根基的阶级；当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我必须证明阶级这一概念为何适用于像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经济体系，因为与市场资本主义相比，在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更为有限。而大多数阶级理论家则都认可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在政治与经济发生分离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阶级的概念才是适用的。^①

我将捍卫自己的观点，认为阶级概念对于当前的东欧是适用的，因为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至少可以观察到“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分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随着新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巩固，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事实上是在不断地增长。革命之后，“政治领域”似乎占据着“优先”地位。其后，这种情况被批评为经济政策中的“斯大林主义的唯意志论”。随着后斯大林主义“自由化运动”的推行，这种政治的优先地位逐步下降，科学计划的重要性得到了强调。只有在这种经济从政治领域中相对分离出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支配阶级的形成”。在

① 鲍曼 (Zygmunt Bauman) 在其最具有原创性的分析中指出，国家社会主义所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权威体系，他幽默地称之为“以党的名义行使的权威” (partynominal authority) (Bauman, 1974: 136)。他认为，这种“以党的名义行使的权威”与法理型权威不同，因为它与“价值理性” (Wertrationalität) 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Bauman, 1974: 136)。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认为在“以党的名义行使的权威”下，无论是“阶级”的概念还是“科层制”的观念都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们都预设了法理型权威和“工具理性” (Zweckrationalität) 的在场。鲍曼提出了“官场” (officialdom) 这一概念去描述“以党的名义行使的权威”下的权力分配。作为一个颇具洞察力的概念，“官场”在分析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不失为一个替代“阶级”的有趣的备选概念。巴林特·贝拉 (Balint Balla) 的分析在很多方面与鲍曼相似。他详尽地阐述了为什么韦伯意义上的官僚概念并不适用于苏联类型的社会；他提出了“干部体制” (“Kaderverwaltung”) 这一概念去描述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体制 (Balla, 1972, 尤其是第 47~62、173~204 页)。遵循鲍曼和贝拉的分析，人们或许会去考虑发展一个全新的概念，以便对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结构进行描述。对一些社会学家来说，这可能是比我的分析的更具吸引力的一个尝试；因为我的分析更为谦逊的目的仅在于试图对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概念予以再解释。

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那些实施统治的人还没有表现为一个阶级。党和国家机器的构成是在经济体系之外，还只是简单地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来实施统治〔从这一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所使用的“种姓”（caste）这一概念虽然不精确但却是颇具洞察力的〕。只要旧的社会体系从政治上被推翻且再次出现与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党和国家机器的主要历史功能就将是促进知识阶层这一新支配阶级的诞生；而我们也只有根据后来的发展才能够看出这一点。在这一视角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表现为官僚精英、等级——或更确切地说，表现为社会阶层（estate）——的党和国家机器，实际上是新支配阶级即知识阶层的一种先驱。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史常常被表述为党和国家与技术知识阶层、自由主义知识阶层以及意识形态知识阶层之间的一种政治斗争，前者所代表的是在政治领域的优先地位，后者则代表着从政治领域相对分离出来的经济领域的利益：这种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史的表述方法，其实遮蔽了党和国家机器的功能。

因此，知识阶层这一新支配阶级的形成与经济从政治中相对分离出来的历史过程以及政治优先地位的相对下降趋势是一致的。遵循这一命题，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达伦多夫假设要发生的事情——“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替代——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并未发生。只有在经济权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相对自主性的情况下，这一新支配阶级才可能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浮现。经济权力并未被政治权力取代。不过，达伦多夫的分析对于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结构依旧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随着从资本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确实发生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以及政治领域重要性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承认，与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相比，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多少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表现为经济的阶级，而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的阶级，或许应该被叫做政治—经济阶级，以承认在经济因素之外各种政治力量也在形成阶级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对新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交互影响进行经验的和历史的分析，对于解释知识阶层这一新支配阶级的内部分化及其动力机制极为重要。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并不想将新支配阶级描述为一个同质群体。要想对新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界定，或许可以考察政治权力在造就这些阶级成员上的相对重要性。党的机器（the Party apparatus）更明显地是由政

治权力构筑起来的，这成为新阶级独特的一部分。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当前的斗争来看，党的机器与从事计划—技术性工作的知识阶层之间存在着冲突；而后者更多地是由经济体制形塑而成。一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史，几乎就是一部从事计划—技术性工作的知识阶层争取经济改革控制权的斗争史，而制定计划的技术性知识分子，则常常需要他们的“思想家”，也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从表面上看，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描述为一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党的机器的斗争史。不过，这种介于党的机器与理性计划者以及自由思想家之间的种种冲突，虽然确实存在但却并不是根本性的冲突。自由主义的、从事计划—技术性工作的知识阶层逐渐与党内官僚知识阶层（the Party apparatchik intelligentsia）共同分享权力。主要的经济对抗并非发生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党的官僚之间，而是发生在知识阶层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对立一定根源于利益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则与经济体制中确保剥夺得以进行的制度有关。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对抗可以被描述为再分配权力和直接生产者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种对抗的基础上，形成了知识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

不过，这种对抗是否真的存在？在直接生产者和目的论的再分配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的结构性的冲突吗？我认为，事实上，这种对抗确乎存在且工人阶级还具备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合法化体系。实际上，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治权力不时遭到工人阶级要求自治的尝试的挑战，被不断浮现的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替代物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前景挑战。南斯拉夫宣称自己是唯一实现了“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尽管这一宣称颇值得怀疑，但它表明，在政治危机中不期而至的自发性工人运动，正尝试将经济更直接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或许，1956年匈牙利成立的工人委员会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其成立是在没有知识分子或思想家的情况下，由工人自发组成并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而类似的工人运动也发生于1968年前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最近的波兰）。这两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概念在经典理论中已经得到了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仅仅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一种能够废除私有产权制度的社会组织，但他们并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将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恩格斯试图将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differentia specifica of socia-*

lism) 定义为直接生产者的自治。^① 布尔什维克对纪律与秩序的强调得它省略了这一概念包含的所有内容, 并将其变成一种纯粹的口号, 一种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纯粹的意识形态, 服务于剥夺工人的所有权力, 并使工人比资本主义工厂或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人更缺乏权力。

这种基于直接生产者自治原则的社会主义的逆向思潮 (counterethos) 发展严重不足, 也没有被清晰地加以表达; 实际上, 它更多地体现在东欧工人自发的反对运动中, 而不是体现在法典化的意识形态之中。我将指出, 这种备选的社会社会主义前景之所以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 其中的原因之一与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阶层的阶级性质有关。

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 能够从处于初生状态的工人阶级内部清楚地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出现的可能性, 要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机知识分子”出现的可能性小得多; 毕竟,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并没有在阶级结构中占据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主要位置, 且其地位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定义。此外, 我倾向于认为, 在东欧基于自治原则的逆向思潮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作为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它并不能够取代理性再分配的思潮, 而仅仅是不断地对其提出挑战, 或至多是对再分配权力的行使稍加限

① 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所给出的也似乎是一些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models of socialism); 对于“是什么构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这一问题, 这些经典似乎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做出了这样一个假定, 即将社会主义的转型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等同于私有制的废除以及生产工具的国有产权的引入——或用更为现代的术语来说, 他们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看作是“生产方式的国有化”(nationa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清楚地表达的: “共产主义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 那就是废除私有制。”(Marx and Engels, 1970: 47) 然后, 他们又补充道: “无产阶级将利用其政治优势地位……将所有生产工具都集中到国家手中……”(Marx and Engels, 1970: 52) 而在其他一些著作中, 他们强调的重点则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化而不是简单的国有化。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0年之后的著作《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该书于1883年出版德文版, 题名为《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 通行的英语译法为“Socialism from Utopian to Scientific”, 中文多译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乌托邦被空想所取代, 这种译法造成了诸多不必要的歧义——译者注) 中坚持认为, “国有产权并没有消除生产力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Engels, 1970: 422)。在这里, 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转型的标准在于它用一种“直接的社会剥夺”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Engels, 1970: 423)。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差异了。在这里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一种建立在国家所有权的基础之上, 另一种则建立在直接生产者的直接权力的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根源所在。

制，迫使再分配者更多地去考虑直接生产者的利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再分配机制，很难想象一个现代的非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将如何运转。由于对直接生产者的一定程度的剥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即使是建立在自我管理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反对运动成功地获取了权力，其领导人仍将不得不行使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权力；对于这一点，我丝毫不怀疑。1980年8月波兰工人阶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列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作为团结工会的主要谈判者是这样总结工人阶级的胜利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共同的所有者（co-owners）了。就直接生产者能够给“目的论再分配者”提出的挑战而言，这大约是可行的、最为现实的一个表述了。列赫·瓦文萨所提出的进一步的行动规划，并非“废除”目的论的再分配或中央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列赫·瓦文萨建议工人在两个“所有者”之间分享权力，接受两种合法性原则，建立双重权力体系。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要想大大超越这些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仅仅建立在具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色彩的“直接生产者的直接权力”的基础之上。尽管存在这些局限，迈向自治和工人控制的自发性的工人阶级运动，以及知识分子试图发展出一种基于自我管理原则的异议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的尝试，是极其重要的。他们构成了对主导思想的挑战，或许代表着能够将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转换为一种“有序表达的冲突体制”的各种力量。如果我们从一个对再分配权力怀有阶级敌意的角度去看待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自治是一种在本质上与行政去中心化颇为不同的事物，后面这个概念很容易被目的论的再分配者所接受。行政去中心化的各种要求，构成了过去20年里东欧大多数社会经济改革中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与再分配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分权与集权之间的斗争表明，再分配权力的不同层次之间的权力存在着种种冲突。只有在直接生产者的反对力量得到充分发育以至于能够迫使再分配权力做出妥协的时候，真正的迈向自治的运动才是可能的。分权本身仅仅是去代表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较低位置的那些人的权力，它并不能改变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关系（或许南斯拉夫——至少如果我们相信其内部的左翼批判的话——仅仅是在东欧国家中能够发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更为分权化的一个版本而已）。

上述论述的目的只是想表明，做出以下的假设是很有意义的，即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存在着一种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对立，这种对立存在于围绕着再分配者而组织起来的阶级和处于直接生产者地位的阶级之间。鉴于目前还

缺乏对这一假设的精致的理论表达和经验证明，笔者希望这一状况有助于激发有关该领域的更多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这或许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 处于初生状态的国家社会主义 社会的支配阶级

知识阶层正走在成为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阶级的道路上。而我们则仅仅是处于这一显而易见是漫长的历史进程的起点。因此，如果我们将知识阶层称为一个阶级的话，就应该明白使用这一概念去分析当前的东欧社会所存在的诸多局限性，知识阶层在很多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与资产阶级不同的阶级；附加到支配阶级观念上的各种含义，未必就适用于对知识阶层的分析。首先，知识阶层不反不是一个所有权阶级，而且也不是一个继承性阶级（inheritance class）。尽管在社会民主党统治的国家进行了数十年的关于继承法的工党改革，资产阶级依旧是一个继承性阶级：资产阶级的财富及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够世代相传。毫无疑问，从纯粹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以下的说法与上述的判断并不存在什么本质性的差异：资产阶级阶级权力的基础在于其剥夺剩余的权力。随着生产方式私有制的合法化，阶级冲突的根源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对抗。换言之，即使社会民主党能够成功地废除对生产工具的继承，只要私有产权还能够使任何人有资格去剥夺剩余价值，这种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就依然还是资本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剥夺的性质。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在判断资本主义的道德性的时候，拒绝认为继承具有重要性的做法是很愚蠢的。那些对财富和权力的继承加以限制的社会总被认为“优于”不这样做的社会。至少到目前为止，东欧的知识阶层还是一个非继承性的阶级。知识阶层并不能将其权力、地位传递给其子女，对那些处于权力顶层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当然，与处于权力高位的人士有关的、关于“社会主义裙带关系”的说法虽时有耳闻，但相对来说并不常见（有趣的例外是罗马尼亚和朝鲜）。知识阶层还是一个相当开放的阶级。它从“被支配阶级”那里获得新的成员。要进入知识阶层，并不要求你必须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子女。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知识阶层正在逐渐丧失其开放性的特征。在东欧，有很大比例的大学毕业

生依旧来自非知识分子家庭，但这一比例正处于稳定的下降状态。^① 我们还可以说，这种开放性特征总是相对的。知识阶层确实在接受新的成员，但很少有知识分子会让其子女离开支配阶级的阵营。换言之，迈向知识阶层的上向流动率是很高的，但下向的流动却不那么显著，且即使关键性的岗位并非依据家庭阵营来实现传承，但那些出身于权力之家的人显然更具优势。他们常常从更高的起点开始其职业生涯，且在权力的阶梯上爬得更快。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成熟，财富的继承扮演着一个较以前更为重要的角色。即使这种状况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同日而语，关于公寓、乡村别墅、汽车等的继承也是明显的，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权。最后，我们还能够认为，支配阶级的开放性特征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任何新的和数量上急剧扩张的支配阶级都是具有“开放性”色彩的。其“开放”的原因，仅仅在于他们没有足够多的子女去占据这些新增的位置罢了。

事实上，即使没有大学招生额度的限制且所有的知识阶层的子女都被允许直接进入大学，也依然有很多的位置被留给蓝领工人家庭的子女，原因仅仅在于大学的急剧扩招。^② 不过，尽管有这些证据，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与资产阶级相比较，知识阶层基本上是一个非继承性的阶级；这一点对那些关注知识阶层权力地位上升并想做出道德判断的人来说，或许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知识阶层并非一个“自私自利”的阶级。它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剥夺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个人所消费和占有的物质商品的不平等程度等，都构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从理论上讲，自私自利并非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支配阶级也可能是禁欲主义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就可以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颇能节制自己的欲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提醒我们注

① 苏珊·费尔格 (Zsuzsa Ferge) 发现，那些父母中至少有一个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孩子，其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比例随着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匈牙利，这一比例从1938年的3.5%上升为1950年的48.5%。在其后的20年中，这一比例逐步下降为1970年的37.1% (Ferge, 1979: 145)。匈牙利是东欧国家中的一个典型；亦可参见沃尔特·D. 科奈尔 (Walter D. Connor) 关于苏联和波兰的极为类似的数据 (Connor, 1979: 177-214, 特别是第206页)。

②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很少有知识阶层的孩子会被挡在大学校门之外。对大学招生额度的限制，使得大学中存在着一一定比例的非白领家庭子女，这通常使得知识分子的子女处于等待的序列之中。而在1~2年后，所有那些真正想上大学的人就都能够上大学了。

意，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累进税制和不在地主所有权（absentee ownership）等现象，大多数剩余价值并不是被资本所有者消费掉的，而是被用于再投资或通过国家预算进行配置。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禁欲的资本家仅仅为了再投资而进行剩余价值的剥夺；但是，只要这种剥夺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样的社会就依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同样，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强调东欧知识阶层的非自私性。在知识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在东欧，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管道工或的士司机之间的工资差异，与西方福利社会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① 东欧的平等仅仅是就其极端性而言——那里既看不到巨富，也不会允许赤贫的存在，不过，其绝大多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颇为显著，且这种差距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阶级分野的方向是一致的。^②

此外，知识阶层的特权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分配上。譬如，知识分子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高补助的国家公寓；他们能够在旺季住进工会的休养所；他们是唯一能够进入装备优良的党的医院的人；他们能够在免税的硬通货商店中购物。从实行再分配经济的东欧各个地方来看，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采用社会主义政策以平衡不平等状况的那些领域中，分析者都能够发现知识分子们处于一种特权地位。^③

不过，知识阶层确乎不能够将通过其权力剥夺来的剩余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能出于个人目的而使用这些剩余。但尽管有工会和国家的控制，甚至是在今天，资本家也能够实施经济性的自杀，进行过度消费和投资不足；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者并不拥有其所经手的剩余。他只能够管

① 要想获得来自东欧的可靠数据是比较困难的。据我所知，苏珊·费尔格提供了关于匈牙利的最具可靠性和综合性的数据。根据她的数据（基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调查），在匈牙利，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6.2%，而5%的高收入群体获得的收入则占总收入的11.8%。根据费尔格的一份由美国、瑞典和丹麦这三个国家的成员所组成的群体的数据，上述比例分别为42.7%和16.4%（Ferge, 1979: 169）。

② 根据苏珊·费尔格的数据，1975年匈牙利国有企业中的高层经理与工人的月总收入的比率为2.5:1。对中层经理来说，这一比率为1.5:1。苏珊·费尔格宣称，这一比率正处于稳定的下降之中。对高层经理而言，1968年这一比率为3.0:1；换言之，根据她的报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一比率下降了将近20%（Ferge, 1979: 180）。

③ 关于行政配置和再分配配置中的不平等，参见塞勒尼（Szelényi, 1978）以及费尔格（Ferge, 1979: 233-273）。

理这些剩余。不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知识阶层的这种非自私性仅仅限于物质层面，而绝非权力层面。再分配者增加个人财富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但他不仅被允许而且有着结构性的动机去将其再分配权力最大化。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规律在于寻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国家社会主义的规律就在于寻求再分配权力的最大化；从这一观点来看，目的论的再分配者当然会以传播福音般的热忱和任何资本家一样残酷地去追逐权力。

此外，至少到目前为止，东欧的知识阶层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class in itself）——它还没有发育出阶级意识。

可以认为，至少依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不具备社会学意义的阶级。确切地说，阶级总是“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东欧的知识阶层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阶级。它不但没有认识到自身权力的阶级性质，反而去倡导一种无阶级性（classlessness）的和共识（consensus）的意识形态；而更为矛盾的是，它宣称，知识阶层所行使的权力，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权力。革命的知识阶层将自身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般说来，支配阶级通常不会热衷于去促进阶级意识的发育，而被支配阶级则在成为自在阶级的过程中具有既定的利益，因此会强调社会关系的冲突的性质。不过，正如我已经承认的那样，当前东欧的阶级意识甚至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意识，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其社会意识的表达并没有资产阶级社会在早期发展阶段那样深入。从政治分析的层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当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遭遇巨大的变迁并暴露出其脆弱性的时候。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完全是不可预见的。没有人能够预见“布拉格之春”迅猛地兴起与衰落，也没有人能够预见最近发生在波兰的工人阶级的反对运动。尽管有着发展得相当好的社会学研究和民意研究，东欧社会对自身的了解远远不如资产阶级社会，后者对自身的了解甚至在“社会学”和“民意测验”这些术语还不存在的时候都要比东欧社会来得彻底。我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失语状态（inarticulate nature），构成了今天东欧社会所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导致了政治的和经济的不稳定。这在部分程度上可归因于镇压性的政治上层建筑，因为支配阶级过高地估计了威胁其权力垄断的力量存在，而感到有必要采取行政措施去消除各种批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则能够通过完全的“镇压性容忍”（repressive tolerance）的方式，将这种批评和平地禁锢在一定范围内。另一方面，社会意识的失语状态也是知识阶层形成的直接产物。知识阶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正在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

会阶级，这一事实阻碍了各种对立的阶级意识形态的发育，阻碍了被压迫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出现。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彼此冲突的阶级意识形态，是因为其知识分子即潜在的思想家所占据的位置是介于两大基本的阶级之间的中间位置，他们能够成为任何一方的有机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阶层并非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阶层（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社会结构中的其他主要组成部分之间并不存在系统的利益冲突）；这一事实构成了阶级意识发育的前提条件。当使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宣称得以合法化的原则成为一种将该社会中的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合法化的主要原则的时候，知识阶层就失去了生产被支配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潜在可能性。它所能做的，仅仅是去倡导那些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阶级并不存在（classlessness）的意识形态。

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剥夺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下，直接生产者并不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人有更多的对自身劳动产品的控制权。而且，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文化剥夺或许要比经济剥夺更为严重——工人不仅被剥夺了其劳动产品，同时也被剥夺了关于自身的社会认同。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取消所有工人阶级的组织。

当局不仅取缔了诸如政党、工会和青年团这样的政治性组织，甚至取缔了像工人唱诗班和徒步旅行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国家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家们认为，既然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已经获得了终极权力，特定的工人组织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工会变成了工人管理组织（在所有的东欧社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一样都从属于同一个工会），同样的逻辑也殃及那些“无辜的”组织，如文化、体育组织或俱乐部组织。

工人不仅被剥夺了与其同行业工人进行联合的机会，且他们对自己作为工人的认同的要求，也遭到持续的质疑。工人被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即无产阶级概念所取代——而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认识到自身历史使命的工人。工人若想按照自己的当下价值或愿望去生活，就会被贴上“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标签，被指责为缺乏无产阶级意识。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从经验上所能够感知的价值、愿望以及生活方式，与所谓“社会主义人”（socialist man）的观念是相对立的；所谓“社会主义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家们用阶级术语设计的一个缺乏个性的抽象人

(a faceless creature)。如果有人想要去仔细分析“社会主义人”的理想类型——这一工作还有待进行——他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人”与任何发达工业社会中有文化修养的上层中产阶级在价值和品味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社会主义人”也会读书看报、欣赏音乐，其穿着打扮以及对待其孩子的行为与教条的左翼学者们是一样的。如果布拉格的一位半熟练工厂工人不能够达到这一要求，他将为自己感到羞耻。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人们根据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产生自我认同。人们也不能够为自己是一个工人或农民而自豪：他们的文化肖像是一个同质的肖像，与之有冲突或相竞争的价值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单一的价值等级。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无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压制所有有关阶级意识的表达。米克洛什·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的力作《工人国家中的工人》(1977)，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工人当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阶级认同”和“冲突意识”(这里借用了迈克尔·曼的术语)。^①哈拉兹梯所工作的布达佩斯红星拖拉机厂的工人和任何工作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传统工人”一样，能够清楚地区分“我们”(“we”)与“他们”(“they”)。^②哈拉兹梯发

①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对阶级意识中的四个要素进行了区分，它们分别是：阶级认同、阶级对立感、对阶级总体性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对曼来说，现实中这四个要素是独立的，任何要素都可以离开其他要素出现。不过，他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在具备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的时候，其革命的阶级意识才会出现(Mann, 1973: 68-73)。

② 工人意识中阶级认同的发展，甚至是工人对阶级冲突和阶级总体性的感知，在哈拉兹梯关于工人如何区分“我们”和“他们”的讨论中得到了有力的揭示：“他们(they)、他们(them)以及他们的(theirs)，我想任何曾经在工厂里工作过的人……都能够体会出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在每一个工作场所中……他们(them)都意味着同样的事物：这一词语所指向的，包括管理方、发号施令和做出决策的人、雇用工人并支付工资的人、说话算数的男人及管理者。‘他们’这一词语，能够将那些我们所熟悉和不熟悉的、所喜欢和所憎恨的人，将我们以友好的措辞对待的工头、用礼节性的尊敬处之的设计工程师、报以奉承式尊敬的经理，以及秘书、计时员、检察员、工厂杂志编辑、保安等联结在一起。尽管我们所谈论的主要是工厂的事，他们(them)这一词语却穿越工厂的高墙并包含……所有高高在上的、遥远的、超出言说者的力量之外的事物……我也曾经在办公室中工作过，正如我所曾经工作过的工厂一样，这里也有主管、下属之分，一些人拥有特权而另一些人只拿着很低的工资……但除了工厂的工人们，我还没有在哪一个地方听到这种对‘他们’的不容置疑的(peremptory)、确切的水晶般明晰的表达。这一用法不仅将企业工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甚至是在工厂内部它都构成了一条微妙的分界线；‘他们’将大多数工人与另外一些人区别开来；这些人由于其所拥有的岗位与资历而失去了某种长远眼光，不能够洞察是什么因素在分化其与工人的共同命运。丢下他们(dropping them)首先就意味着他真的开始想往上爬了。”(Haraszti, 1977: 71-72)

现，在生产线上工作的蓝领工人的强烈认同，被存在于工人和所有那些工作于办公室而非车间的人之间的一种对立感所强化。“他们”就是敌人。对于那些被哈拉兹梯描述的工人来说，这一“敌人”无疑不仅包括高层经理，还包括低层次的拿工薪的管理人员，甚至那些在工人轮班后在工厂门口进行检查的夜班保安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也是敌人之一。哈拉兹梯从经验的角度确认了工人对存在于红星拖拉机厂的对立阶级结构的感知，确认了存在于蓝领工人中的强烈认同感及其感知阶级关系的冲突性质的能力。哈拉兹梯所没有记录的，用迈克尔·曼的术语来说，是工人的阶级总体性；他们对于一个能够“替代”现有社会的另一社会的前景的认识还很幼稚。从哈拉兹梯的研究中，我们能够确认冲突意识的存在，但依然还不能够证明阶级意识的存在。

最近发生在波兰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1980年8月之后发生的事件，对于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动力学是极其重要的。^①自1980年8月后，我们能够发现在波兰的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意识发育的若干迹象，它可能会超越简单的阶级认同与冲突的意识。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在1980年8月间，波兰工人阶级的意识发生了从“工联意识”到“阶级意识”的转型。试图对波兰当前的斗争进行充分的分析还为时尚早；这里，我也不想得出什么深远的结论，而只是想指出波兰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发育中的几个新的要素。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于1980年8月24日提出了21条要求（*L'Alternative*, 1980: 14-15），其前6条都是政治性的，只有其余的条款才能被称作“正常的”工会要求，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21条要求的第一条就提出了工会独立于管理的要求，要求工会成为真正的工人组织而非工人—管理方的联合组织。格但斯克造船厂（Gdansk shipyard）的罢工工人将“组织问题”置于这一要求清单的首条，置于工会问题之前。事实上，在其后与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团结工会在很多关于工会问题的要求上都做出了妥协，却不愿意在组织问题上妥协。在政府的压力下，团结工会承认工会并非一个政治性组织（*L'Alternative*, 1980: 44），并同意运动将不再扮演政治性

^① 关于波兰事件的详尽记录，参见《选择》（*L'Alternative*）专刊（第7期），1980年11~12月。该专刊刊登了团结工会运动从1980年8月23到8月31日《信息通讯》（*Information Bulletin*）的全文（*L'Alternative*, 1980）。关于这一事件的有趣的理论分析，参见艾瑞图的介绍（Arato, 1981）。

党派的角色。不过，这一让步比接受团结工会应当扮演“合适的工会”这样的角色要小得多。波兰共产党和政府的目的是将工会的活动限制在诸如“面包和黄油”这样的事务上，但是——正如卡尼亚（Kania）^① 这位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所不安地指出的那样——随着团结工会组织的建立，波兰正在向一种“双重权力”体制迈进（Arato, 1981）。以下这一情况或许是真实的：至少在其早期阶段，团结工会几乎与罢工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且并没有成为一个包含着高度职业差异的组织；这时，运动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挑战现有的政党或政府，甚至是像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这样的问题都处于次要的地位。运动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工人的“抗衡力量”。团结工会的《信息通讯》编辑在其发表于1980年8月28日的宣言中是这样表述的：“不幸的是，由于经营不善引起的某些失败无法弥补……我们寻找过罪犯……首要的是创造保证不再产生这些失败的条件。当垄断权力不会由智力，而只会由理性的垄断转化而来时，这才有可能。我们不能通过分散权力而不创造允许利用学者的专业知识和工人阶级的集体智慧的条件达到这一点。”（*L'Alternative*, 1980: 29）

因此，运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并非现有权力结构的人事变动，而是一种新的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工人阶级的集体智慧”能够与学者的专业知识一起得到运用。对这一宣言的作者来说，权力的分散化、对计划体制的改革（以及“对学者专业知识的更好的运用”）是必需的，但也是不够的。在对计划体制进行分权外，他们还坚持认为，生产者处置其劳动产品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用宣言中的话来表达，就是：“我们对坚持认为对计划经济和经营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是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家和专家充满信心……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开始转变，为所有工作的人和那些有权期待他们活动效果的人创造可信的参与条件，从而续写我们国家的命运。”（*L'Alternative*, 1980: 29）与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在这两个国家是知识阶层发起和引领着反对运动；而在1980年的波兰，运动是直接从工人阶级那里涌现出来的。与1970年和1976年的事件不同，1980年的波兰工人再也不想将斗争局限在面包和黄油等经济性问题上；他们超越了冲突意识，我们能够从其行动中发现阶级意识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1980~1981年的波兰代表着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新

^① 卡尼亚于1980年9月至1981年10月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2年后任国务委员会委员。——译者注

阶级结构演变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更高的阶段。

不过，甚至是在1980~1981年的波兰事件中，分析者所能够发现的也仅仅是这一新阶级结构的若干要素：新阶级的规则（regulations）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支配阶级仍旧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仍旧处于初生状态。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实现了相对分离之后，只有在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那里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新关系才会以阶级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

只要市民社会还处于极权政治国家的渗透之下，所有东欧政治运动的首要目标就将是确立基本的公民自由原则。显然，至少只要市民社会还没有从政治国家那里获得相对的自主性，波兰工人阶级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工人，就不能够成功地将工人自治的利益链接起来。无论是中央计划和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体系管理的理性化，还是工人自治的渴望，都需要市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来确保公民的自由。在这个阶段，唯一的冲突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是“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本论文的中心思想就在于，只要市民社会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这种被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整个社会反抗权力的共识的表象将烟消云散；而一种新的、介于知识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性质的冲突将显现出来。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本文并没有拒斥吉拉斯的工作。吉拉斯所提供的，或许是一种对那些首次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掌握权力的主体的精确描述，他们掌握权力的背景，是市民社会完全被极权国家所渗透。在这样一种斯大林主义的环境下，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被党和国家机器所统治。与吉拉斯不同，我并不将他们称为一个阶级，因为我不能在可以辨识的经济结构中找到他们的位置。我的主要观点是，在吉拉斯的著作发表后将近20年中，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斯大林式的经济主观主义，逐渐被更为理性化的计划体制所取代。在这一体制中，“科学”的建议必须得到重视；此外，出现了市民社会不断获得自主性的趋势。随着这些趋势的演进，权力所有者的圈子逐步开放，党和国家机器对权力的垄断程度开始下降。渐渐地，党的官僚们开始与知识分子分享权力，他们的权力也逐渐被知识阶层的阶级权力所取代。我的观点是，吉拉斯准确地对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权力所有者进行了确认，自那以后分析者们注意到了知识阶层这一真正的新阶级的出现。这一知识阶层的内涵要比吉拉斯的“新阶级”宽泛，且显然更具有阶级的性质。我

们能够从1980~1981年间的波兰个案，特别是从1981年12月13日戒严法强制实施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发现这些党的官僚依旧掌握着权力。但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后期阶段，我们已经能够发现许多吉拉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不能够发现的迹象，那就是，知识阶层这一新支配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取代官僚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当前东欧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最为可能的后果。

刘建洲 译 何梅清 校

参考文献

- L'Alternative: Special Issue on Poland*. 1980. (November - December)
- Anderson, Perry.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rato, Andrew. 1981. "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Telos*, no. 47 (Spring), pp. 23 - 47.
- Arato, Andrew and Eike Gebhardt, eds. 1978.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Balla, Balint. 1972. *Kaderverwaltung*.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 Baran, Paul. 1961. "The Commitm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Monthly Review* 13 (May): 8 - 18.
- Bauman, Zygmunt. 1974. "Officialdom and Class-Bases of Inequality in Socialist Society." Pp. 129 - 148 in: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edited by Frank Parkin. London: Tavistock.
- Berdyaev, Nicolas. 1972. *The Origins of Russian Commun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rnham, James W. 196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onnerton, Paul, ed. 1976. *Critical Sociology*. London: Penguin.
- Connor, Walter D. 1979. *Socialism, Politics and Eq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Engels, Frederick. 1970.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Pp. 375 - 428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Ferge, Zsuzsa. 1973. *Tarsadalmunk Retegzodese*.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 1979. *A Society in the Making*. New York: Sharpe.
- Gella, Aleksander, ed. 1976.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Sage.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 Gouldner, A. W. 1975 - 1976. "Prologue to a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Telos*, no. 26 (Winter), pp. 3 - 36.
- .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Seabury.
- Habermas, Jürgen. 1970.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translated by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 . 1974.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lated by John Viertel. London: Heinemann.
- Haraszti, Miklos. 1977.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London: Penguin.
- Hegedus, Andras. 1977.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ocialist Society*. London: Constable.
- Horkheimer, Max. 1978. "The End of Reason." Pp. 26 - 48 in Arato and Gebhardt, eds., 1978.
- Konrád, George and Iva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Kuron, J. 1978. "Pour une platform unique de l'opposition." In *La Pologne: Une société en dissidence*, edited by Z. Erard and G. M. Zygiel. Paris.
- Kuron, J. and K. Modzelewski. 1966. "An Open Letter to the Party." *New Politics* 5 (2): 5 - 47.
- Lenin, V. I. 1970. "Can the Bolsheviks Retain State Power?" Pp. 393 - 434 in: *Selected Works*, vol. 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Mann, Michael.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 Marx, Karl. 1970.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Pp. 96 - 179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 1972. "Theses on Feuerbach." Pp. 11 - 13 in: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K. Marx, F. Engels, and V. I. Leni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 1974. *Capital*. Vol.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 1975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Pp. 5 - 129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 1975b.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0.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p. 31 - 63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 1972. "The German Ideology." Pp. 14 - 76 in: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K. Marx, F. Engels, and V. I. Leni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Ossowski, Stanislaw. 1963.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74. "Old Notions and New Problems—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Structure in Modern Society." Pp. 79 – 89 in: *Social Inequality*, edited by André Beteille. London: Penguin.

Perez-Diaz, Victor M. 1978. *State, Bureau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Shachtman, M. 1962. *The Bureaucratic Revolution*. New York: Donald.

Shkaratan, O. I. 1970. *Problemy sotsial'noi struktury rabocheho klassa SSSR*. Moscow: Mysl.

Stalin, J. V. 1972.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Peking: FLP.

Szelényi,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0: 63 – 87.

Trotsky, Leon. 1972.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finder.

Weber, Max. 1958. *The Religion of India*.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solowski, Włodzimierz, ed. 1970. *Zróżnicowanie społeczne*. Warsaw: Wydawnictwo Polskiej Akademii Nauk.

Wesolowski, Włodzimierz. 1974. "The Notion of Strata and Class in Socialist Society." Pp. 122 – 45 in: *Social Inequality*, edited by André Beteille. London: Penguin.

Wright, Erik Olin.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知识分子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支配^{*}

捷尔吉·康纳德、伊万·塞勒尼

1974年9月，我们完成了《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的写作。在书稿的最后一段中，我们总结道：本书在中欧国家的一个官方出版机构出版将成为一项经验证据，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迈进其第三阶段；^① 在这样一个阶段，行使阶级权力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官僚精英。

* 本文曾经以伊万·塞勒尼个人的名义，以“知识分子与知识政治”为题在会议上宣读。会议后不久，东欧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该文的部分内容显得有些过时，伊万·塞勒尼与捷尔吉·康纳德一起对该文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更换了文章的题目并调整了所关注的主题，从而形成了本文的内容。不过，这也意味着舍弃原文〔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科莱门斯·斯扎尼尔威斯基（Klemens Szaniawski）这两位评论者曾对该文予以评论〕的部分有价值的内容。〔限于篇幅，本论文集没有收录这篇摘要以及李普赛特和斯扎尼尔威斯基所做的两篇评论。原文出处是 James Coleman and Pierre Bourdieu (eds.),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337 - 361。——译者注〕

① 本书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斯大林主义时期。我们将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看作是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最为优秀的理论家。在这一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精英垄断着权力，他们通过单一官僚精英的等级体制进行统治，其统治方式具有类似等级制（estate-like）的特点。在苏联，这一社会主义时代开始于十月革命之后；而在中欧和中国，则开始于1948~1949年前后。在大多数国家（尽管中国并非如此），该阶段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魅力型领导去世之后，社会主义开始了其第二时期。在因魅力型领导死亡而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中，官僚精英试图创立各种新的合法化原则。它开始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试图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主要是将其定义为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因为社会主义是有序的，它具备科学的理性主义。《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就是对这一社会主义的第二时期的分析；在这一阶段，官僚精英开始邀请技术知识分子们（虽然还不是整个的知识阶层群体）与其分享权力。在该书中我们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将出现官僚精英的等级式统治（the estate type of domination）的解体；一种很可能包含整个知识阶层的新统治阶级的形成正在发生。我们相信，这种新阶级的形成将（转下页注）

15年之后，也就是1989年9月，该书在匈牙利出版，出版商是一家负有盛名的国有出版社——孔朵拉特·凯尔多（Gondolat Kiado）。在这本书中，我们希望至少能够回答读者或许会提出的三个重要问题：①当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否证明官僚统治的衰落和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权力的增长？作为新统治精英的知识阶层，是否构成了后共产主义匈牙利社会中的一种新统治阶级？②这一明显不断增长的政治激进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影响，究竟是一种持久的现象，还是仅仅是一种介于共产主义—官僚主义（Communist bureaucratism）和另一种可能的新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过渡现象？换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这样一个时代，是正处于形成之中，还是仅仅是一种转型的短暂阶段？③如果当前的阶段并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转型阶段，而很可能将是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个第三“时代”还称得上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吗？

要想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写一本大部头的著作。我们很乐意在今后完成这样的一本著作；不过，鉴于我和康纳德只有数周的相聚时间，因此本章将只对我们的部分观点予以表述。简要地说，我们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如下文所述。

事实上，当前，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最为重要的角色（这对1989~1990年的匈牙利而言，尤其正确；同时也适用于苏联、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官僚统治的基础已经遭到侵蚀；而且随着旧精英的衰落，知识分子是唯一可能成为新精英成员的一群人。在中欧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由匈牙利知识分子行使着如此巨大的集体性权力。

知识分子拥有权力或许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正如其前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样，他们或许仅仅是在为某一阶级的新统治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统治奠定基础而已。但这种统治，至少不能够排除以下的可能，即这一正浮现于历史舞台的新知识阶级，或许能够在中欧独特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体

（接上页注①）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譬如，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许多国家的官僚精英开始暗中破坏其与知识分子的协议，并发动了一场保守的反攻运动；其后，这场运动演变为众所周知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ism）。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知识阶层将掌握权力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本质上不同的新时代，即社会主义的第三时期或成熟时期。

(social agents) 结构中, 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对于上述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把握去回答它。我们倾向于将所观察到的、正在今天的匈牙利出现的社会与经济秩序, 称为后共产主义 (post-Communist)。^① 之所以使用后 (post) 这一前缀, 是因为我们想表达这样一种意思, 即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已发生的事情而非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种正在出现的新的社会形态, 或许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但它也可能意味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趋同。当然, 它也可能是一种具有不同性质的社会: 它所走的道路, 或许与我们目前已经知晓的西方资本主义或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都不

① 对于“后共产主义”这一术语, 存在着众多争议。譬如, 安德拉斯·海基达斯 (Andras Hegedus) 最近对我们使用的这一术语予以了批评。与传统的老左派和新左派一样, 他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如果一个社会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共产主义, 它又何以可能进入后共产主义时代? 在我们看来, 将 1917 年后的俄国和 1949 年后的中欧描绘为共产主义社会是颇为精准的。这些社会性的经历与试验, 其目的是试图创造各种尽可能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而这些社会试验之所以失败, 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集体化程度不够, 而是由于它们过于共产主义化 (communistic) 了。当前的各种力量, 正在寻求解决在这些试验期间所积累的各种矛盾的解决办法, 它们当然会对集体主义加以限制, 寻找各类更具个体主义色彩的形式与价值。

我们本来也可以使用后中央集权主义 (post-statist) 这一术语的, 但我们之所以还是选择了后共产主义这一术语, 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1) 后中央集权主义强调当前变迁中的各种“反集权主义” (anti-statist) 的因素, 而不能抓住其反集体主义 (anti-collectivistic) 的各种特征。因此, 它为新一轮的集体主义乌托邦浪潮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2) 后国家社会主义暗示, 正在浮现的新社会形态将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则认为, 对于“社会主义观念能否用于描述中欧社会形态的未来”这一问题, 目前还不能予以确切的回答。这些社会的社会形态, 可能是社会主义的, 也可能不是。

考虑到未来的变化, 后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具有变通性的概念。后共产主义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成熟的形式 (正如我们在 1974 年的著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中所认为的那样)。该术语自诞生以来, 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法。将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而共产主义是其成熟阶段, 这样一种划分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中也出现得相当晚; 而且, 这一划分在斯大林的整理下成为一种教条。事实上, 在《巴黎手稿》(Marx and Engels, 1975) 中, 马克思将中央集权转型 (statist transformation) 的早期阶段, 称为“粗糙的共产主义”; 随后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对中央集权的集体主义的一种限制而非完善。尽管马克思自己的术语或思想对于分析当前中欧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我们还是认为, 中欧可能成为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形式, 因此为其发展预留理论空间依旧显得相当重要。在这样的一种图景中, 尽管国家的明显干预受到了限制, 但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经济与社会力量, 或许能够得到各种具有个体主义色彩的私有形式的补充。

同，而是某种类型的第三条道路或一条中欧式的道路。^①

在本章中，我们分三个主题对我们自己的观点加以归纳：首先，我们会对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予以一个概略性的诊断；同时就我们目前的理解，对后共产主义的内在构造加以剖析。其次，我们探究了知识分子在这样的一个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位置，并力图从三个维度测量这一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程度。^②最后，我们将对“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权力能够持续多久”这样一个问题，予以简要的探讨。

① 这里，我们的灵感主要是来自基诺·苏克斯（Jeno Szucs）（1983）。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可以将欧洲划分为三个区域。对他来说，中欧代表着一种本质上不同于俄国和西欧的社会型构（configuration）。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平民主义者的布道者〔在匈牙利，这一工作分别由内梅特·米克洛什（Laszlo Nemeth）和毕博·伊斯特万（István Bibó）完成〕，都主要是通过使用诸如“第三种方式”、“第三条道路”和“第三方”这样的主张，来表达他们对中欧道路的优越性的自信。他们宣称，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文明，以及它们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具有优越性。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这种思想在整个欧洲地区可以说相当流行。苏克斯则以一种描述性的方式使用“第三种历史区域”（the third historic region）这一观念，且其使用得并不是很规范。他的主要观点是：与欧洲的其他两个区域相比，中欧的历史演进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尽管中欧要比西方更为落后并且比东欧（从狭义上讲即俄国，或者更广泛一点包括那些信仰东正教的区域）更为发达，但仅仅用“落后的发展”（backward progress）来描述它是不够的。它同样是独特的。在本章中，我们是以一种描述性的方式来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欧道路”的，我们承认历史遗产对于当前和未来的重要意义。

② 在论文《新阶级理论的三次浪潮》（Szelényi and Martin, 1988 - 1989）中，我们认为，每一个阶级都能够通过三个维度加以界定。要想成为一个新阶级（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阶级，而且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定的新阶级），我们需要能够并愿意占据这种新阶级位置的各类“社会行动者”；我们还需要供这些主体去占领的各种新的社会经济位置；最后，要在这些位置上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这些新的主体必须发育出一种新的阶级意识。在那篇文章中，我们认为，从19世纪晚期开始，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进行了各种权力规划，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在上述所有三个维度上形成一个阶级。譬如，就阶级形成所需要的主体（agency）而言，中欧和东欧的“与社会相疏离的”（socially unattached）知识分子们，可谓一种阶级权力规划的强有力的代表，但他们却并没有获得合适的阶级位置，或者说并没有发育出充分的阶级意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们（technocrats）虽然新的阶级位置上获得了权力，但他们作为主体，却最终不能够作为阶级采取集体行动；最后，1968年事件中激进的中产阶级虽然确实发育出了一种激进的新阶级意识，代表了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一种强有力的挑战，但就其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和主体性而言，他们依旧显得相当弱小。我们将根据这三种维度依次展开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在迈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在上述三个维度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 迈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与共产党官僚统治的侵蚀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变迁几乎发生于所有的中欧国家，苏联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这些变迁。所有这些变迁，都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它们意味着我们在过去70年中所熟知的共产体制正在消失。

尽管西方学者对于如何称呼这些社会意见不一（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官僚集体主义以及“苏联类型的社会”等称呼），但评论者们通常都同意关于社会生成的主要特征的一些描述性说法。或许，用以下的方式对这些社会经济体制进行描述不会引起什么争议。

其一，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在经济中具有垄断地位；特别是在核心商品的生产领域和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所有权方面，国家的垄断地位尤为显著。

其二，相应地，这些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表现为一种单一的等级制度（hierarchy）和一种单一的金字塔式结构；表现为通过一种单一的官僚等级秩序（rank-order）的运作，来控制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在这样一种等级秩序中，决定个人命运沉浮的标准有二：①政治上的忠诚（忠于党的领导人或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借用布迪厄的术语将其称为政治资本）。②教育文凭（文化资本）。缺乏这两种资本的人，很少会爬到高位；而那些既没有政治资本又没有文化资本的人，则会处于等级秩序的最底层。

其三，最为明显的是，在这些社会中，只有一个政党垄断着政治权力，并且通过马列主义教条来确保自身的合法地位。^①

按照上述三个方面的描述，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论，即在上述三个方面，中欧国家正处于迈向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这些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垄断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逐步遭到侵蚀。首先是遭受第二

① 上述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概括，限于时间和篇幅，这里不能过分关注具体的细节。当然，国家从来都没有在经济上取得完全的垄断地位。某些私营经济活动总是得到容忍——它们即使不是得到合法化的容忍，至少也得到了半合法化的承认。私有财富也从来没有作为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方面而被彻底消除，甚至是共产主义政党也有一些竞争对手（在一些国家甚至存在着反对党）。不过，尽管存在着这些无关大局的差异，我们还是认为以下的说法不至于引起太大的争议：事实上，共产主义是一种集权主义经济；在这一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官僚等级秩序，存在着单一的马列主义政党对权力的近乎垄断（a near-power near-monopoly）。.

经济出现的侵蚀，其后自1988年以来，又遭到集权主义经济加速转型的侵蚀。一种新的法律框架得以创立，并引入了所谓的“部门中立物权法”（sector neutral property law）。于是，自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私有财产第一次取得了与公有财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一种涵盖并容忍第二部门私有化经济活动的集权经济（statist economy）正在向一种混合经济迈进；而在这样一种混合经济中，私有经济不仅蓬勃发展，而且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伴随着这些经济上的变化，匈牙利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转变。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参与第二经济，匈牙利社会中发生了一个渐进的资产阶级化^①或小资产阶级化（petty bourgeoisification）过程。在匈牙利工人阶级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不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而是越来越多地在国有部门之外的私营企业寻找兼职的机会。^② 随着最近对私有部门的开放，我们有

① 在这里以及本章的其他部分，我们都面临着一个语言学问题。我们倾向于使用德语 *Verbürgerlichung*（或匈牙利语“*polgarosodas*”）这一术语来表达我们的意思。英语单词“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或“中产阶级化”（*bourgeoisification*），并不能够完全地和精确地表达这些词语的意义。德语“*Bürger*”或匈牙利语“*polgar*”都同时包含着资产阶级（*bourgeois*）和公民（*citoyen*）的含义——资本家（*capitalist*）和公民（*citizen*）。对那些用德语或匈牙利语进行思维的人来说，英语单词“*embourgeoisement*”或“*bourgeoisification*”（及各种类似的法语表达）都过于强调经历这些过程的主体的“财产”（*propertiedness*）维度。而德语单词“*Bürger*”或“*Verbürgerlichung*”，却并不抹杀私有产权（*private ownership*）与公民权（*citizenship*）之间所存在的辩证性质。因此，至少从原则上讲，以下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即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化（用德语或匈牙利语表达即 *Verbürgerlichung* 或 *polgarosodas*）现象的同时，却并不一定伴随着大量的私有财产的出现。在德国或匈牙利思想家的心目中，一个社会的资产阶级化（用德语或匈牙利语表达即“*bürgerlich*”或“*polgarosodott*”）程度可能相当高，尽管这样的社会并没有大量的有产阶级（*propertied class*）存在。在本章的其他部分，我们将区别使用“*Bildungsbürgertum*”〔即“文化资产者”，他们是资产阶级（*bourgeois*）的一分子或用匈牙利语表达是“*bürgerlich*”的一分子，判断的标准主要是基于其习惯（*habitus*）、生活风格、意识或对多元民主制度以及市民自由的忠诚度等〕和“*Besitzbürgertum*”（即有产阶级）这两个单词，因为在中欧，这两个单词具有自身特有的差别；这样做，还能够为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发展，留下一个悬念或保留其不确定的性质。

② 在《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Szelényi and Konrád, 1988*）中，我们对这一资产阶级化的历程做了详尽的描述。关于小资产阶级（或并非真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出现以及一种双重等级体系（一种体系建立在官僚秩序的基础之上，另一种体系建立在私有财产或市场能力的基础之上）浮现的相似论述，参见 *Szelényi (1986-1987)*，在那篇文章中，我曾介绍过克洛什将新的匈牙利社会结构描述为一种“L”形的结构；艾勒梅·汉基斯（*Elemér Hankiss*）在1989年出版的一本书的第9章中预测：新资产阶级可能会与旧的干部精英结成“大联盟”（*grand coalition*）；对匈牙利相关文献的一个很好的综述，参见 *Kovach, 1988*。

理由期待会出现一种资产阶级化的发展态势。一些人仍将待在小企业中工作，另一些人则或许会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的成员。共产主义以官僚等级为基础的单一的社会等级制度，现在正被第二种社会等级制度所补充；在第二种等级制度中，决定个人地位升沉起落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和市场能力。

最后，马列主义政党也失去了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今天的匈牙利，已经具备了一个多元政党体系。到1989年2月，甚至连共产党都不得不接受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原则。新的宪法废除了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并为不同政治党派形成及其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1990年3月和4月进行了首次竞选；目前，在组阁问题上，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

最令人惊讶的变化则发生在政治体制中。通过小资产阶级化过程而得以实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但政治体制的资产阶级化转型——尤其是旧的干部精英的解体——却仅仅发生在1989年初。本章将关注这些变化，并力图解释干部精英是怎样和为什么会失去其对权力的掌控。本章还将试图去理解最近整个知识阶层的政治化和动员化的过程。当然，我们知道，为最近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奠定基础的，是那些从底层发起的、缓慢的、更为静悄悄的革命；正是这些革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侵蚀着共产主义体系。今天，突然表现出政治化和激进化倾向的匈牙利知识分子，常常对社会或群众的反应迟钝，表示出急躁的情绪。事实上，这种新兴的政治运动或政党，即使未曾遭遇到民众完全的和总体上的冷漠态度，也面临着大量的质疑。我们并不赞成同事或朋友们表现出这种急躁情绪。本章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假设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匈牙利及其他大多数中欧国家所发生的这种资产阶级化过程，都是不平衡的。

19世纪德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使我们很难区分“Bildungsbürgertum”（指文化资产者）和“Besitzbürgertum”（主要指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北美和西欧（尤其是在诸如英国或荷兰这样的国家，在法国这一点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引导资产阶级化历程的，主要是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相反，在德国，文化资产者是作为新资本家阶级出现的，而且市场经济吸纳了大量高技能的专业劳动者。在中欧，这一点在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Empire）的一些邦国里，比如匈牙利、波兰或波西米亚（Bohemia）

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文化资产者和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中，重点在文化资产者这一边。因此，一些地方所发生的资产阶级（bourgeois）转型过程，并不伴随着真正的资本家（bourgeoisie）的产生；引领这一过程的，是资产阶级化的文化资产者（a bourgeoisified Bildungsbürgertum）；这一阶级对于其所想要打造的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态度。

在使用这些术语对最近的匈牙利历史进行解释的时候，人们或许会认为，在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近20年的时间中——这一段历史时期对中欧来说是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尽管要强调的是，该阶级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和兼职的特性，其规模较小而且具有消费取向而非资本积累的取向）。一方面，除了正在浮现的一些逐步增长但数量仍不是很大的异议群体外，在其社会或政治特征上，知识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中央集权主义者或干部的特质；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人获得了独立于官僚中心的小资产阶级自主性。这一变化，可谓意义深远。在近20年中，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化历程并不均衡。尽管匈牙利所发生的小资产阶级化的范围相当广泛（它包括了一种新的有产阶级的发育，尽管其数量较小），但其文化资产者的资产阶级化程度却比较低，他们更多地保持着干部的特征，而不是表现出文化资产者的特质。这一小资产阶级化过程，逐渐侵蚀着占据支配地位的官僚统治体制；终于，1989年早期，从这一官僚权力体制所制造出的各种孔隙里爆发了一场政治改革。这导致了文化资产者的快速资产阶级化过程；在今天，我们能够在匈牙利观察到一种新的、不均衡的资产阶级化过程：文化资产者依旧保持着其主导性的角色，并走在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前头。与其19世纪的境况相似，匈牙利再次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选择：它要在缺乏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的条件下，试图向一种资产阶级社会转型。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大众反抗官僚权力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各种压力的结果；尽管如此，在本章中，我们仍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化资产者的身上。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区域所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特殊的罕见特征，再次取决于该知识阶层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在本文中，我们的目的是理解这些主体，并探究他们的权力是否仅仅是暂时性的，抑或他们有机会将这种权力固定下来，并转化为自身的阶级权力。

二 后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中的知识分子

在我们的中欧朋友与同事中间，《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并非一本特别受欢迎的书。在大多数中欧知识分子朋友看来，我们的观点即整个知识阶层可能最终会与官僚分享权力，这即使不是一种侮辱，也是不具有多少说服力的。事实上，知识阶层感到自己被忽视、没有受到激励，有时甚至遭到勃列日涅夫主义（通常被称为新斯大林主义或就是斯大林主义）的迫害。中欧的知识阶层曾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因各种关于社会主义的人道化和理性化规划而欢欣鼓舞；而到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在当初许诺的各种改革遭到蓄意抵制后，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鉴于这种情况，扎果斯克斯（Zagorskis）认为，东欧的知识阶层更多地是在通往异议分子而非阶级权力的道路上。

不过，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们当初的分析所具有的洞察力，要远远超过中欧的评论者们通常所给予的认可。东欧的知识阶层找到了一种有效地反对守旧的官僚精英反攻的策略。这一知识阶层转换了官僚统治政治的性质，并且似乎在与官僚统治集团进行的漫长斗争中将要取得胜利。一方面，他们迫使官僚接受批判性话语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这是古尔德纳采用的一个术语，参见 Gouldner, 1979）的各种规则；另一方面，他们也学会了如何与大、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毫无疑问，在不远的将来，他们还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这些联盟之间周旋。同时，随着官僚地位的衰落以及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尽管这种上升幅度还相当有限），文化资产者即使还不能说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但无疑也已经成为当前的统治精英。

本章的余下部分，将从上述三个维度对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过程予以分析。首先，我们将关注干部精英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试图解释干部精英之所以突然势力衰弱的原因。其次，我们将回顾知识阶层的这一语言学的胜利，即回顾他们如何通过建立批判性话语文化而对干部精英予以致命的打击：他们宣称，只有那些懂得这种批判性话语文化的人，才能够设定未来的政治议程。最后，我们将对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知识分子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予以审视。我们将特别关注知识分子在多元的政治过程以及媒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对知识分子在这些位置上行使权力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以及他们行使权力的程度加以探究。

我们并不认为，知识分子阶级在所有这三个维度上都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阶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认为，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完全地”形成。历史上甚至是最为成功的阶级的形成——譬如资产阶级的形成——都是不完全的。资产阶级确立之际，也就是其破裂开始之时。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试图概括的社会现实，亦即匈牙利在1989年夏季的社会现实，本身就处于高度的变动状态之中。匈牙利并非已经是一个后共产主义社会，它正处于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上，或者说，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后共产主义阶段；因此，它还没有固化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目的，是去展现这一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各种正反论据（pros and cons），以及反映其优劣态势的各种指标。对于一个阶级分析者来说，正确的问题总是这样提出的：在什么程度上，我们能够将这些主体视作某一阶级的成员？^① 要回答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

（一）主体性问题：干部精英抑或知识分子

对很多读者来说，《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是一部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书，因为我们在那本书中预测，干部精英（统治集团）将与余下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技术专家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与传统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睿智看法不同，我们相信，主要的社会分裂将不会发生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之间，而更可能会发生在工人与干部和知识分子结成的同盟之间。

我们认为，这一诊断与预测是具有说服力的。至少在匈牙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在过去10~15年中卡达尔政权的逐步衰落，尽管干部精英依旧顽固并发起了一些反攻，但事实证明，在很多方面，干部官僚还是沦为了失败者。有趣的是，从我们的分析观点来看，尽管干部官僚对与知识阶层进行妥协的战略曾表示出顽强的抵抗，但他们最终还是被同化到知识阶层中去了。干部官僚越来越多地来自拥有高技能的专业人员；在惯习（这里借用了布迪厄的术语）方面，干部官僚几乎与中欧经典的文化资产者没有什么两样。

^① 从纯粹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也是以这种方式提问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农民的社会特征（Marx and Engels, 1979）时认为，就其所从事的某些工作和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来说，农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他们又不能被看作是一个阶级。

干部精英构成的变化。与我们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做的预测颇为一致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或中期，匈牙利干部精英的招募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时代，特别强调后备干部所具有的可预期的忠诚。因此，在招募干部时，那些自信心或市场能力较弱的人，要比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更受青睐；后者因为可能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而不被信任。在60年代期间，这种现象常常被称为“逆向选择”，在逆向选择的过程中，那些较不称职的人往往有更多的体制性机会被任命到各种决策位置上。

1968年后，即在匈牙利所经历的长达20年的卡达尔主义期间，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缺乏其他中欧国家的可供比较的数据，我们还不敢将这一情形推及整个中欧地区）。

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帕尔·朱哈慈（Pal Juhasz）就已经注意到，各类农业合作社中的管理者的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Juhasz, 1983）。随着1960~1961年间匈牙利农业集体化的强制推行，农民干部被任命到管理岗位已经成为一种特色。根据朱哈慈的研究，在60年代期间，一批技术和技能水平较高的农业工程师新人，被送到农业院校接受培训；在70年代中期，他们在整体上取代了旧的农民精英与干部精英。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级掌控了对农业的管理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各类合作社的社长或首席农业工程师。这些人领导着郡县政府中的农业事务部门，并逐渐升迁到农业部的主管位置上。借助其与农业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密切联系，他们实现了对匈牙利农业的全方位控制——从农业培训、研究到生产，从国内农业贸易到国际贸易，从劳工组织到农业技术发展。

农业领域中所发生的这种情况并非一种特例。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在有计划地努力招募最优秀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使其加入到党的各类机构和走上政府岗位。对专业技能的重视开始超过对政治忠诚的考量。吊诡的是，这些新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被要求加入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社会科学院中的一些极为优秀的研究者就并不是共产党员。最近，这一官僚的非党员化进程大为加快。譬如，在1989年夏季，在匈牙利共产党的日报——《人民自由报》（*Nepszabadsag*）的经济政策部门所拥有的30位新闻工作者中，只有3位是党员。从1970年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招募方式，这使得各类机构接受了大量具有大学受教育水平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常常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能力，即使党

或国家机构的岗位被大量裁减，他们也能够很容易地在市场上找到诸如建筑师、经济学家或工程师这样的工作。^①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或许会看到关于这一变化的更多的系统证据与比较数据；不过此刻我们所能够利用的证据，其实已经足以支持这样的结论：自70年代早期以来，已经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走上各类官僚决策岗位。

当我们观察到匈牙利官僚统治的轰然倒塌时，不免会对所有这些变故何以会发生的原因产生兴趣。当然，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很多因素值得考虑，但上文所描述的官僚成员的社会和教育水平构成的变化，无疑是导致匈牙利官僚统治坍塌的原因之一。匈牙利社会体系与政治体制中所发生的这种质的变化，与1956年后和卡达尔·亚诺什一起掌权的守旧派的老龄化过程是一致的。这些老人中的大多数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而被招募到官僚机构中的新人们，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依附于官僚位置所赋予的权力与恩惠。在1989年夏季，我们访问了布达佩斯共产党机构中的一位35岁的官员。我们问他：“如果共产党在下次选举中失利，您所工作的机构被裁减了，会对您造成什么影响？”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是个优秀的建筑师，在到这个部门工作之前，我从事的是建筑设计工作。实际上，我很愿意回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相对而言，做出上述回答的一些人——如布达佩斯共产党机构中主管住房和城市政策的那些

① 这里主要是基于霍沃斯·安格尼斯（Agnes Horvath）和斯扎科尔瑞·阿帕德（Arpad Szokolozay）（1989）的调查报告。他们对布达佩斯不同区域党组织中的200名所谓的“督导”（instructors）进行了调查。这些“督导”都是全职的国家干部，其工作是领导所在区域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中的党组织并对其提出建议。他们的调查数据显示，“督导”的构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现为原先主要由干部精英组成，到现在主要由专业人员构成。在这些督导中，年龄在45岁或45岁以上的，只有38%的人拥有大学学历；而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督导，则绝大部分（81%）拥有大学学历。在年老的督导中，有24%的人是非专业工作出身（原先从事的是体力工作），而在年轻的督导中，这一数字下降为4%。

社会学家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社会分层数据时，有一个系统性的发现：专业人员与干部精英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教育或文化资本在解释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性方面则处于上升状态。鲁道夫·安道卡（Rudolf Andorka）（1982）这位国际知名的匈牙利社会流动研究者指出，干部官僚与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陶马什·克洛什（Tamás Kolosi）（1984）反复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解释目前匈牙利所存在的不平等时，教育文凭是最为重要的变量。他还指出，文化资本这一变量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且与西方国家相比，它似乎显得更为重要。罗伯特·杰肯斯（Robert Jenkins）（1987）这位曾经对1982年匈牙利收入统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美国社会学家也发现，在预测收入分布方面，教育文凭这一变量在匈牙利的重要程度要甚于美国。

人——他们在保留自己的职位权力方面，较少有个人利害的考量。他们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这些工作或许并不能够为他们带来太多的官僚权力，却能够提供更好的收入和更多的专业自主性、伦理自主性以及政治自主性。因此，这些处于官僚权力位置的新主体具有更少的依附性；他们对于保留旧的等级秩序、父爱主义以及社会等级式的（estate-type）统治，相对而言兴趣较小。相反，他们更愿意尝试在市场和各个阶级的业绩竞争（meritocratic competition）中去检验自己的能力。

干部精英的资产阶级化。不过，自20世纪70年开始的干部精英的转型过程远远没有终结。不仅那些占据官僚权力位置的新主体发生了变化，那些主管各级机构的在职者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在职者已经变得高度资产阶级化了，他们的“惯习”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并与旧的文化资产者的“惯习”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或许，这也是新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不太可能复归的原因。

在好几个方面都逐渐发生了这种内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性的”）转换过程或者说资产阶级化过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匈牙利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的小资产阶级化，是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标志。与社会中的其他人群一样，匈牙利的干部也开始倾向于享用更多的高质量商品供应所带来的乐趣；他们喜欢购买其他消费品，享受来自私营商店与饭店的彬彬有礼的服务。匈牙利的干部精英还学会了去利用市场来为自己谋得好处。^①这方面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住房领域。从1980年开始，精英群体的成员们开始为自己（通常也是为其子女）建造坚固耐用的资产阶级住宅。这些建造于布达山（Buda hills）上或位于省会城市的颇有名气的郊野的别墅，甚至会令西方的专业人员感到嫉妒。这些别墅配有两个车库和两个浴室，用大理石、名贵木料和紫铜配件加以装修；经过装饰的花园草坪齐整，绿荫成行。这样的别墅，着实令居住于其中的新贵们体验到暴发户（nouveau riche）的味道（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儿保守）。此外，还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怀旧情绪，他们追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些别墅内部的装修显然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譬如，古董家具、瓷器、银器及从破落、年迈的旧中产阶级遗孀那里购得的绘画与家庭

^① 在更早的一篇论文中，塞勒尼和曼钦描述了精英“将官僚特权商品化”的能力（参见 Szelényi and Manchin, 1987）。汉基斯也有类似的观点（Hankiss, 1989）。

的各种老照片（令人感到突兀的是，甚至当教士的外祖父或在加尔文教当牧师的叔叔的照片，也被自豪地向参观者展示）、计算机、录像机，或者甚至是在西方旅游途中购置的传真机，都怡然地混杂在一起。

事实上，在精英惯习的变化过程中，有一个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不应该被低估，那就是他们与西方有着大量的和系统的接触。促使干部精英被知识阶层同化的一个重要力量，正在于他们与西方有着广泛的接触——譬如西方的生活方式、礼仪以及技术等。公派或私人到西方去旅行，成了一件普通的事情。一开始，人们到西方旅行还是以会议代表团的形式，作2~3天的访问；或者是以团体度假的形式，作1~2周的旅行。后来，这种短期的逗留渐渐延伸为长期停留，譬如，以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研究员（IREX fellows）、富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s）、商务代表及访问教授等形式，做长期的停留。这些干部精英的成员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学会了西方的语言，他们对在西方居住或与西方同事交流感到非常轻松。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意识到，他们具有可以在西方市场售卖的技能。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能够在大公司或大学中找到工作。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校长、领军的经济官员以及学者中的许多人，给其西方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与来自苏联、民主德国或先前来自匈牙利、波兰的旧的干部式学者非常不同。他们能够也敢于表达一些有趣的思想。与他们保持联系，不仅对学术政治是有益的，同时也是富有知识启发性和有利于社交的。

存在于“昏庸的干部”与“聪明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裂隙也正在消失。这种通过精英习惯的资产阶级化而得以实现的文化趋同，是改革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同时对今天那些在匈牙利社会中掌权的人来说，也是旧有的干部生存方式如此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阶级形成的局限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另类选择。官员和专业技术能力强的、受过较高教育的市民在人事与惯习方面“重归于好”，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甚至是一个新的阶级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但这一阶级的形成过程也具有诸多局限性；现在，我们要给出一些相反的论点。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既有类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差别。他们之间的裂隙虽然已经大大缩小，但却并未消失；而且，受过较高教育者的内部构成，即使不是派系林立，也是相当多元化的。

忧心忡忡的干部。尽管干部发生了全面的资产阶级化过程，而且他们与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市民重归于好，我们还是感到干部知识

阶层对于匈牙利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表现出极度的担忧。毫无疑问，设想一下，与20年甚或10年前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体会到的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感要少一些，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在进入一个有些陌生的新世界。与1968年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体制不同，卡达尔主义的一个主要诱人之处，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预期，提供一种父爱主义式的安全感。^①很多年以来，存在于郡县、企业和整个经济机构中的干部官僚所拥有的关系密切的网络，营造了一种忠诚、友好甚至是彼此袒护的氛围。甚至是学术干部与文化干部也深陷于这些网络之中。在某一个学术机构中，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现象：五六个人主持着整个委员会，他们编辑所有的期刊并将诱人的出国机会分配给每个人；大家排队等候进入科学院的资格，并耐心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像旧的斯大林主义官场中人那样，彼此在背地里暗中捣鬼。尽管他们彼此并不一定是相似的（尽管他们互称“朋友”，一起度假，一起进餐），但是他们还是从斯大林主义那里学会了很多东西，其中一点就是如果他们能够以协作的方式经营他们的事业且彼此不相互背叛，那么他们就能够共同受益，并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集体安全感。

现在，这种具有父爱主义色彩的职业生涯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甚至那些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官僚的职业生涯其实都受惠于党员资格。因此，尽管他们可能相当胜任工作，但却未必是最适合于他们目前所占据的岗位的人。面对未来，他们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焦虑；因为将来他们不得不在一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猫鼠竞赛（a merciless rat race）中与每一个人竞争。对于这种未来的竞争的前景，他们并不乐观。因为到时候他们的共产党员资格会成为一种脆弱的障碍，会引发人们对其道德、专业 and 学术水准的怀疑。总之，“老伙伴圈子”已经分崩离析。譬如，在一些学术或文化机构中，由于怀疑其前同事是否真的具有在这种竞争的学术或文化市场上获胜的机会，一些人已经开始去寻找新的出路和新的联盟。

可以看出，许多忧心忡忡的干部知识分子未必就是危险的反改革者。他们是一群困惑的人，一群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人。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回

^① 科尔奈（Kornai, 1980）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体制称为“父爱主义的”（paternalistic）。这当然是对匈牙利所处的卡达尔主义时代的特征的最具穿透力的归纳，它同时也适用于描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权力精英的心态。

到“过去的好日子”中去，他们十分看重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这种感觉，即能够说自己想说的话，或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更满意于作为自由的资产阶级（Bürgerliche）知识分子的新角色，而不是官员或国家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不过，他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内心依然充满焦虑，这也是正常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其内心一半是焦虑，一半是希望——在向我们讲述着复辟的危险性；他们更愿意将共产主义的坍塌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的掌权而不是匈牙利内部的发展；他们怀疑戈尔巴乔夫能否成功；他们不厌其烦地谈论军事专政（coup d'état）以及党卫军（the party militia）致力于通过暴力复辟斯大林主义的危险性。没有多少人真的想要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如果这些猜测真的发生了的话，很多人也许可以学习该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

在这些忧心忡忡的干部知识分子中，也不乏一些道义分子（moralizers）。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详尽阐述的，政治话语的变迁确实是巨大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多党制、议会民主、市场经济、再私有化以及放松管制，成为人们谈论未来的主要议题。不过，依然有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跟上这种快速变迁的步伐；而且，他们虽然对共产主义存续的可能性或前景持怀疑态度，但同样也发现，在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方面，他们很难比撒切尔主义更激进。

在这里，我们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旧的官僚或干部精英，确乎失去了其依照传统方式进行统治的能力与意愿，且已经被各种资产阶级化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软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未来的不可预测的你死我活的竞赛，表现出了高度的不安。他们虽然不会主动发起共产主义复辟，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在复辟的共产主义下生活不会那么艰难。

作为知识分子阶级权力替代物的企业家身份与专业化道路。从上述描述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在匈牙利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庞大而齐整的发动、领导或积极参与复辟的群体。这种复辟只可能来自外部。如果没有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动的話，当前匈牙利的精英群体在反击来自知识分子的严峻挑战的“战斗”中，正处于失利的状态。

不过，这些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权力呢？干部精英将如何成功地挽救自身的各种特权？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还不能给予清晰的解答。知识分子的阶级形成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干部精英试图甚或是成功地将自身转变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一状况的发生并非不可能。此外，知识分子中的专业化

阶层也很可能不是去从事本土化的阶级规划，而是选择在跨国公司为了吸引匈牙利人而提供的待遇优厚的专业岗位、管理岗位或工程师岗位上工作。这里，我们将对这两种知识分子可能选择的道路予以简略的推测。

两位匈牙利学者——艾勒梅·汉基斯（Elemér Hankiss）以及最近的厄吉贝特·萨莱伊（Erzsebet Szalai）都认为，干部精英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或许会将自己转换为一个有产阶级（用汉基斯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大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89年晚春的一次匈牙利议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部法律，该法律规定：允许进行“国有产权的转换”；可以通过创建联合股份公司而将国有企业再私有化；企业的雇员也被蛊惑着去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尽管法律文本并没有区分管理者与企业的其他雇员，一些评论者还是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将国有财产转移给经理们的方式。1949年，匈牙利的工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国有化（etatization）了。在其中的某一天，有1000个人被邀请到会议上并被告知他们以前工作过的企业刚刚被国有化，他们现在被任命为国有企业的经理。我的一位朋友认为，不能排除这种类似的再私有化策略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某一天，1000个最大企业的经理被召集到一个会议上，并被告知从今天开始，他们成了这些企业的私人所有者，人们又将作何反应呢？

设想这种场景的发生并不是荒唐的。事实上，在当前的匈牙利社会与经济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改革者正在拼命地寻找明确的所有者。（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一位波兰经济学家半开玩笑地建议，应该将国有企业的股票通过国家彩票的形式分配到私人手中。）有理由去假设，旧的精英会努力地将其手上的旧特权转化为各种新特权。当然，他们已经向人们证明，他们是有能力这样做的；并且，基于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威地位，他们的尝试很可能会获得成功。

但是，我们发现汉基斯和萨莱伊所构想的图景有点儿冒进。经验证据表明，官僚特权的商品化过程是比较适度的；它更多地带有小资产阶级化而非大资产阶级化的特征。这里的证据是什么呢？当然，干部精英确实将一些先前被国有化的住房，以很高的补贴价格再私有化为自己的住房。就其所拥有的别墅、豪华公寓以及古董家具来说，他们至少已经积累了数百万福林或数十万美元的家庭财富。尤为重要的是，一些证据表明，干部精英会将其子女安置在企业或私营单位，并劝告他们不要从政。不过，许多干部子女甚至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就选择了经商。通过对匈牙利中央统计局1983年的社会流动调查数据

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三代人流动的不同模式。我们的数据似乎显示，在那些于1945~1965年间成为第一代专业人员的家庭中，出现了相当程度上的从专业阶级向其他阶级的转换现象：在这些人的子女中，只有约一半的人完成了大学学业。有趣的是，不仅那些已经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其子女中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是比较高的，因此他们的第三代也成了专业人员），而且在那些于1945~1965年间成为下层阶级（déclassé）的家庭当中，其子女成为大学生的比例也很高。这些下层阶级的子女，出生于文化资产者家庭，却没有机会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年代上大学；但出身于第一代干部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完成了大学学业。此外，尽管我们不能从统计上确认这些第一代干部的子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估计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经商，或许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甚至是最为保守的前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斯·卡罗伊（Károly Grósz）^①的孩子，现在也就职于一家私营的西方企业；此外，很多干部子女还拥有自己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业公司。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一过程基本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化的特征。利用其父母官位的优势，这些干部子女能够更容易地从当局获得各种许可证；他们在申请银行信贷等方面也具有优势。不过，他们目前仍然一般是小公司和小饭店的老板，或更多地成了外资企业的中层主管而不是高管。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更像是英国或法国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洛克菲勒家族或格蒂家族（Gettys）。换言之，在共产主义之后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尽管有一些干部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知识阶层的队伍，但他们更多地成了中小型企业老板，其个人财富和政治影响力是相对有限的。

因此，大型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中专业化的或专家性质的工作，对于许多干部或国家知识分子而言，是更具吸引力的位置。事实上，诸如高科技、信息产业、计算机、生物技术、软件生产、咨询以及其他大量的“雅皮士”工作，似乎对干部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诱使他们远离知识分子阶级的规划，成为大资产阶级中的新人。大的企业可能被吸引到中欧投资；对联邦德国、法国、瑞士或意大利的资本而言，匈牙利或波兰或许是比韩国或中国台湾更好的投资地点。这将为当地人创造诸多工作岗位；他们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人际网络以

^① 在卡达尔下台后，格罗斯·卡罗伊（1930-1996）担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后一任总书记（1988-1989）和部长会议主席（1987-1988）。——译者注

及充裕的技术知识，对西方雇主而言极具价值。当然，这些当地人不会成为大资产阶级。他们中的一些成功者，或许会成为次要的合伙人，先从不起眼的小角色干起，逐渐成为相对有地位的主管。这一精英群体的规模特别是他们相对于西方雇主的自主程度，则取决于中欧市场对于西方大资本的吸引力，以及中欧是否具备了较东南亚或拉丁美洲更能够吸引西方投资的各种条件。

阶级形成的局限：知识阶层内部的年龄与专业分化。在上文的三个小节中，我们考察了干部精英被同化到知识分子阶级的各种可能性与局限性，考量了其子女进入知识分子阶级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不过，知识分子本身是相当多元化的，且其内部充满了分化。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当前的政治繁荣中获得了好处，另一些人则落后于时代。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对知识分子阶级形成的前景感到乐观。

我们注意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依照代际差异与职业差异，形成了各种阵营。这些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新阶级的形成形成障碍。

作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先锋，出现了由年轻的新知识分子所发动的变革运动；这一新现象的出现是令人兴奋的。今天，匈牙利最激进和最引人注意的反对运动组织，当属民主青年协会（FIDESZ）。民主青年协会是一个年轻的组织，它在1990年的国民选举中赢得了将近10%的群众选票。该组织的主体由年轻男性（和很少的女性）组成，其成员多数年龄在30岁以下；现在，他们成了拥有巨大权力和权威的人（缩写为MPs）。年轻一代同样成为其他政治运动的主体，譬如自由民主者联盟（SZDSZ）以及匈牙利民主论坛（MDF），后者目前是正在执政的中-右联合政府中最大的党派。年轻人甚至成为共产党员中的主体。这种状况与1945~1949年的情形极为相似，当时很多人在20多岁或30岁出头就突然成为政府部委的领导、大学教授或科学院的成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非常年轻而且没有在任何方面与旧体制妥协。

今天所发生的事情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浮现出来。他们与本地人说着一样的新语言，以黑马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于那些丑闻缠身的旧竞争者来说，他们成了争夺议会席位、政府机构负责人和学术职位的强有力的对手。那些多年来远离政治的老专业人员，一直期待着能够最终因为政治上的中立和专业胜任而获得回报；现在，面对这些超越他们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或许会感到特别不舒服。知识分子中的这一部分年轻同仁不仅对现有的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新氛围颇为得心应手，而且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先前

的那些在政治上中立的技术专家；他们认为，由于这些人以前保持着沉默或缺乏公开的抗争，因此他们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合作者。

在知识阶层内部，还存在着一种职业的分化，或许会威胁到这种新阶级规划的实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专业技术知识分子似乎成为与官僚分享权力的最具威胁的候选人；但是，随着最近局势的发展，人文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风头人物。历史学家、诗人以及小说家在匈牙利民主论坛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自由民主者联盟则是一个由特殊人才构成的俱乐部，其成员主要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以及法理学家等。因此，自由民主者联盟即使算不上一个政治党派，也称得上是一个国家社会科学院（它拥有的社会科学人才或许超过了匈牙利科学院）。在新的匈牙利议会中，大约有90%的议员拥有大学学位，半数以上的议员拥有“博士”头衔。社会科学家、人文知识分子会与技术知识分子结成联盟吗？或者，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会带着恼怒的情绪，掉头追随具有技术能力的干部精英，在国外或者匈牙利的外资企业中寻找工作，而将（在他们看来是）琐碎的和并不重要的政治事务留给那些书呆子（eggheads）？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有一点古尔德纳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这一新阶级形成的关键在于，技术知识阶层和人文知识阶层（他是如此称呼的）能否成功地实现联合。

（二）意识问题：批判性话语文化的胜利

现在，让我们转向阶级形成的第二个维度：是否有迹象表明，上述所描述的这些主体，正在发展出一种足够充分的、追求阶级权力的意识？无疑，在迈向共产主义的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关于话语的变化。知识阶层将自己的话语即批判性话语文化施加到官僚机构上，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共产党官僚统治是以特定的话语为特征的。这种干部话语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清楚地界定了政治与知识议程的边界。这种话语拒绝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因为这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官僚统治性质的质疑。关于这种话语的具体特征尚需要更为仔细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只能对其中的一些特征予以简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话语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旨归的，但它也允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予以探讨，无论这种探讨合适与否、正确与否。在后斯大林时代，官僚们还允许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义——的存在。甚至是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也能够被官僚所接受。

这种干部话语体系的运作，其前提一般是将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个好的社会（尽管它确实也允许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丑恶现象进行讨论），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终将被取代的社会体制。尽管如此，一党体制的现实却是毋庸置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种话语开始为市场观念正名，尽管只是容许人们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还认为，财产权的国有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地下文学（samizdat）、各种另类的思想者（在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的异见分子称自己为“máskéntgondolkodók”，即想法与众不同的人）以及地下出版物的出现，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他们逐渐形成了对这一干部话语的颠覆并创造出一种新的话语，从而为政治改革设定了一个全新的议程。

20世纪80年代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关于话语之战的伟大年代；正是在这一话语之战中，干部精英遭遇了丢脸的滑铁卢。今天，要是谁还试图说着旧的话语，他就会令人感到尴尬。话语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它在法国、英国或美国大学中都具有很好的合法性地位——不再被匈牙利听众所尊敬，他们甚至都不想听到这样的话语。

在描述这一新的话语方面，古尔德纳的术语“批判性话语文化”提供了很多洞见。事实上，人们对官方发言人发表的各种机构或权威部门的宣称，保持着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或者是高度的不信任。该现象所引发的一个有趣的效应是西方学术权威或学究权威正面临着挑战。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有两个不同的研究者宣称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治愈癌症的药物。但对学术机构或医药工业管理部门所做出的“这两种药物都无疗效”的报告，受过教育的公众都表示出极端的不信任。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布这些报告的是官方机构——一位是匈牙利科学院的前主席，另一位是著名的医药研究者；面对各种漫无边际的批判性想象，任何一套官方程序——在本案例中是被医药产业所使用的检测程序——总是会遭到人们的怀疑。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每一周都会出现新的关于如何组织经济、如何运行医疗制度，如何建造大学，如何组织文化的各种蓝图：匈牙利或波兰正处于一个批判思想满天飞的时代。似乎通过思想试验，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批判思想的力量似乎没有止境。

吊诡的是，这种对批判思想的几乎是无条件的迷信——认为批判思想能够通过思想、蓝图以及各种模式建构而改变现实——也限制了这种批判思维的批

判性。此外，在这种批判思维中，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将问题道德化的特质。而指出各种变化所存在的局限性的平实的经验主义，反倒可能被认为是危险的甚至是非道德的。古尔德纳也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存在于批判性话语文化中的道德化趋势。不过，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些保守思想家——如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埃尔文·克瑞斯托夫（Irvin Kristol）——也对知识分子的权力渴望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批判性话语文化的言说者是在实施一种不同寻常的“伦理恐怖”（ethical terror）。因此，在关于越南战争的争论中，保守主义者常常会牢骚满腹，声称他们不能够实践一种真正的理性话语；因为批判知识分子会基于道义的立场，反对任何论证美国卷入东南亚政治必要性的话语。这些保守主义者或许指出了批判性话语文化中所存在的一种有趣的特征，值得我们予以更详尽的探究。

我们在这里将要做出的评论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无论这种批判性话语文化的批判性色彩或道德化色彩如何，这一文化的言说者，最终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共产党官僚权威突然坍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或许正是由于干部精英的失语。现在，干部精英不得不使用来自知识阶层的各种术语，来进行一场反对批判的知识阶层的战争。

一般说来，共产主义的崩溃与其经济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反驳我们的上述观点；他们认为，这种话语的变化不过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而已。我们也认为，批判的知识阶层之所以取得对干部精英的话语胜利，与经济危机以及精英无力有效地治理社会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福柯的话，即危机本身并非完全处于话语之外。话语不仅反映着潜在的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危机。

（三）新的结构性位置：政治官僚，或者作为官僚与新资产阶级之间的裁判或调停者的知识分子

阶级形成的第三个标准与主体所处的位置有关；这些主体只有具备了充足的阶级意识，才能够成为实施集体行动的主体。分析者只有在确认这些主体占据了能够行使阶级权力的位置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关于阶级形成的谨慎判断。

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我们相信，我们在再分配经济制度中，发现了这样一种行使阶级权力的位置。在该书中，我们的观点是：在中央集权主义经济中，再分配者所处的位置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产所

有者所处的位置是相似的。再分配者和财产所有者都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抽取剩余价值，都将这种剩余进行配置，目的是以一种拓展的方式将存在于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不对等的经济关系再生产出来。成功的资本家变得更加富有，雇用更多的工人，并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成功的再分配者，则扩大国家预算并使得生产者更多地依赖国家补贴和福利生活。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试图将利润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生产的规律是将再分配权力最大化。现在，我们倾向于认同以下的观点，即作为技术官僚的知识阶层所进行的将社会主义经济理性化，从而创建计划一再分配者的阶级权力的规划，或许失败了。

塞勒尼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对我们的这本书进行了自我批评（Szelényi, 1986 - 1987）。在这一自我批评的文章中，我们承认，我们确实没有预见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表现得极明显的两个过程。首先，在 1974 年，尽管我们观察到统治集团发起了针对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反攻，却没有预见到这种反攻会持续整整一个时代。此外，干部精英要比我们所预想的更加顽固。他们不惜冒着失去自身地位的代价，去阻挠社会主义理性化改革的实施。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少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阶层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共产主义改革前景的信心，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与干部精英进行妥协的兴趣。其次，种种迹象显示，干部精英在顽固地抵制与知识阶层进行妥协的同时，对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小规模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更为开放的心态；这一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目的是避免与知识分子进行更大的妥协；而为了避免与知识阶层分享政治权力，干部精英在经济领域中开辟了供私营企业发展的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选择的是一种“西班牙道路”，^① 力图将一党体制与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结合起来。

① 1989 - 1990 年间，“西班牙道路”（Spanish Road）这一术语在匈牙利和波兰变得颇为流行。在最近的一些争论中，“西班牙道路”意味着一种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可能；具体而言，指的是佛朗哥（Franco）之后一段时间里西班牙的发展道路。在自我批评中，我们更多地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使用“西班牙道路”这一术语。该道路的主要特点在于，在佛朗哥主义的最后十年里，佛朗哥主义者把持的党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种自由主义政策，其目的是延续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有迹象显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无论是后卡达尔主义官僚统治还是雅鲁泽尔斯基的官僚统治，都一样处于衰落中。尤其是在卡达尔主义下的匈牙利，共产党对小型的私营企业表现出了高度的容忍，只要它们的发展不至于干预到政治；但对批判的知识阶层，共产党则表现得相当强硬。

事实上，所有这些发生于1975~1985年间的情况，都是我们所未曾预料到的。不过，就1988年年中匈牙利所发生的事实来看，干部精英的这一策略并未奏效。它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几乎是在突然之间知识阶层就从这种斗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浮现出来。显然，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正在出现的小资产阶级化过程——尽管干部精英发动这一过程的初衷，本是为了阻止知识阶层与其争夺权力。

首先，共产党官僚关于西班牙道路的构想，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历史已经证明，市场体制的发展，尤其是用来拯救集权主义经济这只正在沉没的大船的充分发育的市场体制，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与政治改革的支持，最终会走向失败。共产党官僚精英如果在政治和法律前沿无所作为的话，最终会损害到已经有所发展的小规模市场体制。这加深了经济危机，并引发了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危机；这些危机，正是从1989年中期开始在政治上取得突破。

知识分子不仅在强迫干部精英推进政治和法律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改革的力度要超出其所致力于的任何经济改革的力度，而且还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同时积累着的优势。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知识阶层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角色或者说一个位置，这种角色或位置更适合于它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本质：这种角色，就是“相信目的论的规划者”（teleological planner）。正如我们在《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看到的那样，知识分子要想围绕再分配者的位置形成一个阶级的话，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阶级不得不经历一定程度的官僚化过程。在该书中，我们将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双重过程：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将取决于两个过程，也就是官僚的知识分子化过程，以及知识分子的官僚化过程。

在当前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似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官僚化的角色。他们将不会形成一个围绕再分配权力的阶级，而是作为政治官僚（politocracy）或中介者（mediacracy）行使着自身的权力。

随着人们认可和接纳后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双重性，这种新的社会层面正在形成。共产主义是一个只有一个主人（我们称之为官僚统治集团）的社会，^①后共产主义社会则存在着两个主人。在后共产主义体制下，国家官僚精

^① 主人（master）这一术语的使用，应归功于马克思·罗迈德（Max Nomad），他以一种幽默的语气将知识分子这一新阶级描绘为“新主人”。

英不得不学会如何如何去与正在浮现出来的有产阶级共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还不得不学会如何与之竞争。知识阶层在一夜之间为自己开辟了民主政治的空间，它通过对话语的垄断支配着这一领域，并为当前特别是今后的政治设定议程。知识阶层发现这一多元化的、扩大了的政治空间是如此惬意，他们开始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在两个主人之间周旋，用一个主人去反对另一个主人，并通过政治民主的各种机制对二者进行控制，从而使自己成为位居二者之上的“超级主人”（super-master）——游戏的庄家和裁判。

官僚统治集团要显得更为顽固，也不如我们预计的那样有智慧，知识分子则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加聪明一些。后者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懂得去利用干部精英所颁布的各种制度和设计的各种机制；而这些制度与机制颁布的初衷，本是用以提升干部精英自身的地位并牵制知识分子的。此外，知识分子还为自己在社会结构中创造了一个更适合于自身性质的位置。

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第一阶段，知识分子主要是确立了自己作为中介者的地位。在今天的匈牙利，大约有500家出版社，人们在书报上的花销很大。在对核心问题进行界定方面，大众传媒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媒体曾经挫败了政府的好几项计划，如在多瑙河上修建大坝的计划，引入关于高速公路收税的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知识分子也在媒体中扮演着一个非同一般的显著角色。譬如，每天晚上，第二频道（在匈牙利只有两个电视频道）的晚间播出，都以类似的研讨节目结束：比如，2~4个社会科学家会就诸如新精英的形成、再私有化背后的策略与哲学、匈牙利电影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展开探讨。这种节目常常持续40~45分钟，这对美国的晚间电视节目观众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不过，这一中介者已经为扮演政治官僚的角色做好了准备。实际上，电视辩论被证明是选举运动的预演。成千上万的人在收看这些节目，就像成千上万的人观看美国的世界拳击比赛；在匈牙利，国会议员、参议员、政府各个部委的领导以及大使，则是取得胜利的拳击手。这些节目并不仅仅是作秀，而且还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新的总理、反对党的总理以及外交部部长等位置全都被历史学家所占据。一个新的精英群体正在形成，但我们认为它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大资产阶级。这一新的精英群体的成员来自与我们一样的社会阶层，那些最能够熟练地运用批判性话语文化的人将最有可能爬到顶层。

如果人们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的话，它们的发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

竟，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精英；如果官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话，谁又能够扮演这一新精英的角色呢？无疑，知识阶层是唯一值得考虑的候选人。

三 一个新时代的转型期？

这里，我们希望对三种可能的前景予以讨论：官僚的复辟、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的阶级权力。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最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权力规划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知识分子形成一个实现自身再生产的阶级，这一情形是否不可想象？或者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个破坏者，他们善于破坏一个旧的权威体系，却拙于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所扮演的是否仅仅是一种中介者的角色，还是他们将把自己的权力让渡给其他的新统治阶级？这一后共产主义阶段的确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抑或不过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替代这一阶段的，将是共产主义秩序的复辟，还是迈向资产阶级统治的转型？

尽管并没有很多有力的证据去支持我们的分析，我们基本上还是基于事实，试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面临着一个危险的任务，那就是：我们不得不探究未来的图景。我们将简要地、尽可能谨慎地完成这一冒险的历程。

我们感觉，最不可能发生的前景是共产主义的复辟；更可能发生的，是向某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转换。这些国家可能会加入欧洲的阵营；而更大的一种可能，则是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的怀抱——如果幸运的话，将是半边缘，且伴随着知识分子阶级权力的稳定化——总之，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而后一种可能发生的概率会更大。

尽管在社会科学家的词典中不存在“不可能”这样的词语，我们还是认为，在匈牙利，共产主义的复辟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如我们以前所解释的那样，官僚统治集团已经失去了统治的能力与愿望。它已经被同化到知识阶层，且在惯习和生活方式上已经表现出资产阶级化的各种特征。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哪一种国内力量能够形成一种真正的复辟威胁。当然，如果苏联发生了戏剧性的保守主义转向的话，那么，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迈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缓，我们认为匈牙利和波兰不会回到先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中去。谁将会是在复辟过程中具

有真正利益的在社会学上可以辨认的主体？可以保证一个可行制度的可靠的经济和社会蓝图又在哪里？

第二种可能，是向某一类型的资产阶级统治转型。正如汉基斯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图景中将出现一个新的大资产阶级，以及某种类似第三世界的依附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资产阶级将来自国外，本土的社会结构则依旧主要由无产阶级构成。这种前景是可能的，却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本土的资产阶级还太弱小，他们还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新精英群体。汉基斯曾经构想过这样一种前景，即干部精英会变成洛克菲勒式的人物；我们则认为，很难发生这种变化。我们还认为，不大可能发生这样的政治过程——允许将国家财富再分配到数十万私有财产所有者手中。那些处于非管理者位置的干部精英（即并非大型国有企业经理的党内、国家机构及文化机构中的官员），没有理由会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干部精英中的少数人成了百万富翁，而大多数人则依然是身无分文。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认为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在官僚和资产阶级之间，将产生一种新的均衡（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弱小，尽管其中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很可能发展很快，并与西方或跨国的大型企业合作）。在这一官僚结构与资产阶级结构的联合中，知识阶层或许会保持其主导性地位，并继续扮演着周旋者（play-master）或超级主人的角色。毕竟，这一过程将与传统中欧的经验有类似之处：在中欧，文化资产者保持着对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或许，中欧资产阶级化（Verbürgerlichung）的辩证法会按照其在现代历史上已经展开的方式继续上演。

刘建洲 译 何梅清 校

参考文献

Andorka, Rudolf. 1982.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in Hungary*. Budapest: Gondolat Kiado.

Gouldner, Alvin. 1979. *The Futur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nkiss, Elemér. 1989.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chap. 9. Budapest: Kozgazdasagi es Jogi Kiado.

Horvath, Agnes and Arpad Szokolczay. 1989. *Senkiföldje—Or No-Man's Land*.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o.

Jenkins, Robert. 1987.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State Socialist Division of Labor: Earnings Determination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Juhasz, Pal. 1983.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s in the Cooperatives." *Medvetanc* 1.

Kolosi, Tamás. 1984. *Stratified Society*. Budapest; Kossuth Kiado.

Konrád, George and Iva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ornai, Janos.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Kovach, Imre. 1988. *Producers and Entrepreneurs*. Budapest; Tarsadalomtudományi Intezet, pp. 7 - 28.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5.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anuscript of 1844." *Collected Works*, 3; 229 - 34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9.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Collected Works*, vol. 1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Szelényi, Ivan. 1986 - 1987. "The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 Project." *Politics and Society* 7; 103 - 144.

Szelényi, Ivan and George Konrád.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zelényi, Ivan and Robert Manchin. 1987. "Social Policy and State Socialism." In G. Esping-Anderson, L. Rainwater, and M. Rain (eds.), *Renewal in Social Policy*, pp. 102 - 139. White Plains; Shar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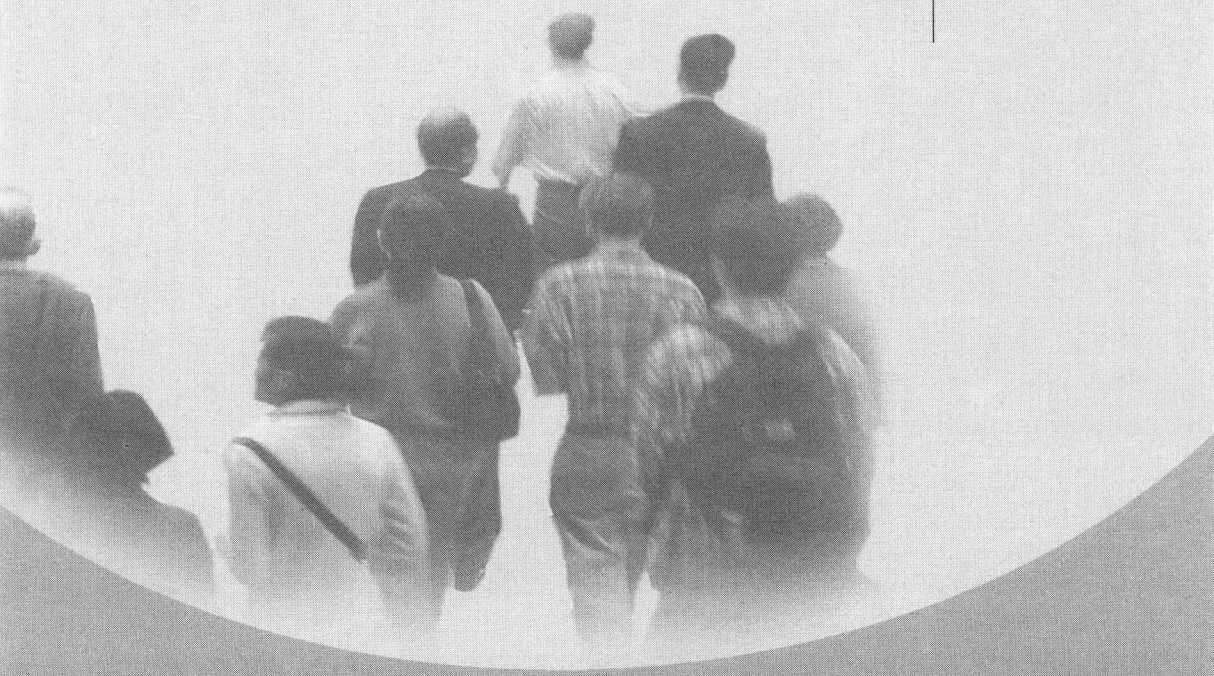
Szelényi, Ivan and B. Martin. 1988 - 1989. "The Three Waves of New Class Theories." *Theory and Society* 17.

Szucs, Jenó. 1983. "Th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 *Acta Historica*, nos. 2 - 4.

DISCIBLIAN

第三编

国家社会主义之后



社会主义为何失败： 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分析*

伊万·塞勒尼、巴拉日·塞勒尼

1942年，熊彼特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①该书写作于大萧条的阴影之下，受到了盟军有望胜利的启发和鼓舞。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构造了法西斯主义之后战后重建时代的前景，并阐述了关于重建的各种需要。当讨论20世纪第二个50年的发展时，熊彼特在该书中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并给出了两个引发争议的答案：“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不能。”^②“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当然能。”

在我们看来，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与曼海姆的《重建时期的人与社会》^③以及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④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熊彼特、曼海姆和波兰尼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和兴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伴随着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终点；

* 原文发表于《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1994年第23辑。

①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Cox & Wyman LTD, [1943] 1976). 该书完成于1942年——第一版序言的署名日期是1942年——尽管在1943年，它才在伦敦由Allen and Unwin首次出版。本文中标注的页码等信息，来自1976年的版本。

② *ibid.*, p. 61.

③ 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and Brace, 1940).

④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2] 1957).

他们都对谋划西方社会的战后重建蓝图充满了兴趣。^① 他们都认为，重建必须是创新性的，必须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它既不能是我们过去所知晓的资本主义，也不能是左翼或右翼版本的极权主义。他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展望了与 20 世纪 50 ~ 70 年代最终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类似的前景，而从各项客观的测量指标来说，这些都被证明是资本主义最为成功的时期。

一 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我们的出发点：重访熊彼特

考虑到 1989 ~ 1990 年间所发生的世界性历史事件，熊彼特关于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将崩溃的预言及其关于社会主义能够运转良好的预测，必须受到批判性的审视。这正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过，我们的审视并非建立在 1989 ~ 1990 年间所获得的事实或假想性的智慧的基础上，而是以熊彼特本人的论述为基础。在“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这一章中，熊彼特声称自己提供了一份“关于社会主义秩序将有望获得经济成功的各项条件的问题”的调查。^② 他指出，“爱憎的价值取向已经……影响到关于这一问题的严肃研究”，这也为其理论冒险提供了正当性：因为作为一名非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位非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认为自己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上从而能够做出客观的分析。

我们的目的是将熊彼特的分析运用到对中东欧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建事件的分析上，正是这些事件导致了共产体制的崩溃。我们试图不带“爱与恨”这样的感情色彩进行分析，并通过重新阐述熊彼特的问题、基于过去十年中的发展来审视这一问题。我们分析的目的，不是去探讨“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而是去审视“为什么社会主义失败了”这一问题。虽然乍看起来，这似乎严重偏离了熊彼特的出发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并不拒绝熊彼特的观点，而是采用其方法论来分析我们自己的现实。当熊彼特以肯定的态度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也许能行得通。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提出“为什么社会主义失败了”这一问题时，我们并不接受今天的普遍假设，即认为因为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它注定会失败。本文的主旨是：社会主义体制的

① 虽然熊彼特确实因为大萧条而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焦虑，但人们不应该对此过于夸大。在一些写作于大萧条之前的文章中，他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官僚化的趋势和企业家精神的下降及其最终衰落趋势。我们感谢理查德·埃斯克萊夫特（Richard Aschcraft）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

② Schumpeter, *Capitalism*, 410.

崩溃并非不可避免；在不同的历史拐点，社会主义也许能够存活下去。社会主义的崩溃，不应该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对此需要进行严肃的分析，而只有不带感情色彩的分析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熊彼特觉得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声明，即他并不是在“鼓吹社会主义”。在本文中，我们既不鼓吹社会主义，也不鼓吹资本主义。我们的基本假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的独特产物，而不是普世的“制度类型”。^①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使一种制度运转而使另一种制度失败的铁律。它们的成功或失败，只能通过对它们成功或失败的“社会环境状态”和“历史情境”的严格分析才能够得到理解。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为发起这样的研究规划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其间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的凄惨的失败”——不仅是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有许多甚至是社会民主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是再明显不过了；所谓“最终的胜利”乃至“历史的终结”，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案似乎是多余的。本文余下的部分，将致力于阐明为什么我们认为这种探究是一种有价值的历险。

二 社会主义曾经是行得通的吗？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肯定。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从过去在经济、政治和道德上蒸蒸日上的状态，进入一种螺旋般下降的破坏性状态。最后少数几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信徒试图争辩说这种蜕变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却不这样认为，尤其是如果我们希望从分析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话。虽然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并不是社会主义理想型的完美体现，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都曾严肃地试图落实其“奠基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规划。

尽管我们承认在20世纪80年代停止运转并崩溃的确乎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我们并不满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因为“不管用和行不通”从而必定失败这样的结论。^②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结论不仅带有决定论的色彩，同时也带有历史主义的色彩。

^① Schumpeter, *Capitalism*, 167.

^② Nigel Swain, *Hungary — The Rise and Fall of Feasible Socialism* (New York: Verso, 1992), 53.

李普赛特 (Lipset) 和本茨 (Bence) 在本辑的《理论与社会》中, 令人信服地证明: 在 1989 年苏联式社会主义倒台之前,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们引用了亚当·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的话: (未能预测到) “‘人民共和国之秋’ (1989 年的崩溃) 是政治学的一次惨痛的失败。”^①

1989 年之后,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试图从相反的方向犯下同样的错误。受早期社会主义批评者的启发——譬如, 路德维希·冯·密塞斯 (Ludwig von Mises) 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就认为,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从来就不应该诞生,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②——当前学界的主导观点宣称, 社会主义的崩溃在经济上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 尤其是后共产主义政客和经济政策专家、“波兰的哈耶克们”和“布达佩斯的芝加哥小子们”^③ 则走得更远, 他们声称: 社会主义从未管用过。这一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注定失败的经济理论, 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 伴随着黄昏到来。

其他经济学家如亚诺什·科尔奈 (Janos Kornai), 则更接近制度主义的分析, 他们确实承认社会主义的短期有效性。但是, 他们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像科尔奈一样, 质疑这种体制是否能够永久地存活下去。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至多存在了 70 年, 这就证明了“相对于成功地维系了数百年生存的社会经济体制 (譬如市场资本主义) 而言, 社会主义是相对短命的”^④。我们的主要前提假设, 则是对这种制度主义分析的拓展。

我们相信, 社会主义的崩溃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它必须得到解释。我们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①人们可以有效地证明社会主义确实管用过, 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对自身进行再生产的系统。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是什么不管用这一点尚不清晰: 其危机的根基是体制的合法性还是经济上的失败? 其失败是由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经济因素抑或军事因素导致的? ③就社会主义经济而言, 至少有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

①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

② Erich W. Streissler, “What kind of economic liberalism may we expect in Eastern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5 (1991): 197.

③ Janos Matyas Kovacs, “From reformation to transforma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5 (1991): 42.

④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77–378.

济政策的运转看上去并不比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差，那就是中国。

（一）社会主义最初似乎是行得通的

让我们从比较的角度用数据来展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绩效。我们这么做有点儿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所展示的数据是众所周知的和琐屑的。不过，在面对诸如“对共产体制和非共产体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类似阶段的比较显示……与其可供比较的竞争对手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政权提升了其地位”^①这样率直的宣称时，我们所做的这一琐事，也许会变得富有洞察力甚至是具有启发意义。

有证据显示——部分证据是非常“过硬”的，部分证据则或许仅仅是“统计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其最初阶段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社会主义体制确实是管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处于欧洲的边缘或半边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20 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开始缩小其与欧洲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

让我们用最“过硬”的证据，也就是明显可以相信的数据来说明这一点：譬如，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东欧国家位居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列。在后来加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甚至最“西化”的捷克斯洛伐克也至多处于欧洲的“半边缘”。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可以在欧洲大陆上发现明显的平等化趋势。在过去的 20 年里，东欧和西欧的差距维持着不变的水平并再次开始拉大。

譬如，在 1948 年，匈牙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58.7 岁，同时期，法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是 61.9 岁。两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差 3.2 岁。到 20 世纪 60 年代，匈牙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65.2 岁，而法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是 68.0 岁，两者的差距缩小到 2.8 岁。1947 年，匈牙利男性平均比奥地利男性少活 3.2 年，而到了 60 年代，奥地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比匈牙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多 0.4 年。

捷克斯洛伐克在 1930 年和 1947 年都落后于奥地利，但是到了 1960 年，其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奥地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更长。在 1930 年和 1947 年，捷克斯洛伐克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较奥地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少 2.6 和 1 年，而到了 1960 年，捷克斯洛伐克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却要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236.

比奥地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多 1.9 年。

被考察的东欧国家原先越落后，它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越惊人。1930 年，保加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同龄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少 10 年。到 1960 年时，保加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奥地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更长，且可能与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当。

不过，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趋势开始发生变化。在一些东欧国家，譬如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出现了下降；在其他国家，虽然并没有发生绝对值的恶化，但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又开始扩大。譬如，1984 年时匈牙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奥地利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少 4.6 年；而在 70 年代，匈牙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与奥地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差不到 1 年。^①

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数据所揭示出来的图景，与我们刚才在平均预期寿命中的发现是一致的。譬如，在匈牙利，每 1000 名新生儿中就有 115.6 名婴儿死亡；到 1959 年，这一数字下降为 52.4，1968 年是 35.7，1989 年则是 15.7。^② 总之，无论用什么标准进行比较，这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更“软”一点的数据，即关于经济增长的数据。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个十年，东欧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 20 世纪 50 ~ 70 年代，人们的居住条件^③和高等学校入学人数^④都有

① 关于预期寿命的数据，请参见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The United Nations, 1948, 1961, 1965, 1979, 1986, 1988/89)。

② *Statistikai Evkonyv, 1989,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9* (Budapest, 1990)。

③ 在进入共产主义体制之前，匈牙利的住宅建设处于中等水平。在 1935 年，匈牙利只建设了 23350 套公寓。在社会主义早期，住房建设仍然是一个被忽略的部门。在 1950 年，匈牙利只建设了 35034 套公寓。从 1960 年以来，住房建设逐步变得越来越具有活力：1960 年匈牙利建设了 58059 套住房；20 世纪 70 年代是住房建设的爆炸式增长期：在十年的时间里，年平均建房数都在 8 万套以上，而在 1975 年，这一数据则达到了顶峰，为 10 万套，参见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9* (Budapest: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4。在社会主义时期，住房质量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譬如，在 1949 年，70% 的住房是一居室，不到 5% 的住房是三居室或以上；到 1989 年，这一数字分别为 19% 和 33%。就在同一时段里，带卫生间的住房的比例由 10% 上升到 75%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9*, 27)。有意思的是，住房建设在 1992 年回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住房建设量的下降始于 70 年代。到 1989 年时，建设量下降到 51000 套/年，随着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住房建设出现了衰退。

④ 1938 年底，匈牙利有 12000 人上过大学或学院。到 1950 年时，这一数字增长到 33000 人/年，1965 年时是 94000 人/年，在 1976 年达到顶峰，为 111000 人，从那以后，逐渐下降到 100000 人/年以下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9*, 19)。

了显著的增长。个人消费也得到了增长，在一段时间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和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似乎正在缩小，或者至少是保持不变。众所周知，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通信是出了名的低效；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东欧各国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落在西欧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后面。譬如，1937年奥地利在用电话数几乎是匈牙利的两倍；直到70年代，匈牙利的电话数量才达到了同样的比例。捷克斯洛伐克在1937年落在奥地利的后面，但到1970年，它却走在了前面——至少就电话的绝对数量而言。不过，在1970年之后，这一情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虽然东欧国家仍然是在增长的道路上前进，但是它们已经开始快速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

迄今为止，我们所展示的经济增长的测量数据都是不易造假的数据，如建造的住房单元数、大学录取人数、在用电话数等。或许，有人会指出这些数据在质量上存在着差异，但是至少从这些测量指标的数量方面来看，在20年的时间里，直到20世纪70年代，很难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是失败的。更多关于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数据——尽管它们在统计上也更容易造假，尤其是在一个非民主的政府的管理下——也揭示了与上述发现相一致的趋势（见表1和表2）

表1 工业总产指数（1958年 = 100）

国家	1938年	1948年	1953年	1961年	1964年
奥地利	39	36	66	123	146
保加利亚	11	22	55	153	208
苏联	31	44	64	135	148
法国	53	54	71	115	136
民主德国	38	27	66	129	150
联邦德国	53	27	66	127	149
匈牙利	28	38	84	138	171
西班牙	—	—	—	120	169
芬兰	44	58	76	136	161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6。

表2 工业总产值指数 (1970年=100; 1980年=100)

国家	1960年	1968年	1972年	1975年	1988/1980年
奥地利	58	83	114	118	116
保加利亚	34	83	119	154	141
苏联	56	88	114	138	124
法国	59	85	112	114	108
民主德国	55	88	112	137	130
联邦德国	59	83	106	105	111
匈牙利	51	91	112	136	116
西班牙	34	79	122	143	115
芬兰	49	78	114	122	128

资料来源: *Statistical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78; 1988/89。

这些数据并没有暗示着经济的崩溃。在1975年后,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经济似乎还有相当不错的表现。捷克斯洛伐克的表现令人肃然起敬,而匈牙利尽管仍然未能进入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列,但却开始紧随在经济发展处于类似水平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后。

尽管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运转所付出的代价这一问题还存在着争议,但是从整体上看,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其间也出现了一些例外,如苏联集体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20世纪50年代中欧一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捷克斯洛伐克在60年代的不景气,等等。不过,就整体而言,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社会在许多方面正在“追赶”或维持着自身与西方最基本的竞争力。在一些发达地区,譬如波西米亚和民主德国,这一点表现得尚不明显;而在大多数原先就落后的国家如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一点要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尽管我们承认上述的某些成就可能是虚报政府统计数据的结果,但是,我们发现很难去质疑最严格的分析所报告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某些成功之处。毕竟,苏联之所以能够打败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德国这一战争机器——其主要利用的是自身的资源,其所凭借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果。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苏联在空间研究领域的成功,使得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担心苏联有可能超过美国和西方——不仅仅在重工业部门,而且在包括尖端的

技术研究和科学探索领域。我们不应该忘记苏联人造卫星所引发的恐慌，而美国高等教育和政府资助研究的爆炸式增长，正是对“苏联威胁”的反应——这种所谓的威胁，不仅来自军事方面，而且来自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似乎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也与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管用的——至少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是有效的——因此，其最终的崩溃不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需要加以解释。无论我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证据，它们似乎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那些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起步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60年代都一直在缩小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1960~1975年间，它们的表现大体上与人们对与其相似的经济水平上的国家的期望是一致的；只是到了1975~1989年间，其增长放缓，社会主义国家与具有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开始再次扩大，这最终导致了其社会经济甚至意识形态和人口体系的衰落。

（二）合法性与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起源

虽然从“事后之见”的角度来看，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明显是其经济低效的结果，但可以想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和经济困境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经济崩溃也许是政治合法性缺乏的原因，但也可能是后者的结果。我们应该避免马克思主义简化论者的错误，即将合法性问题简化成经济体制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很可能存在于体制的合法性问题中；“经济危机”这一现象，也许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共产党员之间、共产党精英和非共产党精英、精英和非精英之间彼此政治斗争的结果。

到了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对自由和民主而不是更快的经济增长或更高的生活水平的渴望，激发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改革措施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口号——“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其发起人不仅包括共产党改革派，同时也得到了许多非共产党员的呼应。

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批改革者——甚至包括1956年匈牙利的革命者——声称他们并不想要资本主义，他们所宣称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改革的话语才开始改变：一些人开始认为民主的代价也许是走向资本主义。到1989年，资本主义才作为一个口号被提上日程——作为走向民主的一个手段，“建设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民族的需要，成了一个与

20世纪40年代晚期共产党所宣称的“社会主义”一样的目标。这就是历史真实的反讽：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些人开始畅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目标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实现。改革的历史来了个彻底的轮回：现在，一些人开始宣称“建设资本主义”的代价就是实行威权主义的统治。

我们的主要论点是：以体制在“经济上的无效”来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动力，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简化论的观点。社会主义规划的主要缺陷，很可能根本并非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并非在于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不能够运行，而是因为它无法将自己确立为一个民主的体制，从而从长远来看损害了其合法性。另外一个很大的可能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不稳定与其精英不能实现自身的再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社会学特征在于，其“党国精英”缺乏自信和自尊。共产党政治阶级的成员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社会地位看得多么值得令人向往，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政治干部；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体面的专业人士。最终，干部们自己也开始向往私人财富，他们相信成为富人要比成为共产主义者更好。他们接受市场改革的意愿并不能完全与他们对个人致富的渴求割裂开来。倪志伟就曾极其幽默地将他讨论这一问题的标题原创性地拟为“与敌人共眠——为什么共产主义者热衷于市场”，^①这一标题可谓切中要害。雅德维佳·斯坦尼茨基斯（Jadwiga Staniszkis）曾经指出，东欧将最终走上政治资本主义的道路^②——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前政治阶层将自身转换为有产阶级。最后一代“党国精英”是这样一种历史主体，无论是从生存的还是政治的利益来看，他们会去“建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危机，并将政治资本主义设计为走出这一危机的出路。

我们并不想将对社会主义崩溃的单向的经济解释替换为一个同样单向的政治解释。正是各种实际存在的经济问题与对它们的政治判断一起，以一种相互影响的辩证方式，影响着东欧和苏联的未来。

（三）1978年以来的中国

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呈现出非凡的经济增长势头。虽然这一增长在

^① Victor Nee,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in this issue of *Theory and Society*.

^② Jadwiga Staniszkis,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989年之后曾下跌，但是现在它又恢复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活力。伴随着年均6%~7%的增长率（1992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2%），中国已经跻身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之列；如果人们可以推测其经济表现的话，他们会认为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会轻松地成为亚洲的“第六条龙”^①。

中国无可争议的明显的经济成功，能否在某种意义上归功于社会主义？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有许多评论家对此表示十分怀疑。按照某些解释，中国的经济已经被成功地私有化了，其巨大的经济活力应该归功于它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性质。

我们对中国私营经济的程度并不是十分了解，对于其经济活力从何而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据一些人宣称，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有50%以上源于私营经济，但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其他人则宣称，私营经济只贡献了大约10%的国民生产总值，另有40%来自新的“公有产权”形式。^②还有一些人宣称，中国经济是由外国投资拉动的；另一些人则贬低外资的作用，强调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在社会学家内部曾经有过友好的论争。从彼此的分歧可将其划分为两大阵营：阵营的一方是倪志伟（Victor Nee），另一方则是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戴慕珍（Jean C. Oi）。倪志伟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概念化为“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③他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似乎是在暗示，中国经济的运行已经演变到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度——限制这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因素，必须被归咎为改革的不足。戴慕珍^④和魏昂德^⑤则提供了一个多少有点不同的解释。根据他们的说法，中国的“奇迹”与私有化或资本主义关系不大；中国并没有从再分配转向市场，相反，它是在将再

① 相对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言得出的名词。——译者注

② Nicholas D. Kristof, “Chinese communism’s secret aim: Capitalism,” *New York Times*, 19 October (1992): 1, 4.

③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989): 663–681.

④ 戴慕珍把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称为“地方国家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这一干净利索的概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独特特征。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1992): 99–126.

⑤ Andrew Walder,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c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 524–539.

分配去中央集权化，并使用市场机制作为补充。

魏昂德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重新界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而不是实施直接的私有化。“这些重新安排的经济关系，使得产权得以转移到地方的控制之中。”^① 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控制力，尤其是汲取利润的能力。然而，中央的分权不应该被视为放弃再分配经济。地方政府掌握了产权，而早先这些都被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这样，社区承担了再分配的职责，而在此之前，这些职责是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再分配职责，如补贴性的食物供给、教育、医疗卫生、老年保健和住房等。”^②

戴慕珍和魏昂德的解释看上去与认为中国仍然“站在街垒的另一边”的观点一致，即认为中国仍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不过，中国也许不是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它却在遵循一种“路径依赖”^③ 的发展轨迹——这与魏昂德在其《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④ 一书中所展现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国经济的成功也许不大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存活能力，但是它肯定有助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转，其所遵循的是一条与西方经济增长不同的道路。

三 为什么社会主义失败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失败了，为什么它以一种长期的衰退而终结，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体制的崩溃在1989~1990年间达到了顶点。我们之前的详细阐述表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其答案既非显而易见，也不是常识所能够解决的。我们的核心假设在于，这个体制的崩溃并非不可避免：它是若干外部和内部因素互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几乎恰巧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发挥作用。

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社会变迁的韦伯主义的分析。在韦伯关于历史的“发展主义”理论中，关键假设是，社会沿着各种历史轨迹运动。当各种因素能够产生变化时，变化就发生了——这些要素始终是多重

① A. Walder. "Property rights," 524 - 539.

② J. Oi. "Fiscal reform," 125.

③ David Stark,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1992): 17 - 54.

④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的（内生的、外生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它们的发生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恰巧发生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上罢了。

发展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或现代化理论进化观的挑战。后两者声称，人们能够要么通过历史哲学的规律，要么通过关于人性的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变迁和体制的崩溃。我们在图1中提出了自己的框架，来解释中欧和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所发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将苏联视为一个“外生”因素，不过，该框架也可以被应用到对苏联解体的分析中去。虽然对中欧和东欧来说，以下所归纳出的因素在体制瓦解中都发挥了作用，但在每一个国家，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希望我们在此提出的这个框架，对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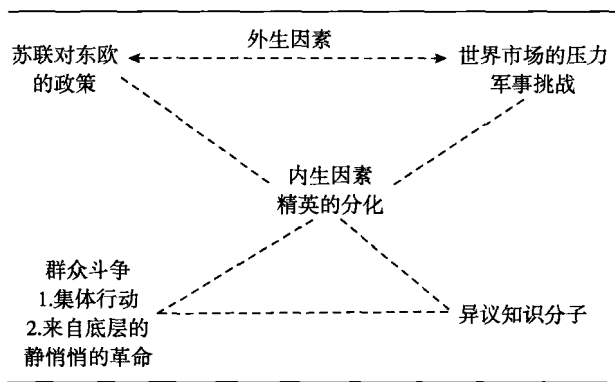


图1 影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崩溃的因素

本文剩下的部分，将考察图1中每个变量的影响。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与时间，我们不能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对每一个因素都予以深入的讨论。

让我们首先从世界经济的影响开始，因为它与普遍接受的假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并不管用——的联系最为直接。东欧经济的逐渐衰退始于1975年。至少有四个事件需要对此负责。

(1) 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的暴涨。虽然东欧曾一度希望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①的价格控制能够遏止其影响，但这被证明是一个幻想。增长的

^① 经济互助委员会是苏联牵头成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译者注

石油价格最终推动了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得东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甚至是那些它们原先做得比较不错的市场（譬如非洲）上的竞争力下降。结果是，在东欧的专家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他们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重组。这种思想在波兰尤其占有主导地位：它引发了“波兰的二次工业化”的项目。

(2) 作为石油价格暴涨的结果，来自阿拉伯的廉价信贷成为可能。从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到南斯拉夫，东欧的改革者们开始大量借债，用来投资于他们认为重建经济所必需的项目上。这就将该区域最有活力的国家拖入负债的陷阱中。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借债的成本突然上涨，与其他第三世界的负债国一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现自己陷入一种无法承受的债务负担之中。

(3) 更糟糕的是，经济的重建并未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场以信息技术、计算机、芯片等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展开，而东欧的再分配经济体发现它们要参与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竞赛中是极其困难的。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尚需进一步的解释。科尔奈有关短缺经济的理论，也许可以被应用到这一议题上。科尔奈将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界定为一种“短缺”经济。因为在一个再分配经济体中，带有家长性质的国家不允许其企业破产，企业受到科尔奈所称的“软预算”的约束。在科尔奈看来，这种状况下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与“硬预算”约束下企业家的行为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软预算”约束下的企业的一个特征在于，它有可能过度扩张，从而产生对某项投资产品的过度需求，进而产生长期的短缺。短缺所造成的后果是，生产过程虽然仍在继续着，但却是通过“替代”（substitutions）机制得以进行。如果一个企业找不到原材料或备用零件，它就会通过用次优的、可得的材料或零件来进行替代，从而继续生产。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产品质量。虽然在粗放型的增长领域，譬如重工业和纺织业，这也许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在高科技生产领域却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分配经济就会面临很难或无法适应的处境。

(4) 对世界市场的开放。改革派决定努力融入世界市场。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负债累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为了偿还不断加重的债务，他们必须增加出口；但是由于其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条件的能力的下降，这种做法越来越难以继。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官僚开始把赌注压到西方市场上，希望最终——尤其是当其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债时——能够放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些技术官僚（我

们在分析内生性过程时将其称为“新精英”）也许已经开始建立与跨国公司的联系，也许已开始受贿并在西方开设秘密账户，从而确保当资本主义转变开始之时，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要检验这一假设，可以对20世纪80年代负责经济政策的技术官僚的纽带、财富及其后来的策略加以详细的研究。

于是，那些在1989年向后共产主义转型的东欧经济体——匈牙利和波兰——是在没有怎么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进入世界市场的。他们盲目地举债，未能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环境。结果是，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开始恶化。在波兰，这导致了团结工会运动；在匈牙利，这导致了第二经济的解放。

世界的变化，尤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对军工部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纳德·里根深知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低迷状况，他做出了两个重要决策：首先，当共产主义世界正在遭受经济压力的时候，他宣布进行军备竞赛。里根的顾问们将这看作是拖垮苏联的一个机会，而里根竞选时的反对者们（自由派）则相信他是昏了头，竟声称要搞出一个“没有共产体制国家的世界”。事实证明里根是对的：美国比苏联更有能力承担一场加速的军备竞赛的代价。其次，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一重要的象征性策略。虽然大多数西方专家并没有严肃地看待这一提议，苏联却认真得要命。这部分是因为苏联人无法忽视美国人将其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他们不能孤注一掷地认为这一项目不可能成功。“星球大战”计划同样触到苏联人最为脆弱的地方：他们已经在“高科技”上感到自卑，现在他们又突然要面对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宇宙空间的激光武器，将把苏联的导弹打下来。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他们启动国内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出于对升级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计划的恐慌。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经验证据，即苏联疯狂地进行谈判，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来换取美国在“星球大战”问题上的让步。

虽然长期以来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一个专注的民主派，他致力于改革目的是引入更多的自由，但是，我们也可以将他解读为是在按照克格勃的建议行事，目的是维护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的。他的第一场改革运动，似乎是想改革经济从而令苏联在军事上更具竞争力。最初，他遵循着安德罗波夫的政策，而且也许受到这一思想的指引，即苏联的军事工业不能无限期地与民用工业割裂开来——这与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

的预言正好相反。计算机产业的革命对理解这一点显得极其重要。虽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和 60 年代早期，苏联在计算机技术方面颇有竞争力，但是至少在军事领域，它落后于美国，因为美国的计算机革命受到了市场对计算机的民用需求的驱动。卡斯托里亚迪认为，苏联的二元经济——高科技的和有活力的军事经济与落后的民用经济——可以无限期地并存下去。^① 计算机革命的历史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苏联在 80 年代早期对此做出了回应，它认识到要想维持军事竞争力就必须改革以便为民用经济带来活力。然而，这些经济改革遭到了守旧官僚的破坏。戈尔巴乔夫最终将注意力从经济改革（perestroika）转向了政治改革（glasnost），这最终使他走到了与其改革的初衷即维护军事工业复合体利益相冲突的道路上。

苏联所走的改革之路，开始影响到东欧解体的内在过程。在走在最前面的国家中，如匈牙利和波兰，精英们曾宣称维系共产主义秩序是必需的，因为苏联严格地限制它们的变化。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利用这一理由宣布实行“军事管制”，^② 而类似的理由也成为卡达尔（Janos Kadar）获得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之一——他为自己创建了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惬意的营房”而自豪。有时候，卡达尔也被改革派知识分子称为苏联统治时期的拜特伦·加波尔（Gabor Bethlen）。^③ 加波尔在 17 世纪土耳其人占领期间统治着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公国，因为富有技巧地在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周旋并维持其对匈牙利公国的主权而受到尊重。随着苏联走上改革之路，这种合法性的来源开始枯萎。

尽管如此，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归结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仍然过于简单化。早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这一体制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解体就已经开始了。从许多方面来说，戈尔巴乔夫是在沿着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所走出的改革道路前进。而对南斯拉夫或者阿尔巴尼亚来说，苏联的影响甚至要更小。

因此，如果对外生因素进行考察，我们或许能够说它们在不同的国家扮演

① Cornelius Castoriadis, *Devant la Guerre* (Paris: Fayard, 1981) .

② 关于这一观点，可参见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New York: Scribner's, 1984) .

③ 譬如，可参见 Anges Hankiss, “Bethlen Gabor: Adalekok a ‘koteltanc’ archetipikus kepletehez” (Gabor Bethlen: An arche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walking a tight rope in politics”) . In Agnes Hankiss, *Koteltanc* (Walking a tight rope in politics) (Budapest: Megveto, 1984) .

了非常不同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有关比较研究的若干假设。对匈牙利和波兰来说，世界市场产生了重要的效应，而技术官僚可能长期以来就在谋划着与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联系；而在几乎完全与世界市场力量隔绝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放弃东欧的决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抛弃他们的话，雅克什（Jakes）和昂纳克（Honecker）也许还能统治一段时间。

在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内生性过程在体制崩溃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些内生性的力量非常复杂，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影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走向体制崩溃的第一步，也许是精英内部的分化。这些精英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完全由守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组成，但后来，精英的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伴随着卡里斯玛型领袖的消逝，官僚集团需要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于是他们开始向技术专家类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由懂技术的或具有高超技能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新精英”开始浮现出来，他们对用旧的方法进行统治感到不满。“新”、“旧”精英之间的斗争开始了。^①1968年，这一斗争在捷克斯洛伐克达到了高潮，老精英在苏联的支持下赢得了胜利。在波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斗争得以继续，胜负各有不同。新精英在匈牙利最为成功，尽管直到1989年2月，他们尚未赢得明确的胜利。不过，他们成功地渗透到各个权力领域。

精英内部的紧张斗争开启了新的政治空间，并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非精英或反对派精英相对自主的经济和政治行为创造了机会。精英的内部分化和技术官僚影响力的逐渐增加，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即当局对使用压迫性的手段来对付知识分子失去了兴趣。新精英发现，再用警察手段来对付知识分子，连他们自己都会感到不舒服。结果是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的出现。后斯大林主义、后极权主义、家长式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镇压手段是能够估算的和能够预测的。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一个人无法预测到政治压迫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对同一行为的惩罚有可能是5个月监禁、5年监禁或枪毙。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惩罚变得可以预测，这就为异议人士创造了空间。异议人士

^① Erzsébet Szalai, “Az új elit” (The new elite), in Erzsébet Szalai, *Gazdaság és Hatalom* (Economy and Power) (Budapest: Aula Kiado, 1990), 169–176.

出现了；他们开始为地下出版物写作，开始组织示威等活动。

1974年之后，在匈牙利，再也没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因异议活动而坐牢：他们面对的惩罚，至多将是被开除公职或被限制到国外旅行。在其他国家人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政府定期逮捕反对派人士，之后引发国际抗议，最后按照惯例反对派人士都会被释放。到20世纪80年代，如果一个异议人士曾至少做过一次牢，他（她）在圈内的地位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因此而浮现出来的异议派知识分子和精英中的技术官僚派之间存在着某种共谋。随着自由化的发展，新精英开始追捧异议人士。他们阅读地下出版物，为自己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耻辱。某种话语革命正在形成：一开始是新精英为异议知识分子的成长创造了空间，而随着新精英因为使用异议人士的新话语而获得尊重，某种“批判性话语文化”开始渗透进新精英中间，并令其变得激进起来，同时也为其与老精英的斗争提供了智识上的装备，让他们对统治社会的旧方法感到更加沮丧。

这一肇始于1968年的新话语，其所包含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于，它既不是对现有政权的政治批判，也不是对现有体制的经济批判。不管是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团体还是匈牙利的异议运动，在他们真正掌握大权之前，都未曾大吵大闹要替代现有政权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知识阶层的新话语所转向的，是对政权的道德批判：在这里，异议派知识分子是心灵的、真理的代表，而其所对应的党则成为肉体的、邪恶的化身。面对异议人士的批判和他们对自己的整体性表述（当某人因偶然的逮捕而受到折磨时，异议人士自诩的形象就会得到强化），党没有现成的、可供使用的武器。在党谈论计划、目标和帝国主义的时候，异议人士所谈论的却是真理、爱和自由。

仅仅从精英和反对派精英的角度去解读社会主义体制的瓦解，那将会是一种具有高度的修正主义色彩的历史观。从群众运动发展而来的草根运动是十分壮观的，在促成体制解体的过程中，其重要性不亚于新精英和知识分子反对派之间的互动。尽管我们在这里只是简要地提及团结工会和那些在匈牙利第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元素，我们确乎很想提请人们去注意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就是他们常常做出的“沉默的抵制”。顺手牵羊、消极怠工、蓄意破坏机器、工作时酗酒，这些事情虽小但叠加起来却极大地消耗掉了这个体制。虽然国家称这种反抗是犯罪和破坏，但是这些沉默的革命确实是工人阶级表达其对政权不满

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政权号称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到。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在东欧获得承认的两大草根运动。这两个运动采取了非常不同的形式。从运动的形式这一角度来看，匈牙利和波兰处于这一形式的两端。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匈牙利发生了一场“来自底层的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扎根于“第二经济”。随着匈牙利精英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分裂成“新”、“老”两派，为了赋予卡达尔主义的统治以合法性，一种双重的妥协被提供给了社会：知识界获得了一些表达异议和独立思考（以及到海外旅行）的权利；工人阶级则获得了从事第二经济的许可。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经济中的国有部门渐渐变“空”了：许多匈牙利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中心由国有部门转向了其业余的家庭生意，他们在家里的自留地上耕种，在建筑和服务行业做夜工。到80年代早期，甚至全职的自我雇佣人员的数量也开始增长，一些小私有部门开始出现。

匈牙利的第二经济有助于经济的增长：由于国际负债和竞争的压力，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起，匈牙利人的实际工资开始下降。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之所以仍然保持着增长，是因为人们干私活的时间在变长。匈牙利的第二经济还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异议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文化”所破坏的是精英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第二经济则让精英的生活方式变得资产阶级化起来：匈牙利的精英开始更喜欢更具效率和更有品质的私人服务，他们并不想回到短缺经济时代的老日子里去。

在波兰，故事以另一种方式展开。波兰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卷入第二经济（当然，第二经济在波兰远未形成）中，他们采取的是集体行动。团结工会运动与匈牙利的“静悄悄的革命”，彼此的功能是对等的：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方式，只不过一个是集体性的，一个是被动的、个体的经济行动。波兰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和匈牙利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的“静悄悄的革命”，成为体制崩溃非常重要的前奏。

在这两个案例中，异议知识分子与大众抵制运动的联系都是松散的。在波兰，虽然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来帮助工会运动，但是在没有动员起布尔什维克主义幽灵的情况下，它不可能作为“先锋队”而行动；而工人们也对知识分子表示十分怀疑。匈牙利异议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甚至要更大。曾几何时，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想按自己的思想来引导第二经济中的新企

业家，但是很快他们就放弃了这一想法。新的小资产阶级所表现出的“新富”的姿态让他们感到恶心；到体制瓦解时，他们开始把筹码放到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试图让自己在经济中占一个好位置，成为跨国公司的所有者或雇员），这就更让他们觉得新的小资产阶级是一种危险或是其竞争对手了。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在于，这一体制的崩溃是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节点，这些变量的组合和相对权重是不同的。

吕鹏 译 刘建洲 校

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的 精英循环或再生产：导言*

伊万·塞勒尼、索尼娅·塞勒尼

本期《理论与社会》特辑所刊载的，是一项关于东欧共产主义精英补充状况的跨国比较研究。一个由美国和若干东欧国家的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在“1989年后东欧的社会分层”这一课题名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在俄罗斯以及五个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①展开。

1993年，这一专辑里刊登的文章的作者们在匈牙利一个名叫 Erdötarcsa 的地方举办了一次集中的工作坊。这一工作坊的目的是对从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获得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本专辑中的文章就是这次会议的成果。在

* 原文发表在《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杂志1995年第24辑第5期上。本文是作者为这一辑撰写的导言。

① 作者这时对“东欧”的界定与后来文章中的有所不同。作者最后认可的表述应该体现在2009年前后“后共产主义的三个世界”的有关论述中：以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中欧”国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体制”(neo-liberal regime)；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国家承袭主义体制”(state-patrimonial regime)；最后是以“东亚”的中国、越南为代表的“合作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由此可见，东欧、中欧、东亚在塞勒尼眼中并不完全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历史地理区域为基础、由市场制度的发育程度和民主化程度决定的“政治经济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当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某些南欧国家加入欧盟并按照欧盟的要求实施改革时，塞勒尼称它们正在从东欧转向中欧。——译者注

这篇导言里，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对后共产主义精英补充情况的研究所具有理论和政治意义予以解释；其二，对指导本专辑中的文章的共同概念框架进行描述；其三，对我们在东欧所做的问卷研究的性质加以勾勒；其四，对我们在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的发现予以概括。

一 研究中的困惑：理论争议与政治争议

（一）循环抑或再生产

在这期特辑中，我们把焦点放到东欧和苏联继承国中一个理论上颇具争议的话题上：伴随着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谁是那些占据领导职务的人？后共产主义转型对这些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东欧精英的构成真的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对老干部们的影响如何？新精英又从何处而来？

迄今为止，对于上述问题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回答：第一种回答是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发生在东欧的革命性变化并没有影响到精英的社会构成。这是因为“党国精英”们（*nomenklatura*）成功地在阶级结构的上层存活了下来，他们正在成为新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第二种回答是精英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迈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导致了阶级等级制上层的结构变迁：在新的原则的基础上，新人们被吸收到领导位置上来。

关于精英构成变化的问题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论争还折射着当前东欧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譬如，政治上的右翼基本上支持精英再生产理论：他们声称，随着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精英人员的构成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号召另一场（即政治上的）革命；相反，政治上的左翼则认为，精英循环在过去的数年里已经过头了，为了将来应当放慢变革的步伐。

为了阐明这些看似学术性的争论的政治意义，让我们回顾一下1991年秋天在波兰总统选举中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对马佐维耶茨基（*T. Mazowiecki*）的攻击：前者指责后者对共产党太“软弱”，因为这位波兰前总理让他们在1989年之后成为产权所有者。效仿瓦文萨的先例，后来出现的东欧新右派常常将他们的攻击焦点放到那些被认为是将旧的政治特权转化成新

的经济特权的前共产党员身上。因此，匈牙利和波兰的新右派号召在东欧进行第二场革命，他们声称执政的保守派政党已经“背叛”了革命，此外，正因如此，所谓的“天鹅绒革命”并没有导致足够激进的社会变迁。政治上的左翼则持相反的立场。前正统派共产党员、改革派共产党员和当代自由主义者对精英人员的快速变化提出了警告。他们担心政治上的清算；出现了新一轮的“逆向选择”^①：只要一个人在1989年之前曾是共产党员，哪怕他再有能力，反共人士也会公开拒绝雇用他担任阶级结构中的重要职务。

新右翼和老（或改革了的）左翼都在某些特定的公众圈子中获得了同情。1993年秋天，波兰的选民们响应前改革派共产党员更为平和的声音，使得左翼政党赢得了议会选举中的绝大多数。与此类似，在1994年5月的匈牙利选举中，原共产党中有改革思想的继承者们赢得了胜利。然而，在俄罗斯，1993年12月的选举显示，两派都能动员群众：不仅极右翼的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y）在选举中表现优异，而且前共产党员也同样表现出色。

在这一辑的文章中，我们对有关精英构成变化的两种理论——精英再生产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进行了区分。^②在东欧，关于精英的主导观点是“再生产”理论。匈牙利的艾勒梅·汗基斯（Elemér Hankiss）和波兰的雅德维佳·斯坦尼茨基斯（Jadwiga Staniszkis）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早在1989年，汗基斯就指出，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旧的党国精英将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③与此同时，斯坦尼茨基斯开始就后共产主义东欧所出现的“政治资本主义”撰写论文。^④在她看来，前党国精英们使用其政治权力来获取私人财富。斯坦尼茨基斯和汗基斯都认为，这种私有化的进程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阶层，他们将在不受多少限制的情况下，维持其在阶级结构上层中的位置。

同样，匈牙利的厄吉贝特·萨莱伊（Erzsébet Szalai）也对东欧做出了类似的分析。在关于匈牙利大型企业的研究中，她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早

① 关于逆向选择，请参见本论文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文。——译者注

② 参见 Ivan Szelényi and Szonja Szelényi, “Az elit cirkulációja?” [Circulation of Elites?] *Kritika*, No. 9 (1990): 8–10.

③ Elemér Hankiss, “Reform and conversion of pow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Mittel-Europa: Herausforderungen der Reformen,” organized by the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9–31 May 1989; Elemér Hankiss,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Jadwiga Staniszkis,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专家阶层，该阶层开始逐渐获取一些关键性的财产权。^① 萨莱伊以“老精英”和“新技术专家”之间不断扩大的斗争来对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政治变迁的动力进行解释。根据她的观点，“老精英”由1956年革命后掌握政治权力的党国精英组成，他们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大多数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意识形态上的信仰；相反，“新精英”则更年轻，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在技术和取向上尤其偏向于专家治国。毋庸置疑，由于新精英所受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他们越来越不喜欢那些老卫士管理这个国家的方式，因此，他们赞同那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必须实现激进转变的观点。这些“新技术专家”不可避免地但又是逐步地抛弃了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开始支持市场转变的改革议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慢慢地攫取财产所有权并将自己变成新政权下的新私营企业家。^② 不过，按照萨莱伊的说法，“新技术专家”的成员在政治上并不成功。他们在政治上对“老卫士”的胜利是暂时的，其政治权力很快就被来自非共产党圈子的“新统治精英”取代。^③

从上面三种叙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汗基斯、斯坦尼茨基斯和萨莱伊对东欧提出了类似的诊断：虽然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颇为剧烈，但阶级结构上层中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变化。换言之，人事格局并未改变，变化的只是其令自己的权威、权力和特权合法化的各种原则。

不过，与上述两位作者不同的是，萨莱伊在“新技术专家”和“老精英”之间进行了重要的区分：后者可能会在经济的转型中向下流动。她还指出，在前共产主义的“新技术专家”和反共产主义的“新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着斗争。通过引申萨莱伊的论点，我们提出了一种“精英循环”的假设：前精英

① Erzsébet Szalai, “Az új elit” [The New Elite], pages 169 – 177 in *Gazdaság és Hatalom /Economy and Power*, ed. Erzsébet Szalai (Budapest: Aula Kiadó, 1990). 欲了解更多的关于“新技术专家”的概念，请参见 Erzsébet Szalai, “A Hatalom Metamorfózisa”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pages 61 – 114 in *Otelagazas /Cross-Roads/*, ed. Erzsébet Szalai (Budapest: Pesti Szalon Könyvkiadó).

② Erzsébet Szalai, “A Hatalom Metamorfózisa,” 84 – 85.

③ 厄吉贝特·萨莱伊将这一社会群体称为“新精英”，参见 Szalai, “Ismét az új Elitről” [The New Elite Revisited], 181 – 186 in *Gazdaság és Hatalom [Economy and Power]*. 在“A Hatalom Metamorfózisa”一文中，她引入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术语——“新统治阶层”（new ruling estate）。在本文中，我们在相互可替换的意义上使用“新精英”和“新统治阶层”这两个概念。

将维系他们在阶级结构上层的特权位置，但是政治上的限制会决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成功；老精英中的一些成员会向下流动；一些人会保留住他们之前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另一些人则会向上流动到老精英的级别。^①

使用皮埃尔·布迪厄的概念体系，可以认为汗基斯和斯坦尼茨基斯所提供的是这样一种理论：他们假设将政治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所受到的限制很少或没有限制。^②然而，萨莱伊的假设更加复杂一些。遵循她的说法，我们认为，那些完全或严重依赖政治资本来保持其权力和特权的人（亦即“老精英”），有可能向下流动；而那些兼具文化和政治资本的人（亦即“新技术专家”），今天则会依据其经济资本来获得更好的地位并获取绝对的特权。“新政治精英”也可能来自那些在过去政治资本低下但是文化资本较高的人。至于“新政治精英”究竟只是占据政治权威的位置，还是会同时在经济特权上获得成功，则仍需观察。

（二）精英再生产中的跨国变化

我们期望在本特辑所包含的三个国家（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中，发

-
- ① 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场类似的讨论，也就是人们知道的“市场转型讨论”。这场讨论由倪志伟（Victor Nee）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年第54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市场转型理论》（“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的文章所引发。在那篇文章以及随后发表的两篇重要的文献中——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91年第56辑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社会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与《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年第101辑上的《一个市场社会的出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倪志伟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精英循环的假设，主张新的经济主体从市场改革中获益，而前干部们将被淘汰出局。好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尤其是魏昂德（Andrew Walder）对这一主张提出了质疑。魏昂德的文章《职业流动和共产党的政治秩序》（“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95年第60辑上。在那篇文章中，魏昂德提出了一种与萨莱伊接近的立场，认为从市场转型中获益的，是旧精英中的技术官僚派系。
- ②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itor,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布迪厄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多维分析。在他看来，社会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空间是由三种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形塑的。在这本特辑和其他地方，我们是在与布迪厄接近的意义上使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概念；但是，我们常常会用“政治资本”这一概念替换他的“社会资本”概念。所谓政治资本指的是一种高度制度化了的社会资本，这种资本可以通过共产党员的资格加以测量。

现精英再生产方面的不同趋势。由于在过去的20年里，匈牙利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较俄罗斯（或者波兰）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要更为成功，我们认为，那里的老精英更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在卡达尔政权时期至少存在过一种不完全的吸纳精英的贤明领导体制（meritocratic system）；这一体制意味着，在1989年的时候，许多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已经占据了与他们的技术相匹配的岗位。

相反，我们假设，在波兰存在着更大规模的精英循环，因为该国试图效仿卡达尔政权的努力——试图与技术知识分子达成某种妥协或者至少与技术专家合作——基本上来说是失败的。在所谓的波兰“第二次工业化”时期，波兰的官僚集团试图将技术专家带到领导岗位上；而且，在雅鲁泽尔斯基政权时期（1981~1989年在位——译者注），他们又再次尝试这么做。波兰政府所得到的反馈却并不令人满意：波兰的知识阶层仍然游离于权力体系之外，且组织起来成为反对派的精英。

俄罗斯的情况也许更接近匈牙利，但其原因却颇为不同。常识往往认为（尽管数据已经否定了这一点），俄罗斯不曾允许技术类知识分子掌握与匈牙利同行们同等程度的权力。因此，1989年和1990年时俄罗斯党国精英的状况，也许更接近波兰而不是匈牙利。此外，至少有初步的证据表明，俄罗斯的精英再生产程度颇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在1993年的秋天，也就是当我们开展田野工作的时候，俄罗斯最终改变了其向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方向，因此其精英尚未开始“循环”。

为了对匈牙利、波兰、俄罗斯精英循环或再生产的三条道路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引入了另一个概念——反对派精英的力量。尽管在波兰和俄罗斯，党国精英或许具有类似的特征，但我们还是认为，在波兰，存在着—伙庞大且组织良好的反对派精英，这有助于精英的循环。在俄罗斯，反对派精英的发育要稍弱一些，而且由于没有可以替代的干部，老的党国精英能够得以继续维持其在该国中的领导位置。普遍存在的社会不稳定也有助于前干部们继续他们的统治，这在俄罗斯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正在浮现的社会特征还不是很明显，加之新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像所预期的那样运转；此外，在俄罗斯很少有“政治企业家”准备参与到这场新游戏中去。基于这些原因，那些老干部有可能保持不受挑战的状态。

概言之，我们的理论认为，在那些技术专家被党国精英增选进国家体制且

不存在反对派精英的国家里，能够发现较高级别的精英再生产；相反，在那些技术专家没有成为增选精英或存在着组织良好的反对派精英的国家里，能够发现较高级别的精英循环。这些假设在表 1 中得到了概括。^①

表 1 关于循环或再生产的假设

国家	合作	反对派精英	循环或再生产
匈牙利	有	有一些	某种程度的再生产
波兰	有一些	有	某种程度的循环
俄罗斯	没有	没有	再生产

为了对这些假设的经验有效性进行检验，我们在 1990 年发起了一项关于精英的跨国比较研究。^② 到 1994 年中期，调查已经在六个国家完成，它们分别是：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斯洛伐克。^③ 1993 ~ 1994 年间，我们对这些国家中的约 4 万名受访者进行了私人访谈。我们设计出一套复杂的研究方案，从不同的随机样本中抽取受访者进行访谈。在每一个国家，我们访谈了 2000 名精英成员，其中，1000 名在 1988 年时占据着党国精英的位置；600 名是新经济精英的成员，400 名在 1993 年时是政治或文化精英中的一分子。此外，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从总体中随机抽取 5000 名成员，目的是获取一个基准线，从而与我们的精英再生产模型进行比较。我们对所有的访谈对象进行了生命史访谈。我们要求他们全面地说明其活动史、教育生涯和党员资格情况；我们还询问了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情况，并询问关于其朋友的相关信息。

到 1993 年底，我们获得了这 6 个国家中 3 个国家（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的精英研究数据。其中，来自美国和这三个国家的研究小组召开了会议，写好了报告的第一稿，即刊登在本期特辑中的系列文章。

① 我们要特别感谢陶马什·克洛什 (Tamás Kolosi)，这些假设是在与他的多次谈话中发展起来的。

② 在 1990 年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一群来自美国和若干东欧国家的学者得以会面，他们发起了这场调查。领导这一调查团队的，是伊万·塞勒尼和唐纳德·特雷曼 (Donald Treiman)。

③ 一个类似的调查在伊万·塞勒尼、唐纳德·特雷曼和魏昂德的领导下于 1995 年在中国展开。

二 经验研究的发现：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的精英再生产

“循环”与“再生产”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五年的时间都足以使得一个人期待其所担任的领导岗位有所改变。不过，即便是在最为革命的环境下，人事上的彻底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当我们评价某个国家的精英在“多大程度”上究竟是循环的还是再生产的时候，就必须始终用一种相对的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

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考察：①我们探讨了旧党国精英的归宿和新精英的来源；②我们分析了精英再生产中的国别差异；③我们考察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精英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

(1) 旧党国精英的流出是有限的。许多在1988年时占据党国精英位置的人，在五年之后仍然占据着高层精英的位置。那些向下流动的人，则通常只是在地位等级制中“下滑”了一点点，或者对旧党国精英来说，最糟糕的状况也就是提前退休。换言之，1988年时的党国精英在面临共产主义转型时的处境并不是那么糟糕：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去再生产其所占据的权威位置。不过，我们也发现存在着新精英的实质性的流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欧精英的人员构成存在着实质性的循环。1993年，在社会等级制的顶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这些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人，大数并非来自阶级结构的底层，而更多地是从上层或中层阶级上升到顶层。

(2) 从跨国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结果显示，与匈牙利和波兰相比，俄罗斯的旧党国精英更有能力在阶级结构的上层生存下来。不过，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匈牙利的精英循环要比波兰的精英循环规模更大（和迅速）。

(3) 我们发现，匈牙利新、旧经济精英之间的循环尤为剧烈。匈牙利相对较大程度的精英循环，也许可以归咎于（我们所称的）“政府调控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正好发生在迈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之后。因此，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在大选中的胜利，可以被解读为反对这种“政府调控的社会流动”而做出的表决。这次投票显示，选民更倾向于社会分层格局的渐进性转变。

(4) 我们的总体结论是：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变迁具有（而且将继续具有）

路径依赖^①和内卷化^②的特征而不是革命性的特征。在那些骚乱程度更为严重的区域（即政治领域），似乎正在发生着一种“轨迹调整”。1993~1994年间的选举支持这一主张。作为这些政治变迁的结果——尽管要想重建共产主义还遥不可及——社会结构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是进一步倒退到一个甚至更为内卷化的转变路径上去。

（一）旧党国精英的归宿和新精英的来源

如果通过比较旧党国精英的归宿和新精英的来源（见表2）来评价精英循环或再生产的程度，我们就会得出关于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型的两个多少有些不同的故事。

表2 旧党国精英的归宿

单位：%

1993年时的阶级位置	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精英	64.2	38.2	20.0
有下属的非精英	15.5	18.4	31.5
没有下属的非精英	10.6	16.6	15.7
退休者	9.7	26.8	32.8
	(N = 854)	(N = 888)	(N = 662)

注：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由于近似误差的缘故，纵列数据的总和可能不到100%。

第一个故事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已经产生了一种程度可观的精英再生产：到1993年时，那些在1988年时占据精英位置的人更有可能是继续保有其权威位置而不是离开了这些岗位。从这一意义上讲，“老卫士”们在东欧很少遭遇到什么麻烦。事实上，看上去他们过得不错。不过，“过得不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完全未受1989年经济转型的冲击。许多人从其原先占据的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降职，尽管大多数人在这种向下流动中相当不错地幸存了

① 关于“路径依赖”这一概念，可参见 David Stark,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1992): 17-51; 以及 David Stark, “Recombinant property and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1996)。

② 黄宗智发展出这一概念，并用其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参见 Philip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 1350 to 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下来。在匈牙利和波兰，1988年时的党国精英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到1993年时已经退休：一些人是提前退休，只有很少的人不得不接受级别稍低的工作。

从这些表格中可以得出的第二个故事是，伴随着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我们也许已经见证了一场大规模的精英循环：1993年时占据精英位置的绝大多数人，其在1988年时都不是党国精英的成员。然而，阶级结构上层的这些新面孔并不是必然都那么“新”：他们常常来自“候选梯队”（next in line）的位置，所以，即便没有政体上的变化，这些人也许也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被提拔到精英的位置上。

考虑到上述发现的看似矛盾的性质，或许有必要对这些发现予以更为详细的阐述。表2展示了我们在做调查时（即1993年）旧党国精英所处的阶级位置。虽然这个表所显现的支配性趋势是精英的再生产，但就模式来看，各国之间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如果采用一个关于精英的广义的定义的话（譬如，把那些“真正”的精英与那些严格说来并非精英而只是扮演一般性管理角色的管理人员合并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俄罗斯的精英再生产率是80%，波兰是57%，匈牙利是50%。如果做一个狭义上的界定（把管理者从精英的定义中剔除），那么再生产的结论只能够在俄罗斯成立：依据这一定义，俄罗斯的精英再生产率是64%，而在波兰只有38%，在匈牙利只有20%。真实的再生产率大体上应该在这两种精英的定义（也就是广义的和狭义的）之间的某个地方。由于忽视了那些随着共产主义转型而失去某种地位的向下流动的精英（从1988年时全国重要的领导岗位降级到1993年时权力较少的管理者位置），宽泛定义下的结论有可能是错误的。狭义定义下的结论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不过原因正好相反。

毫无疑问，导致我们在表2中观察到的相对程度较高的精英再生产的原因在于，1988年时从党国精英位置的流出更有可能是一种“侧向流动”（side-ways）而不是“向下流动”（downward）：在波兰和匈牙利，那些离开精英位置的人更有可能在1993年时选择退休，而不是从事普通的职员工作。^①大约三分之一的老干部选择了退休（亦即在阶级结构中“靠边站”），大约六分之一的老干部被“降级”去从事普通工作（亦即“向下”流动）。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退休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旧官僚地位的严重受损。相反，经济部门里的前

^① 这一发现与萨莱伊的观察一致：“‘旧的统治阶级’的成员的主要选择是退休。”参见 Szalai, “A Hatalom Metamorfózisa,” 98。

党国精英即使已经退休，也常常成为（国内或境外）公司的顾问。譬如，在匈牙利，依照我们对1993年何为精英的狭隘定义只能计算出20%的再生产率，许多看上去失去了根基的人实际上仍然在共产主义时期占据着有权势的位置（正如我们对精英的宽泛定义所揭示的那样）。尽管我们在上述三个国家中都发现了大规模的精英再生产，^①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结果也显示，在波兰和匈牙利，社会等级制的顶端所发生的变动要大得多。

在对新精英的社会来源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各国之间的差异较小。表3显示，三个国家的精英循环程度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准确地说，俄罗斯的循环率似乎要更低一些，在那里，有51%的精英在1993年占据着其在1988年时就已占据的党国精英的位置。此外，波兰精英循环的证据看上去要比匈牙利相对少一些：在波兰，来自旧党国精英的新精英的比例是41%，而这一数字在匈牙利只有33%。尽管如此，从这些结果中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即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普通干部的序列流到新精英队伍里：在新的掌权者中，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在1988年时并非精英。领导岗位上的新贵们的真实来源是原来的中层管理者；也就是说，新“老板们”是那些在1988年时就已有点权势的人。^①

表3 新精英（1993年）的阶级来源

单位：%

1988年时的阶级位置	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党国精英成员	51.0	40.7	32.7
其他官员	33.4	37.9	47.5
非精英	15.6	21.4	19.8
	(N = 958)	(N = 960)	(N = 783)

注：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由于近似误差的缘故，纵列数据的总和可能不到100%。

总之，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的向上流动过程看上去非常有序。在社会等级制中，很少有大跃升；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保住权势的通常做法是慢慢地沿着社会阶梯往上爬。在观察到新精英中的流入率的同时，人们不应该忽略在阶级结构顶层存在着大量的循环。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夸大这种循环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清晰地显示，东欧的新统治精英并非来自

^① 这意味着萨莱伊正确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些保住了其权力位置的新技术专家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来自各个部门的前副手们。”参见“A Hatalom Metamorfózisa,” 102。

阶级结构的底层，而是来自中层的管理者。

我们所描述两种情况——流出率上的再生产和流入率上的循环——并不必然地就是相互矛盾的。毕竟，可以想象的是，大多数前党国精英成员可以保住他们的权势，即便许多新精英成员在 1988 年时并非党国精英。这并不是是一场零和博弈。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 1988 ~ 1993 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某部分的精英（比如，政治精英）数量减少了，但其他部分的精英（比如，经济精英）数量却增加了。对经济精英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在 1988 年，经济精英担任着最大的 200 家企业的高层经理人；而到了 1993 年，他们又成为 3000 家最大型企业的 CEO。我们在样本中所观察到的一些循环，正是由于经济中的这种结构性变化而产生的。

因此，我们的一般性结论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第一个五年，具有人事上的相对稳定性和制度结构上的显著变化这样一种特征。政治以及尤其是经济制度转变的主导趋势，是决策权的去中央集权化。由此导致了精英位置在数目上的增长。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可以被描述成人事上的连续性和经济、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式的转变。

（二）跨国差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差异

尽管从精英再生产的程度而言，我们发现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但是我们也发现能够为经验证据所支持的足够多的差异，它们足以帮助我们去推断我们关于俄罗斯和东欧的假设。换言之，与东欧相比，俄罗斯的党国精英似乎更为成功地延续了其权力与特权地位。

不过，波兰和匈牙利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直觉相反和未曾预见到的发现。事实上，我们从比较中得到的结果与我们之前的预期差别很大，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之前提出的有关精英再生产的理论假设。虽然我们预期在波兰看到更多的精英循环、在匈牙利看到更多的精英再生产，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的事实正好相反：在 1988 年，在波兰，57% 的党国精英在五年内仍维持着其党国精英的地位，而在匈牙利，这一比例只有 51%。

尤其有意思的是去考察匈牙利的退休人员的比例比另外两个国家要高多少。在匈牙利，33% 的党国精英在 1993 年时就已经退休，而在波兰，这一比例是 27%，在俄罗斯是 10%。退休率上的差异不可以被归结为这三个国家党国精英构成上的年龄差异，因为在匈牙利，老干部的平均年龄与波兰和俄罗斯

几乎是一样的。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1989年之后，在匈牙利有许多处于精英位置的人，他们要么选择了降职，要么被迫提前退休。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在1993年退休时不到60岁，80%的人不到70岁。由于我们所调查的是社会等级制中处于最高层的那些人，因此能够在被调查者中发现有如此多的人在60岁之前就已经退休，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可见，在匈牙利，至少有一部分精英循环是因为这些提前退休的现象造成的。

对波兰和匈牙利不同层次的党国精英予以进一步的详细比较，揭示出更为有趣和未曾预料到的发现。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经济类党国精英的流出率之间的差异，与我们的直觉正好是相反的。如表4所示，在匈牙利的老的经济精英中，到1993年只有48%的人保住了其权威地位。相比之下，在波兰的老的经济精英中，有几乎70%的人在五年后仍然留在权威位置之上。波兰前经济精英更强的存活能力，也得到了有关新精英社会来源的数据的支持。据表5显示，有整整一半的波兰新经济精英在1988年时就已经是党国精英成员，而在匈牙利的CEO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人们一般认为，与波兰的同侪相比，国家社会主义晚期的匈牙利经济管理层受过更好的训练、更有能力、政治动机没有那么强——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上述发现尤其令人感到惊讶。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老经济精英存活的时间更为长久），波兰经济的表现要比匈牙利好。^①

表4 旧党国精英的归宿（仅限于经济精英）

	单位：%		
1993年时的阶级位置	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精英	81.1	56.6	29.2
有下属的非精英	13.2	12.6	18.3
没有下属的非精英	1.7	7.2	4.9
退休者	3.3	23.6	47.6
	(N=60)	(N=263)	(N=82)

注：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由于近似误差的缘故，纵列数据的总和可能不到100%。

① 我们必须注意到，波兰和匈牙利经济精英幸存率的差别，也许是我们调查所采用的方法论差异的人为产物。在波兰的案例中，我们访谈的经理人的数量要更多，因此，有可能在1988年时，在经济类的党国精英的样本中，CEO的人数要少一些。也许，未曾担任CEO的人幸存下来的几率要大一些，这一点或许能够解释波兰经济类党国精英有更大的幸存率。

表5 新精英（1993年）的阶级来源（仅限于经济精英）

单位：%

1988年时的阶级位置	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党国精英成员	52.6	50.7	34.9
其他官员	33.4	38.8	54.7
非精英	14.0	10.5	10.4
	(N=565)	(N=588)	(N=489)

注：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由于近似误差的缘故，纵列数据的总和可能不到100%。

不过，各国之间精英再生产的差异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比如，我们的数据显示，匈牙利文化精英的循环率要比波兰的高很多：1988年，匈牙利的文化精英只有56%的人维持住其地位；而在波兰，这一比例为61%（见表6）。这是一个我们未曾预见到的结果。1988年，人们一般认为，在匈牙利的科学、高等教育领域和媒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政策。匈牙利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出版社以它们（相对）自由和客观的特征，以及其受过高等教育的（而非政治上积极的）管理者，给观察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之相似，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匈牙利科学院已经因为依据学术成就而不是政治资质来选举院士而令人瞩目。相反，波兰的媒体就没那么自由，大量的地下出版物在合法出版的审查制度的重压下偷偷出版，政治上保守的官方学术机构迫使一些学者恢复所谓的“流动大学”（flying university）的传统（见表7）。

表6 旧党国精英的归宿（仅限于文化精英）

单位：%

1993年时的阶级位置	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精英	49.4	43.9	9.0
有下属的非精英	20.8	17.1	47.5
没有下属的非精英	21.8	10.5	14.3
退休者	8.0	28.5	29.2
	(N=212)	(N=123)	(N=154)

注：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由于近似误差的缘故，纵列数据的总和可能不到100%。

表7 新精英（1993年）的阶级来源（仅限于文化精英）

单位：%

1988年时的阶级位置	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党国精英成员	44.9	29.9	27.1
其他官员	14.4	45.5	47.4
非精英	14.4	24.4	25.5
	(N=138)	(N=90)	(N=133)

注：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由于近似误差的缘故，纵列数据的总和可能不到100%。

尽管存在着这些基本的差异，就老政治精英的命运和新政治精英的来源而言，波兰和匈牙利是十分相似的。譬如，从表8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两个国家里，与经济或文化精英相比，政治精英更有可能向下流动。当然，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因为1989年的变化在原则上是指向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我们还能够在表9中发现，在由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三个部分组成的新精英中，无论是匈牙利还是波兰，只有新的政治精英才从非精英的位置上吸取大量的成员。在这两个国家，在向后共产主义转型前大约40%的新政治精英并未从事过精英性质的工作。

表8 旧党国精英的归宿（仅限于政治精英）

单位：%

1993年时的阶级位置	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精英	67.7	27.5	21.9
有下属的非精英	13.7	15.1	23.0
没有下属的非精英	7.6	29.3	23.9
退休者	11.0	28.1	31.2
	(N=582)	(N=502)	(N=426)

注：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由于近似误差的缘故，纵列数据的总和可能不到100%。

表9 新精英（1993年）的阶级来源（仅限于政治精英）

单位：%

1988年时的阶级位置	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党国精英成员	51.0	23.7	30.4
其他官员	29.4	33.3	26.1
非精英	19.6	43.0	43.5
	(N=255)	(N=282)	(N=161)

注：表中数据为百分比，由于近似误差的缘故，纵列数据的总和可能不到100%。

（三）在后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存在着“政府主导的流动”？

匈牙利经济和文化精英更高的循环率表明，我们关于反对派精英存在着影响的假设，也许是经不住认真的检视的。一开始，我们假设实力更强、组织更好的波兰反对派会更有可能会接管决策权，因为经过多年的地下活动，他们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技巧，因此可以为填补1989年阶级结构顶端的真空做更充分的准备。从我们在这里展现的数据来看，人们会怀疑这不是一个天真的假设。那些在某一体制崩溃时渴望权势和填补政治真空的人，未必就具备什么特别的能力。他们所拥有的只有野心而已。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匈牙利更高的精英循环率，可以用1990年时掌握权力的新政治精英相对不足的行政经验和政治经验来加以解释。新的政治官员的经验越少，他们就越不信任那些在共产政权中任过职的下属。因此，他们想跟他们信得过的人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后共产主义的精英（尤其在匈牙利）倾向于相信关于共产主义的阴谋论，并怀疑旧政权的幸存者会试图阻挠新时期的改革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们的共产党前任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做的不同，这些后共产主义的政治精英往往会怀疑他们中的某些人所相信的能力神话。他们争辩说，反共人士在共产体制时期没有机会获得很好的技能，仅仅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工作能力不行而歧视他们是不公平的。此外，他们还争辩说，对经验的过度强调，只会有助于旧共产党精英的再生产并有可能阻碍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旧共产党精英强调“红”胜于“专”，而在匈牙利，“1989年精英”也以同样的方式（亦即讲政治不讲专长）选择他们的政治盟友（尽管现在是反共人士成了老牌的“爱国者”）。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考量的导向下，新政治精英有时会试图铲除他们的下属（尽管下属拥有称职的文凭）并用他们“自己”的跟班（也就是与他们私交好的、他们认为可以信任的人）来替代。因此，新政治精英的亲戚、校友和邻居们因为其个人的忠诚而被提拔上来。

匈牙利文化精英所具有的更高的循环率尤其耐人寻味，我们倾向于从匈牙利新政治精英的社会特征出发来解释这一点。就其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生涯来看，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与俄罗斯和波兰的新政治精英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俄罗斯，存在着一种清晰的、导致“官僚式的种姓”（bureaucratic

caste)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世代地再生产。与波兰和匈牙利相比,俄罗斯的干部子弟更有可能成为干部;这种再生产的模式似乎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得到了延续。俄罗斯的新精英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前干部集团。在苏联,出身于工人阶级或农民的党政要人的比例,要比波兰、匈牙利两国低很多。相反,波兰和匈牙利的党国精英对低层阶级的开放程度更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譬如,在匈牙利,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来自专业人士家庭的子女才大规模地进入高干行列,而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几十年里(也许由于在第二经济中出现了供企业家发财的机会),干部子弟并不特别热衷于从事他们父辈所从事的工作。而在波兰,直到其社会主义阶段终结之际,精英集团都很注重从工人阶级中吸收干部。

1989年,新政治精英的社会来源有了一个突然的改变。无论是在匈牙利还是在波兰,来自专业家庭背景的子女进入精英位置的比例都有所上升。不过在波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人也继续在新政治精英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许是因为团结工会运动于1989~1990年间在波兰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匈牙利,新政治精英则几乎完全来自专业家庭。在1990~1994年间的中右派政党的众议员中,情况尤其如此。执政的匈牙利“基督教—爱国联盟”的干部一般都来自世代的专业家庭,他们因而成为所谓的匈牙利“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嫡系传人。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第一届匈牙利执政联盟的成员,大多数是人文知识分子(比如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而老的党国精英则主要由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组成。因此,匈牙利文化精英更高的循环率,也许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新的政治精英非常看重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结果是,在文化、科学和媒体领域,他们可能拥有代理人并希望获得这些领域中的领导职务。

因此,1988~1993年,匈牙利经历了一场或许可以被称为“政府主导的流动或循环”的过程。新的匈牙利政治精英由于对自己的能力没有把握,于是,他们在人事上推动了一场超出功能性变革所需要的更快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以一种行政管理的风格推行的,人事的任免也更多地基于对个人或政治忠诚的考虑而不是贤能统治的标准。这引发了一种独特的后共产主义的“逆向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庇护比个人能力更加重要。

在波兰和匈牙利,1993~1994年大选竞选活动的动力机制以及议会选举

的最终结果，与我们关于政府管理下的流动机制的假设是一致的。在1994年5月，由老共产党员重新组建的社会党获得了绝大多数匈牙利选民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中的关键口号就是“称职”。通过将自己表现成更有能力的、更懂政治的和更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专家，社会党赢得了选民的信心。以同样的手法，他们将前执政党（即基督教—爱国联盟）描述成一帮妄自尊大的业余人员。在这场选举中，匈牙利选民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精英循环还是再生产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人们是认真地对待了竞选中的口号，那么，这一结果就可以被解读为是对政府主导的精英循环投了否决票。1993年9月波兰的大选，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加以解读。赢得大选的，同样是前共产党的两个继承党。虽然在这次选举中“称职”并没有成为一个直接的议题，但是选举结果暗示了这一点——至少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而这对波兰来说同样是重要的。

当然，说经过重组的共产党因“称职”而赢得大选是一回事，评价他们到底多称职则是另一回事。譬如，在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很难被称为一个“专家政府”。许多新部长和他们的副手之所以获得任命，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党或自由党的政治忠诚。新政府没等多少时间就开始解雇前朝遗老遗少。新政府迅速地将他们解雇，这样就可以建立自己的裙带关系。因此，可能发生变化的不过是政府的颜色，庇护主义的旧逻辑仍然一脉相承。

1993年夏天，我们在三个国家完成了数据收集工作。第二轮的选举——匈牙利是1994年5月，波兰是1993年9月，俄罗斯是1993年12月——则体现着这三个国家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因此，有理由认为，我们从1993年夏天的数据中得出的结果过高地估计了精英的实际循环率。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些选举“纠正”了后共产主义政府最初进行的政府主导的精英循环，而让权力回到了那些在1989~1994年间暂时处在“停车道”上的人的手中。对政治精英来说，情况可能更是如此。在1993年夏天，新政治精英是从1988年的普通公务员阶层实现实质性的上向流动的唯一阶层。

三 元理论上的意义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大多数评论家声称，在东欧的旧共产主义政权内部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突破。然而，没过多久人们就注意到，至少是在经济机构

中，延续性仍然在发挥作用。事实上，早在1992年，戴维·斯塔克（David Stark）就认为，从再分配到市场经济转型的独特特征在于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式的变迁，他还强调了存在于经济管理和财产关系中的强大的内卷化趋势。正如斯塔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变化是从计划（plan）到宗族（clan）的变化：所谓的“私有化”，也许能够被更准确地描述为对公共所有权内部的财产权的渐进式重组；^①而所谓的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也许更多的是再分配制度的一种内卷化过程，或者仅仅是再分配制度的去中央集权化。^②

当我们开始形成我们关于精英研究的假设的时候，我们一直抱有这样一个想法，即东欧在1989年之后的发展也许是不平衡的：经济变迁或许存在着路径依赖和内卷化过程，但政治转变却更可能是革命性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1949年）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1989年）的区别在于：在前一个转型中，打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求打碎资本主义国家；而在后一种转型中，由于打碎了社会主义国家并用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则防止了可能发生在经济制度中的革命性断裂。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样的一种关于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的调整，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是必要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即便在经济上是理性的，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因为它并没有考虑政治周期性的主要特点，因此对落实这种激进的经济改革所需要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估算。试图在经济领域执行休克疗法的政治精英们不太可能拥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一过程：在政策有可能产生结果之前，新的选举就会举行，而当权者肯定会被淘汰出局。如此，民主政治必定会延缓东欧经济变革的步伐。

自1993年夏天以来发生的政治事件和在匈牙利的调查所得出的预期之外

① 参见 David Stark,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lso David Stark,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 From plan to market or from plan to cla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4 (Fall, 1990): 351–392。

② 这一论点是由戴慕珍和林南针对中国的情况提出的，分别参见 Jean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1992): 99–126 和 Nan Li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3 (1995)。对东欧来说，再分配机制以一种新的面貌得以存活下来也许也是存在的。参见 Erzsébet Szalai, "Perpetuum mobile," (1992) in *Otelagazas*, 115–169。另请参见 Eva Voszka, *Privatizacio es Szervezeti Decentralizacio* [Privat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Decentralization], (Budapest: Penzugyutato Intezet, 1991) 以及 Eva Voszka, *Tulajdonreform* [Property Reform], (Budapest: Penzugyutato Intezet, 1991)。

的结果，引导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便是在政治领域，革命也更多地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政治仅仅轮替了一轮，我们就已经观察到后共产主义社会政治轨迹上的一次重大修正。在因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而掌权的新政治精英的修辞中，1989年的系列事件或许要显得更加激进、更加革命。以革命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变化是符合新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的。但公共舆论也许从未接受这种激进主义的大多数主张——即便它曾经一度接受过这种主张，也会很快修正自己的看法。

新政治精英的修辞和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分歧，早在这场游戏开始之初就已经表现得颇为明显。民意调查显示，早在1990年，人们就对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强大的福利国家持强烈的支持态度。新政治精英很快变得激进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人处于反对派的位置，与其说他们是“革命者”，不如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者”更为合适）。只是在最近几年里，他们才开始极力推行自由市场、个人责任、私有化并致力于废除福利国家制度。在一段时间里，新精英们曾认为公共舆论“落伍”于时代，舆论应该最终“赶上”新政治精英们“领先的”思想。但是事与愿违，公众在目睹了福利国家的解体后，开始反对私有化。波兰和匈牙利的选民非但没有对新精英们亦步亦趋，反而在1993~1994年间的选举中给了他们一个教训：公众因为其不识时务的激进主义而反对他们掌权。

在1989~1990年间，现代化理论带着一种复仇的姿态重返东欧。^①一开始，好像是共产体制的倒台带来了“历史的终结”，所有的社会都在朝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模式迈进。然而，伴随着1994年的事件，这些社会演变的方向就变得不再那么明确了。

毫无疑问，即便是在社会党政府的领导之下，后共产主义社会也都处于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党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胜利，并没有将这些国家复归到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后共产主义匈牙利的第一位社会党总理，霍恩·久劳（Gyula Horn）在他的党赢得大选后不久就宣称：匈牙利现在正处在“建设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这些社会党与老的共产党有着根本的不同，用西方政治的术语来说，他们倾向于站在社会民主运动的右翼。当然，变迁中的路

^① 参见 Michael Burawoy, "The end of Sovietology and the renaissance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2): 774-785.

径依赖和内卷化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在转型得以巩固之后，今天的新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变得不再那么清晰。很显然，共产体制乃至前共产体制时期的强大力量，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转型的方向。后共产主义转型的路径依赖和内卷化特征到什么时候才会终结呢？

在对后共产主义的前景和现代化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价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做出了一个多少有点儿冷峻的诊断。他认为，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运作法则“将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法则，而很可能更多地是类似于商业资本主义或如某些人所说的一种封建资本主义的运作法则——这开辟了一种通往第三世界的第三条道路……现代化理论图谋遮掩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它培育出一种关于未来的错误的乐观主义”^①。

欣赏布洛维的理论洞察力未必就一定要分享其令人沮丧的预测。布洛维的绝望，源于他对东欧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失望，以及他对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希冀。^② 根据我们对共产体制之后五年社会变迁的了解，人们不一定非得与布洛维持一样的政治立场，也能够认同他对以下问题的疑惑，即迈向“第一世界”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历史趋同是否不可避免；同时，人们也能够感知经济制度或分层体系的逻辑，对于处在发展道路上的社会的影响力有多么强大。

布洛维的以下看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没有什么能够确保东欧或后苏维埃国家平稳地驶向现代资本主义；相反，它们更可能沦为第三世界；没有什么能够确保其社会结构正在变得“现代化”：社会主义的“逆向选择”并没有被选举的贤能政治所代替，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后共产主义庇护体制或逆向选择机制的运转，无论这些机制是披着“爱国基督教”的外衣还是带有后共产主义—社会党的色彩。

四 结论

到目前为止，从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的精英循环与再生产中，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呢？首先，很清楚的是，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一个简单的精英再生产或

^① Michael Burawoy, "The end," 784.

^② *ibid.*, p. 788.

权力转换的理论。后共产主义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变迁造成的后果是：旧精英中的一些人被推下其权力与特权的位置，因此在阶级结构的顶端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其次，认为这些变化带来了某种革命性的突破的想法同样是不准确的。在我们的报告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抑或是这些制度中掌权者的构成，其发生的变化都是路径依赖式的。主导性的趋势（或多或少）是由“中层”向“上层”的加速流动；有时，新政治精英或许是过于严肃地看待了其革命的修辞（匈牙利1990年和1994年大选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但这导致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因为只要有人试图利用行政的力量来对精英职位进行洗牌，洗牌后的结果很快就会（在下次选举中）被“纠正”过来。

这些分析为萨莱伊的严肃的“精英循环”理论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老共产主义精英的官僚派系被从最高权力位置上清理出去。许多人提前退休，或者从事相对次要但尚体面的工作。晚期国家社会主义精英中的技术专家部分，尤其是经济管理者和中层经理人，则在总体上维持甚至改善了其地位。最后，一些新的空间向那些（通常是非党员的）普通职员敞开了，这主要发生在政治领域，但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也有这样的现象。

吕鹏 译 刘建洲 校

译后记

经典的文献从来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细节的出入而失去它们带给一代代读者的启迪和洞见。相反，历史的和现实的错位总是不断地引导我们重访、反思和发现这些文献中或明或暗的真知灼见。编辑、翻译这本文集的动力即始于此。更具体地说，长期以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和最有原创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教授的著作和文章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相关社会学课程中都是必读文献，其中一些文章还入选了主流的社会学教程。在中国，他的文章一直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教学和科研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学界的许多学者和学生，也都是他文章的引用者、追随者、对话者或批评者。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伊万·塞勒尼文章的阅读和援引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许多文章历时久远或发表在非学术期刊上，国内学者无法便捷地获得，不少学者只能阅读到国内引用率最高的四五篇文章；二是伊万·塞勒尼的文章很多，其中一些在内容上有所重复或后来做了大量修正，国内学者无法很快地辨识出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总之，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利于我们对其思想历程做一个全面和到位的把握，甚至导致一些误读和误解。

出于这些原因，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室主任童根兴提出编纂一本伊万·塞勒尼的论文自选/精选集时，我立刻应允下来。塞勒尼教授本人热情地发来了他亲自挑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清单。我将其中一些已经以中文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剔除，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格局。大体说来，这个论文集反映了伊万·塞勒尼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国家社会主义、后共产主义和新阶级这三个议题上的主要学术观点和思想历程。我相信，许多文章将是中国读

者第一次接触到的。其中，《社会主义社会史大纲或者对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一文，概括了作者写作的“社会变迁三部曲”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历程，具有提纲挈领的效果，因此被当作本文集的导言。

需要指出的是，出于篇幅的考虑，这个文集并没有将塞勒尼教授在2000年后关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二次转型”的作品包括进来（这也是作者本人的意思）。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检索相关的文献。塞勒尼教授本人在生活中曾是一位马拉松运动健将。如今，虽然已经70多岁高龄，他仍然是自己开拓的学术马拉松中的积极参与者和领跑者。我们期待着他正在从事的两个课题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想火花，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需要顺便提及的是，这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塞勒尼教授与他的同事和学生合著的。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塞勒尼本人毫无疑问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们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这个文集里的术语和人名翻译遵从了《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中文版里的做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323页）。限于篇幅，我在此不再做详细的解释。为了方便那些只是选读文集中部分文章的读者，一些关键术语和人名在每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译者都标注了英文。

本文集中文版的出版，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导师孙立平教授和沈原、郭于华两位教授，他们是我们其中几位译者在“转型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引路人，对我组织翻译这本文集给予了精神上的支持。作为“清华社会学教参系列”的直接促成者，沈原教授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的眼光和决策，是本文集得以面世的基础。我还要感谢童根兴先生的提议、督促和帮助。

其次，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三位合作者。这本文集的翻译时间紧，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翻译工作，靠的是他们对这份事业的热忱。在上海行政学院任教的刘建洲于博士论文写作之余鼎力相助，承担了大部头的工作；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王颖曜不仅克服了学业繁重的困难，而且为搜集文献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我长期的挚友和合作者，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的闻翔义无反顾地继续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帮助。虽然本书译者最后按翻译篇幅多少排序署名，但是他们为本书做出的贡献是不分先后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集的翻译是分工合作的产物（四位译者的分工通过每篇文章后的署名表现，全书由我最后统稿），但是，作为本书的

译者，对于译文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译文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故恳请各方专业人士、广大热心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于在将来有机会对这个译本做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如方便，可来信至 great-transformation@126.com）。

吕 鹏